

#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题名（中英对照）：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恐慌情绪蔓延与调适机制  
研究

Research on the spread and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group panic among public health events

作者姓名：罗坤瑾

指导教师姓名  
及学位、职称：林如鹏 博士学位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新闻传播学

学位类型：学术学位

论文提交日期：2022.12.1

论文答辩日期：2022.12.6

答辩委员会主席：张晋升

论文评阅人：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2.12.27

## 摘要

群体恐慌情绪是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领域。学术界对群体传播、恐慌情绪传播、群体集合行为等各类群体性特征具有丰富论述。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将视野放置在群体内部封闭的环境中，忽略了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全球流动背景，媒介化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流动，各种社交平台对信息的共享、交流促使群体间的关系网络日趋复杂，群体间的情绪感染影响因素众多，不能忽视全球媒介传播的大环境影响；二是在媒介化环境下，个体思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在资讯发达的媒介环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宇宙。群体传播中的个体差异化非常明显。按照恐慌情绪影响因素划分，既有基于历史记忆形成的恐慌刻板印象，也有基于道德审判的恐慌认知，还有文化差异导致的恐慌程度不一。

本文要回答的是传播视角下的恐慌情绪传播，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究竟如何构成。从传播主体维度讲，媒介渠道为公众提供资讯，满足信息渴求的同时，也制造了道德恐慌情绪，从历史场域看，长期性、周期性爆发的疫苗安全事故形成人们对疫苗的刻板认知，甚至对疾病的刻板认知。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为例，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由于爆发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未知和弥漫性、病毒的高传染性和致命性、影响的广泛性、防控的艰巨性，引发国际间、各国民众的群体恐慌。从传播客体维度讲，民众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再造、恐慌应对、在现实语境中的恐慌记忆共同串联起媒介恐慌臆想及其对个人健康素养的再建构。从情绪共振维度讲，病毒引发的群体恐慌情绪蔓延已经从公共卫生领域波及了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外交领域、甚至地缘政治、文化、人种问题。引爆国际间的政治理想，病毒政治化、工具化，丧失理性，借病毒来进行政治攻击，甚至引发区域战争，这才是世界范围内的大恐慌。

本文从宏观层面解读群体恐慌情绪蔓延机理；也从微观层面关照疫情下的每个生命个体的情绪传播。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提出了群体恐慌臆想的概念，即对媒介化信息的过度解读，形成夸大事实的恐慌臆念，从而加剧自身的恐慌情绪及应对。二是通过调研数据的剖析、建构群体恐慌情绪的蔓延机理与内在逻辑。

**关键词：**群体恐慌 情绪传播 公共卫生

## Abstract

Group panic is a hot topic i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re are abundant discussions on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roup communication, panic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gathering behavior in academic circles. View most of these studies, however, be placed in groups within a closed environment, ignoring the at least two problems, one is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flow, the flow of the medium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various social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network is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the mood that the group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media communication. Second, in the media environment, individual thinking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closed. In the media environment with advanced information, everyone has a small universe. Individual differentiation in group communication is very obviou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nic emotion, there are panic stereotype based on historical memory, panic cognition based on moral judgment, and panic degree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What this paper wants to answer is the communication of pan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how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s 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object, media channels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satisfy their thirst for information, but also create moral pan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field, long-term and periodic outbreaks of vaccine safety accidents have formed people's stereotyped cognition of vaccines and even diseases. Take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as an example. Due to the uncertainty, unknown and diffuse nature of the outbreak time and space, the high infectivity and lethality of the virus, the extensive impact and the difficulty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worldwide pandemic of the virus has triggered mass panic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ople. From the main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public's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panic response and panic memory in the real context connect the media panic conjec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health literacy. From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dimension, the spread of mass panic caused by the virus has spread from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to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even geopolitical, cultural and ethnic issues. Detonating the outbrea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virus, politicizing, instrumented and irrational virus, using the virus to carry out political attacks, or even triggering regional wars, is a worldwide great panic.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preading mechanism of mass panic from the macro level. We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transmission of each individual under the epidemic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innovation lies in: first, the concept of group panic conjecture is put forward, that is,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information, forming exaggerated panic hysteria, thus intensifying their own panic and response. The second is to build a group panic measurement mode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Key words:** group panic; emotion communication; public health

# 目 录

绪论.....	6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9
一、研究背景.....	9
二、研究意义.....	10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2
一、情绪与恐慌情绪研究.....	12
二、群体传播研究.....	17
第三节 理论基础.....	22
一、情绪与情感.....	22
二、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情感分析.....	22
三、情感社会学理论.....	23
四、社会冲突理论.....	2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7
一、收集资料的方法.....	27
二、分析资料的方法.....	27
第五节 研究框架.....	29
第一章 全球化视域下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格局 .....	33
第一节 媒介化环境下的舆论传播格局 .....	33
一、种族歧视的反智言论.....	33
二、媒体导向的推波助澜.....	35
三、宗教信仰的偏狭、刻板.....	36
四、反智主义的社会思潮.....	36
五、失范与焦虑双重压力的精神重构.....	40
第二节 恐慌情绪泛化的表征：疫苗民族主义 .....	43
一、道德恐慌与疫苗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表征 .....	43
二、疫苗民族主义在疫情时期的道德恐慌表征 .....	45
三、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危害 .....	48
四、疫苗民族主义的道德恐慌规避 .....	55
五、小结 .....	56
第二章 不同场域下的公共卫生事件学术考察 .....	58
第一节 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场域的学术考察 .....	58
一、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研究场域 .....	58
二、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数据获取和参数设置 .....	60
三、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数据分析 .....	61

四、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整体特征.....	74
第二节 全球视域下疫苗安全研究的学术考察 .....	76
一、疫苗安全的研究场域.....	76
二、疫苗安全议题的数据获取和参数设置 .....	78
三、全球疫苗安全研究的数据分析.....	78
四、疫苗安全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85
五、小结.....	89
第三章 传播主体维度：媒介制造道德恐慌 .....	91
第一节 道德恐慌的概念及产生机制 .....	91
一、道德恐慌的概念.....	91
二、道德恐慌的蔓延机理.....	92
第二节 英国 MMR 疫苗事件的媒体道德恐慌.....	96
一、媒介恐慌情绪 .....	97
二、媒介恐慌情绪的维度 .....	99
三、媒介恐慌情绪传播的呈现.....	100
四、媒体制造道德恐慌的舆论偏向.....	107
五、生物权力论视角下的道德恐慌.....	110
第三节 中国疫苗事件的媒体舆论引导 .....	112
一、公共卫生议题的研究缘起.....	112
二、案例选取、研究样本与数据.....	113
三、框架视角下公共卫生议题的媒体呈现 .....	115
四、我国公共卫生议题报道的平衡策略.....	121
五、小结.....	124
第四章 传播客体维度：群体恐慌的媒介臆想 .....	125
第一节 恐慌情绪蔓延：寻找替罪羊、疾病污名 .....	125
一、“猎巫运动”的内涵 .....	125
二、群体情绪传播的数据挖掘与处理.....	127
三、群体情绪传播分析 .....	128
四、“猎巫运动”视角下的群体情绪恐慌 .....	133
五、小结 .....	136
第二节 恐慌记忆形成:群体记忆及媒介恐慌臆想 .....	138
一、集体记忆及问题缘起.....	138
二、研究设计 .....	140
三、影响因素分析 .....	142
四、疫情中的恐慌记忆及媒介恐慌臆想.....	147
第三节 恐慌情绪释放：抗疫 Vlog 的群体情感释放 .....	156
一、媒介按摩研究的文献回顾.....	157
二、媒介按摩的媒介生产实践——抗疫 Vlog 的扎根理论 .....	159

三、 从媒介按摩到情感修复的生产逻辑.....	164
四、 小结.....	169
第五章 情绪共振维度：媒介化环境下恐慌情绪蔓延机理 .....	171
第一节 道德恐慌蔓延与规避 .....	171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德恐慌的症结与回应 .....	171
二、 道德恐慌的蔓延机理与社会根源.....	173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德恐慌的规避 .....	177
第二节 群体动力论视域下的恐慌情绪蔓延机理 .....	180
一、 群体动力论.....	180
二、 情绪及群体情绪感染.....	181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周期的情绪特征 .....	182
四、 群体动力论视域下的情绪蔓延机理.....	186
五、 小结 .....	190
第六章 恐慌情绪疏导与健康传播环境的重构 .....	192
第一节 疏导之策：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 .....	192
一、 极化：群体恐慌的表征及产生机制.....	192
二、 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	196
三、 消除群体恐慌的现实路径.....	199
四、 小结 .....	202
第二节 重构愿景：数字政府治理消除群体恐慌的逻辑、路径与保障 .....	203
一、 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基础.....	203
二、 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206
三、 数字政府的治理路径.....	208
四、 数字政府的治理保障.....	211
五、 小结 .....	213
结语.....	215
参考文献.....	217
附 1 访谈提纲表 .....	237
附 2 访谈对象信息表 .....	238

## 绪 论

从政治选举造势活动到伊斯兰恐怖主义或禽流感、新冠病毒的讨论不一而足。在当今社会肆虐的恐慌文化的起因和后果仍然有很多令人困惑之处。英国学者弗兰克·菲雷迪指出，“面对众多令人担忧的事件，如艾滋病蔓延、未成年人失踪、宗教仪式性侵害、污染和犯罪等，人们要么危言耸听，要么无所适从，大众媒介热衷于为恐惧气氛推波助澜，人为地制造恐慌情绪。”<sup>1</sup>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在世界各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宣传报道在稳定社会情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媒介的传播效果理应一分为二，既有稳定社会秩序、理性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各职能部门间的相互协调，减轻疫情破坏的正面作用；也有扩大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引发社会更多焦虑的负面影响。

历史的悲剧总是不断重演。欧洲中世纪流行的黑死病，让世人至今谈病色变。甚至疾病的污名化标签让某些族群久负骂名，形塑了欧洲人对某些种族群体的刻板印象。今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一样，不同的是，现代媒体资讯体量惊人，连接着全球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媒体舆论导向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这场大灾难的认知和应对，并形成对世界政治传播、媒介传播和文化传播新的认知高度。西方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刊文称，新冠病毒溯源为中国武汉的菜市场。中国学者立即进行了驳斥。但充斥西方世界的舆论偏见却不绝于耳。媒介的舆论导向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和情绪影响呢？

首先，我们应了解公共卫生事件中恐慌情绪的产生及扩散，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民众都感到人心惶惶、极度恐慌。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流行促使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激励了政治机制。在和平时期，人们可能关注积极情绪；而当危机来临时，人们却不得不面对焦虑、恐惧这样的负面情绪，这是无法绕开的政治命题和社会命题。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引发群体恐慌的社会根源。COVID-19 危机也不例外。在充满危机的情感环境中，焦虑、恐慌、不安、质疑等各种情绪相互交织、冲突和碰撞。霍布斯（Hobbes, 1985）认为，“恐慌是一种谨慎的激励动力。恐慌是人类的同伴驱使个人建立能够减轻不确定性的社会契约。”<sup>2</sup>恐慌本身可以成为政府的社会控制工具。霍布斯指出，在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恐慌，并且任何法律制度都暗含着“最小程度的恐慌”，以激励人们遵守法规。

然而，随着“情感转向”和对经典公民身份观念的重新关注，霍布斯和什克拉等人在政治哲学中占据了非常小的位置。当人们批评政治中缺乏对情感的关注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2018）将恐惧描述为一种内在的自恋情绪，与完全成熟和公民身份相对立。在大规模的恐慌购买和囤积中可能已经看到了自恋的恐惧。从历次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中，我们看到，民众在危机爆发之初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慌情绪及相应的抢购、囤积物质等集合行为。随着危机的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也会随之消解。然而，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恐慌情绪既有个体健康素养、风险感知等差异，也有社会集体意识的衰落，个体生命价值受到极度重视的社会风气转向使然。加之，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民众恐慌情绪即使在消解后也形成恐慌记忆，成为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加深民众的恐慌想象。

**其次，在群体内部传播过程中，群体恐慌情绪的蔓延受到群体的怎样影响？**  
按照群体动力论观点，人们在相对集中的环境中容易产生情绪冲动的行为，这场流行病在数百万人中引起的焦虑，“被圣战组织和极右翼恐怖组织利用来传播阴谋论，旨在煽动对他们所谓的敌人的仇恨，鼓励容易攻击、易受攻击的目标，以及旨在推翻政府和推动恐怖分子议程的蔓延。在大流行初期，反亚洲仇恨犯罪激增。”<sup>3</sup>从各种传媒渠道可见，某些亚裔族群在这场危机中被污名化、标签化、刻板化，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而这种暴力袭击更加剧了某些暴力、偏激的人无知、野蛮行为，也容易形成错误的群体示范效应，刺激群体的盲目效仿。因此，疫情爆发之初，多地连续发生亚裔族群被攻击的暴力行为。极端主义团体并没有停止播下他们自己的恐怖烙印。“他们正在利用安全漏洞以及大流行给社会带来的普遍负担，并推动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治疗恐惧、沮丧和恐慌的方法。”<sup>4</sup>

群体恐慌情绪既有显性的表现，如暴力攻击、抢购、囤积药品、生活用品等集合行为；也有隐性的表现，如寻求媒体资讯、多方渠道获取医疗信息来补充对病毒的认知，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在社交化媒体环境中，各种网络社群内部传播中，信息流动对群体的刺激不言而喻，个体裹挟在群体传播中很难做到清风不扰、两耳不闻。尤其是疫情爆发初期的微信朋友圈几乎爆炸性刷屏，人人自危；各个微信群被各种真假难辨的疫情信息所淹没，个体在群体互动交流中更是由掺杂着虚假信息所激起的恐慌情绪，在群体的感染与示范效应下呈倍速地增长。

再次，媒体道德恐慌传播对群体及个体产生的连锁反应，形成了怎样的情绪共振效应呢？大多数关于恐慌文化的报道认为，媒体在传播危言耸听的信息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一名记者曾用“福克斯新闻恐怖工厂”来描述致力于制造恐怖故事的媒体产业的形象。<sup>5</sup>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家玛吉·科尔(Margee Kerr)认为，媒体和“我们获得新闻的直接性”是“我们现在为何比两百年前更加恐惧”的原因。科尔指出，不断浏览新闻“会让人感觉更有激情”。19世纪，对媒体破坏力的恐慌性报道本身即是当今恐慌文化的早期版本之源头。谴责媒体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这一危言耸听的做法类似于其所批评的做法，即采用如涡轮增压般的夸张性修辞。

自“9·11”事件后，“媒体由于对暴力的反常迷恋以及受利润驱使全天候不停顿地报道”应该为公众灌输“危险意识”和“无力感”承担责任。赛琳娜·哈珀和布鲁斯·吕西尼昂教授总结道：“在意识到美国面对这种渗透和侵略竟然如此脆弱而感到震惊之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向一种恐惧和顺从的文化。”<sup>6</sup>我们看到，美国疫情危机直接引爆了民众冲击国会大厦，其景象与当年攻占巴士底监狱何其相似！民众在极端情绪感染下，其爆发出的冲动行为难以预料，无法遏制。群体恐慌情绪、恐惧情绪、怨怒情绪等杂糅成为仇恨政府的对抗情绪，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的集合行为。这其中，媒介制造的道德恐慌将群体引向了质疑政府的对抗斗争中，显露出群体的盲从、非理性情绪。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与灾难。各国、各地区、各种族、各民族的群体都经历过群体恐慌、焦虑、担忧、不安、疑惑等复杂情绪斗争的阶段。两年来，我国在这场伟大的战疫中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生命安危为己任做出巨大牺牲，捍卫了国家的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大数据信息传播与飞速扩散的媒介化环境下，在媒介信息传播无国界、无边界的跨越式“元视域”下，疫情的传播与扩散迅猛、猝不及防，公众的焦虑、愤怒、悲伤、恐惧等负面情绪在公共空间里经评论转发成难控信息；外媒在疫情中不断制造“中国病毒论”、“种族歧视论”等荒谬论调，混淆视听，裹挟在舆论信息里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甚至真伪难辨，疫情传播期间常伴谣言病毒式感染，或疫苗致死谣言、或双黄连口服治病谣言等诱导公众。

在媒介化高度拟态、仿真的传播语境中，公众的健康素养能力、医学认知能力、个人心理素质、媒介认知能力等都影响到个体情绪的差异，对舆情严重程度的应急反应能力不一。现实中的情况，疫情严重的区域，民众未必都很恐慌；疫情不严重，甚至几乎没病例的区域，民众反而非常恐慌。原因很多，其中我们要探究的是在媒介化环境中，民众的恐慌来自于对媒体制造恐慌的一种想象，或者说，民众的恐慌情绪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媒体信息误读所产生的恐慌臆想。

我们需要分辨网络场域中的用户如何受网络传播语境的影响，在网络空间里形成恐慌情绪氛围。在现实的社会场域中，民众又是如何受到媒介信息的影响而产生恐慌情绪。故研究群体性恐慌传播路径、传播规律，探究其社会根源、影响因素及其权重，构建恐慌度量模型，探索缓解群体性恐慌之策，建立调适机制是当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性、临时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此类事件中群体情绪感染、传播规律和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还关注了长期存在且呈现规律性爆发的疫苗问题，如我国近20年内发生的多起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都是与疫苗安全有关。回顾疫苗医学史，世界各国都曾经历疫苗安全危机而爆发过大规模的流行病危机。历史上，民众因为拒打疫苗而导致流行病爆发的案例比比皆是。我国目前尚无此先例，多数民众依然信赖疫苗接种预防疾病，

但从以往间歇性爆发的疫苗事件来看，民众已经存在疫苗的认知偏见而排斥疫苗接种的恐慌情绪。可以说，疫苗接种意愿不仅涉及个人身体健康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问题。通常而言，公众的疫苗接种态度与媒介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媒介在担任医疗科普、风险认知方面具有很大影响。

## 二、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从学科建设来说，研究群体恐慌有助于提供群体性恐慌情绪蔓延的研究新范式，拓展群体传播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凸显的各种社会性焦虑情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恐慌情绪等交织在一起，探讨群体恐慌情绪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能够更好第拓展“恐慌是对现实社会不确定性风险的感知与存在的集体焦虑”的新视角，它将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情绪，在后疫情时代里尤为凸显。即使疫情已经消退，群体情绪并未完全放松，在条件反射性的社会实践体察中，群体已由社会性焦虑上升为条件反射性焦虑，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社会心理的多维度解读。

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说，多学科理论的相互融合，延伸群体动力论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斯梅尔塞认为，所有的群体性行为、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发生，都是由 6 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 6 个因素即是：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触发因素、行动动员、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当这些因素以孤立的形式出现时并不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有当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时，它们的价值才会被放大，群体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从研究方法来说，本文运用了数理模型与数据统计构建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恐慌度量模型；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一种创新性的探索。本文也运用多种方法获取数据，如利用数据挖掘工具获取疫情反复中的“广州阿婆事件”、“成都女孩事件”中的网民评论文本，并借助软件工具分析两起事件中网民的情绪态度、情感立场以及情感倾向，运用“猎巫运动”理论来阐释网民态度的社会心理机制。运用深度访谈法了解广州、武汉、贵阳三地（东、中、西部）民众的恐慌记忆，通过回顾疫情中的亲身经历来总结恐慌情绪蔓延的影响因素。运用可视化方法呈现全球疫苗安全的研究议题以及中国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热点，进一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研究素材。

## （二）现实意义

恐慌作为一种情绪，与环境、认知、行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情绪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认知则是外部刺激和情绪之间的中介，是情绪产生的根本条件。因此，有什么样的外部社会环境，有什么样的社会认知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

情绪与社会事件类型或运动类型具有天然的对应关系。社会运动容易产生愤怒情绪。社会运动多为社会性结构压力让人们产生打破社会结构的社会情绪。而突发事件，地震、火宅、海啸、飓风、暴风雪等自然灾难，暴力袭击、群体踩踏、传染性疾病等社会性灾难，容易让民众产生群体性恐慌情绪。因此，突发事件与社会情绪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我们既可以从中探索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中探索群体情绪变化的脉络；也可以从群体情绪呈现的规律、特征中反推各类社会问题，探究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解读角度和解读方式。

首先，我们通过群体恐慌情绪总体状况的分析，了解当前社会公众的总体精神状态，进而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其次，通过对群体恐慌情绪形成的社会机制的分析，尤其是对群体恐慌情绪的初始状态和转化中介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或社会问题较集中的领域。

再次，从社会安全的视角而言，研究群体恐慌情绪的蔓延机理有助于降低社会风险，缓解群体焦虑，释放群体恐慌情绪，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增强政府公信力。群体恐慌情绪的触发点往往是认知上的简单归因，将一切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政府不作为、不善作为、不主动作为或是善治效果不好等，继而引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因此，缓解公众焦虑情绪有助于增进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

最后，从实践操作而言，本文在探究恐慌情绪蔓延的根源上提出重建健康传播环境的路径，丰富拓展公共应急管理案例，为公共卫生管理部门提供实践指导。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情绪与恐慌情绪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恐慌事件并不鲜见。“15、16世纪西欧发生过可怕的巫术恐慌。1940年6月，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军队合围巴黎之际发生的大逃亡。中国18世纪发生过‘叫魂妖术’引发恐慌，1900年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普遍恐慌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大恐慌引人注目。”<sup>7</sup>关于疾病与战争造成的人类恐慌，美国作家威尔·杜兰在他的巨著《世界文明史》中写道，“雅典城内人口的过分麇集导致了异常瘟疫蔓延了将近三年，死去四分之一的军队及大量的老百姓。雅典人民陷入了传染病与战争的双重煎逼之中，痛苦不堪……”<sup>8</sup>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这场瘟疫不仅夺走了人的生命，还对人的生活秩序、道德观念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瘟疫，也开始有了违法乱纪的情况。现在，他们明目张胆地冒险做一些事，这些行为在此前是不敢公开的。”<sup>9</sup>可见，疾病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对群体情绪的干扰极大。

近代以来，随着群体和群际情绪评价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情绪在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从个体范畴发展为群体和社会范畴，产生了“社会情绪”的概念，关于社会情绪早期的定义有：沙莲香（2016）认为，社会情绪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境的知觉，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验，这种知觉和体验对个体或全体产生指导性和动力性的影响”<sup>10</sup>从这个定义，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情绪不是简单的个体情绪反应（如愤怒、忧愁、悲伤、焦虑、恐惧、欢喜、兴奋等），更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和行动意愿等，尤其是在媒介化环境下，群体在传播互动中受到媒介信息的干扰与群体间感染，形成社会化的认知结构。

“恐慌”最早作为引发传播事件的心理现象被发现。对传播过程中恐慌的论述最早出现在坎特里尔的《火星人进攻地球》研究中，对媒介引发的大范围恐慌事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Jay Blumler&Stephen Coleman（2021）指出，全球的经济政治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处于动荡之中，动荡已经成为了“新常态”。<sup>11</sup>关于群体恐慌的概念，目前尚无定论。国内学者廖皓磊等（2020）做过这样的拆分，“恐慌”的概念被定义为恐惧+惊慌，就是因受到各种强烈的信息刺激后，感到自己的健康（包括）生命都受到威胁时的内心反映，这种对突发事件（信息）

引起的内心不安的特殊反应，是人类面临某种危险情境时的一种心理活动状态。

<sup>12</sup>社会学家鲍曼的定义强调了恐惧是对威胁的不可预测性，“恐惧”是我们赋予不确定性的名称。学者童小溪（2020）等提出需要对群体恐慌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因为社会大众的突发性恐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即所谓的“社会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舆情具有“恐慌”的典型特点，比如非理性、情绪化和容易蔓延。当代舆情的主要载体是互联网，并随着自媒体的增长而泛滥。“舆情”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群体恐慌形式，被视为“次生舆情灾害”。<sup>13</sup>这种观点将恐慌情绪与社会舆情相联系。笔者认为，群体恐慌的定义应该进一步明确，将群体恐慌的概念界定为社会中的群体受到强烈的信息刺激，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经过群体感染快速蔓延成为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互联网中群体恐慌容易产生舆情事件，具有非理性、情绪化的特点。

不同学科对群体恐慌都有所涉猎，也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呈现出群体恐慌研究的繁荣景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利·科恩（1973）阐述了“道德恐慌”概念的文化内涵，他认为“道德恐慌”是一种社会过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某种事件、个人或群体显现出来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构成的威胁。<sup>14</sup>Nickie D. Phillips 等（2020）认为，在博客、论坛、电子邮件、脸书、推特和其他互联网网站的帮助下，关于亚裔群体的负面隐喻和负面形象比过去更有效地传播给互联网受众。道德恐慌又被隐喻为“民间恶魔”，被认为是更大社会问题的替罪羊。<sup>15</sup>邵培仁（2007）的媒介恐慌论认为，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当一个公共事件发生了死亡事件，媒介就会立即开足马力，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报道，媒介这种渴望发生大新闻的心理和面对突发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兴奋状态，容易引发非理性的恐慌情绪。<sup>16</sup>舒尔茨等（2015）认为，由于主流媒体拥有话语权，它能够对灾害预警下的大众行为进行“情境定义”，这就是“恐慌神话”能够持续持久不衰的原因。<sup>17</sup>

Matt Carlson（2018）在奥巴马当选前后，与“社会主义”和“敌基督”相关的搜索量显著增加，表明奥巴马的“民间恶魔”形象日益严重的道德恐慌。

<sup>18</sup>Yvonne Villanueva-Russell（2009）指出，脊椎指压疗法被贬低并被贴上民间魔鬼的标签，因为它们代表了对正统医学专业主导地位的哲学威胁和竞争性财务

挑战。患者接受脊椎按摩后中风身亡的事件，在1992–1997年总共有六个报道，当时还没有引起群体恐慌。1998–2000年报道激增，出现了有明显偏向性的评论。该研究展示了新闻媒体的报道与道德恐慌的关系，以及社会恐慌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进行话语建构所致。社交媒体通常被指责为假新闻的传播制造了条件，没有履行公共职责。

在道德恐慌中，新闻界对假新闻的谴责被定义为“信息道德恐慌”，在假新闻报道中，焦虑并不是针对特定群体，而是针对社交媒体使信息空间的更大转变成为可能。<sup>19</sup>Anuja Hariharan等人（2017）指出，数字媒体为道德恐慌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导致羞辱事件和更个性化的焦虑表现。<sup>20</sup>Dubé等（2016）指出，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是因为在线传播关于疫苗的负面信息和对疫苗知识的缺乏。<sup>21</sup>Blume Stuart（2006）结合英国和荷兰关于反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证数据，对两国反疫苗接种所造成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进行科学解释。<sup>22</sup>P. R. Warda等（2017）探讨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度与寻求适宜的沟通方法，研究父母对孩子接种疫苗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sup>23</sup>Judith Petts等（2004）研究父母对官方信息反应、与免疫接种专家接触如何影响父母处理信息等。<sup>24</sup>李梦瑶等人（2021）指出，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传播让个体觉得自己更能理解和影响政治，政治互动会削弱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弱化民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sup>25</sup>

李香平认为信息时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谣言传播速度加速，导致恐慌蔓延，强调政府应做到信息公开，引导公众正确使用信息。<sup>26</sup>王佳佳等人（2021）通过建立谣言和恐慌情绪并行的双传播模型，运用仿真模拟的方法，发现当谣言达到一定的传播阈值后，与之对应的恐慌情绪的传播阈值则会降低，反之亦然；同时发现恐慌情绪与谣言是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sup>27</sup>禹卫华（2011）基于第三人效果框架，以手机传播谣言为分析文本，发现谣言传播过程存在认知偏差，指出信息特质和对他人行为预期是群体恐慌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提出及时发布可见可感的信息，确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媒体权威平台等措施来降低群体恐慌。<sup>28</sup>

部分研究从心理学视角，以微观视角聚焦于恐慌情绪与模型。国外研究多从医学角度展开。如Richard E. Adams（2011）的研究表明，事件周围的恐慌症发作预示着未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通过实践性探索，构建了群体性恐慌与创伤后应激反应模型。<sup>29</sup>Anthony R. Mawson（2005）讨论恐慌模型对预测社

区对恐怖主义袭击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反应影响。<sup>30</sup>Bonifacio Sandin 等（2015）考察了三种主要认知因素（即焦虑敏感性、身体症状的灾难性误解和恐慌自我效能感）在预测恐慌症患者中严重程度的贡献。<sup>31</sup>

在认知心理层面，DAVID M. CLARK（1986）认为，恐慌认知理论的核心是个体对程序感到愉快或厌恶的程度取决于认知因素。<sup>32</sup>Steven Reiss（1991）认为恐慌被视为对身体某些感觉的误解造成的，把正常的焦虑反映认为是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症状。<sup>33</sup>Peter Hayward 等（2000）认为，过度通气的身体反应实验检验了恐慌认知模型并认为惊恐是强烈的恐惧，普通的恐惧有时是由于对强烈恐惧的预期引起的。<sup>34</sup>YlaTausczik 等（2011）分析网络行为对理解公众焦虑及沟通有着重要作用，<sup>35</sup>Meghan Bridgid Moran（2016）为疫苗信息内容、说服策略类型、反疫苗宣传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规范等信息进行编码。<sup>36</sup>

Bingsheng Liu 等人（2021）的研究表明，政府公开信息不一定会减少公众恐慌，可能还会放大恐慌，因为公开信息会放大居民的风险感知，效果取决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想要减少群体恐慌首先要树立地方政府形象，增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缓解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恐慌情绪。<sup>37</sup>冯露等人（2021）指出，在公布灾难信息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因为很多公共突发事件是自然现象而不是道德现象，在道德审判的高度上赋予一定的意义，容易产生舆论暴力使得当事人社会性死亡。<sup>38</sup>James Price Dillard 等人（2020）研究表明信息寻求的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它们将取决于发现的内容。恐惧既可以作为信息寻求的原因，也可作为结果。<sup>39</sup>在对负向情绪的处理上，陈芬芳等学者（2021）提出表达性写作对个体和心理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表达性写作需要在情绪体验后进行情绪调节才能达到最好效果。<sup>40</sup>

陈卫明等人（2019）将现实社会恐慌情绪与心理学人格特征理论结合，建立恐慌情绪传播模型，认为在外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群体对于环境的刺激会诱发恐慌情绪的蔓延，不同群体的感染和恢复速度不同，情绪的恢复率会加快恐慌传播，但也能降低恐慌程度，为了解社会恐慌情绪的形成提供参考。<sup>41</sup>Sminther（2007）用 AMB 模型研究群体成员间情绪交互的特点，发现群体情绪传染是反复互动中产生，会发生循环作用。<sup>42</sup>王瑞祥等人（2021）基于传染病传播模型构建了 NPCN 恐慌心理蔓延模型，加入干预因子优化模型后进行模拟结果对比分析得

出恐慌人群随着恐慌率和冷静损失率增大而增大，在加入干预因子后，恐慌人数下降，以此说明采取干预措施能够抑制恐慌情绪蔓延。<sup>43</sup>王欣等人（2021）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新冠疫情期间民众对恐慌情绪的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极化，如果民众对疫情风险感知越高，会降低应对行为。<sup>44</sup>

有从管理学视角探究群体性情绪的疏导路径。宋之杰（2017）编制突发公共事件情绪感染本土化研究工具，用以评估突发公共事件下公众情绪感染敏感度。<sup>45</sup>也有学者从心理学视角关注公共卫生中群体心理调适机制，如刘宏等（2017）指出，应侧重女性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和低年龄青少年的不良应对方式，心理干预应将消极应对方式的调整和改变作为重点，<sup>46</sup>秦昕（2011）揭示了民众对于甲流的了解程度、疫苗安全感知以及风险认知的情况，<sup>47</sup>高文斌（2003）指出，SARS 流行期间及时开通公众心理咨询热线，为缓解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正常秩序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sup>48</sup>从宏观层面探索恐慌度量模型。国内有关群体性恐慌度量模型实证性研究尚不多见，其中，陈曦（2009）在计算实验理论、Agent 建模技术等信息技术基础上，通过计算实验数据对公众恐慌进行动态度量等。<sup>49</sup>此外，吴鹏等（2016）从系统仿真和舆情监测等视角提出了多样化的群体性恐慌评价体系指标，为进行实证筛选以及信度和效度上的验证，因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较弱，据此构建的评价体系难以用实际测度群体性恐慌程度及动态变迁状况，导致对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害认识多停留在感性描绘阶段。<sup>50</sup>

论及群体恐慌的发生机制时，廖卫民（2011）提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风险性信息的传播过程进行理论模型建构。一是风险性信息传播微观策略博弈模型，研究了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恐慌情绪，并且是怎样蔓延到社会上的；二是风险性信息传播的宏观动力模型：研究了影响一条风险性信息是否能大面积流行传播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最初有多少人相信、风险性信息的接触率、接受信息后能正确处置的康复率；且三者之间存在某种数量关系特征。<sup>51</sup>李季梅等（2009）从突发事件传播过程中搜集流言作为样本，分析网民的恐慌心理及建构恐慌度量模型。<sup>52</sup>余乐安等人（2016）通过研究政府的危机信息公布策略和网络舆情扩散构建了多主体模型。<sup>53</sup>吴鹏等（2016）提出，用 BDI-Agent 模型模仿网民的心智状态转换过程，对多主体模型进行深化，并用于网络舆情中各种主体的进行仿真预测模拟。<sup>54</sup>关文玲等人（2021）基于动力系统学去建立紧急状态下人员恐慌动

力学模型，由于自身恐慌和恐慌传播效果显著，恐慌人数激增，随后在自我调节和环境正向作用下，人数小幅下降，对紧急状态下消除恐慌情绪，做好应急疏散工作具有指导意义。<sup>55</sup>胡象明等人（2020）发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会引起社会性次生灾害风险，次生性社会稳定风险存在恐慌型社会稳定风险和压抑型社会稳定风险两种生成逻辑，分别出现于突发性事件的前期和中后期。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要防范次生性社会稳定风险，对不同逻辑路径采取不同的策略精准施治。<sup>56</sup>

综上所述，国内外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涉猎较广，杂糅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既宏阔俯瞰也探微揽胜，呈现出学界对该领域的深切关照。然而遗憾的是，现有成果缺乏系统地研究群体性恐慌成因问题，在群体性恐慌情绪蔓延的实证研究存在几个重要问题亟需解决：其一，恐慌数据的客观性和充分性。现有成果的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多为有限样本的验证，缺乏大规模数据的精确分析；其二，恐慌指标的一致性。由于缺乏合理、一致的衡量准则，恐慌结构化度量构建一致是个难题；其三，恐慌情绪的实时性和可持续性。传统调研模式难以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恐慌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权重给出差异性分析，无法对群体性恐慌的动态演变趋势，尤其是对特定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进行持续跟踪分析。新媒体用户的表达情感倾向与其恐慌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考虑到网民的非理性表达和网络虚假信息等不利因素影响，本文将在线下展开全国范围内深度访谈作为补充，以使群体性恐慌情绪蔓延规律更加客观有效、适用性更加广泛。

## 二、群体传播研究

在 21 世纪，传统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互融合，呈现出新的网络生态和社会趋势。西方学者对群体传播的研究起源于心理学领域。最早对“群体”进行论述的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他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出，群体不仅智力低下，而且感情的波动、行动的动机上都与个体大为不同。<sup>57</sup>勒庞认为，群体行为可能是突然的和极端的。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当它成为集体时，群体心理很容易受到群体统一律和群体成员的感染，从而造成大规模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认为集合行为由以下要素组合——环境条件、结构性压力、诱发因素、行为动员、普遍情绪的产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

社会控制能力——造成社会集体行动。<sup>58</sup>日本社会学家田宗介认为，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sup>59</sup>郑永廷等学者指出群体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体更为注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相处过程中的真实感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庆光认为群体之所以称为群体，需要满足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高度的协作意愿和群体传播三个基本要素。<sup>60</sup>可见，群体传播是组成群体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群体传播难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群体。

学者对群体传播特征的认识主要从其与组织传播的区别展开。段京肃给予群体传播的定义为“一种规模较小又非专业的群体内进行的传播”，用“非专业”一词给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划定楚河汉界。<sup>61</sup>隋岩将群体传播定义为非组织群体内成员之间自发的、非制度化的传播活动，更为强调群体传播的非组织性和非制度化。<sup>62</sup>可见，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最大的区别在于群体性质。魏永征指出，组织传播是指特定的组织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它是非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种自发性活动，在信息传播与交流沟通过程中没有需要恪守的规则和条令，传播环境较为宽松和谐。<sup>63</sup>关于互联网群体传播，胡翼青认为，新媒体解构了大众传播的主导地位，显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交流。<sup>64</sup>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相关议题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认为互联网群体传播是包含网络虚拟社区、社会化媒体的社群等。<sup>65</sup>隋岩将互联网传播场域看作是一类群体传播，指非组织群体内成员与成员之间自发的、非制度化的传播活动。<sup>66</sup>

群体传播研究早期主要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小众群体研究，如宗教信仰、日本动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播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群体传播与传统群体传播具有较大差异，出现了一些新的议题和动向：一是探讨群体传播中的情感化传播问题。以情感为导向进行传播成为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内在动因。二是关于群体传播受众的研究，相较于过去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群体传播的主体性崛起，带来了话语权的转变。三是探讨网络语言对群体传播的影响研究，网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符号意义的生态圈，网络语言在促进群体传播和构建网络叙事中具有重要作用。四是探讨群体传播的发散性（相关性）研究，群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在

政治传播中存在显著表征。综合考虑词频、研究热度、媒介学术史等因素，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目前群体传播的核心议题进行梳理。

其一，互联网群体传播与情感化传播研究。互联网群体结构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隋岩基于微博的定性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网络群体传播背景下带有情感的内容是信息扩散的重要因素。<sup>67</sup>群体传播中情感、情绪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传播表征以及如何利用情绪进行群体传播。互联网不仅提高了社会情绪的“能见度”，还拓展了情绪传播的覆盖面。<sup>68</sup>人们从身份认同到形成社群再到交流分享都离不开情绪，情绪作为一条主线，串联起群体传播的整个过程。相较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都更广。<sup>69</sup>这就是网络群体传播反向社会情绪的放大效应。反向社会情绪的放大效应是造成社会环境不稳定的因素之一。<sup>70</sup>尤其在危机事件中，恐慌情绪传播导致了群体性认知障碍。赵云泽等学者认为，通过降低大众的恐慌情绪消除认知障碍才能确保大众回归理性。<sup>71</sup>

步入后情绪时代，个人情绪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sup>72</sup>个人情绪社会化传播会对网络舆论带来负面效应，如各种负面情绪的滋生和蔓延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影响官方舆论场，进而影响到政府、机构的决策。互联网群体传播中受众倾向于情感化的内容，个体观点的情感化表达成为常态，许多学者认为受众在互联网环境下呈现出非理性、情绪化的宣泄，加速了社会话语的撕裂，影响政府、机构的决策，因此强调大众要回归理性。有学者指出，受众的感性认同也可以建立共识。<sup>73</sup>如在“饭圈出征”中的互联网群体传播，网民通过构建身份认同和道德感，以爱国主义为情感链接的集体行动，情感能量得以释放。<sup>74</sup>情感在群体传播中发挥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如何引导受众情感促进社会整合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而“利他情感”在群体传播中的动员效果较为明显，如在接种新冠疫苗的宣传研究中，利他情绪的叙事信息有助于公民配合进行疫苗接种。<sup>75</sup>

其二，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受众研究。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受众不仅仅是主体性的崛起，还伴随着社会权利和结构的变迁。受众以新的角色进入到传媒生态中，从受众群体传播的方式看，出现了在网络平台进行界面传播的新受众；从利己的角度看，出现了以获取社会资本的新受众；从利他的角度看，出现了以分享自我资源的新受众。<sup>76</sup>在移民群体中，受众使用社交媒体不仅是为了移民群体成员的内部交流，更是为了与本土居民建立关系。<sup>77</sup>但也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导

致了主体的异化，如张冠文从批判学的视角探讨了微信朋友圈“点赞”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情绪认知需要，它是迫于某种压力产生的趋同心理和集合行为，这是一种主体的异化导致的非理性交往。<sup>78</sup>群体传播加速了谣言、流言的传播速度。有研究表明，虚假信息的传播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媒体和政治环境。在以共识为导向的民主国家，意识形态对虚假信息的影响较小，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正在撕裂社会话语，如美国传播虚假信息的意愿总体较高。<sup>79</sup>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是一定加剧了群体传播的非理性行为，如在群体决策中，匿名成员贡献了更多不认同的表达。<sup>80</sup>孔倩在研究中发现微信中群体传播对谣言具有自我净化功能。个体在微信上的“虚拟自我”是高道德性和真实性的“自我”，谣言虽在社交媒体中快速传播，但当人们获知权威消息后，谣言最终不攻自破。<sup>81</sup>

其三，网络语言对互联网群体传播的作用研究。网络语言是互联网产生之后出现的网民创造与狂欢的文本形式，成为互联网群体传播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网民表达意见、交流思想和情感沟通的重要工具。目前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包括网络语言对话语权的影响以及对个人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话语即权力”，网络语言的产生预示着一种话语权的变迁。网络语言虽然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力格局，但同时也衍生了新的问题。网络语言以草根化、戏谑式的表达方式进行模因化传播，而模因以幽默的方式扰乱和重新塑造了政治，它构建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边界，这既可能创造团结的政治身份，也会促使两极分化严重。<sup>82</sup>网络语言具有社交属性功能，赵乐平将网络语言分为三种形态，即以改变符号能指的方式而形成的网络语言、网民共同参与而形成独特文化圈以及由特定的社会事件触发而形成的文本。<sup>83</sup>网络语言的社交属性在群体传播的推动下，不断产生意义的交流和传递。多传播主体的相互交流建构了网络叙事，网络叙事是群体进行传播和互动的结果。隋岩认为多传播主体参与到网络叙事中，造成了网络叙事在时间上的多维性、情节上的未完成性，促使网络叙事行为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复杂关系。<sup>84</sup>网络叙事的文本客体、传受主体和网络群体传播环境之间构成相互阐释的意义系统，群体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文本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的互文性，使得网络叙事在呈现高度的流动性。<sup>85</sup>

其四，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发散性（相关性）研究。群体传播的理论性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库利将群体分为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勒庞认为群体是极易受到感

染的人，容易引发集合行为。但是以往在传统媒体时代，群体往往是在一定物理空间组成的一定量的成员，群体传播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生产方式和扩散机制发生嬗变。隋岩等学者认为，群体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相互作用，改变了社会信息的生产方式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群体传播信源的不确定性通过人际传播使信源得以确定并产生信任；人际传播依靠群体传播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因此，群体传播为谣言、流言的泛滥成灾提供了温床。<sup>86</sup>田维钢等学者总结出群体传播时代的四种风险类型——虚假信息、谣言蔓延、水军炒作以及网络暴力，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sup>87</sup>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媒介生态格局，伴随而来的还有话语权力的变迁和话语体系的变革，推进民主进程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网络群体多元化给政治生态带来了新变化，多元的群体传播形成多元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结构和政治行为结构。<sup>88</sup>一项探讨 2018 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群体间态度研究证实，群体的政治认同与群体间的偏见和不妥协正相关。<sup>89</sup>这种偏见化、不妥协态度对政治生态治理带来巨大挑战。而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sup>90</sup>

综上，学界对于探讨群体传播的网络话语建构以及群体传播的相关性研究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学界对于群体传播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点关注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群体传播模式对信息传播方式以及传播领域秩序存在的潜在影响；二是绝大部分研究将着眼点放在群体传播的表征和机理上，且对于群体传播的负面影响展开热烈讨论；三是在对于群体传播的研究方法上，实证调查法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并普遍应用。可拓展空间：一是与势头正旺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活动相比，学界对于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影响力研究较为欠缺。之前的研究集中于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概念、特征等基础研究，对于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形成机制、社会影响还有待深入。二是前一阶段的研究仍旧停滞于对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描述性研究，对于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实证研究仍旧留白，倘若想要探析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本质规律，则需要经验性研究作为数据支撑。三是过去的研究大多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互联网群体传播问题进行探讨，对于微观及某一特定领域的互联网群体传播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如公共突发卫生事件背景下的互联网群体传播研究、基层治理角度下的互联网群体传播研究等。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一、情绪与情感

按照我们的理解，情绪（emotion）和情感（feeling）是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概念。在日常使用中，人们往往也能够细致体察到情绪与情感的细微差别。“情绪具有较大的情境性、激动性和暂时性，往往随着情境的改变和需要的满足而减弱或消失。情绪代表了感情的种系发展的原始方面。……情感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sup>91</sup>西方学者 Plutdnk 提出，人类情绪的类型可划分为八种，恐惧、气愤、欢乐、悲伤、接纳、厌恶、期望、惊讶。<sup>92</sup>Bollen 等人将情绪状态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s, POMS）进一步研究，将情绪划分为六种：紧张、沮丧、愤怒、活力、疲劳和困扰。<sup>93</sup>通常来说，情绪被划分为正面、负面和积极、消极等方面。Izard 提出了差异情绪量表（DES），按情绪态度倾向性将情绪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大类，建立了个性情绪指标。<sup>94</sup>其中，正面情绪包括高兴、快乐；中性情绪为惊讶；负面情绪（内部因素造成）为生气、厌恶和鄙视，负面因素（外部因素）为罪恶、含羞，负面因素（情景因素）害怕、悲伤。此外，Mehrabian 还提出 PAD 三维情感模型，将人类情感投影到 P（Pleasure-displeasure）、A（Arousal-nonarousal）、D（Dominance submissiveness）组成的二维空间中。<sup>95</sup>情绪感染理论最早由 Mc Dougall 于 1923 年提出，他认为情绪感染为：“通过原始性交感神经反应产生的情绪直接感应法则”。<sup>96</sup>

#### 二、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情感分析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 1893 年的《社会分工论》中，充分肯定了现代分工社会中情感纽带的道德作用，他把集体情感看作一种社会事实，认为集体生活依赖于集体情感，集体情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代分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而集体情感则是这种整合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就其“本质而言，社会凝聚来源于共同的信仰和感情。”<sup>97</sup>齐美尔（Georg Simmel）对情感投入较多的关注。他在《论爱情》、《羞感心理学》、《忠诚与感激》等文章中，多次论及情感问题。齐美尔将情感分为两类：一是初级情感，即引发互动的情感，属于内容的范畴，如爱情、信任、愤怒等；二是次级情感，即先前互动的产物，或者说互动的心理效应，这种情感若无相应的体验，则不能激发出来，故可谓之社会情感，如人际互动中的嫉妒、怨恨等。齐美尔认为，初

级情感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基础，无论道德、法律或者自我利益均不足以长久地维持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必须建立在情感之上，若不以积极的情感为基础，人类的相互依存就是不可能的。

### 三、情感社会学理论

情感社会学理论对突发事件中恐慌情绪的解释主要集中于情绪形成的社会机制方面，尤其是符号互动论中的情感理论、情感交换理论，冲突论中的情感分析，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情感分析以及情感社会结构理论等。它们为我们理解恐慌情绪是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如何在各种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在媒介化环境中、群体互动中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 （一）拟剧与文化情感理论

拟剧与文化研究取向的情感理论几乎都强调文化对限制如何感受和表达情感的重要价值，把人们看作舞台上的表演者，依据文化脚本进行表演，并把行动者看作策略者，认为人们试图让他人信服，自己是根据感受和表达规则以及更多一般的情感意识来展示自己。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他们实际感受到的情感与感受、表达规则的要求不一致的冲突状态中。

史蒂文·戈登（Steven Gordon）较早就意识到文化对解释情感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戈登从理论上将情绪区分为“生物性情绪”（biological concept）和“社会情操”（social sentiments），所有的社会情操都由文化来定义。他认为情感由身体感受、表达姿势、社会情境或关系以及社会的情感文化四种成分构成，文化的力量在多个方面表现显著，它控制人们描绘情感的语言、人们持有的情感信念以及人们感受和表达情感的规则。阿里·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分析和卡尔·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文化脚本施加给人们在情感展现上的异化性或压力性影响。她指出，“社会的情感文化构成了一系列人们在不同类型的情境中应如何体验的复杂观念。这种文化将从情感意识上对基本行为的适当的态度、感受和情绪反应给予限制。”<sup>98</sup>

#### （二）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情感分析

早期的美国学者一般都把法国思想家勒庞（Gustave Le Bon）看作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的鼻祖。他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出的“聚众”这

一概念展现了法国政局动荡时期参与各种革命和暴乱的城市居民。其理论触及现代“民主”条件下群体感情的强化和蜕变的特征，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sup>99</sup>他认为，一个理性智慧的人一旦进入集体就会被集体情感所裹挟而变得情绪化和非理性化。因此，“在勒庞看来，聚众的上诉特征所导致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后果必然是消极的。”<sup>100</sup>

其后，符号互动理论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在勒庞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集体行为形成理论。布鲁默将其力量限定为“只解释集体行为，而不能解释社会运动和革命。”<sup>101</sup>布鲁默认为集体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结构性变化引起的不安、孤独甚至是怨恨，他继承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对聚众形成的微观机制进行了专门阐述。“他把这一过程称作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循环反应过程有三个阶段：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sup>102</sup>

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的加值理论是西方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个经典范式，体现了西方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向社会学视角转变的努力。与勒庞、布鲁默局限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微观社会心理研究不同，斯梅尔塞把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任何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产生都是由一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其中，结构性诱因是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结构性条件。在一定社会结构性因素下，人们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压力，如剥夺感、压迫感或怨恨。还需要人们对问题的归因有共同的认识及一般化信念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一般化信念再造了、深化甚至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

早期的或心理学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强调集体行为参与者的非理性以及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正是这一非理性假设，使得早期的集体行为理论备受后来学者的批判，于是理性选择范式占据了后来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的中心，情感因素被全盘否定了。20世纪70年代后，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质疑，情感分析重新回归，这一时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者特别关注话语、符号性行

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赵鼎新指出，“对一个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凡认为它取决于策略性行为的学者，一般都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作用；凡认为它取决于文化的学者，则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sup>103</sup>20世纪70年代的情感分析强调情感的社会建构性，“强调情感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强调特定情感的形成和展现都深受社会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不像集体行为理论那样把情感视为一种本能和个性。”<sup>104</sup>

#### 四、社会冲突理论

##### （一）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论综合为自觉目标的另一种当代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 1926—1995）。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为这一学派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学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不仅用它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是行动者所期望从多种可能的行动结果中获得功利的函数，也即行动者所追求的是价值或利益的最大化。该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文化、情感、政治等目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是否理性需要通过行动者自己的眼光来衡量。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个体方法论，它试图通过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以及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来对社会秩序做出说明。

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主要在两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互相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系统行动包括三方面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社会资本、法人行动。科尔曼对美国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现象表示不满，提出要探讨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方式。与迪尔凯姆等人一样，科尔曼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社会科学

应当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为重点”。但他又接受韦伯等人的主张，指出社会系统行为归根结底是许多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现象。

## （二）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

德国人种学家舒尔茨（H. Schurtz）创造了“排气孔”一词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一般内驱力提供制度化出口的习俗和制度。受此启发，L. 科塞在其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中阐述冲突关系中的敌意情绪时提出了冲突的“安全阀理论”。科塞认为“在针对原初对象的冲突行为被阻止的情况下：一是敌对的情绪会转向替代目标；二是只有通过紧张状态的释放才会得到替代性的满足。在这两种情况下，原有关系的连续性仍可以保持下去。”<sup>105</sup>安全阀制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结构的维护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强调通过宣泄敌对不满情绪转移目标，来消除心理紧张、缓和冲突，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增进社会团结。

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爆炸、罢工、暴力和劳工骚乱等现象的兴起，导致美国人对所有移民的恐惧感蔓延，移民被美国人视为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威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出现多种解释社会冲突的理论，反对帕森斯关于社会的价值一致、均衡与整合的观点。社会冲突理论以科塞、达伦多夫为代表，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是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反思和对立物提出的。科塞认为，弹性比较大、比较灵活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对社会没有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因为这种冲突可以导致群体与群体间接触面的扩大，也可以导致决策过程中集中与民主的结合及社会控制的增强，它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起积极的作用。科塞提出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阀制度”，避免灾难性冲突爆发而破坏社会结构。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中，达伦多夫主要吸取了韦伯关于权威和权力的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其阶级和冲突理论。他认为，社会组织不是寻求均衡的社会系统，而是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社会结构中固有的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收集资料的方法

(一) 新闻报道资料 从 2018 年开始关注疫苗事故的报道后，笔者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疫苗的相关报道，英国 MMR 疫苗报道、中国近二十年疫苗报道，并整理这些报道资料。2019 年底新冠病毒爆发后，笔者开始搜集国内外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

(二) 文献资料 一是传播学领域的专业书籍，跟群体传播相关的书籍，如《基于群体差异的谣言传播规律与政府辟谣策略研究》、《混合网络下社会集群行为研究》、《群体应急心理与行为传播建模及管理研究》等；二是社会学领域的专业书籍，如《乌合之众》、《理解社会冲突》、《流动的社会》、《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1789 年大恐慌》、《情感地缘政治学》等；三是心理学领域的专业书籍，如《群体应急心理与行为传播》、《群体心理研究》；四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书籍，如《中国医学地理学》、《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疾病阅读史》等；其他理工科及管理学领域的专业书，如《大数据：互联网大规模数据挖掘与分布式处理》、《灾难性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空间群体行为规律与政府治理研究》、《社会化媒体不实信息的群体干预模式研究》等。

(三) 访谈资料 通过深访广州、湖北、贵州等地的医务人员、公务员、媒体人士、教师和学生，了解疫情对群体情绪传播的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

### 二、分析资料的方法

(1) 可视化分析法：一是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做了一次计量分析的检视。对 2000-2019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 678 篇文献进行共词分析和共现分析，包括发文量趋势分析、核心作者分析、最高被引量分析、关键词总体分析、发文时区分析等，意图呈现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发展进程及前沿态势，探索研究不足和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二是将关注视野聚焦全球范围内疫苗安全问题。研究发现：热点主要聚焦于公众认知、互联网信息对疫苗接种决策的影响、疫苗安全的媒体传播效应、公众接种疫苗意愿、公众反疫苗接种运动。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医学管理类，人文社科关注度不够；核心作者的紧密合作度有待提高；疫苗研究成果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呈正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疫苗民族主义正影响着疫苗分配公平问题。

(2) 框架分析法：一是选择英国近二十年发生的疫苗事件报道展开梳理，探究媒体报道如何构建议题、如何营造舆论偏向，如何制造道德恐慌。笔者对2005—2018年间发生的9起疫苗事件403篇报道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本研究通过检视疫苗事件的新闻报道相似性或差异性探究媒体框架设置，试图剖析：(1)新闻价值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疫苗安全问题的认知；(2)主流媒体如何确定主题框架、增强信息传播效应以及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

二是对中国近二十年疫苗事件展开梳理，探究媒体报道的平衡手法；检视当前新冠病毒疫情时期，我国主流媒体对以疫苗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呈现模式。笔者选取了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发生的9起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疫苗事件。分别是：2005年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2008年江苏造假疫苗事件、2009年大连违规疫苗事件、2010年广西来宾“开水疫苗”事件、2010年山西失效疫苗事件、2012年山东潍坊非法疫苗案、2013年深圳注射死亡婴儿案、2016年山东非法疫苗案、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案。检索报去除通稿后获得样本量403篇。

(3) 数据挖掘法：通过后羿采集器以及八爪鱼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选择“新浪微博”与“哔哩哔哩弹幕网”为媒介来源。本文运用八爪鱼数据采集器分别获取了武汉抗疫和广州抗疫两个视频共4000条热门评论作为研究样本，再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软件对深度访谈获取的资料进行编码研究和深度分析，从而对媒介按摩的建构和意义进行分析。选择新冠疫情中两个疫情反弹时的知名事件，“成都女孩事件”、“广州阿婆事件”为样本，“成都确诊女孩”事件有效评论为9814条，“广州确诊阿婆”事件有效评论2974条。将经过数据清洗的数据导入到Divominer平台，使用Divominer中文分词系统对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分词后的结果使用Divominer情感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与编码。

(4) 深度访谈法：通过对广州、贵阳、湖北三个地区的民众进行滚雪球式抽样，抽取了13个样本进行半结构化深访，涉及行业众多：医疗卫生、党政机关、媒体人士以及教师、学生群体。访谈方式一是电话访谈，主要通过微信语音电话；二是面访。时间大约在45—50分钟。访谈共获得资料约10万字。

## 第五节 研究框架

文章的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的缘起、理论综述、研究方法及框架。

第一章概述了全球化视域下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格局。世界舆论格局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相可言，尤其是非常态的大流行疾病期间，西方政客炮制的阴谋论、谣言、偏见、种族歧视等虚假新闻更是充斥着媒体舆论空间，混淆视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断炮制中国阴谋论，捏造谣言，弥漫种族偏见，散播疫苗民族主义的歪曲舆论，严重损害全球抗疫共同体。道德恐慌策略以社会冲突论为其立论前提，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标签理论、种族偏见、民族主义、族群边界为其理论基础，在现实运用过程中存在着悖论，除了将西方世界推向抗疫边缘，扰乱健康共同体的秩序，还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阶级与种族不平等弊端。

第二章对不同场域下的公共卫生事件做一检视：一是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做了一次计量分析的检视。从全球视野来看，20年来公共卫生事件在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脉络、从事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主体表现出何种群像特征等一系列问题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参照国外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范式，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状况如何，今后该选取哪些研究路径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文献计量的演示展开探讨：近20年来，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演进趋势？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是哪些？在全国视域下，这种研究是否存在研究地域差异？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主体主要来自哪些学科？相互间合作状况如何？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热点问题是哪些？形成的知识群分布状况如何？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考察有助于观察和理解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形成对公共卫生研究进路的整体性把握和认识。二是将关注视野聚焦全球范围内疫苗安全问题。通过研究发现，疫苗安全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公众认知、互联网信息对疫苗接种决策的影响、疫苗安全的媒体传播效应、公众接种疫苗意愿、公众反疫苗接种运动。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医学管理类，人文社科关注度不够；核心作者的紧密合作度有待提高；疫苗研究成果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呈正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疫苗民族主义正影响着疫苗的分配公平问题。

第三章从传播主体维度讲，用两个案例来剖析媒介制造道德恐慌。一是对英国近二十年发生的疫苗事件报道展开梳理，探究媒体报道如何构建议题、如何营

造舆论偏向，如何制造道德恐慌；研究发现，英国主流媒体对疫苗报道存在明显的恐慌情绪传播趋势；目的在于唤起公众对疫苗问题的重视程度，配合政府接种疫苗，防止大规模疾病扩散；恐慌情绪传播的社会根源既有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现实的社会危机。笔者在反思之余，提出媒介报道的情绪需要把握一个平衡尺度，过犹不及，恐慌情绪传播能唤起公众重视，能激起社会过度紧张的负面影响。二是对中国近二十年疫苗事件展开梳理，探究媒体报道的平衡手法；检视当前新冠病毒疫情时期，我国主流媒体对以疫苗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呈现模式。通过对三类主流媒体 403 篇疫苗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责任框架、人情味框架和冲突框架、信息补偿框架是三类媒体架构疫苗议题的主要模式。在信息报道角度和信源选择上，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存在一些模式刻板的缺陷。在互联网成为公众主要利用的渠道环境下，主流媒体应关注公众的疫苗接种态度、疫苗安全的损益平衡、公共卫生的社会公正性等议题，加强信息补偿框架，增加信息来源，合理引导舆论，避免媒体过度恐慌导致舆论偏见，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

第四章从传播客体维度讲，用三个案例来分析群体恐慌的媒介记忆。一是抗疫短视频传播效果。本文运用八爪鱼数据采集器分别获取了武汉抗疫和广州抗疫两个视频共 4000 条热门评论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武汉、广州抗疫 Vlog 的热门评论进行分析，阐述了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媒介生产逻辑：通过媒介协作提供受众情感出口，在象征性符号中建立群体情感联结纽带，借助媒介仪式巩固受众情感认同；受众情感修复逻辑：以媒介数字技术为情感记忆的延伸点，通过触媒后的按摩，在群体感染中修复创伤，从而达到群体情感释放，完成情感治愈的历程。二是选择新冠疫情中两个疫情反弹时的知名事件，“成都女孩事件”、“广州阿婆事件”为样本，通过后羿采集器以及八爪鱼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选择“新浪微博”与“哔哩哔哩弹幕网”为媒介来源。选择这两个平台的原因一是这两个平台日活用户量与用户活跃度高，二是在地域分布上较为广泛，样本具有代表性。在对“成都确诊女孩”事件的相关评论采集中，其中“成都确诊女孩”事件有效评论为 9814 条，“广州确诊阿婆”事件有效评论 2974 条。将经过数据清洗的数据导入到 Divominer 平台，使用 Divominer 中文分词系统对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分词后的结果使用 Divominer 情感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与编码。三是通过对广州、贵阳、湖北三个地区的民众进

行滚雪球式抽样，抽取了 13 个样本进行半结构化深访，涉及行业众多：医疗卫生、党政机关、媒体人士以及教师、学生群体。笔者在考虑样本来源时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地域原则：疫情最严重是武汉及湖北地区，选择 3-4 人，有亲历者、有关联亲属在湖北、或曾经旅居湖北一年以上，对其地域文化较为熟悉；疫情常态化的地区：广州，一直都是疫情活跃区域，但抗疫效果佳，民众心态乐观，样本具有可推广性，选择 5-6 个人；疫情最轻微的地区：贵州，抗疫管控非常严格，在此状态下的民众情绪如何也值得关注，样本数 3-5 人。以上对象全是成年人，经历疫情，居家隔离。

第五章从情绪共振维度分析群体恐慌蔓延机理。主要从媒介化环境下的传播格局，将疫情放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疫情演变的规律以及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恐慌情绪蔓延机理。在深受全球化影响并致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笔者运用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诠释了集合行为的传播特征与诱导因素。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三个信息进化路径，在模因激活、群体恐慌、社会传染阶段，属于前期信息饥渴期，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事件发生信息，表明鲜明态度，防止谣言滋生；在模因复制、群体盲从、社会围观阶段，属于中期信息扩散期，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流调信息和权威处置措施，消除社会恐慌情绪。在模因变异、群体极化、社会冲突阶段，属于峰期信息高涨期，应不断更新感染人数，发布救援情况、逐步发布事故原因、消除社会谣言；在模因转移、群体理性、社会共识阶段，属于后期信息饱和期，相关部门应发布事件完整报告，公布相关责任追究措施，完善防范预警机制，最后针对群体恐慌构建一个模型。

第六章恐慌情绪疏导与健康传播环境的重构。疏导之策：笔者基于情绪传染 SIR 模型，引入媒介环境因素 M (Media) 并构建出 M-SIR 模型，以分析媒介环境中群体恐慌传播的产生机制；同时援引彼得斯对话与撒播观的理念，提出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应是摒弃霸权式对话，尊重事实的撒播，实现真正的“对话与撒播相交融”。宏观维度：政府应管控复杂的媒介环境，关注信息贫困群体；中观维度：媒体应尊重受众属性差异，深入一线撒播事实；微观维度：个体应提高应急信息素养，利用机会人人发声。重构愿景：本章重点阐述了数字政府治理消

除群体恐慌的现实路径。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政府，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基于信任关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数字政府可通过创建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民意收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三方面来实现社会治理。

综上，论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群体恐慌情绪蔓延研究思路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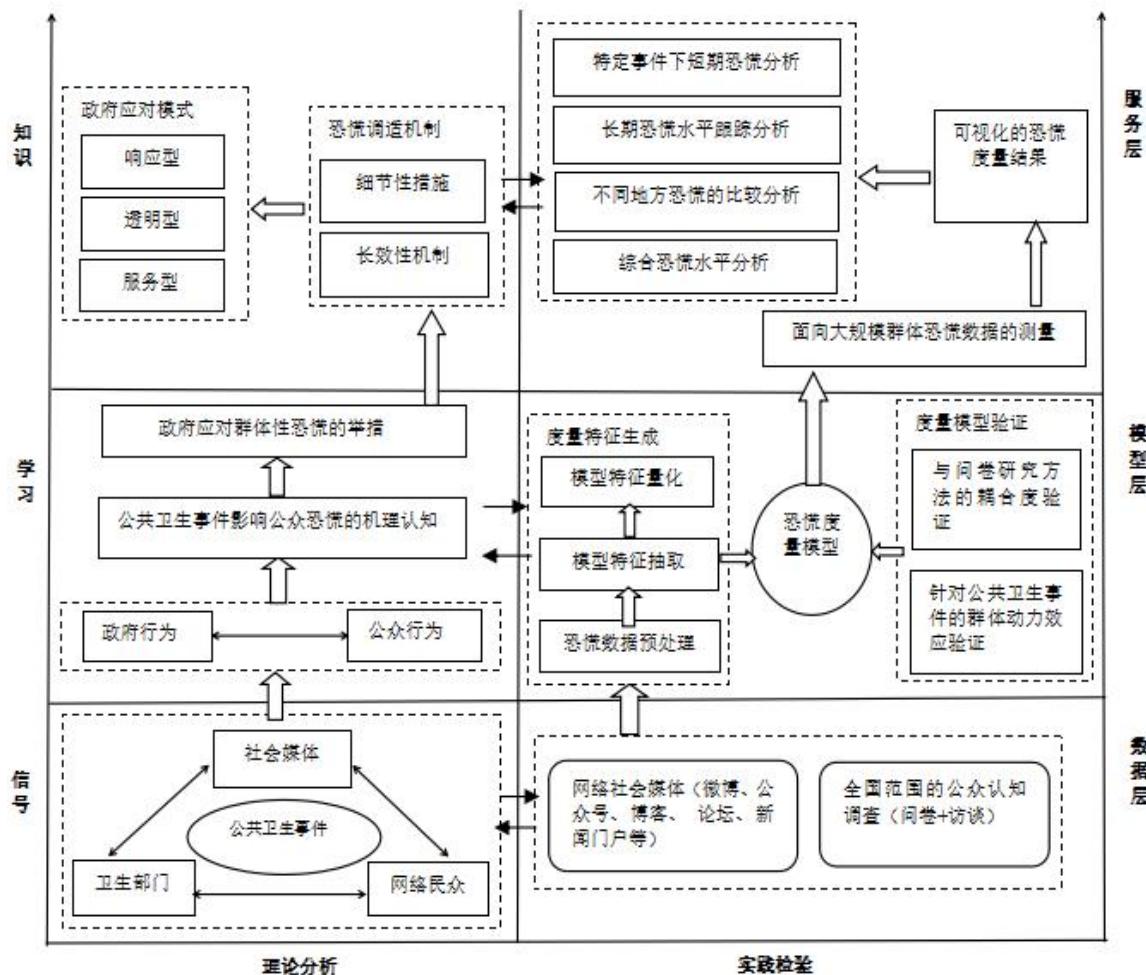


图1 群体性恐慌情绪蔓延及调适机制的研究框架

反智主义是憎恨和怀疑智识以及具有智识的人，并不断贬低智识价值的一种倾向。（历史学家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

## 第一章 全球化视域下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格局

世界舆论格局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相可言，尤其是非常态的大流行疾病期间，西方政客炮制的阴谋论、谣言、偏见、种族歧视等虚假新闻更是充斥着媒体舆论空间，混淆视听。尽管危言耸听，民众也并非全盘接受。然而，谎言总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大行其道。历史总是不断重演，人类抗疫史上重复上演着种族歧视、群体迫害的悲剧。西方上流精英们为了稳定民心而不惜转移祸端，嫁祸于人，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西方国家就嫁祸病毒缘起中国武汉，甚至命名为“武汉病毒”。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曾驳斥过这种谬论，刊登过一封 27 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合声明，认为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以及损害全球共同抗疫的努力外，别无他用。西方政客嫁祸他人的造假伎俩并非首次使用。这种炮制谎言的反智行为早就被西方学者批判过。简单来说，反智主义缺乏理性，对与自己看法相悖的事实视而不见，只相信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美国社会中，“魔幻”的反智主义案例俯首皆是，如共和党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自由派和外国政府的阴谋而拒绝讨论。

### 第一节 媒介化环境下的舆论传播格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断炮制中国阴谋论，捏造谣言，弥漫种族偏见，散播疫苗民族主义的歪曲舆论，严重损害全球抗疫共同体。这种偏狭、刻板的政治话语充斥着道德恐慌与反智主义情愫，让原本岌岌可危的美国抗疫体系雪上加霜。道德恐慌策略以社会冲突论为其立论前提，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标签理论、种族偏见、民族主义、族群边界为其理论基础，在现实运用过程中存在着悖论，除了将西方世界推向抗疫边缘，扰乱健康共同体的秩序，还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阶级与种族不平等弊端。

#### 一、种族歧视的反智言论

大流行期间，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炮制各种反智言论，制造种族歧

视、仇外政策情绪，试图转嫁疫情治理不利的窘境。种族歧视在流行性疾病中早已存在。14世纪黑死病爆发期间犹太人就遭到种族歧视的袭击、19世纪后期艾滋病流行期间美国同性恋族群也遭受过袭击。<sup>106</sup>大流行以来，特朗普拒绝戴口罩成为右翼科学否认者的榜样，他们声称整个大流行都是自由派的骗局。他反复吹捧这种药物羟氯喹，尽管医学研究表明它不能预防或治愈病毒，并且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sup>107</sup>特朗普甚至建议饮用或注射漂白剂可能会有所帮助。<sup>108</sup>让他受到广泛的嘲笑。当美国几个州出现反对隔离令的抗议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解放明尼苏达！”、“解放密歇根！”和“解放弗吉尼亚，并保存伟大的第二修正案。它被围困了！”，从而将公共卫生措施与没收枪支混为一谈。特朗普和助手一再无视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和流行病学家的建议，包括他自己的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甚至一度领导了一场诋毁他的运动。<sup>109</sup>他一再呼吁州经济重新开放，学生重返校园，并声称大型集会是安全的。此外，特朗普不断试图削减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公共健康卫生部门的预算经费。<sup>110</sup>

虽然这种流行病对公共卫生和经济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但特朗普总统和其他著名的共和党人却火上浇油，将 COVID-19 称为“武汉病毒”、“中国人”，妖魔化了中国人和其他亚裔美国人。“病毒”和“功夫流感”，这是将外国人妖魔化为威胁和危险的更大和熟悉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sup>111</sup>将国外群体与对细菌和疾病的恐惧联系起来在政治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它们可能有助于将仇外、反华甚至广泛的反亚裔美国人的态度与担忧联系起来关于美国的冠状病毒，学者们称之为“他者”。<sup>112</sup>

除了永远的外国人之外，中国移民还被定型为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和肮脏的急性疾病传播者。一方面，亚洲人被视为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是一个能够在教育和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勤劳而聪明”的群体。<sup>113</sup>另一方面，他们被视为永久的外国人，永远不值得拥有完整的美国地位，并不断被视为局外人和外国威胁。

<sup>114</sup>瘴气疾病理论认为，流行病是由污染当地空气的恶劣卫生条件引起的。公共卫生官员经常指责中国移民飞地，他们的“臭气熏天”是美国城市污染和疾病的主要来源。<sup>115</sup>将亚洲人与冠状病毒联系起来的精英言论会激活这些态度，进而直接影响焦虑（对冠状病毒的担忧）以及直接和间接（通过担忧）塑造相关行为和政策态度的程度。有学者做过研究，将《纽约时报》中单独提及“冠状病毒”与“中

国”配对的次数，显示大量文章在此提及冠状病毒的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将这种病毒与中国的持续联系反映在媒体报导和谷歌搜索行为上。就谷歌搜索行为而言，这种精英政治和媒体框架已经蔓延到大众行为中。<sup>116</sup>长期以来，精英们一直试图通过制定与福利和非裔美国人或移民和拉丁裔等群体相关的某些政策来塑造大众态度。<sup>117</sup>

## 二、媒体导向的推波助澜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美国的国家治理机构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情况变得更糟了。恶化的进程一直以惊人速度继续，并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时至今日，各国反智主义浪潮仍然无边泛滥，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呈爆炸式增长，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广大民众的极大关注，民众的恐慌情绪、焦虑情绪受突发事件的刺激集中爆发，出现仇恨亚裔、民族主义暴力等极端恶劣行为。西方媒体实施话语议题霸权，多次污名化中国。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际话语方面被西方霸权禁锢，西方媒体常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严重影响我国国际形象。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于2020年2月3日发布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污名化中国的不实报道。在此之前《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还多次发布了辱华的文章，如《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物武器》、《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等污名化中国的恶劣行为》。在“中国制造论”和“疫情隐瞒论”的错误疫情信息编造与社交媒体的转发中，美国民间的反华势力暗潮涌动。美国著名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以“反华情绪抬头”为题，分析2020年1-5月间民调数据所显示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比例变化从20%升至31%。<sup>118</sup>

长期以来，美国精英们一直试图通过制定美国人与亚裔、非裔、拉丁裔美国人的福利政策区别来塑造大众的种族优劣态度。<sup>119</sup>现有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大流行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将“激活”大众中的反亚裔态度。右翼媒体的普通消费者尤其有可能将这种流行病视为“自由主义骗局”，他们往往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采取羟氯喹等伪疗法并拒绝采取预防措施。<sup>120</sup>著名的保守派电台评论员拉什·林博断言 COVID-19 “就像普通感冒一样”，大众对科学的无知和不信任导致许多美国人无视社会疏远警告并采取鲁莽行为，导致新病例激增。<sup>121</sup>

### 三、宗教信仰的偏狭、刻板

与欧洲或日本的同行相比，美国人更倾向于不信任他们的政府。<sup>122</sup>在市场信心和保守派媒体无情攻击的推动下，许多保守派尤其以高度怀疑的态度看待联邦政府。在最极端的表现中，这种不信任导致了荒谬的阴谋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拒绝遵循戴口罩等健康准则，甚至不愿意接种疫苗。<sup>123</sup>特别是在美国，戴口罩变得高度政治化，很大一部分保守派和共和党人拒绝这样做。<sup>124</sup>与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不同，美国表现出很高的宗教信仰，每周去教堂或犹太教堂做祷告。这种宗教信仰在大流行期间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一些保守派传教士谴责这种病毒是骗局，声称上帝会保护他们。<sup>125</sup>得克萨斯州的电视布道家肯尼斯·科普兰声称，如果观看他的节目的人触摸他们的电视机，他就可以治愈这种病毒。<sup>126</sup>美国的宗教信仰削弱了对病毒的科学理解以及基于事实、数据和证据的理性反应。正如一些观察家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和宗教长期以来一直相互支持。<sup>127</sup>例如市场和不平等的相互自然化以及对进步力量和思想的普遍敌意。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热切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作为服务上帝的一种手段，将旧的新教伦理更替为全球化时代。

许多美国保守派痴迷于神话般的“自由”概念，对行为的任何限制都被视为不道德、不公平和“非美国人”，为了共同利益的个人牺牲被妖魔化。<sup>128</sup>因此，戴口罩已被许多保守派视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美国反智主义的悠久传统，无疑助长了冠状病毒的传播。“专家”通常不被信任，因为它是某些神秘的、居高临下的精英的一部分。对专业知识的普遍不信任日益形成一种氛围，任何意见都与其他意见一样好。<sup>129</sup>随着假新闻和假科学（如反疫苗接种言论、神创论）的浪潮席卷全国，客观性的概念本身就受到质疑。共和党一直在积极怂恿这种现象，共和党将不信任科学和科学家作为其政治战略的主要部分。<sup>130</sup>涂尔干认为，宗教不仅是维系群体成员的共同信仰，也是进行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宗教的衰落就是失范产生的根源，在新旧宗教的交替和过渡过程中，集体意识的丧失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长久的混乱。

### 四、反智主义的社会思潮

#### （一）新动向：反智主义思潮的回笼

面对西方政客的甩锅和嫁祸，以及西方媒体的联袂表演。我们不难发现，大

流行中的种种怪诞行为背后掩藏着西方精神领域被长期桎梏的枷锁——反智主义。据“韦氏辞典”解释，“反智”（anti-intellectual）是指反对或敌视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的观点或方法，该词首次出现于182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提出。早在18世纪后期，美国就已存在反智运动，当时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中被用以攻击对方。随后由于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脱胎于欧洲文化下的美国急于摆脱欧洲印记，开始重视知识和科学的社会认知，社会中的反智浪潮才开始消退。20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极度泛滥，掀起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各个层面。<sup>131</sup>在此背景下，美国宗教在其内部制造了具有清教徒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清教徒怀疑受过教育的牧师作为中介会曲解对神的意志表达，更愿意自己从圣经中寻找神的指导。美国知识分子一面向往民主社会，另一面极度崇拜个人权利，这种群体意思与自由意识相矛盾中，人们认为个人的实践经验比书本知识有用，任何知识都为实用主义服务，易对知识产生蔑视心理。

1963年，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根据美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梳理了反智主义诞生及发展的条件，并阐述了反智主义在宗教、政治、商业、教育等方面的表现形式，直指美国民众的一种罗曼蒂克式信念和心态，即大众民主应该支持“天生的、本能的、民间的智慧处于优越地位，凌驾于文人和有钱人的教养、学问、和自我牟利的知识之上”。他细致地定义智识与知识分子，认为“反智主义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sup>132</sup>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发表后，“反智主义”作为学术界专有名词迅速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对反智主义进行理论性的定义，更没有相应的概念框架。

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学者们将反智主义的研究视角投入传播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批评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基于电视、印刷等媒介飞速发展的历史现实，指出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批评电视媒介娱乐化、碎片化、无逻辑性的表达使“我们不仅仅被剥夺了信息，而且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sup>133</sup>美国独立学者苏珊·雅克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对社会中流行的反智主义、非理性主义表示不满，非理性、假新闻、伪科学、垃圾思想、后真相、娱乐

文化大行其道。人们热衷于相信谎言，用非理性的方式抨击美国社会中的非理性现象，用反智语气讨伐反智主义。<sup>134</sup>国内学者邵培仁与邱戈以“媒介弱智论”为研究重点，归纳出“媒介弱智”的三个特点，分别把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的儿童化和幼稚化、讯息的反智倾向，<sup>135</sup>潘采夫指责电视节目或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泛娱乐化内容、八卦新闻、犯罪报道和一般报道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模糊、焦虑的氛围中，从而加强人们的反智情绪。<sup>136</sup>电视节目中传统的纪录片、新闻类节目的比重越来越低，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与早些年相比有大幅度下降，传媒人也应从大众传播领域的种种现象中看出反智主义抬头的警示。

以美国面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及做法为例，Lancet、Science、Nature、NEJM等一系列世界最顶级的医学科学刊物纷纷发表文章，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严厉抨击了特朗普的抗疫表现。而特朗普政府却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忽略甚至贬低专家，掩盖真相，将公共卫生问题上升至国家间的政治问题，推动谎言肆意发酵传播，不断削弱人们对科学和政府的信任。强烈地谴责了特朗普政府的无能和失败，指出是其导致美国的新冠疫情变成一出悲剧。<sup>137</sup>在病毒溯源这一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科学问题上，“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显然更符合反智主义想象，“实验室泄漏”论一时间在美国甚嚣尘上。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成员、澳大利亚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家德怀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验室泄漏”论迎合了部分国家的政治话语，甚至得到个别国家政府支持，其流传有蓄意因素。其实，反智主义不仅是科学精神的丧失，在社会阶层固化、国内政治极化和冷战思维惯性的加持下，更反映了美国政治道德的崩坏，其对外表现是鼓噪疫情索赔、“实验室泄漏”论等，对内则表现为“黑命贵”、亚裔歧视、枪支泛滥等问题迟迟没有政治解决方案。

## （二）新形态：盲目仇外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安全网破烂不堪，缺乏全民健康覆盖，监狱人口众多，无家可归者人数众多。医疗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低收入小区和有色人种特别脆弱。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缺陷因特朗普政府的腐败、冷漠和无能而加剧，特朗普政府未能认真对待这一流行病。缺乏测试、牧师无视社会疏远准则、迫使低工资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以及吹捧羟氯喹等欺诈性治疗方法都说明了当一个习惯于不便利的保守社会遇到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效率复制自己时会发生什么。

现有国际话语场域中存在着严重的西方霸权，在中国场域地位跃升、资本增

加、话语权竞争优势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西方场域主导者试图操控场域规则进行霸权护持，导致中国的结构性压力上升，话语权提升面临瓶颈。在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关于中美如何相处便成了政治家和学者关心的问题。在中美贸易争端激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作出种种“甩锅”和指责行为。我们怀疑，这种大流行初期的精英言论导致反亚洲态度与新发现的对冠状病毒的担忧以有毒方式混合在一起，这些方式表现在种族歧视、仇外政策情绪和一些大众公众的行为中。事实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阶段，新闻报道暴露了主要城市中心的中餐馆和空荡荡的唐人街的访问量急剧下降。<sup>138</sup>

新冠疫情初期，亚裔美国人在美国遭到口头或身体攻击的故事，让人想起大流行后的历史暴力。然而，绝大多数关于对流行病和疾病的态度的文献几乎没有发现这种“其他”假设的系统经验证据——即大众对疾病的理解可能会与对被诬陷为该疾病负责的污名化群体的偏见合并。<sup>139</sup>相反，现有文献指出“行为免疫系统”，尤其是厌恶敏感性，是对疾病、流行病甚至更广泛的外国人的态度的主要驱动因素。大流行中对亚裔人群的歧视、厌恶和暴力行径也有历史渊源。古老的东方在西方人臆想中充满神奇的诱惑和历史想象。历史上，鼠疫这种病症是中国传播的历史臆想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杜希德（Denis Twitchett）通过追述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晚期在东罗马帝国和音浪的一系列疾疫，认为7世纪和8世纪前期的诸次疫病中应该有从东罗马传来的腺鼠疫。<sup>140</sup>这种关注，是尝试将历史上某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疾病放到“中国”的语境之下，同时也在疾病传播的世界地图上拼接上“中国”的那块拼图。中国学者曹树基和李玉尚之处，杜希德对中国鼠疫起源的研究本质上是思辨的，或者说是想象的而非实证。<sup>141</sup>

概言之，带有暴力倾向的仇外现象在任何地方都很活跃。从字面上看，仇外指的是对外族的恐惧。从现代思想体系的角度分析，仇外思想就是对外族的仇恨情绪。当帝国主义自以为比其他民族高人一等时推行政治保护的政策，往往不考虑外来民族的存在。他们通常会竭力扼杀有竞争力的文化或民族对手。在帝国的形式下，蔑视胜过恐惧，狂妄胜过不安。民族主义更具戒心，其不安和仇恨更接近仇外思想。意识形态的倾向或是政治上的险恶用心需要寻找替罪羊。仇外思想宣扬的就是这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夸大外部或内部的敌对势力。当人们用全局的，战略合理化和神正论来解释这种态度时，阴谋论就会萦绕在脑子里。这种简单、

惰性的逻辑思维时政治意义上的居心叵测，意在找到一个能为集体的不安和失败开脱的替罪羊（人民或团体）。确定了外来的罪人后，控方就集体开脱自身的弱点。等于为集体的不幸找到了外部原因，而且可以以此为代价维护自尊。寻找自满的逻辑没有极限，可能会走向极度荒唐的地步而不能自拔。<sup>142</sup>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世界大战和文明冲突等各种危机以后，个体的心理失调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为西方社会的“病症”，它促使人们对个体或社会的心理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社会的急剧变迁使暴力迅速升级，暴力采用了符号形式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不仅在深层上使个体形成了虚假的自我认同，而且在表层上也瓦解了集体意识的同一性。

## 五、失范与焦虑双重压力的精神重构

### （一）焦虑：信息道德恐慌的表象

历史造就了民族。民族性类似于人的情绪和性格。一连串事件会把民族性转变成为民族命运。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生命节奏是叙事的对象。在这里，民族意识形态可能转变成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形态经常会高估这种叙事的重要性或影响，或者把民族的兴衰变化统统归结为民族素材。诽谤其他民族或者过分美化炫耀自己的民族都只是民族意识形态的一个缺点，但却不一定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一个人可以有很强的民族自尊但并不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在没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情况下，民族也会自我陶醉。这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一边是群体对自我的一种满足感，而另一边则是为公平和超脱而进行的努力。<sup>143</sup>民族意识的特点是不断回到叙事的程式和内容。叙事重新描述民族冒险的历程，自由和强制相互交织构成民族历程的背景。叙事不能任意编造，结局也要受到某些史实的限制。

有学者认为疫情引起的网络情绪总体倾向于积极，但负向情绪占比接近 1/3，这种负面情绪在政府、媒体、社会、个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焦虑、紧张等心理，形成群体舆论性心理恐慌；网络情绪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同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疫情爆发的政策指导以及媒体对疫情中人物事件的报道，对受众产生的正向情绪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相较于日常交流语言，网络语言的情绪层次更为丰富，加速同一社群中的个体情绪向集体情绪转化。<sup>144</sup>当前的网络环境是人民抒发个人情绪的公开平台，同时也是反智主义生长的沃土。反智主义是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直接反映，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变种。唐纳

德·特朗普通过深入挖掘白人种族不满和怀旧情绪，将外国人和移民作为美国弊病的替罪羊而部分上台。<sup>145</sup>因此，特朗普和他在保守媒体中的盟友抓住机会将冠状病毒种族化为中国——或者更广泛的亚洲——威胁，从涂尔干的道德失范论角度来看，这就不足为奇了。部分原因只是特朗普的政治本能。民主党精英和活动家迅速揭露任何种族分裂的政治让特朗普能够将叙事从对其政府早期危机管理的批评转变为他认为的政治信息。

## （二）失范：信息道德恐慌的实质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序言中谈到：“所有权威都丧失殆尽，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了，而战争将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sup>146</sup>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发表的言行为表明了美国形成这种反智言行的历史原因及特朗普政府这种作为后会造成的影响。<sup>147</sup>同样有研究结合美国历史发展及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根源，对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恶化的现象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反智主义使公众选择站在知识的对立面，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播科学是公众最偏爱的方式，同时受众讨厌高高在上的故事讲述者。刺激疫情迅速蔓延及恶化的种种原因中，反智主义是不可忽视的推手。<sup>148</sup>

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问题上，需要立足于社会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条件，这是把握话语权的根本与关键。当前，我国借助新媒体抢占国际话语权，更是要把握历史性的生成性逻辑，把中国放置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分析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共性，打造出贯通中西方思想的当代话语体系。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西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国际社会出现众多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言论，包括“新冠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论”、“中国赔偿论”等等，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冲击。面对西方媒体的抹黑，我国媒体主持人、评论员及时反击西方不实炒作和辱华言论，以真实准确的数据全面、立体地展现事件真相，让抹黑中国的谣言不攻自破。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缺席使个体意识不再是具有内在的限制和约束，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旧的道德和法律”被取缔了，“新的道德和法律秩序”远未确立起来。个人的欲望和情欲突破了原有的界限，集体意识所承载的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普遍性和目的性。<sup>149</sup>在美国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指责中国和中国人传播病毒的精英言论为迄今为止对大众态度中的“他者”假设进行最严格的

测试创造了理想的条件。我们假设大流行早期的精英指责言论激活了先前存在的仇外心理和反亚洲情绪，使这些态度影响到美国对冠状病毒的情绪、态度和行为反应。可能是在大流行的后期，种族态度开始发挥作用，因为非裔美国人被确定为不成比例地感染和死于该病毒。精英们在早期阶段成功地将冠状病毒大流行种族化为独特的“亚洲人”。一个本应为抗击大流行做好充分准备的国家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再加上无知的公众每天都从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那里获取错误信息。长期以来助长民族主义幻想的美国例外主义传统对其发源国产生了残酷的影响。病毒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裂缝和断层线，暴露了美国深刻而长期存在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

## 第二节 恐慌情绪泛化的表征：疫苗民族主义

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的关键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却固守“疫苗民族主义”，大肆宣扬疫情在种族、冗余人口、第三国家等边界中形势更为严峻的思潮，鼓吹种族偏见、贸易保护和白人至上，强化种族人群身份差异，致使种族偏见和排外情绪和国家的政治、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成为美国控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建立国民政治认同、转移社会矛盾的合法化手段，加剧了社会道德恐慌情绪蔓延。同时，疫苗民族主义与道德恐慌的纠缠也进一步激化世界性不平等、加剧地缘政治矛盾、强化阶级分化与种族歧视。为消除疫苗民族主义需要践行多边主义，在世卫组织的综合组织下共建命运健康共同体。

### 一、道德恐慌与疫苗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表征

#### （一）道德恐慌的内涵与表征

前文已述，科恩认为，道德恐慌意指“公众在错误的或被夸张的信息支配下所产生的风险认知和带有恐惧心理的集体反应……与通常的恐慌相比，集体道德恐慌的驱动力来自公众对某种威胁的一致性道德判断。”科恩所言的“道德”，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约束人们言行的规范或准则，而是被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本身，<sup>150</sup>因此，所谓道德恐慌实际是对既有主流社会秩序受到挑战的焦虑。摩德青年（Mods）和摇滚乐迷（Rockers）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仅仅是道德恐慌中的替罪羊，社会需要一些“反面教材”以维系社会规范和道德边界，因此青年亚文化群体就成为了所谓的“民间恶魔”。科恩将新闻称为“关于社会规范轮廓的主要信息来源”。<sup>151</sup>媒体的过度报道是主流社会对某些群体、行为可能威胁到自身价值观、意识形态、利益等产生焦虑的具体体现，信息传播被用夸大的言辞制造威胁性的局面，并对小群体产生恐惧感。除了媒体之外，科恩还关注警察系统、法院等组织在道德恐慌形成与升级中的作用，但他没有对这些机构的统一价值与目标进行分析，在科恩的研究中，代表主流社会秩序的各机构显得“各自为政”，而这一缺陷在文化研究学派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道德恐慌的研究中得到了弥补。

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给以霍尔为代表的的文化研究学者带来了重大的研究思路转变，为道德恐慌研究注入了更加宏大的视角。霍尔把对道德恐慌的分析从微观和中观的社会结构与功能研究的视角引向宏观的意识形

态批判以及阶级和种族关系的政治分析，<sup>152</sup>超越了对道德恐慌生成发展机制的探讨，将其与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把道德恐慌理解为国家进行霸权斗争的一种意识形态手段。“霸权”不是依靠国家机器建立，而是通过在市民社会中进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确立。道德恐慌制造了一种“危机”，为国家介入市民社会内部，改造市民思想意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道德恐慌策略就是“要在人们心中灌注恐惧，并就此鼓励他们回避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躲进一种城堡式心态——一种无望、无奈、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心态。”<sup>153</sup>霍尔认为，就某一事件意义的建构来说，权威“发言人”是初级定义者，媒体则是次级定义者。媒体会受到新闻源的制约，对权威“发言人”存在系统性的依赖，媒介和政治相互作用，形成了封闭的“表意螺旋”（significant spiral）。道德恐慌就在公共讨论和媒体报道中以表达人民“心声”的形式不断发酵升级，国家由此实现“文化霸权”的建构。总之，道德恐慌仅仅是表象，其后隐藏的是深层的统治危机，通过想象性地建构道德恐慌“靶子”并对其进行打击，掩盖社会深层问题，强化主流秩序的目的。

## （二）疫苗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表征

疫苗民族主义（Vaccine Nationalism）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次生形态。<sup>154</sup>尽管不同学者对于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公认的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活动或产生的思想。新冠肺炎病毒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生产为阻止病毒肆虐带来了转机，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却在阻碍疫苗的共同研发、生产与分配，无视世卫组织规定，无视他国人民生命权，在疫苗研发、疫苗生产、疫苗分配中试图占据绝对优先地位。

202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国防生产法》，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行出口管制；拜登政府提出一系列名为“战时努力”的举措，截至2020年2月，美国政府已从辉瑞制药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囤积了6亿剂疫苗，足以满足3亿人的接种需求；<sup>155</sup>截至2020年2月，英国已订购5.1亿剂疫苗，约为其总人口的4倍。疫苗民族主义根植于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全球风险社会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疫苗的研发、生产、分配中贯穿者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部分国家试图利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实现对疫苗的

绝对主导与绝对优先。在此背景下诞生的疫苗民族主义是无视和破坏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的政治运动。<sup>156</sup>

疫苗民族主义的初衷是优先保证本国疫苗供应，但这种自我利益至上的行为带来的是低效率的防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 2020 巴黎和平论坛上明确表示，“一些国家正在提前购买更多疫苗，数量是其人口规模的两倍以上，其他国家可能因此无法获得疫苗或负担不起。”<sup>157</sup>若较贫困国无力负担疫苗，可能给本就不公平、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带来更深远的负面影响，由于病毒的特殊性，在全球疫苗接种率达到形成免疫屏障的要求之前，产生传染性致死性更强的变种，附带更严重的并发症，疫苗民族主义会推迟世界性免疫屏障的建立，从而给世界经济复苏、全球政治局势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疫苗民族主义是短视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当前疫情背景下的表现，疫苗民族主义不会给国家本身带来经济恢复的“先发优势”，反而会将人类拖进全球经济复苏遥遥无期的深渊。

对于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一味迷信“以我优先”的结果必然是“弄巧成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sup>158</sup>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新冠及其带来的系列负面影响，有效的全球卫生危机应对、全球风险应对不可能离开多边主义。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构在新冠疫苗研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正在领导试验一种公平高效、惠及各方的疫苗分配机制。要抵制疫苗民族主义、避免国际免疫计划滑向经济利益或权力政治主导的逻辑，唯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巩固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发挥积极作用。<sup>159</sup>

## 二、疫苗民族主义在疫情时期的道德恐慌表征

### （一）疫苗民族主义成为道德恐慌嫁接桥梁

疫苗民族主义中的种族歧视成为道德恐慌嫁接桥梁的最关键根源。为减缓病毒形势严峻所带来的恐惧不安，人们往往需要找到一个“问责对象”获得相应的解释。一旦人们能够在种族身份上找到“他者”，就很容易凭借一个小小的借口，以体貌特征为基础将“他者”作为替罪羊。<sup>160</sup>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资本主义为寻找自我安慰，在追寻“罪魁祸首”的过程中，对内进行种族边界划分，以“黑人的种族基因以及生活环境低等于白人”作为评判依据，通过具有种族优越感的边界想象，认为黑人感染病毒的形势更为严重，黑人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

而对外，美国则通过意识形态划分，以对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想象作为依据，认为疫情在这些边界中更为严峻。于是，当中国政府全力迎战，担负起国际责任和国际道义，积极开展国际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疫苗援助、展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时，美国则戴着种族偏见的有色眼镜，在本已严峻的疫情环境中煽动西方民众针对特定国家与特定族群的仇外情绪。

同时，疫苗民族主义的加剧离不开冗余人口所带来的“种族边界”他者恐惧想象与歧视链的长期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资本控制的现代化四处蔓延，现代生活方式的广泛普及，冗余人口越来越多，废品生产幅度越来越大，既无法被吸收消除，更无法解除毒性，渐渐接近并有可能超过所能管理的极限，对全球人类的共存中形成的政治平衡和社会均势产生极大影响。此时，“冗余人口”就成为了圈内人眼中挤占了生存空间与生存安全的“侵犯者”。新冠病毒本身并不会歧视任何人，人人都是其受害者，但美国资本主义打着控制疫情发展局面的幌子使得病毒具有歧视性。冗余人口在大疫情环境下，难以被妥善安置，面临着随时都会被抛弃的风险，使得原本平等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被区分为“值得救援”和“无足轻重”的，部分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和贫困的工人阶级因没能接受平等医疗救助和卫生保障，日夜生活在病毒威胁的死亡恐惧中，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和恐慌情绪蔓延。

可见，对于道德恐慌与西方部分国家奉行的疫苗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放置于西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视域下进行理解。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借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嫁祸于特定国家、地域和族群，实施大规模的种族歧视和排外行为已成为社会“常态”。如在过去的中世纪，随着黑死病在欧洲肆虐，因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种族偏见，犹太阴谋论像瘟疫般大规模爆发，成千上万犹太人被迫害残杀，成为了灾难的牺牲品和替罪羊；19世纪后期，美国旧金山地区黑死病肆虐，由于第一位感染病毒的死者是唐人街华人，地方卫生局便以此作为种族歧视的借口将疾病的传播责任归咎于当地所有华人居民；2003年“非典”暴发，西方媒体片面报道，忽略中国政府作出的努力，使报道重点转向种族、文化背景等，甚至将“非典”称之为“中国疾病”。同样，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将冗余人口以及地域、种族边界差异作为转移社会矛盾、推脱疫情防控失误责任的借口，引发道德恐慌，从而成为美国控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建立国民政治

认同、转移社会矛盾的合法化手段。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奉行的疫苗民族主义，既是西方极端民族主义的映射和延伸，也是西方国家对当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回应。<sup>161</sup>

## （二）疫苗民族主义加剧道德恐慌

新冠疫苗作为稀缺性资源，其分配本就具备一定的道德悲剧性，然而疫苗民族主义又加重了这种悲剧。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锚定“替罪羊”，奉行“疫苗民族主义”，通过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隐喻和表达将新冠病毒来源“原罪化”，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道德恐慌情绪之中，其中种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尤为强烈。资本主义将第三国家、种族人群界定为“他者”，认为“他们”是病毒传染源、携带者，“我们”是无辜被传染者，使得种族偏见对待被合理化。同时大肆传播疫情在在种族、冗余人口、第三国家等边界中形势更为严峻的思潮，鼓吹种族偏见、贸易保护和白人至上，强化种族人群身份差异，致使种族偏见和排外情绪和国家的政治、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

随着疫情在西方国家的扩散蔓延，部分西方媒体大肆传播关于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报道，将新冠病毒的根源毫无依据地归咎于疫情暴发地，将白种人群定义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并认为亚裔族群是文化素质低下、粗暴野蛮的，使得部分西方国家民众对亚裔族群产生偏见与歧视。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也指出，那些被认为是中国或其他东亚血统的人士遭受了与该病毒有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攻击。<sup>162</sup>流行疾病的报道最终会与国家及民族的形象挂钩，形成一个民族的隐喻。<sup>163</sup>这种充满种族偏见和地域歧视的报道，使得部分人群将重点放在了排斥种族之上，造成歧视者关注焦点误判，无心深入了解新冠防疫。泛美卫生组织（PAHO）于2021年11月25日发表了一项研究，强调了持续的COVID-19大流行对美洲人口的心理健康和福祉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并提出需加强美洲对COVID-19的心理健康反应的分析和建议。根据其中的研究审查数据显示，十分之四巴西人一直在与焦虑作斗争，秘鲁抑郁症状增加了五倍，并且由于大流行，报告高度焦虑的加拿大人的比例增加了四倍。<sup>164</sup>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主任Anselm Hennis博士认为美洲各地的人们除了克服对生病的恐惧和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失去亲人的创伤之外，还在遭受失业、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之苦，对心理健康的极其不利。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全人类都是病毒的受害者，是命运共同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多次公开呼吁各国抵制“疫苗民族主义”，因为这“只对病毒有利”。无论是从世界安全角度，还是国家利益角度，在全球抗疫关键时刻，“疫苗民族主义”都是目光短浅的错误做法，是一种低效率的防疫行为，大大暴露了部分西方国家巩固文化霸权“本色”，凸显了部分西方国家为追求利益所展现的战略野心以及建立政治认同的目标意图，是狭隘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体现。费德勒教授也曾提出，“疫苗能够弥合因病毒而饱受煎熬的世界的裂痕，而囤积疫苗、破坏公平获取路径的行为，刻意凸显人们在种族身份上的差异，鼓动种族歧视与仇外情绪只会加深这些裂痕。”<sup>165</sup>在不同国家和种族间人为制造鸿沟，对被歧视种族带来多重伤害，加剧国家防疫发展鸿沟，使得疫苗接种的公平性成为问题，进一步煽动国民极端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了社会道德恐慌，恶化了道义环境，反映出西方社会的伦理价值、道德恐慌挑战以及深层次的道德文明危机。同时也打碎了疫苗自由贸易链条，诱发了部分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倾向，削弱了对国际抗疫的支持，增加了各国疫情防控成本，将世界推向道德和经济双重灾难，给世界带来更大的风险。

### 三、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危害

#### （一）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

一是本国生产多、捐赠别国少。新冠疫苗生产地范围受限，“助力”疫苗民族主义扩张。由于疫苗生产过程价格昂贵、复杂，生产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被严格监管控制，贫穷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有力的医疗保障体系来生产、管理新冠疫苗，即使部分富裕国家拥有经验丰富的监管机构，疫苗的生产及批准仍成为挑战。因此目前来说，全世界只有少数公司能够完成对疫苗中的活性成分高强度的质量控制，而这也表明疫苗的生产分发将局限于少量国家。此外，即使疫苗已经过批准，部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仍会因追求国家利益、巩固自身霸权而实行疫苗民族主义行为，秉持本国需求至上原则，锁定疫苗使用权，推迟对他国的疫苗供应。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感染和死亡病例激增的危机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迟迟无法兑现捐赠承诺，加剧疫苗民族主义。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抢夺医疗物资，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发货，截取多国抗疫

物资；印度疫情严重之时，政府曾多次呼吁美国解除禁令，开放疫苗原材料出口，但美方依旧持拒绝态度，严格管制疫苗的原材料出口。这一举动阻断了疫苗生产供应链，对世界疫苗生产带来极大限制与冲击。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表明，“占世界人口 14% 的高收入国家拿走 13 家主要疫苗开发商 75 亿美元订单的一半。而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中低收入国家只向 6 家疫苗制造商下了订单”。<sup>166</sup>美国疾控中心发文表示于 2021 年 3 月至 9 月，美国浪费了至少 1510 万剂新冠疫苗，远远多于先前统计数量。<sup>167</sup>在引发国际公愤后，美国此前曾作出对外提供 8000 万剂疫苗的承诺，并定于 6 月底前兑现，但挤牙膏一般的美式援助拖到了 2021 年的 8 月份才完成。<sup>168</sup>美国拜登政府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捐赠的 80 瓶辉瑞新冠疫苗仅够为 200 多人接种，对于一个总人口约 140 万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沦为国际笑话。<sup>169</sup>

多国纷纷谴责美国的疫苗浪费行为，这无疑是在剥夺他国国民接种疫苗的机会。英国华威大学研究传染病防治公平问题的塞卡拉拉副教授在谈及疫苗浪费问题时表示很是痛心，不少非洲国家只有不到 5% 的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而美国却浪费了这么多，这是一个悲剧。”<sup>170</sup>《纽约时报》也发文表示，“美国国内疫苗供过于求，但对他国的援助承诺迟迟不能兑现，一些捐赠出去的疫苗已临近有效期，给受援国或地区的疫苗使用增加了困难。”<sup>171</sup>目前，捐赠疫苗情况并不乐观（见图 1-1），由于富裕国家大量囤积疫苗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疫苗供应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交易却在苦苦挣扎，剂量捐赠对于疫苗公平变得越来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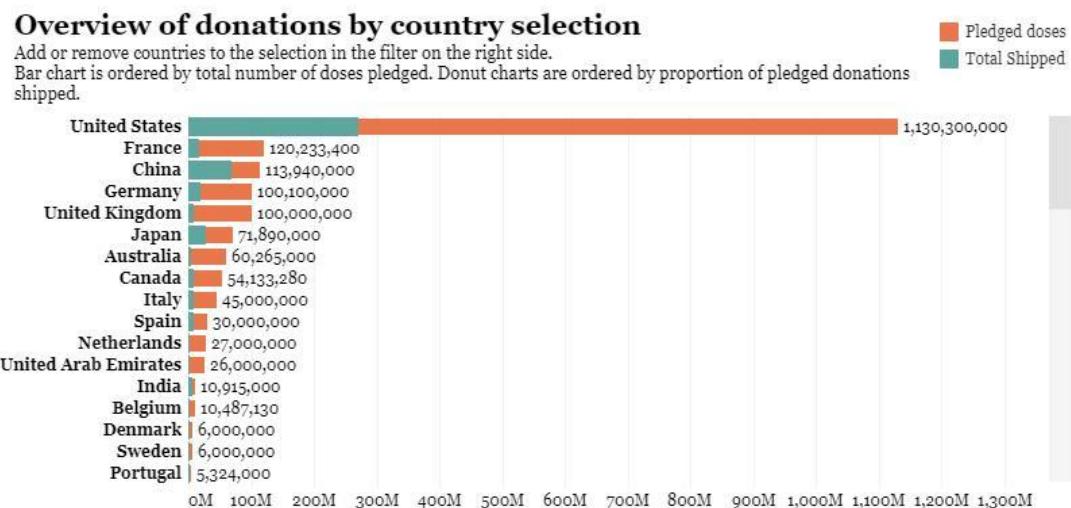


图 1-1 西方国家疫苗捐赠情况<sup>172</sup>

二是囤积疫苗远超本土实际需求。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巩固霸权，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提前砸重金抢购囤积的疫苗数量远超所在国家人口所需。目前，疫苗在全球范围的分配接种严重不均衡（见图 1-2），不仅导致大量新冠疫苗被浪费，全球疫苗供应变得更紧张，极大减少贫穷国家弱势群体可获得的疫苗库存量，使得部分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出现疫苗短缺的情况，甚至容易引起疫苗价格飙升，使贫困国家更难以企及。路透社称，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富裕国家囤积大量新冠疫苗，比需求量高出 10 亿剂。<sup>173</sup>截至 2021 年 3 月，英国伦敦一家追踪疫苗进展的分析公司 Airfinity 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多的新冠疫苗生产国，生产的 1.64 亿剂疫苗“全部自用”，出口量为“0”。而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美国田纳西州东北部地区因大量囤积疫苗，前来接种疫苗的民众数量不及预期，已有近 3.5 万剂疫苗被扔掉，导致大量浪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因人数不足丢弃近 22.4 万剂苗的同时，全球仍有数百万人在等待接种疫苗的机会，如像马里、苏丹等国家如果想实现国民大面积疫苗接种，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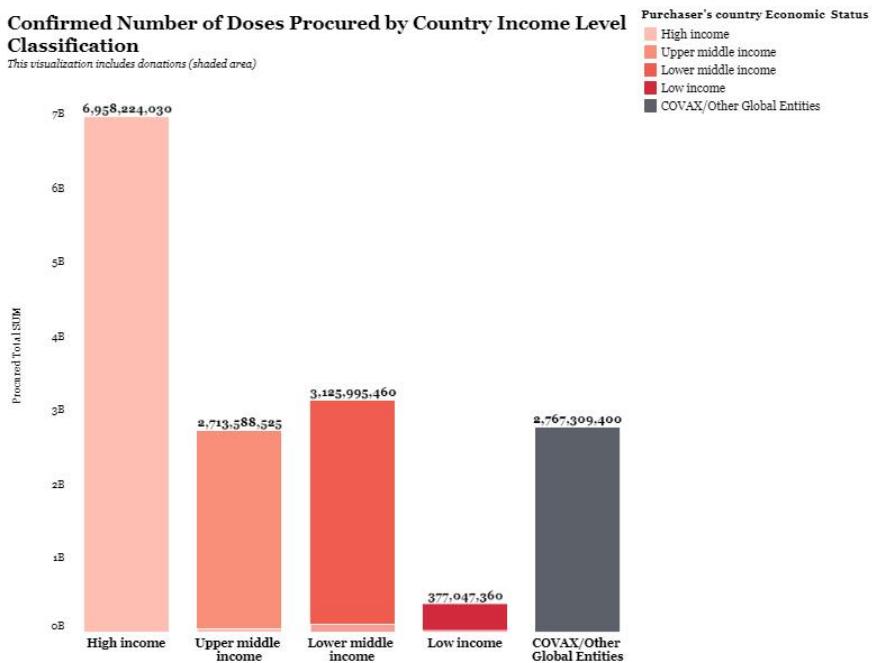


图 1-2 按国家收入水平购买的剂量数<sup>174</sup>

穷国一剂难求，富国囤积居奇。《纽约时报》发文表示，“美国内疫苗供过于求，但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承诺迟迟不能兑现，一些捐赠出去的疫苗已临近有

效期，给受援国或地区的使用增加了困难。”<sup>175</sup>可见，“疫苗民族主义”的短视做法将拖慢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进程，导致新冠病毒救援时间被拉长，最终将会沦为新冠病毒侵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帮凶。

三是疫苗数据公开程度。当有关疫苗的沟通不透明、数据不公开时，也容易引发不确定性与道德恐慌的负面情绪产生。如印度一些议员认为印度正式批准的国产新冠疫苗 Covaxin 尚未被证明有效，因而对印度政府批准它的决定感到震惊。印度卫生监督机构“全印度药物行动网络”(All India Drug Action Network)也表示，由于缺乏药效数据，已经引发了民众强烈的担忧。<sup>176</sup>同时，随着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多地疫情反弹，尽管美国疫苗接种点如今并不少，但仍有许多人不愿接种，原因是他们不信任新冠疫苗。疫苗怀疑论者要么听信社交媒体反疫苗活动人士鼓动，要么受美国共和党籍政客在疫苗方面对民主党政府批评言论的影响。<sup>177</sup>不实信息对国民的生命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潜在威胁。此外，由于数据缺乏公开性与收集有序性，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支离破碎。美国科技网站“The Verge”在《美国在收集新冠疫情数据方面做得不够好》文章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收集混乱，美专家在研究新冠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毒株有效性时，不得不依靠国外数据，如以色列、加拿大和英国。”<sup>178</sup>

而反观中国，却能在以最快速度甄别出病原体并在第一时间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做到了信息公开共享，为研制疫苗提供了大力数据支持。英国《卫报》称《俄罗斯报》援引俄方官员及专家指出，“中国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公开性，与非典时期相比，这对疾病研究帮助极大，中国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sup>179</sup>社交网络成员的态度可能对鼓励接种疫苗产生影响。公共卫生传播可以使用透明和清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信息，并承认历史和持续的歧视和种族主义是对 COVID-19 疫苗信心低下的可以理解的原因。<sup>180</sup>

可见，在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下公众对新冠病毒了解程度有限，加之各类疫情信息混杂，只有公开向大众展示疫苗的接种情况与实际数据，拒绝“疫苗民族主义”，及时回应舆论关切，才能够提高人们对政府及卫生当局的信任，增强公众信心，促进对疫苗的支持，有效防止“民族疫苗主义”阴谋论的传播，这也是打败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关键。而部分西方国家秉持着本国绝对优先原则、疯狂囤积疫苗、数据不公开透明，大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危及世界各国的安全

和经济利益，为国家共同抗疫制造了发展鸿沟，也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这无疑将阻碍全球抗疫的合作进程。

## （二）疫苗民族主义的危害

危害之一：疫苗民族主义激化矛盾加剧世界性不平等。世界性的不平等早在疫苗民族主义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无疑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据联合国 2021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剧变世界中的不平等》显示，欧盟居民的平均收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居民的 11 倍；北美居民的收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居民的 16 倍。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之间的绝对差从 1990 年的约 27,600 美元增加到 2018 年超过 42,800 美元。<sup>181</sup>如此之大的经济差异带来的是世界各国在政治、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在资源分配与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人的生命常常被价格化，<sup>182</sup>当新冠肆虐全球时，较贫困国国民的生命健康权甚至都难以得到保证。较贫困国缺乏病毒检测工具及隔离设施，高危人群和医疗工作者暴露在感染的危险中，新冠病毒给原本岌岌可危的当地医疗系统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国家进一步被拖入无疫苗-感染-医疗系统崩溃-再感染的恶性循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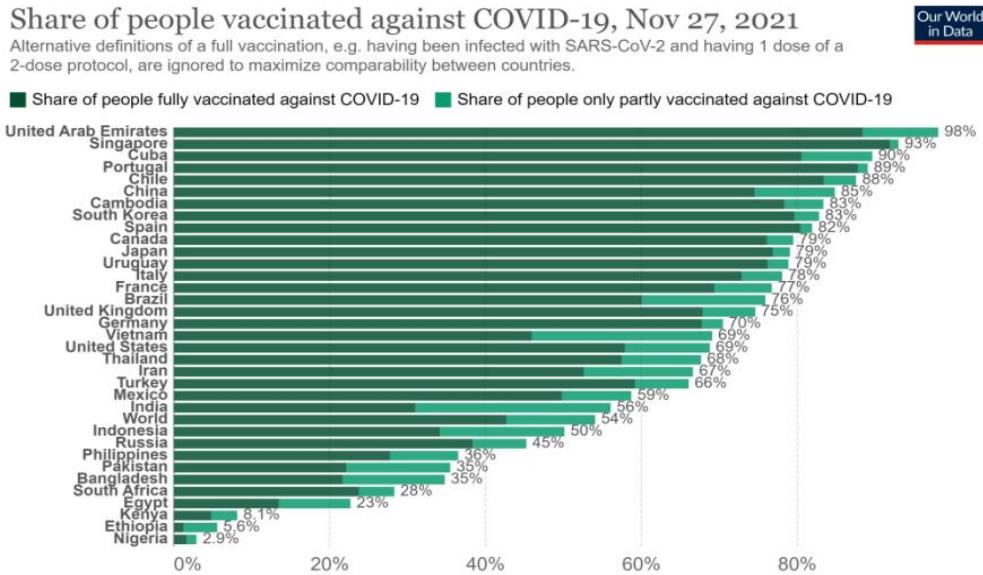
在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大背景之下，疫苗民族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主义观念本身的产物，应当更加关注疫苗民族主义背后的国际性不平等问题。疫苗产品的跨国流通也是国际经贸竞争的载体之一，背后涉及品牌、经济和政治等产品衍生利益的博弈。<sup>183</sup>目前，疫苗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有争夺疫苗研发主导权、囤积超量疫苗、控制疫苗原材料出口等，而这一系列动作本质上是一种“强国特权”。首先，疫苗本身作为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用于预防接种的生物物品，对研发能力、研发投入要求极高，疫苗研发本身的难度注定了它只能由世界少数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经济体来完成。其次，只有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才能有足够的政治霸权、经济能力、科技储备实现对疫苗研发、生产、分配的干预或控制。但是，国力强大应当意味着承担更多世界公共责任，而非忽略导致世界不平等的结构性错误，剥夺较贫困国国民接种疫苗的权利，只强调所谓“自研自用”。

在人类历史中，疫苗民族主义并非鲜见。在西方强国看来，保障本国公民，尤其是主要人群（本土人口，非移民群体）接种疫苗的数量和资源足够充裕，是安抚本国民众的主要手段，即使囤积的疫苗远超本国公民接种需求，也不会“施

舍”给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历史上西方强国霸占医疗卫生资源导致分配不公的案例比比皆是。博利基等人观察到，对富裕国家囤积和/或购买所有可用的大流行疫苗的担忧并不新鲜，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市场上的所有疫苗都已售罄，并被输送到富裕国家。这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向低收入国家捐赠和隔离一些物资的建议和呼吁。<sup>184</sup>这种仅靠量的囤积而不讲科学，违背医疗常识的动作，在短期内提升国内政治支持，但罔顾科学最终会埋下更深隐患，这不仅是对本国国民的不负责，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人类健康与发展的不负责。

**危害之二：疫苗民族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对抗。**疫苗不公平分配可能激化地缘政治矛盾，甚至带来对抗。一方面，疫苗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筹码被交换，很可能损伤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激化原本就不睦的国际关系。同时，分配的不公也有可能带来“无声的抗议”。抗疫物资，包括疫苗、防护用具、检测工具等在全球各国的生产分布并不平均，研发、生产、装配、运输的全过程涉及多个国家，一旦其中某个环节遭到限制，则很有可能带来被限制国的报复性制裁，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国际组织共同提出并牵头进行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该项目拟于2021年底前向全球“自费经济体”和“受资助经济体”提供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COVAX计划旨在确保每个国家都能公平地获得新冠疫苗。各疫苗主要供应国如果能通力合作，积极推动疫苗在全球的合理分配，将有助于实现全球协调部署，有效控制新冠疫情流行，挽救人类生命并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但当前以COVAX为代表的疫苗分配多边框架实际运转面临重重困难。据Our World of Data在2021年11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疫苗接种率(一剂)达到了54%，但尼日利亚等国的疫苗接种率甚至不足5%（见图1-3），疫苗不平等的现象令人担忧。许多国家在选择疫苗捐助和出口对象时，首先考虑的是能从对象国处获得的政治回报和外交影响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公开表示：“现在我们还看到作为COVAX一部分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正达成额外的双边协议。”“这会让所有人注射的疫苗涨价，意味着最贫穷和最边缘化国家里的高风险人群得不到疫苗。”<sup>185</sup>



Source: Official data collated by Our World in Data. This data is only available for countries which report the breakdown of doses administered by first and second doses in absolute numbers.  
CC BY

图 1-3 全球人口疫苗接种率<sup>186</sup>

危害之三：疫苗民族主义导致阶级分化、种族歧视。疫苗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全球化发展中，各国内不一定只有单一民族或种族，少数群体，弱势种族同样有可能要面对更加直接的区别对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自新冠大流行以来，公众针对亚裔美国人表达种族歧视或无意的冒犯种族言论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近 1/3 的亚裔美国人（31%）表示，他们曾遭受种族侮辱或嘲笑，而 26% 的人说，他们担心有人可能会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sup>187</sup>这一现象反映出，疫情激化了一国内部原有的种族矛盾与对立，给种族团结及相互尊重带来了威胁，当这种威胁被疫苗民族主义进一步强化时，有可能带来国内暴力事件的增多，引发政治动荡。

在疫苗接种数据方面，有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疫苗接种情况存在明显的种族间差异。美国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群体的疫苗接种比例明显低于白人。数据显示，在美国所有完成 2 剂疫苗接种的人群中，65.8% 为白人，11% 为拉丁裔，8.5% 为非洲裔，5.3% 为亚裔。截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美国白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为 66%，比非洲裔高出 56%。<sup>188</sup>疫苗接种直接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活动相关，先接种疫苗意味着能更快使得生活恢复正常，在国内疫苗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少数族裔不仅生产生活继续受到病毒影响，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暴露风险，更容易感染，而这种因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的感染风险又会进一步强化种族偏见、种

族歧视，走入恶性循环，进一步强化国内的民族对立。疫苗民族主义注定是一条死胡同。世卫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期在接受 CGTN 专访时表示，所有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者，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所有人都安全了，自己才会安全。面对“疫苗民族主义”的抬头，疫苗的分配，必须讲求平等、道德的原则。

#### 四、疫苗民族主义的道德恐慌规避

##### （一）各国携手共建命运健康共同体

全球风险社会下以新冠病毒肆虐为代表的“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人类身处新冠疫情之中，对病毒在当下及未来产生的影响感到惴惴不安，快速变化与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急需出口，急需“归责”，因此潜伏在公众心中的道德恐慌浮出水面并促使疫苗民族主义产生。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继续蔓延，新冠病毒本身仍在不断产生新型变种。究其根本，部分国家奉行疫苗民族主义，超量囤积疫苗及疫苗生产原材料，随意插手疫苗分配，无视世界卫生组织权威，严重拖慢了全球免疫屏障建立的步伐，造成“免疫鸿沟”。国际商会（ICC）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疫苗民族主义”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高达 9.2 万亿美元的损失，而其中近一半的损失将发生在最富有的经济体。同时，疫苗“争夺战”不断升级，让疫苗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限制疫苗成品出口，还限制生产疫苗所需的关键材料，试图形成“疫苗垄断”。

但病毒没有国界，疫苗的公平分配不仅事关人道主义精神，从更加务实的角度看，除非能通过疫苗全球接种形成免疫屏障，使得病毒在全球各地得到控制，否则全球经济将难以复苏，生物病毒之外“政治病毒”或许会带来本可以避免的惨痛结果。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平分配应当是全球所有国家，特别是各强国需要考虑的重要任务，而疫苗的公平分配，必然依赖多边主义框架。2020 年 9 月 2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我国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加入该计划，同时承诺，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作为抗击病毒最有效的武器，疫苗不应成为逐利工具，更不能成为政治筹码。各国应当携起手来，抵制“疫苗民族主义”，努力填平本不应出现的“免疫鸿沟”，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民众都能负担起的公共产品，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sup>189</sup>

##### （二）世卫组织须从制度上保障疫苗均衡

世卫组织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卫组织与各国家，各国际组织密切合作，收集、分析和科普关于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信息、知识，积极为各国防范病毒传播提供预警及指导，同时启动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加速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但尽管世卫组织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其自身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自身资金短缺、执法力量不足、受地缘政治干预等。有学者甚至指出，世卫组织牵头推出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也具备很强的临时性，这种临时性质就意味着在超国家层面上缺乏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永久性结构或长期解决方案。<sup>190</sup>

显然，当前世卫组织缺乏统一制度来保障疫苗合理分配，尽管世卫组织总干事等人多次发声呼吁共同抗击疫情，促进疫苗合理分配，但现实依然是疫苗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本国第一”横行。虽然当前各国表现出希望能公平分配疫苗资源的“共识”，但在疫苗的真正公平分配之前，一切共识都只能称为愿景，而要使疫苗公平分配真正实现，需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政府间卫生组织表现出更强硬姿态，发挥更实际作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世卫组织必须在卫生事务中以领导和协调机构的身份行动，且世卫组织也能胜任这一角色，不希望让共同努力的意愿政治化。<sup>191</sup>因此，尽管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是朝着全球公平获得新冠疫苗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世卫组织也不应当忽视其面临的挑战和局限性，应当尝试采用更加强硬的措施。

## 五、小结

大规模的道德恐慌与公众心目中有关某一事件或某一群体威胁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和利益的联想密切相关，<sup>192</sup>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之时，公众心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不安情绪需要出口，此时道德恐慌极易产生。而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是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典型黑天鹅事件，其带来的影响是剧烈、深远而长久的。部分西方国家正是利用了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产生的普遍的道德恐慌，实行疫苗民族主义，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固守种族主义的歧视和偏见，试图借助疫情转移矛盾与国家道义责任，在疫苗的研发、生产、分配等各环节无视全球多边主义框架，无视世卫组织权威。试图实现对新冠疫苗的绝对主导与绝对优先，呈现本国疫苗生产多而捐赠别国少、囤积疫苗远超本土实际需求、疫苗数据不透明降低大众信任度等一系列“疫苗民族主义”表征。这种“以

“我为先”的短视带来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负面连锁效应，不仅强化阶级分化与种族歧视，使得少数族裔有可能成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受害者，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的感染风险反向强化疫苗民族主义与道德恐慌本身，最终引起阶级分化与种族歧视的强化，甚至还严重扰乱国际抗疫合作，妨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改善，加剧全球不平等，使得原本就没有先发优势的国家被卷入更深的贫困、疾病旋涡；激化地缘政治矛盾，甚至带来对抗。

当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在新冠疫情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疫苗民族主义是不尊重客观医学规律，丧失人类共同道德与良知，只追求国内政治运作的产物，对本国国民及世界人民都极不负责。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疫苗民族主义与道德恐慌的化解最终一定要依赖多边主义框架，这需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政府间卫生组织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更有约束力的措施，加强各国联防联控，使疫苗数据公开化、透明化，提高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同时各国间也应超越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摒弃种族主义的傲慢，凝聚共识，认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秉持人类命运，齐心协力、精诚合作，才能最终战胜新冠病毒，弥合“疫苗分配鸿沟”，共建健康命运共同体。

场域是一个由社会各种力量组成的公共空间，不同的场域以意义斗争的形式出现。<sup>193</sup>（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 第二章 不同场域下的公共卫生事件学术考察

学术场域的出发点是布迪厄的基本场域理论，由危机所形成的的话语场域是一个围绕意义展开争夺话语权力的隐含力量关系的公共空间。本文关注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学术场域，其中涉及公共卫生机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医患双方，媒体等不同的社会力量。由于公共卫生的专业性、复杂性，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等因素，医患矛盾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发危机舆情，成为重大突发事件。场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变化的系统，不但有自己的逻辑，也遵从整个社会的逻辑和制约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Citespace 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公共卫生所涉及的危机传播、社会舆论、突发事件等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充分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探讨研究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对于平衡学科的偏离问题，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和拓展公共管理学、舆论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实践。

### 第一节 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场域的学术考察<sup>194</sup>

在大数据背景与国际视野下，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与扩散迅猛、猝不及防，易引发公众的焦虑、愤怒、悲伤、恐惧等负面情绪，加剧公众群体性恐慌。笔者运用分析软件 CiteSpace，以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为基础，对 2000-2019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 678 篇文献进行共词分析和共现分析，包括发文量趋势分析、核心作者分析、最高被引量分析、关键词总体分析、发文时区分析等，意图呈现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发展进程及前沿态势，探索研究不足和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 一、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研究场域

习近平在 2017 年全国卫生计生系统表彰大会上强调：“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卫生和健康事业、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全国卫生计生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卫生和健康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推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各项工作。”

作，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sup>195</sup>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涵盖疫苗问题及各种传染病）涉及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危。在大数据背景与国际视野下，其传播与扩散速度之迅猛、猝不及防，极易引发公众的焦虑、愤怒、悲伤、恐惧等负面情绪，加剧公众群体性恐慌。20年来中国爆发过大大小数10起公共卫生事件，给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曾出现过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声音：一是宗教原因，部分神职人员反对将动物制品注入人体；二是医学争论，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抱有疑虑；三是伦理考量，强制接种疫苗侵犯了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近年来频繁曝光的疫苗问题引发的社会恐慌更加尖锐和紧迫。怀疑疫苗安全性是疫苗犹豫的主要原因之一。<sup>196</sup>2014-2016年WHO和UNICEF对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怀疑疫苗安全性和担心副作用占疫苗犹豫原因的22%-23%。<sup>197</sup>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格鲁尼亚和英国儿童父母发生疫苗犹豫的原因包含认为疫苗不安全和担心不良反应。<sup>198</sup>意大利的研究发现，疫苗犹豫的家长与接受疫苗的家长相比，对长期和短期疫苗不良反应的关注度更高。<sup>199</sup>波兰的研究显示，37%的受访家长表示“疫苗会导致儿童严重的副作用和并发症”。<sup>200</sup>可见，世界各国疫苗问题的惨痛教训是前车之鉴，必须警钟长鸣。面对公民因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断降低政府公信力的突出问题，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学者都以各自的学科背景为起点，对公共卫生问题形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科关怀，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聚焦于场域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而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却较为鲜见。布尔迪厄（1998：133）以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场域理论。他认为，“从分析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惯习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sup>201</sup>他认为，惯习是深刻存在于“行动者”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它既是“行动者”用来指导实践的标准维度，也是“行动者”进行创造和发展策略的行为方法（宫留记，2007）。<sup>202</sup>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视为一个场域来研究，不能忽视其巨大的社会背景，围绕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报道又难以绕开中国的政治场域。因此，“中国的新闻场域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其作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建构的工具，自主性是比较脆弱的”（张志安，2010）。<sup>203</sup>

综上所述，从全球视野来看，20年来公共卫生事件在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

脉络、从事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主体表现出何种群像特征等一系列问题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参照国外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范式，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状况如何，今后该选取哪些研究路径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对以下问题展开探讨：

Q1：近 20 年来，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演进趋势？

Q2：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是哪些？在全国视域下，这种研究是否存在研究地域差异？

Q3：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主体主要来自哪些学科？相互间合作状况如何？

Q4：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热点问题是哪些？形成的知识群分布状况如何？

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考察有助于观察和理解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形成对公共卫生研究进路的整体性把握和认识，以期对当下相关研究带来有益启示。

## 二、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数据获取和参数设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医疗体制在市场经济改制中不断调整，医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人们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健康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由此衍生出很多医患方面的问题，公共卫生事件也在各种矛盾中日益激化。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疫苗安全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互联网的出现及快速普及，加剧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发酵及爆发，几乎每年都有因疫苗问题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突发事件。本文聚焦于 2000—2019 年之间的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对 CNKI 数据库的检索与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研究文献达到 6325 篇，其中核心期刊、CSSCI 期刊多达 1082 篇，如此庞大的论文数量若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难以科学全面地概括出各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研究者也容易落入主观判断的窠臼。可视化分析工具简化了繁琐的传统文献查阅方式，客观、全面地展现学科研究的演进路径与发展趋势。

知识图谱的相关研究众多，且多集中于图书情报领域（孙鸿飞等，2014）。

<sup>204</sup>王军利（2017）对比了国内外对身体活动的关注点的差异，研究侧重点不同。

<sup>205</sup>也有少量文献关注公共卫生绩效问题（陈曦等，2012；<sup>206</sup>张琪明等，2019<sup>207</sup>），此类研究聚焦于公共卫生绩效管理的系统研究，强调应加强公共卫生绩效的协同研究。本文采用美国华裔学者陈超美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呈现工具。CiteSpace 的优势在于可以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

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本文借助 CiteSpace V (版本 5.4.R1 (64bit) , 利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对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合关键文献的重点分析, 梳理出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 提供预测性的经验参考。在此基础上, 回答本文提出的四个问题。

### (一) 数据获取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将疫苗问题作为公共卫生事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单列出来。以“疫苗”、“公共卫生事件”为主题词 (检索条件: 年 between (2000, 2019) 并且 ((主题=疫苗 或者 题名=疫苗) 或者 (主题=公共卫生事件 或者 题名=公共卫生事件)) (模糊匹配)) 进行检索, 去除与本研究明显不相关文献, 最终获取文献 678 篇。

### (二) CiteSpace 参数设置

由于 CNKI 所搜集的数据不能直接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 所以要先将从 CNKI 搜集的 Refworks 数据转化成 Web of Science (简称 WOS) 数据源, 并对于相关的参数进行设置。具体参数设置见表 2-1。如无特别提出, 以上参数基本保持不变。研究将会依据分析内容的不同, 选定特定的主题词来源绘制相关图谱, 进行系统分析。在绘制相关图谱时, 为了图谱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将会对部分特定参数做一定的调整。

表 2-1 CiteSpace 参数设置详情

序号	参数项目	具体数值
1	Time Slicing (时间分隔)	2000-2019 年
2	Years Per Slice( 最小统计时间)	1 年
3	Term Source( 主题词来源)	Title ( 标题) 、Abstract ( 摘要) 、Author Keywords ( 作者关键词) 、Keywords Plus ( 拓展关键词 )
4	Term Type ( 术语类型)	Noun Phrases ( 名词短语)
5	Node Types( 节点来源)	Author ( 作者) 、Term ( 主题词 ) 、keyword ( 关键词)
6	Top N( 频率选择)	N = 30 ( 选取每年出现频率前 30 的关键词、主题词 )
7	Pruning( 网络剪裁)	pathfinder ( 寻径 )

## 三、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数据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2000-2019 年之间, 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的时间分布图, 如图 1-1 所示。根据图 2-1 可将我国对于疫苗及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2000–2002 年），这三年间，探讨公共卫生事件的文献仅有 2 篇。其相关研究的匮乏程度与我国媒体关注公共卫生事件的热度及宣传策略有关。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通常采用平衡报道手法，突出事件的正面导向，疏导公众恐慌情绪，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因此这一阶段各领域学者对疫苗问题及公共卫生事件的探究并不多产。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2003–2015 年），2003 年爆发的 SARS 疫情使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处理，由此该年度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呈井喷之势。之后十余年间学术各界都高度关注公共卫生事件，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发表数量达 367 篇之多，占研究样本总量的 54%。第三阶段为高潮阶段（2016–2019 年），2016 年发生的山东疫苗事件将该领域的研究推上顶峰，仅 2016 年发文数量就达 130 篇，2018 年长春疫苗事件的爆发又推动了学者进一步关注疫苗问题及公共卫生事件。这一阶段发文数量共 311 篇，占研究样本总量的 45.8%。可见，疫苗事件舆情的爆发在引起公众恐慌的同时也激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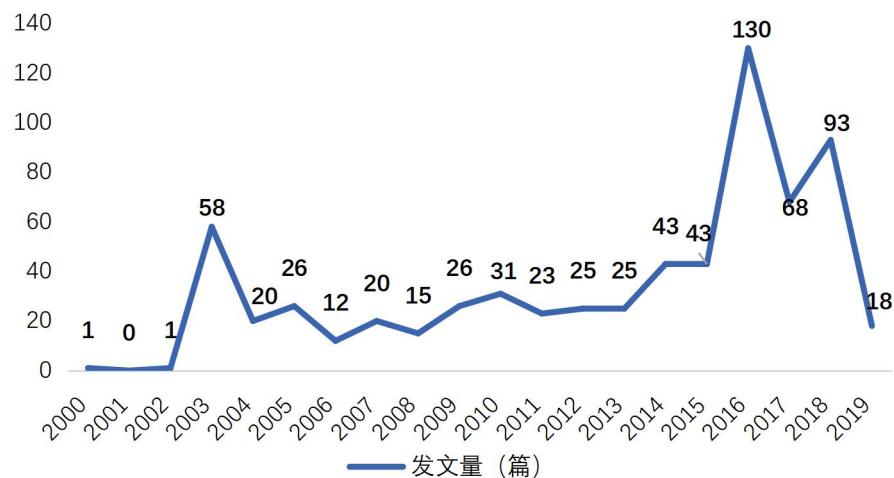


图 2-1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领域研究成果数量的时间分布图

## （二）核心作者分布

对某一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的理解，可从相关文献作者入手进行分析。评判核心作者的标准，可从发文数量、文章被引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等级等指标作为综合参考。本文以 CiteSpace 软件为工具，进行文献作者分析。具体操作上，Time Slicing（时间分区）选择 2000 年至 2019 年，其中 Years Per Slice 为 1。Node Type（节点类型）选中 Author（作者），Pruning（裁剪）则选中 Pathfinder（寻径），进行分析，制作成图 2-2，即核心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

从 Process Reports (运行报告) 可得知 Nodes (节点) =96, Links (连线) =124, Density (密度) =0.0272。本文选择了发文量最高的前三十位作者进行共现与分析可知, 疫苗研究、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密度较低, 学者间的合作程度不高, 共同研究问题、发表论文的合作模式尚未形成。就图中显示的合作关系而言, 金明华、石东风、曹锦丹和孙志伟等人合作发表论文 5 篇。而钟剑明、赵梦蓝及刘小敏三人与朱为群、尹情及赵术高三人则合作发表论文 3 篇。石修权和周彦娜合作发文 2 篇。发文量前 30 的其余作者均为个人研究者, 并没有与其他学者形成合作。



图 2-2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研究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图谱中“Summary Table”显示连合作者在内共含有 96 位核心作者, 将发文量排在前 30 名的学者制作成表 2-2: 疫苗公共卫生事件核心作者表。数据显示, 在 2000–2019 年间, 只有 7 位作者发文数量达到 3 篇以上(含 3 篇), 其中只有 1 位学者发文 5 篇, 2 位学者发文 4 篇。其余 23 位学者的发文数量皆为 2 篇。从学者的发文量来看, 高产作者较少, 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研究尚未触及较深层次, 仍有大量空间留待后继者继续开拓探索。

表 2-2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核心作者

排名	作者姓名	发文量	排名	作者姓名	发文量
1	应松年	5	16	谭兆营	2
2	徐勇	4	17	周彦娜	2
3	顾玉林	4	18	朱为群	2
4	郑保章	3	19	靖力	2
5	达庆东	3	20	曹锦丹	2

6	付子堂	3	21	张晓丽	2
7	张自力	3	22	李娟	2
8	赵丽梅	2	23	赵术高	2
9	莫于川	2	24	金明华	2
10	石修权	2	25	孙志伟	2
11	钟剑明	2	26	白丰硕	2
12	刘小敏	2	27	尹情	2
13	赵梦蓝	2	28	石东风	2
14	田华	2	29	王炎龙	2
15	宋华琳	2	30	李纲	2

为进一步探究学者论文的被引数量,笔者选取了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被引数量大的论文(前15篇),以其为基础制作成表2-3,即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研究15篇高被引文献表。数据显示,薛澜、朱琴的文章《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以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为例》被引227次,高居首位。莫于川的文章《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非典危机管理实践提出的法制建设课题》被引99次,紧随其后;牛冲槐等的文章《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应急能力的测定》被引57次,位居第三。这三篇文章成为该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大概源于:一是SARS事件激发了学者对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学术热情;二是当时国内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学者对国外危机应对经验的高度推崇;三是国内学者对突发事件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制、政府等宏观、中观层面的策略性思考。

表2-3 2000-2019年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研究15篇高被引文献表

序号	文章名	作者	年(期)	刊物名称	被引数
1	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以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为例	薛澜 朱琴	2003(08)	中国行政管理	227
2	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非典危机管理实践提出的法制建设课题	莫于川	2003(04)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99
3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应急能力的测定	牛冲槐等	2003(04)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7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策略	张自力	2005(10)	中国记者	49
5	我国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状与管理对策	徐勇 颜博秋	2013,(05)	中国学校卫生	45
6	我国学校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现状与研究展望	徐勇	2007(08)	中国学校卫生	45
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媒报道与民意诉求——以“苏丹红事件”为例	张自力	2005(04)	新闻大学	43

8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急体系建设	方利洪	2004 (04)	中国学校卫生	41
9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的构建	赵冰	2004 (01)	中国行政管理	39
10	构建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框架的探讨	石东风等	2004 (01)	中国公共卫生	39
1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责任研究	徐继敏	2003 (04)	探索	38
12	面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移动 GIS 设计与实现	王伟星等	2008 (06)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31
13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长效机制的构建	文美荣	2010, 2 (01)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30
14	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透视健康传播	何伸	2007 (04)	新闻窗	30
15	高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探讨	武文宏	2005 (08)	中国热带医学	28

### (三) 研究热点领域分布

#### 1. 主题词及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分析

将 CiteSpace 处理的数据导出以后，对“Term Labeling”中的各个数值进行调整，其中“Threshold”阈值取 2，最终生成 137 个节点，346 条连线，密度为 0.0371，最终形成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主题词、关键词共现图谱，详见图 1-3。在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也就是图中“+”号的大小代表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号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现了各个关键词之间共现的强度，连线越多，强度越大。密度为 0.0371 则表明在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中各个节点研究较为紧密。同时，节点从内到外，从浅色调到深色调表示从早期到现在的发文时间。有部分节点外环颜色特别深，如“问题疫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表明这些主题的中心性高，该节点与其他节点存在着紧密联系，也是连接不同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sup>20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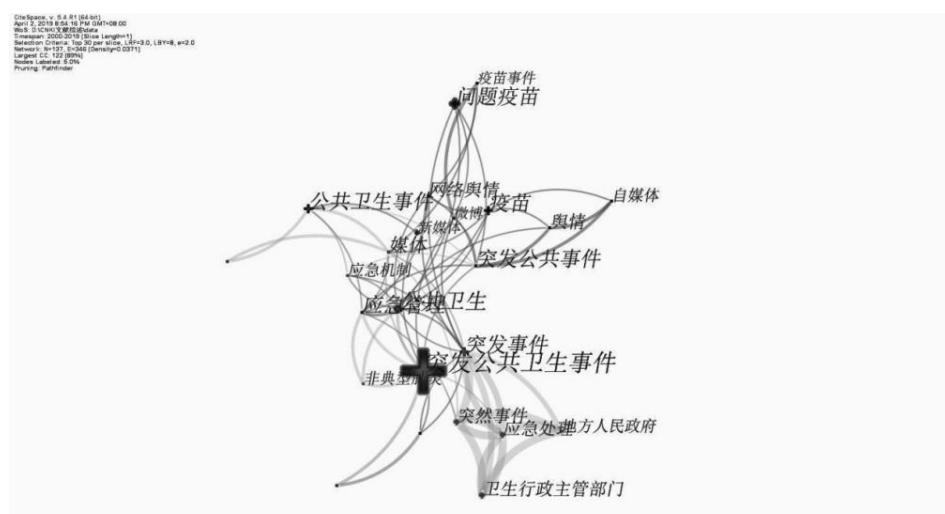


图 2-3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主题词、关键词共现图谱

将图 1-3 图谱中的主题词、关键词共现的“Summary Table”导入 Excel 表格中并进行整理后，得出表 1-4：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表。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的大小可作为衡量该关键词在整个共现网络中媒介者的能力强度。在 CiteSpace 中，中介中心性超过 0.1 的节点被称为关键节点。

表 2-4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84	0.32	11	网络舆情	13	0.12
2	公共卫生	65	0.35	12	应急机制	12	0.08
3	突发事件	47	0.19	13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12	0.01
4	疫苗	33	0.19	14	疫苗事件	12	0.08
5	媒体	22	0.14	15	行政处分	10	0.01
6	应急管理	21	0.17	16	非典	9	0.03
7	问题疫苗	20	0.37	17	新媒体	8	0.01
8	突发公共事件	19	0.17	18	舆情	7	0.04
9	应急处理	14	0.03	19	自媒体	7	0.05
10	微博	13	0.02	20	传染病疫情	6	0.03

结合图 2-3 和表 2-4 可看出, 2000-2019 年间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领域中主要围绕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84, 0.32)、公共卫生 (65, 0.35)、突发事件 (47, 0.19)、疫苗 (33, 0.19)、媒体 (22, 0.14)、应急管理 (21, 0.17)、问题疫苗 (20, 0.37)、突发公共事件 (19, 0.17) 等议题进行研究。可见公共卫生研究领域所聚焦的问题有: 疫苗问题、媒体报道、应急管理等。学界研究主要包含着网络舆情应对、公众群体恐慌、政府危机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在 CiteSpace 中, 可运用关键词聚类功能, 将所有关键词中具有明显的相同特征的

词汇作为聚类对象，从而发现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热点领域（见图 2-4）。



图 2-4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主题词、关键词聚类图谱

聚类分析的 Modularity 值 (Q 值) 是图谱网络模块的评价重要指标，Q 值一般在区间为  $[0, 1]$ ， $Q > 0.3$  (经验值) 时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 值 (平均轮廓值) 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一般认为，Silhouette 值在 0.5 以上，聚类是合理的。<sup>209</sup>根据图 1-4 可以得知，Q 值为 0.6136，Silhouette 值为 0.6618 (这里的 Q 值和 Silhouette 数据是所有聚类的平均值，表 1-5 只罗列了前 8 位聚类词的数据，所有未能呈现)，这表明聚类效果良好，团队结构较为显著。具体聚类信息见表 2-5。

表 2-5 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关键词重要聚类及其聚类标识词

聚类号 (Cluster ID)	节点数 (Size)	轮廓值 (Silhouette)	平均年份 (Mean year)	聚类识别词 (Top Terms)
0	27	0.838	200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22	0.952	2017	狂犬病疫苗
2	21	0.827	2015	长春长生
3	18	0.879	2003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4	15	0.927	2007	公共卫生事件
5	11	0.916	2016	山东疫苗事件
6	4	0.958	2003	应急机制
7	4	0.954	2016	企业管理

聚类标识词按照节点数降序排名依次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狂犬病疫苗、长春长生、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公共卫生事件、山东疫苗事件、应急机制、企业管理。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内存在着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行动者”携带资本入场后进行着资本的角逐和转换，能否在场域中占

据一个关键位置，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的资本数量和结构。<sup>210</sup>由于许多聚类标识词含有相似词，为进一步归纳学界研究热点，笔者将聚类标识词进行合并：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公共卫生事件”合并；将“狂犬病疫苗”、“长春长生”与“山东疫苗事件”进行合并；将“应急机制”与“企业管理”进行合并。再根据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与合并后的聚类标识词进行联系归纳，总结出2000-2019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五个主要知识群（见表2-6）。

表2-6 主要知识群及其高频关键词一览表

知识群名称	高频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突然事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危机、公共安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非典危机、公共卫生安全
传染病与疫苗安全研究	疫苗、问题疫苗、菌苗、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药品安全、传染病疫情、疫苗生产、狂犬病疫苗、二类疫苗、临床医学、h7n9禽流感、疫苗流通、甲型流感、百白破疫苗、流感、禽流感、疫情、传染病传播、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疫苗行业、疫苗接种、接种者、传染病、受害者、疫苗事件、山东疫苗案、山东疫苗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机制研究	应急管理、应急处理、应急机制、行政处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策、危机管理、社会责任、企业管理、冷链物流、监管、应急条例、借鉴、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有期徒刑、监管体系、应急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档案管理、治理、征求意见稿、防控、信息公开、应对系统、应急处理机制、公共卫生工作、违法违规、档案工作、区域合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服务
传媒与舆论研究	媒体、微博、网络舆情、新媒体、舆情、自媒体、议程设置、舆论场、舆论引导、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健康传播、风险沟通、新闻、网民、舆论监督、媒介融合、可视化、媒体报道、视频报道模式、危机传播、引导、媒体责任
政府机构与相关部门研究	学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高校、山东、地方人民政府、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政府、企业、疫苗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长春长生、食药监、卫生部、美国、深交所、北美洲、医疗卫生机构、药监局

## 2. 主要研究热点知识群的内容讨论

###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

从图谱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苗事件”的节点大小可看出，疫苗事件在大数据时代成为“公共卫生事件”里最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将图谱中节点较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危机”、“公共安全”合并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群，同时该知识群下与“应急管理”、“应急机制”、“信息公开”等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下载“Listing Citing Papers to the Cluster”列出的核心文献进行研读后，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重点：

一是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研究。此类研究重点关注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的困境，许志强等（2016）指出媒体报道还未形成一套应急机制，因此“构建‘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生态布局，才能让媒体能在危机发生时准确、快速地作出反应，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媒体应急效率。”<sup>211</sup>

二是对政府形象的影响研究。袁军等人（2013）认为，在“北京暴雨”、“动车事故”、“龙江镉污染”、“宁波PX事件”等不同类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中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沿用的仍是‘强化支持+超脱+纠正’的‘灾事喜报型’修复策略。”突发事件考验政府的应对能力，也是提升政府信任度的有效途径。<sup>212</sup>然而陈虹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却不容乐观：“对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对所在政府在公共事件中的‘缓报瞒报’程度评价与政府信任评价呈负相关。”<sup>213</sup>张薇等（2015）关注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官方媒体疫情报道的隐喻架构特点与实效。”<sup>214</sup>任景华（2015）提出，“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是政府信息传播策略建构的基本原则，承认风险的可建构性是政府信息传播策略建构的学理基础，实现媒体的协同传播是政府信息传播策略建构的重要目标。”<sup>215</sup>陈昌凤等人（2016）指出，“在社会化媒体情境下的危机传播中，搭建透明完善的对话机制，主动倾听、参与、回应、对话，是政府应当采取的应对方式。”<sup>216</sup>

## （2）传染病与疫苗安全研究

将图谱中有关传染病与疫苗安全研究的紧密联系节点“传染病疫情”、“疫苗接种”、“问题疫苗”、“疫苗流通”等进行合并，研读核心文献后发现，学界对传染病与疫苗安全研究的探讨多集中在社会心理学方面。

一是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心理反应研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的群体应激反应是存在差异的。刘宏等人（2017）认为，“女性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和低年龄青少年更易产生不良应对方式”，成为心理干预的重点对象。<sup>217</sup>高文斌等人（2003）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容易让公众滋生、蔓延恐慌情绪，“在SARS流行期间及时开通公众心理咨询热线，成为公众寻求心理支持的有效途径，为缓解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正常秩序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sup>218</sup>因此，赵玉芳等人（2008）提出，“突发公共事件需要心理救助，严重突发事件的心理健康服务包含事前的准备、应急和善后的完整建构。在运作上应该遵循综合预防、协同应对和规范管理三个基本原则。”<sup>219</sup>

二是公众接种疫苗意愿调查。目前，国内调查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方法多采

用传统调查方法——问卷+访谈。秦昕等人（2011）通过“采用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对提出的模型进行了验证和调整。揭示了民众对于甲流了解程度、疫苗安全感知以及风险认知的情况”，劝服家长接受疫苗接种的途径主要通过宣传。<sup>220</sup>张钟等人（2018）通过调查表明，“应针对健康宣教薄弱环节，加大对低学历家长、低年龄儿童家长的宣传力度，并帮助居民树立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以提升居民对手足口病的认知和EV71疫苗的接种意愿。”<sup>221</sup>张洁等人（2018）认为，公众对疫苗认知的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疫苗接种。有遗传病家族史的人群更易接受疫苗接种。如“HPV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的接种意愿并无差异。医药类专业学生、有肿瘤家族史的学生接种意愿较高。”<sup>222</sup>类似研究指出媒介对公众接种疫苗意愿有一定作用，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公众文化程度和对疫苗认知度，赵敏等人（2018）认为，“电视、网络是获取疫苗信息的主要途径，年龄、文化程度、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是影响HPV疫苗认知度的重要因素。”<sup>223</sup>

### （3）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机制研究

探讨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应对机制。将节点中与“应急机制”有紧密关系的节点进行合并后发现，许多学者对于应急机制、危机管理、协同治理等进行了研究，重点是对公众情绪进行危机管理。宋之杰等人（2017）指出，“通过编制情绪感染量表来完善政府的应急预案。”<sup>224</sup>或是通过合理引导，缓解公众焦虑、紧张的恐慌情绪。王威（2018）指出，“关注风险传播中危害性和可能性两个变量有利于公众做出合理风险决策。运用萨德曼的‘移动跷跷板理论’引导公众社会情绪，帮助公众全方位看待问题并采取组织引导的立场行事。”<sup>225</sup>

### （4）传媒与舆论研究

传媒与舆论研究随着中国互联网络日益普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而不断深入。将图谱中“舆论场”、“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等与“传媒与舆论”联系较为紧密的节点进行合并，精读核心文献后发现，这一议题的探讨肇始于2003年。SARS疫情事件后，中国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不再将负面事件作为不可逾越的鸿沟避而不谈，而是将公众的信息需求与认知需求放在首位。国内学者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关注公众心理动态。在危机事件信息传播中，公众作为舆论主体，其心理动态往往被忽视，丁迈等人（2015）指出，“通过分析微博内容中公众表露的

对事件的态度以及在事发后的个体行为决策，探求危机信息传播在不同心理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机制，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的分析和研判提供路径。”<sup>226</sup>

二是建构概念模型。薛可等人（2015）指出，“筛选和确立测量标准与归类准则，通过结构维度的探索性分析，形成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概念模型。”<sup>227</sup>刘丛等人（2015）运用个案分析结合抽样分析的混合研究方法，指出“微博不同情绪指向性有所不同；蓝V、黄V及普通微博用户在情绪表达特征、表达方式上差异明显。”<sup>228</sup>

三是研究传媒的舆论导向。王凌云等人（2013）基于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指出“官方话语的报道框架比较平衡，重点突出事件的认定以及积极救援；而民间话语的框架相对松散，其中社会情绪框架占主导地位。”<sup>229</sup>宫承波（2014）指出“在舆论把控中，不仅要关心‘后果’更要关注‘前因’。”<sup>230</sup>李翠敏（2018）“利用定量分析法，借助内容分析，运用利益相关者等相关理论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协同主体进行分析，政府及相关部门完善制度建设与监管机制。”<sup>231</sup>

四是强调量化研究。喻国明（2018）据“2016年中国食品报舆情系统采集的热点事件和案例作为舆情数据库，确立变量与操作化指标，建立食药安全舆情事件的热度评价指标体系。”<sup>232</sup>张一弛（2014）注意到媒介传播与引导作用，强调“在疫苗事件报道中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做客观公正的‘雷达’，提高从业人员医学素养，增强报道科学性，注意风险传播的‘度’，把握平衡。”<sup>233</sup>

#### （5）政府机构与相关部门研究

政府机构与相关部门研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而越发重要，将图谱中“卫生部”、“药监局”、“疾控预防机构”等与“政府机构”联系较为紧密的节点进行合并，精读核心文献后发现，关注政府机构与应对机制研究紧密相连。陈冀周（2014）围绕探讨政府应对危机的破题之径，指出，“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是主角，在危机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央政府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危机预防和管理。”<sup>234</sup>王晓菲等人（2018）指出，“完善多种类媒体形式整合传播，提高政务微博、微信以及客户端等新媒体形式的设立率；提高网络监管技术手段，依法追究网络违法责任，净化网络环境。”<sup>235</sup>崔鹏等人（2018）提出构建模型，“借助危机管理中的生命周期阶段论，构建突发公共事

件网络舆情发展生命周期‘六阶段’模型。”<sup>236</sup>

#### (四) 研究演进脉络分析

CiteSpace 软件不仅可以呈现核心作者共现图谱、关键词贡献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等可视化图谱，在工具栏图表之中，除了 Cluter View (聚类视图) 外，还可以选择 Timeline View (时间线视图) 和 Timezone View (时区视图) 两种视图模式以配合自身的研究。聚类视图侧重于不同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时区视图更注重于描绘各研究主题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和相互影响，时间线视图更便于发现某个研究主题研究基础的时间跨度。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工具栏图表上选择 Timeline View (时间线视图)，再调节 Term Labeling (术语标注) 中的 Threshold (阈值) 为 2，Font Size 为 17，Node Size 为 58，最终得到图 2-5：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热点时间线图谱。前文提到，时间线视图可以看出某个领域主题研究的时间跨度，图谱从上到下即指聚类按大小递减，而从左到右即为时间由远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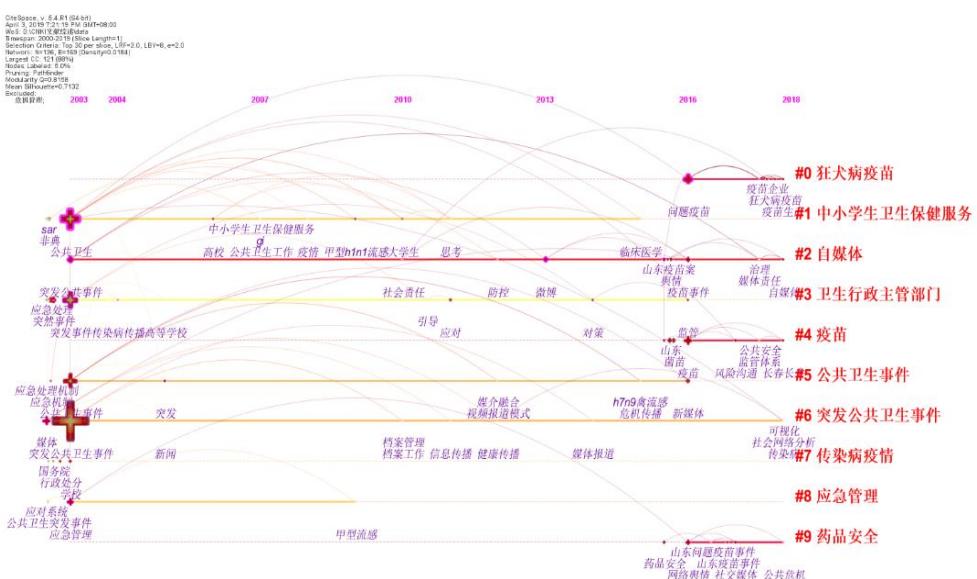


图 2-5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热点时间线图谱

通过制作重点关键词的突现图谱，可直观了解到所示时间段内研究热点的变化。笔者在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中的 Burstness (突变) 选择 View (视图)，得出了图 2-6：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前 19 位重点关键词突现图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 2000-2019 年的研究中，排名前 19 的突现关键词为：地方人民政府、非典、行政处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媒体、高校、甲型 h1n1 流感、大学生、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网络舆情、疫苗、问题疫苗、疫苗事件。

Top 19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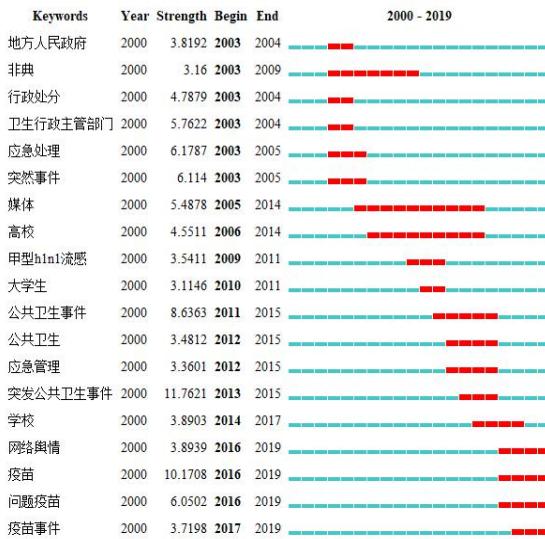


图 2-6 2000-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前 19 位重点关键词突现图谱

若结合时间线图谱和重点关键词突现图，可将研究热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 1. 第一阶段：2000-2003 年，研究政府部门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机制

学者们的研究重心集中在政府部门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之策。笔者之所以将 2003 年划为研究的分水岭，主要源于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危机应对这一标志性事件。政府和媒体在此事件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因此，学者们以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分、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等为研究对象，反思和探索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应对举措。

### 2. 第二阶段：2004-2015 年，研究学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策略

国内发生过多起校园食品卫生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学者们主要关注学校处理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应对之策。前文提及总被引数较高的文献主要来自这一时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学校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状、防范与应急体系、应对能力等方面。

### 3. 第三阶段：2016-2019 年，研究疫苗问题与网络舆情的危机应对

笔者之所以划分 2016 年为分界点，是基于该年度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数量激增，山东、长春等地接连爆发的疫苗事件，将疫苗安全问题推上了热搜关键词。在此期间，网民对于疫苗问题的讨论此起彼伏，掀起了两个舆论场的热议话题。

自媒体时代，互联网用户在技术赋权之下，接触互联网更为便捷，人们的意见表达亦更自由。学者们注重探求疫苗事件与网络舆情、舆论引导之间的联动关系。

#### 四、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整体特征

2000-2019年二十年间是中国互联网从普及到飞速发展的阶段，技术赋权给予中国公众的不仅是技能和信息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使中国公众的认知发生了颠覆式改变。面对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疫苗等重大医疗事故，社会公众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在媒介赋权的环境下，掌握话语权的欲求和动力驱使着公众的主动认知和识别专业素养。公众的求知渠道和信息接收方式的改变，也推动着中国政府与官方媒体不断调适自身定位，以适应新时代环境下公众的社会期待。笔者通过梳理20年来的文献，发现研究者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宏观视野关注公共卫生事件的政府危机应对，到微观体察公众接受疫苗接种的社会心理。学者们一直试图为社会公平发展而不断努力探索更为合理的解决路径。从2000-2019年的研究文献看，公共卫生议题激发了学术界的极大热情。这一阶段也是西方健康传播学引入国内并渐成“显学”的发展时期。随着新时代追求健康、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理念不断深植人心，公共卫生领域爆发的各种问题上升为社会矛盾。围绕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上升为整个社会安定、安全的保障性研究。国内学者对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涉猎较广，杂糅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公共卫生领域尚有诸多空白留待探索和挖掘。

##### （一）定性研究较为丰富，量化研究较为单一。

国内研究多从管理视角，从宏观层面探索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应对之策。而从微观视角探究公众的疫苗接种意愿、群体性恐慌度量等实证性研究尚不多见，陈曦等人（2009）“在计算实验理论、Agent建模技术等信息技术基础上，通过计算实验数据对公众恐慌进行动态度量等。”<sup>237</sup>王春雪等人（2015）“据恐慌心理量表和调查问卷得到恐慌程度影响因素及其分类，并确定各影响因素权重值。以试验数据修正模型中相关事故经历因素，得到地铁应急疏散恐慌程度最终优化模型。”<sup>238</sup>诸如此类研究尚属星星之火。这大概归咎于目前国内人文社会领域在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度还不够。尽管也有较多的借鉴、尝试自然科学的量化手段，如数理模型、脑神经医学、实验研究等，但真正娴熟运用并能真正纳入实践推广的成果少之又少。学科交叉、融合并产生实效还需学者们不断深入探索。

## （二）涉猎领域杂糅，但科学量化指标较少。

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各个学科门类，部分自然科学的学者运用数据挖掘、系统仿真、数理模型等方法，从舆情监测和心理学等视角提出了多样化的评价指标，（如群体性恐慌评价体系指标），进行实证筛选以及信度和效度上的验证。然而大数据挖掘中存在海量虚假信息的困境，造成清理数据的难度。小数据调研存在调查对象的随意性和主动意愿不强等缺陷，存在取样数据的客观性和充分性不足的困境。现有成果的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多为有限样本的验证，缺乏大规模数据的精确分析；导致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较弱，据此构建的评价体系难以用实际测度群体性恐慌程度及动态变迁状况，致使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害认识多停留在感性描绘阶段。这是因为，传统调研模式难以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恐慌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权重给出差异性分析，无法对群体性恐慌的动态演变趋势，尤其是对特定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进行持续跟踪分析。

## （三）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研究重实效轻理论

总揽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研究，对发文量最高的前三十位作者进行共现，笔者发现，疫苗研究、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密度较低，学者间的合作程度不高，共同研究问题、发表论文的合作模式尚未形成。布尔迪厄（1998）认为，“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sup>239</sup>从学者的发文量来看，高产作者较少，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尚未触及较深层次。这直接导致有影响力的文章不多，不利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入探索。从高被引文献来看，多集中在“现状与管理对策”、“防控机制研究”、“应对体系建构”、“媒体策略”等重实效而轻理论的研究。关注公共卫生的实践有用性，是短期绩效管理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然而，从长远来看，应鼓励有志于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组件科研团队，集结国外不同学科学者的思想，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体性恐慌、公众疫苗接种意愿、公众隐私保护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而丰富和延展我国健康传播学科的落地与创新。

## 第二节 全球视域下疫苗安全研究的学术考察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太多，公共卫生议题太宽泛，从前期文献搜集中，笔者发现疫苗安全问题是非常敏感、且公众关注度极高，媒体制造话题较多的一个议题。因此，笔者在搜索关键词时将焦点放在了“疫苗安全”议题上。运用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 Web of Science 上 1987–2019 年疫苗安全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共引分析和共现分析，包括发文量分析、学科结构分析、核心作者分析、关键词总体分析、突变词分析等，以期呈现全球疫苗安全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知识流动，寻找研究的不足和可扩展的空间领域。结论：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公众认知、互联网信息对疫苗接种决策的影响、疫苗安全的媒体传播效应、公众接种疫苗意愿、公众反疫苗接种运动。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医学管理类，人文社科关注度不够；核心作者的紧密合作度有待提高；疫苗研究成果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呈正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疫苗民族主义正影响着疫苗的分配公平问题。

### 一、疫苗安全的研究场域

早在 18 世纪，被誉为“疫苗之父”的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Zinner)，在一次实验中意外发现用接种牛痘能有效减少天花的感染机率这一重大医学突破。随后，疫苗接种被广泛普及。而疫苗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引发公众群体性恐慌。然而，疫苗安全研究历程却仅有短短三十余年。学术界常用英国百白咳疫苗危机、MMR (Measles, Mumps, Rubella) 疫苗与自闭症恐慌、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疫苗安全等事件作为经典案例。世界各国媒体、政府、医学界多年来致力于恢复公众使用疫苗的信心，但持续的反疫苗运动与公众对疫苗安全存疑的现象依然是今天疫苗推广的难题之一。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对疫苗安全形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科关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2006 年，David C. Burgess 等学者就运用 Sandman 模型（音译：桑德曼模型）预测社区愤怒程度，从而评估测量 MMR 疫苗争议事件的沟通效果，Sandman 模型为分析这一争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并解释了其中社区反应的重要环节以及随后疫苗接种率下降的影响原因，并为疫苗风险治理提供解决措施。<sup>240</sup> Avery Holton 等人立足责任框架，结合 281 篇相关报道分析了媒体将 MMR 疫苗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何者、用于支持这些归因的消息来源以及问题解决方案，研究结果强

调了新闻媒体如何在健康风险传播中归咎责任，以及这种归因如何在塑造公众行为中扮演潜在的重要角色。讨论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sup>241</sup>聚焦媒体报道与疫苗安全事件之间议题的还有 Erika Franklin Fowl 等人，通过分析美国 101 家地方报纸报道关于 HPV 疫苗争议的报道文本，研究发现随着事件的动态变化，刚开始媒体的报道未必会引起争议与广泛关注，但随着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和行动者增多也影响了争论的论点类型。<sup>242</sup>

疫苗安全争议的出现与扩散与媒体报道存在关联，媒体的报道选题、倾向、信源、证据平衡等因素也影响着公众在疫苗争议中的观点与情绪，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较早地遭遇疫苗信任危机，随着当代疫苗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面临疫苗安全问题，如东南亚国家的登革热疫苗安全、日本 HPV 疫苗安全、包括中国国内出现的狂犬疫苗安全等，都影响着疫苗的接种率，群体免疫效果受到挑战。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任，降低公众恐慌，从风险传播视角提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参考国外治理与应对疫苗争论问题策略上有着经验性的价值，但在国内的传播学领域，关注具体的国外疫苗安全事件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大多立足于本国发生的疫苗事件。而笔者试图从全球视野，纵览疫苗安全的研究进展、前沿热点，展望其发展趋势，探索其研究路径与方法，以供国内疫苗安全研究查补缺漏、见贤思齐。

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发现，在 1987–2019 年疫苗安全的相关研究文献仅核心期刊就达 1410 篇之多。（注：数据库中搜索的“疫苗”、“反疫苗”、“公共卫生事件”、“接种意愿”等关键词可追溯到 1987 年）采用传统阅读文献的方法，很难全面地概括某一个领域的关键性文献和前沿热点，研究者容易陷入主观臆断之中。而 CiteSpace 可视化计量分析工具，大大简化了传统文献查阅之繁琐，将主观判断与数据可视化结合起来考量。本文采用的是美国学者陈超美开发的软件 CiteSpace5.4.R1 作为数据分析的工具。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把疫苗安全研究的巨量文献数据，以多元、分时、时态的引文分析可视化语言和网络知识图谱等方式呈现出来，便于我们找到其中最重要、关键、有效的信息，<sup>243</sup>厘清疫苗安全的发展历程，对疫苗安全研究现状进行全方位解读，结合重点文献的分析，识别出疫苗安全研究的前沿热点和发展趋势，以资后继者学习借鉴。

## 二、疫苗安全议题的数据获取和参数设置

为使数据更具备权威性和全面性，本节选择外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中的 SCI、SSCI 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由于笔者在前期文献查询中发现，国外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疫苗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焦点：父母对子女接种疫苗的意愿、反疫苗运动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反疫苗运动媒体的社会影响等。这些疫苗问题的文章中极少提及“疫苗安全”或“疫苗问题”这样的概念，但所涉及的问题又关涉“疫苗安全”。因此，文中选择疫苗安全为研究对象，但在搜索关键词时采用文中出现的高频词，如“疫苗”、“疫苗接种意愿”、“反疫苗”等词。疫苗和公共卫生事件关联度极高，因此，笔者将“Vaccine”（疫苗）And “Public health event”（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疫苗与反疫苗、接种意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故将“Vaccine”（疫苗）OR “Anti-vaccine”（反疫苗）OR “Willingness vaccination”（接种意愿）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为“Article”（文章），共检索得 1410 篇文献，去重后获取 1408 篇。将收集的数据源导入 CiteSpace 分析工具进行数据统计，并对相关的参数进行设置。（见表 2-7）本研究依据分析内容，选定不同主题词来源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为保证图谱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将对部分参数做少许调整。

表 2-7 Citespace 参数设置表

序号	参数项目	具体数值
1	Time Slicing (时间分隔)	1987——2019 年
2	Years Per Slice( 最小统计时间)	1 年
3	Term Source( 主题词来源)	Title ( 标题) 、Abstract ( 摘要) 、Author Keywords ( 作者关键词) 、Keywords Plus ( 拓展关键词)
4	Term Type ( 术语类型)	Noun Phrases ( 名词短语)
5	Node Types( 节点来源)	Author ( 作者) 、Term ( 主题词) 、keyword ( 关键词) 、Country ( 国家) 、Reference ( 参考文献)
6	Top N( 频率选择)	N = 30 ( 选取每年出现频率前 30 的关键词、主题词)
7	Pruning( 网络剪裁)	pathfinder ( 寻径) 、purning sliced networks ( 修剪片段网络) 、purning the merged network(修剪合并网络)

## 三、全球疫苗安全研究的数据分析

### (一) 发文量分析

关于疫苗安全的研究文献，笔者在搜集前查询相关资料，人类疫苗接种史上曾发生多次疫苗事故，导致人们对疫苗谈虎色变，而拒打疫苗造成流行病蔓延的

危害性更大。如历史上有名的疫苗事故：在 1955 年春天，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 (Cutter Laboratories) 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由于灭活病菌不够彻底导致出现活体病毒，导致接种疫苗的 12 万名儿童中 4 万人染病，113 名终生瘫痪，56 人患上麻痹性脊髓灰质炎，5 名儿童死亡。这次事故之后三十年，疫苗成为了在美国医药市场上濒临灭绝的产物，药厂不愿意生产、研发。直到 1986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国家儿童疫苗伤残法案》(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NCVIA) 确定疫苗不良反应监测系统(VAERS)、全国疫苗项目办公室(NVPO)，并要求接种点向接种者提供“疫苗信息陈述书”(VIS)。至此，疫苗接种才重获新生。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起来。因此，笔者以此事件为起点，搜索了 1987 年至 2019 年 3 月的文献资料。此外，笔者在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中搜到的首篇疫苗研究文章是《Perceived vibriosis risk by Swedish rainbow trout net-pen farmers: Its effect on purchasing patterns and willingness-to-pay for vaccination》(1987, MATHORBURN 等)。研究养殖户给鱼接种弧菌病疫苗的意愿。数据显示，学术界关于疫苗安全的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图 2-7 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1987-1999 年)，这一阶段对于疫苗安全的研究数量共计 44 篇，占总量的 3.16%。早前疫苗多处于研发状态或运用于军事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疫苗获得生产许可证。学者们在研究领域尚处于朦胧意识状态，没有展开大规模的系统研究。第二个阶段为平稳上升阶段(2000-2007 年)，这一阶段疫苗安全研究成果共计 208 篇，占总量的 14.77%。2006 年是首例宫颈癌疫苗上市元年，引起相当多的学者关注，促使疫苗安全研究数量激增。第三个阶段为激增阶段(2008-2019 年)。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共计 1156 篇，占总量的 82.1%。注射疫苗已经成为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环节。研究数量猛增体现出学者对疫苗安全的深切关注和迫切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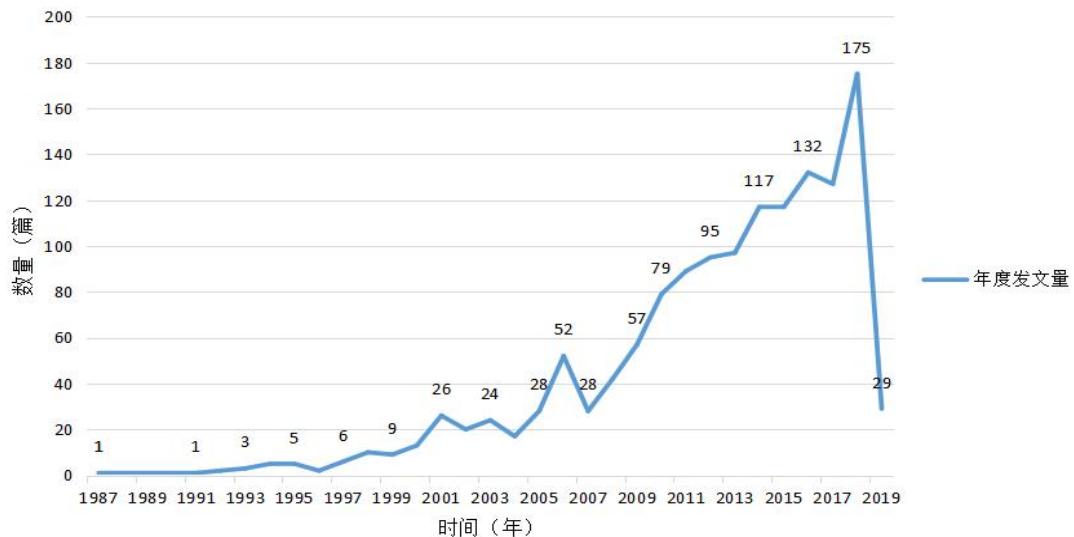


图 2-7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成果数量的时间分布图

## (二) 研究的学科领域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传染病流行的根源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明鬼怪作祟时，在漫长的探索中研制出了疫苗。18世纪早期，中国人接种“天花”预防疾病的方法传入欧洲，通过医生的改进与试验，接种疫苗免疫疾病的方法获得成功。疫苗安全成为医学研究中的显学，随后逐步在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展开探索，蔚为大观。笔者按研究发表成果的情况，选择了前 20 个学科，绘制成图 2-8。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国外疫苗安全研究主要涉及在医学领域的各个分支，总体来看，研究最为丰富的当属于免疫学，次之是公众环境及职业研究、医学研究试验等，偶有经济学领域发表。因为图表不便展示疫苗安全研究的学科全貌，其实，在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均有涉猎，然而相较之下，人文社科的研究还不够丰富，仍有大量可拓展的空间和学术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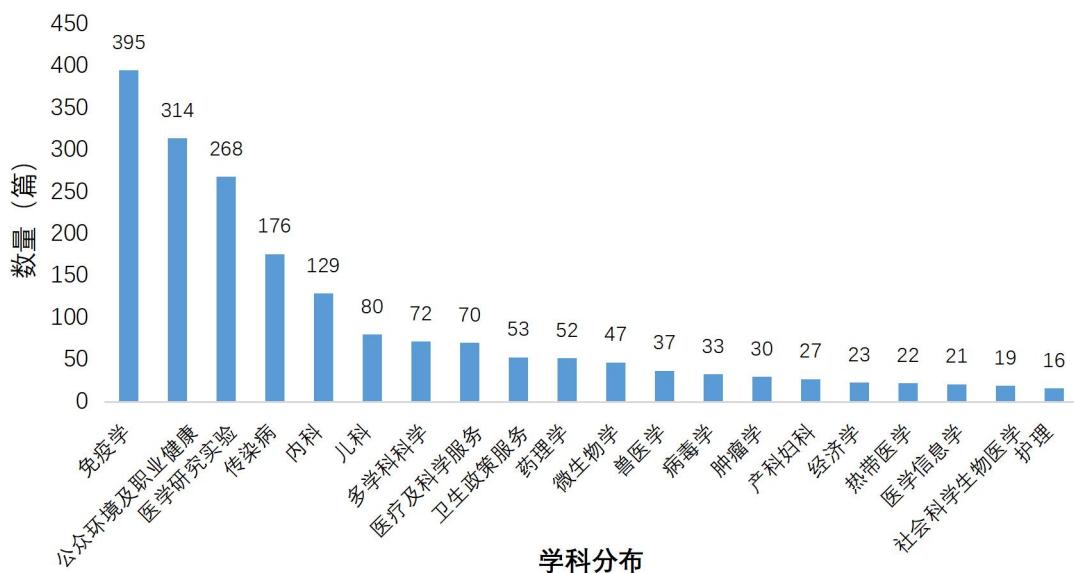


图 2-8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学科分布图

### (三) 核心作者分布

从文献作者分布状况可见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区域。从发文量和文章被引数来研究具备丰硕成果的核心作者。在参数设置上，“Node Types”选择 Author（作者），选择路径算法（pathfinder）进行分析，得到图 2-9。Nodes（节点）=207，Links（连线）=302，Density（密度）=0.0142. 分析数据得知，在疫苗研究的领域核心作者共现网络总体密度一般，但是在细化研究领域作者密度比较密集，特别是“vaccine acceptance（疫苗接受）”、“dengue fever（登革热）”、“dengue vaccine（登革热疫苗）”、“confirmatory factor（验证因素）”、“analysis（分析）”、“dengue prevention（登革热预防）”、“prevention strategy（预防策略）”、“willingness（意愿）”等这几个聚类中，作者间的合作较为紧密，但在细化各个领域的作者间合作程度比较低。由此看出研究疫苗的学者们研究领域较为分散、多元。图谱中“Summary Table”显示有连接合作的核心作者为 207 位，将发文量排在前 20 名的作者绘制成表 2-8。数据显示发文量在 3 篇以上的作者共 23 位，仅一位作者发文 8 篇以上，占核心作者数量的 0.4%。可见，研究疫苗安全的学者还未形成学术共同体，分散作业的居多，彼此间强联系的合作研究较少，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需深耕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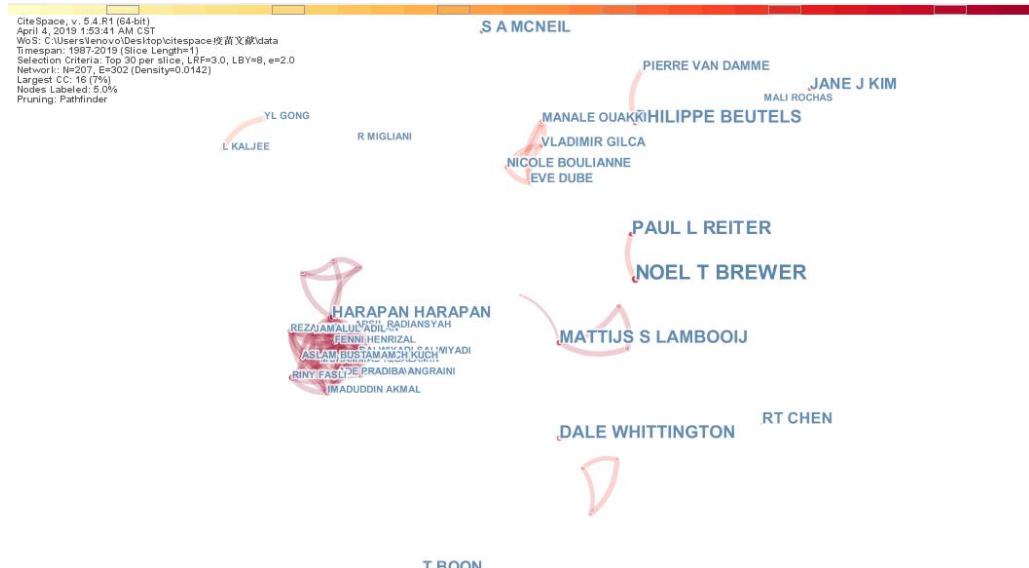


图 2-9 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表 2-8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领域高产作者表

排名	作者	发文量	排名	作者	发文量
1	Noelt Brewer	8	11	Pierre Van Damme	3
2	Paul L Reiter	6	12	Jorien Veldwijk	3
3	Philippe Beutels	5	13	Manale Ouakki	3
4	Dale whittington	5	14	Maarten J Postma	3
5	Mattijs S Lambooij	5	15	Vladimir Gilca	3
6	T Boon	4	16	Mark Jit	3
7	Rt Chen	4	17	Cornelia Betsch	3
8	Jane J Kim	4	18	G Ardine De wit	3
9	Harapan Harapan	4	19	Eve Dube	3
10	S A Mcneil	4	20	Nicole Boulianee	3

文献被引数可视为在该领域中核心作者的重要衡量指标。笔者通 CiteSpace 绘制出图 2-10。以颜色深浅表示被引次数。颜色越深被引次数越多，反之越少。将数据导入 Excel 选取前 10 名作者被引文献绘制成表 2-9。从表中可见，被引用最多的文献是 Capeding. MR 的文献，共 441 次，次之是 N. French、Miller. E 的文献，分别被引 322 次和 263 次。精读文章发现，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疫苗原理与安全性、互联网反疫苗运动以及家长对儿童疫苗接种意愿等方面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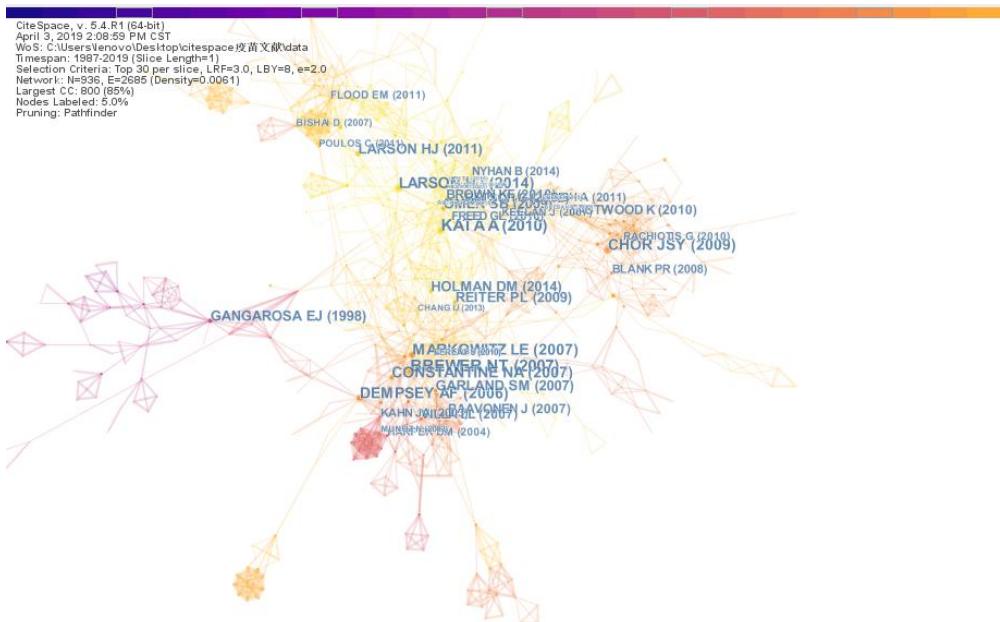


图 2-10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共被引文献图谱

表 2-9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领域前 10 篇高被引文献表

序号	文章名	作者	年(期)	刊物名称	被引数
1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 novel tetravalent dengue vaccine in healthy children in Asia: a phase 3, randomised observer-mask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Cape ding, MR, ect.	2014 (9951)	Lancet	441
2	23-valent pneumococcal polysaccharide vaccine in HIV-1-infected Ugandan adults: double-blind, randomised and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	N French, ect.	2000 (9221)	Lancet	322
3	Planning, regist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immunisation campaign against meningococcal serogroup C disease in the UK: a success story	Mill er, E, ect.	2001	Vaccine	263
4	New Decade of Vaccines 5 Addressing the vaccine confidence gap	H.J. Larson, , et al.	2011	Lancet	250
5	HIV infection: epidemiology, pathogenesi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Maartens, , et al.	2014 (9939)	Lancet	242
6	Vaccine Safety Datalink project: A new tool for improving vaccine safety monito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n, R. T., et al.	1997 (6)	Pediatrics	228
7	An assessment of thimerosal use in	Ball	2001	Pediatrics	206

	childhood vaccines	, LK, ect.	(5)			
8	Antibiotic use in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 potential for consumer health risks	D.J. A lderman, , ect.	1998 (2)	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	
9	Anti-vaccine activists, Web 2.0, and the postmodern paradigm – An overview of tactics and tropes used online by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Anna Kata	2012 (25)	Vaccine	196	
10	Economic evalua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Jit, Mark, ect	2008 (7665)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89	

#### (四) 核心国家分布

运用 CiteSpace 软件，“Node Types”选择 Country（国家），选择路径算法（pathfinder），修剪片段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修剪合并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进行分析，做成图 2-11。Nodes（节点）=49，Links（连线）=63，Density（密度）=0.0536。分析数据得知，该领域国家的合作密度较为宽松，将数据导入 Excel 制成图 6。从图中数据可见，在该领域美国占主要份额，是全球在疫苗领域发文量最多的国家（615 篇），次之是英国（155 篇）、加拿大（110 篇）和澳大利亚（80 篇），中国排在第五位（74 篇）。疫苗（安全）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疫苗发展比较早、疫苗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疫苗研究进步的速度非常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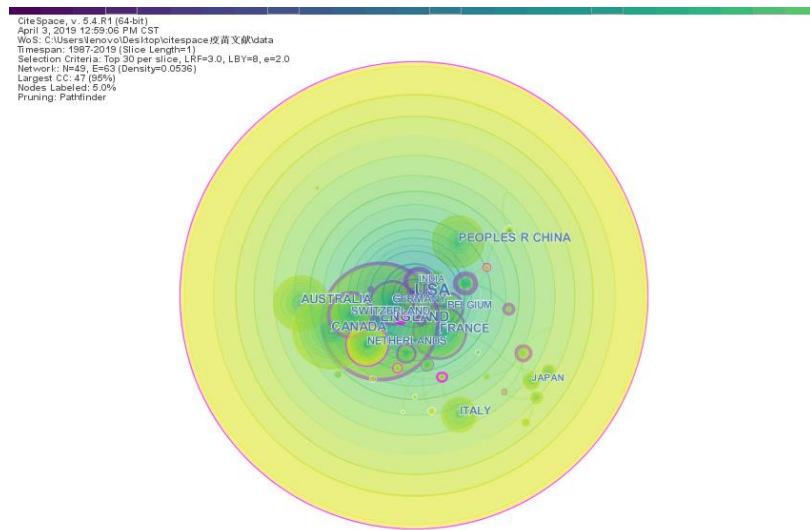


图 2-11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国家合作共现图谱

## 四、疫苗安全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 (一) 主题词及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分析

将 CiteSpace 处理的数据导出后，对“Term Labeling”中各阈值进行适应性调整，其中“Threshold”阈值取 6，最终生成 171 个节点，704 条连线，密度为 0.0182，形成图 2-12。图中分布了许多节点，节点大小表示他们出现的频次，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的强度。<sup>244</sup>密度为 0.0182 表示疫苗研究领域中不同节点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紧密。同时，节点从内到外，从冷色调到暖色调表示早期到现在发文的时间。有部分节点呈红色外环，表明这些主题的中心性高，该节点与其他节点存在着紧密联系，也是连接不同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sup>2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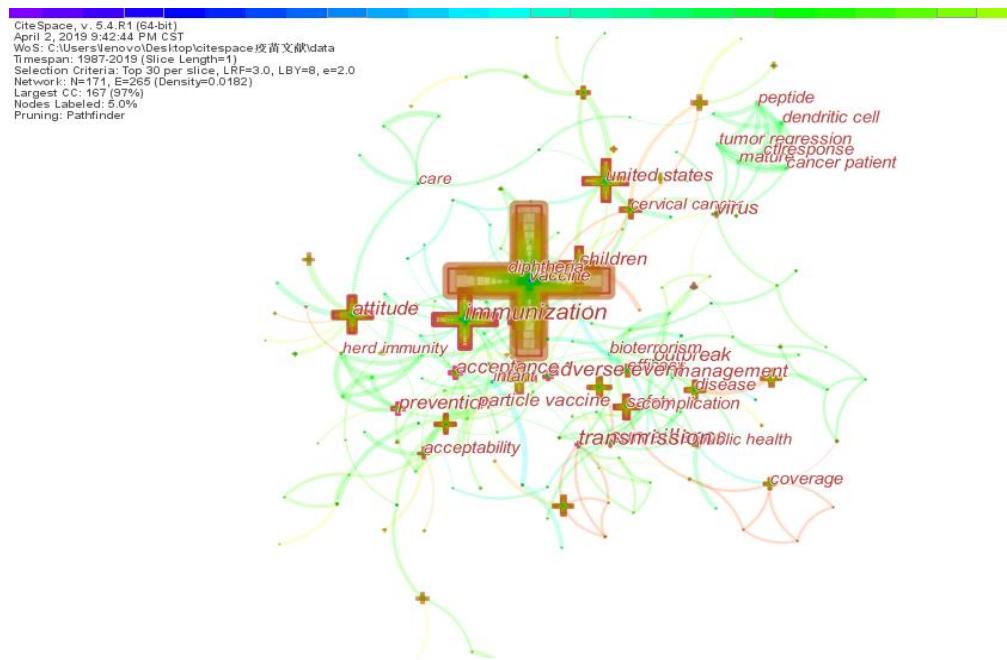


图 2-12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主题词、关键词共现图谱

将图 2-12 共现图谱的主题词、关键词共现的“Summary Table”（概要表格）可得出疫苗安全研究的高频词及高中心性关键词。笔者发现，在研究的三十余年间，西方对疫苗安全的议题主要围绕 vaccine(疫苗) (503, 0.14)、immunization(免疫接种) (226, 0.51)、United States(美国) (178, 0.26)、children(儿童) (166, 0.25)、attitude(态度) (154, 0.26)、infection(感染) (133, 0.16)、safety(安全) (118, 0.23)、risk(风险) (95, 0.14) 等。

### (二) 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 可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将关键词归纳总结，可见 1987-2019 年各个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聚类分析的 Modularity 值(Q 值)是图谱网络模块

的评价重要指标， $Q$  值一般在区间为  $[0, 1]$ ， $Q > 0.3$ （经验值）时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 值（平均轮廓值）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一般认为，Silhouette 值在 0.5 以上，聚类是合理的。<sup>246</sup>在此次聚类图谱中，研究选用 LLR 算法，导出 Top  $N=30$ ，将关键词与高频词聚类后绘制成图 1-13。分析数据可知： $Q=0.7565$ ，Silhouette 值为 0.7922。表明聚类效果较理想合理。按节点数从大到小排列聚类标识词分别是：human papillomavirus（人乳头瘤病毒）、economic value（经济价值）、hypothetical avian influenza vaccine（假想的禽流感疫苗）、healthcare worker（医护人员）、public perception（公众认知）、education program（教育计划）、melanoma patient（黑色素瘤患者）、causal vaccine effect（因果疫苗效应）、smallpox vaccination（天花疫苗接种）、other form（其他形式）、new rotavirus vaccination program（新的轮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

### （三）研究演进脉络分析

在 Citespace 中，为更好地分析在不同时间段内关于疫苗安全的讨论，时区视图是另一种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在保持“Term Labeling”中 Threshold 阈值为 6 不变的情况下，Layout 面板中选择为“Time Zone”（时间线视图）绘制图 2-13。可探索各个聚类的关注度热冷趋势，时间线视图更关注聚类之间的关系，即聚类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本研究选取前 20 个关键词：vaccine（疫苗）、children（儿童）、infant（婴儿）、immunization（免疫）、pertussis（百日咳）、trial（审判）、contingent valuation（临时估价）、bioterrorism（生物恐怖主义）、smallpox（天花）、care（护理）、young women（年轻女性）、particle vaccine（粒子疫苗）、health care worker（医护人员）、recommendation（推荐）、mortality（死亡率）、willingness（意愿）、influenza vaccine（流感疫苗）、adolescent（青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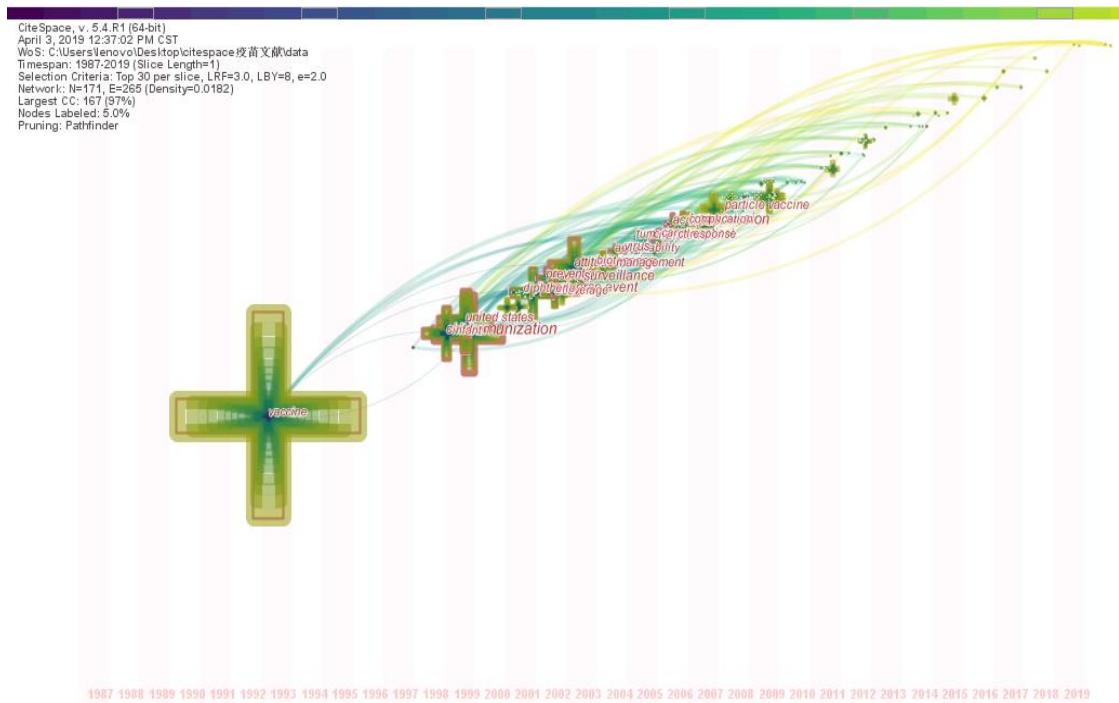


图 2-13 全球疫苗安全研究热点时区可视化图谱

#### (四) 疫苗安全研究的演化趋势

整体而言，全球学者对疫苗安全研究涉猎较广。1987—2019年三十余年间的研究成果丰硕，蔚为大观。疫苗安全研究的演化趋势表现如下：其一，聚焦于公众认知研究。Betsch 研究互联网信息对疫苗接种决策的影响。发现互联网上的疫苗信息对人们是否愿意接种疫苗产生一定的影响。<sup>247</sup>为了解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度与寻求适宜沟通方法，P. R. Ward 对西澳大利亚州弗里曼特尔和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非疫苗接种和处于犹豫接种阶段的父母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探讨父母为孩子接种疫苗与否所带来的风险或收益困惑。<sup>248</sup>Petts. J 对 MMR 疫苗主题进行小组访谈，调查父母与免疫接种专家接触机会如何影响父母的信息处理，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健康风险沟通的重要性。”<sup>249</sup>Kim. S. 探讨风险信息框架对接种意愿、行为的影响，在美国南部一所学校中展开实验，指出框架对流感疫苗接种的影响：了解风险信息披露、感知疫苗效力和矛盾心理。<sup>250</sup>遗憾的是，此类模型研究尚处于摸索和探索阶段。娴熟运用并能真正纳入实践推广的成果并不多产。学科交叉、融合并产生实效还需学者们不断深入探索与实践。

其二，关注疫苗安全的媒体传播效应。疫苗安全在大数据时代成为“公共卫生事件”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们聚焦于自闭症疫苗的媒体报道框架。从媒体报道框架中探讨媒体在疫苗事件报道中的不足、寻找媒体与疫苗接种率下降的

关系、探讨从报道中恢复公众对疫苗信心的有效路径。如 Bie. B 研究中国主流纸媒关于自闭症报道的基本报道框架。<sup>251</sup> James 关注尼日利亚北部疫苗接种停止的报道情况。<sup>252</sup> Liana 关注公共健康、新闻和炭疽袭击。<sup>253</sup> 随着社交媒体量化研究逐渐增多。Jang. S. M. 关注“从社会媒体到主流新闻：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疫苗-自闭症争论的信息流。以 Twitter、Reddit 帖子和在线新闻为大数据样本，跟踪关于辩论疫苗与自闭症的新闻议程。”<sup>254</sup> 学者们也热衷于研究媒体报道的信息平衡手法。平衡报道手法在西方媒体中运用历史悠久。本杰明·富兰克林办《宾夕法尼亚报》时便提出“当人们各持己见的时候，双方均应享有让公众倾听各自意见的平等机会。”<sup>255</sup> Christopher. E 关注到报纸对自闭症疫苗争议的报道中动员和问责信息，且以美国和英国报纸对自闭症疫苗争议的报道作为案例研究，“考察媒体显性与隐性的规范压力是否影响报道中公众动员与政府问责的信息出现。”<sup>256</sup> 澳大利亚纸媒的疫苗接种宣传对公众产生正面影响引发学者关注。<sup>257</sup>

其三，公众接种疫苗意愿成为研究热点话题。关注公众接种意愿干扰因素研究。有学者研究视频内容传播对公众接种意愿的影响。Jennifer 研究发现 Youtube 社区支持疫苗接种的积极信息极少。综合健康信念模型与阴谋论、公民论进行内容分析，公众更青睐于负面视频，而不是模棱两可或正面视频，且视频中多呈现对阴谋论的指控与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sup>258</sup> 关注公众对疫苗信息的接受心理研究也是疫苗安全研究的热点话题。Brooke 以母亲身份的公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对疫苗接种持反对态度的母亲更有可能参与疫苗主题讨论，而持支持态度的母亲群体则更少参与。随着负面信息的推广，改变态度和立场的可能性增大。<sup>259</sup> Tausczik Y 关注公众焦虑心理与自我效能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 H1N1 的反应是迅速而短暂的，在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网络行为的分析对于理解公众的焦虑以及沟通有着重要的作用。”<sup>260</sup>

其四，关注公众反疫苗接种运动研究。公众对待疫苗的负面态度到达极端便演化为反疫苗运动。Meghan 对 480 个反疫苗网站进行了内容分析，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疫苗信息、说服策略类型、反疫苗宣传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试图寻找公众反疫苗运动的根源。<sup>261</sup> 类似研究：Anna Kata 接种疫苗倡导者专注于纠正错误信息；接种疫苗抗议者则反对生物医学和科学事实。<sup>262</sup>

## 五、小结

笔者发现，研究者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宏观视野关注疫苗安全的政府危机应对，到微观体察公众对疫苗接种的社会心理。学者们一直试图为社会公平发展而不断努力探索更为合理的解决路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涉及学科众多，涵盖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尤其是医疗卫生与公共管理领域。疫苗安全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医疗领域的话题，它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种族、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关联。如政治传播中媒体宣传过度导致的疫苗恐慌危机。疫苗滥用涉及的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等。文化观念影响公众接种疫苗意愿等研究都深切地关照到疫苗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从社会运动视角关注公众抵制疫苗运动的行为研究。在“反疫苗接种运动及其解释”中，结合英国和荷兰关于反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证数据，对两国反疫苗接种所造成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进行科学解释。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关注公众的焦虑心理与自我效能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从社会传播学视角探究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度与寻求适宜的沟通方法。“风险、责任与负面反应：父母对儿童接种疫苗的信任的定性研究”探讨父母如何谈论为孩子接种疫苗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健康风险沟通与放大：从 MMR 疫苗接种争议中吸取教训”研究父母对官方信息反应、与免疫接种专家接触如何影响父母处理信息。

二是研究方法丰富多元：问卷调查、访谈、个案、方程模型、实验、眼动、神经等，研究水平日趋精细化。如从医学角度，以微观视角聚焦于恐慌情绪与模型探究。学者 Adams 通过实践性探索，构建群体性恐慌与创伤后应激反应模型。提出社区灾难后事件周围恐慌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表明，事件周围的恐慌症发作预示着未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sup>263</sup>。还有学者将群体性恐慌和其他威胁和灾难集体反应结合起来，讨论恐慌模型对预测社区对恐怖主义袭击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反应影响。探讨公众风险认知与防范，学者们对疫苗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等进行了研究。多数学者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运用实验法，对博客圈中的 HPV 疫苗信息的风险感知、态度和行为意图进行研究。<sup>264</sup>同样采用实验法的类似研究还有，Betsch. C 通过浏览典型的疫苗评论网站增加对疫苗接种风险的认知，降低对未接种疫苗风险的认知。<sup>265</sup>

纵观近 20 年来我国公共事件研究场域的学术考察，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群

体性恐慌、公众疫苗接种意愿、公众隐私保护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一是我们对该议题的认知度还不够，二是我们对负面议题抱持一种天然的敬畏与顾虑，导致群体恐慌、公众隐私保护等话题讳莫如深。在全球视域中考察公共卫生议题，如疫苗安全问题，相较于国外疫苗安全的关注热度而言，我国对疫苗安全的研究还不温不火。仅在疫苗安全事件发生后出现短暂的研究热度，但多局限于舆情治理，政府形象、危机应对之类的应急管理研究视角，缺乏将疫苗安全与人类健康共同体、美好社会建设等关联起来，将人民生命安全与幸福感追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疫苗安全的探讨无论是学科视野还是关注命题都较为狭隘，远不比国外对疫苗安全的关注如此多元，尤其是疫苗与家庭成员态度、宗教信仰、群体情绪等。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来看，媒介在大众认知、群体认同、社会秩序维持等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健康的主题将成为未来传播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而小到一个地域，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围绕健康命题中的疫苗安全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未来疫苗研究领域可能会关注“疫苗民族主义”。因为现有的研究中已经出现疫苗资源的紧张与分配不公现象，少数发达国家奉行本国利益绝对优先原则，抢购、囤积远超所在国家人口需要数量的疫苗，保障本国国民生命安全，而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资源短缺状况。漠然忽视人类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在病毒肆虐的当下，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疫苗分配不均不仅暴露出世界经济分配不均、政治霸权依然凸显强大势力，疫苗民族主义的危害显而易见，作为抗击病毒最有效的武器，疫苗成为逐利工具，成为某些西方大国的政治筹码，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悲哀。与弥漫在某些国家中的“疫苗民族主义”不同，我国始终“彰显了一种慷慨无私的国际合作精神”，我们的做法得到世卫组织、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赞赏与拥护，未来，各国应当携起手来，抵制“疫苗民族主义”，努力填平本不应出现的“免疫鸿沟”，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民众都能负担起的公共产品，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频繁制造恐慌气氛的时期。<sup>266</sup>（巴里·格拉斯纳）

### 第三章 传播主体维度：媒介制造道德恐慌

与对大肆渲染的威胁感到担忧相应的是，人们对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风险的焦虑不断增加，对饮食、生活方式、生儿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众多方面，人们都重新审视以发现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恐慌本身已经被政治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有个数据非常贴切地说服这个问题，“2005年，Nexis数据库中提及‘恐慌文化’共576次，十年后，2015年，提及的次数已经增长到1647次，到2016年已经高达2222次。”<sup>267</sup>该用语与公众的想象力形成了共鸣，修辞习语如果能唤起可被纳入公众想象的众多形象，就能被广泛使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穿着白色保护服、戴着防毒面具的形象或超市布告牌上频繁出现的失踪孩子的照片，常常成为人们借以发挥想象力进而表达恐慌的视觉风景。对当今社会存在的道德不确定性和无力感的表达，充分赋予了恐慌文化这种修辞手法和现实巨大的威力。不同群体争先恐后地制造恐慌，危言耸听，竭力表达我们应该或不应该对什么感到恐慌。围绕给孩子接种疫苗是否比顺其自然风险更大进行辩论也是争先恐后地制造恐慌。人们往往相互指责对方制造恐慌气氛，大打恐慌牌，或者放任自己沉溺于恐慌而甘愿受人操纵。有些恐慌文化批评家已经被他们谴责的目标彻底吞没，或者至少已经被弄得无所适从。

#### 第一节 道德恐慌的概念及产生机制

##### 一、道德恐慌的概念

“道德恐慌”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科恩的著作《民间妖魔和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摇滚族的创造》一书中，意指“公众在错误的或被夸张的信息支配下所产生的风险认知和带有恐惧心理的集体反应……与通常的恐慌相比，集体道德恐慌的驱动力来自公众对某种威胁的一致性道德判断。”<sup>268</sup>随着数字化时代一步步逼近，不少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媒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科恩将新闻称为“关于社会规范轮廓的主要信息来源”<sup>269</sup>这种远见已从新闻内容的信息提供维度转移到了建立对是非的共同理解的道德角色。信息传播被用夸大的

言辞制造威胁性的局面，并对小群体产生恐惧感。在斯图亚特·霍尔等看来，暴力事件引发的道德恐慌所指向的是远远超出普通街头“犯罪”的、更为深远的统治危机，以及社会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转型；抢劫以及媒体围绕这一公共议题所建构起来的道德恐慌只是深层社会冲突的表征道德恐慌的媒体叙事，加剧了将某些特定阶级或种族背景的群体罪化为“民间恶魔”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危机的替罪羊的趋势。正是新闻媒体对“行凶抢劫”，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危机和道德恐慌之关联的建构，为后来的舆论对特定事件的定义提供了意义阐释的限定性框架，进而为更为广泛的趋向保守的政治和社会政策 转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sup>270</sup>以技术为导向的道德恐慌的传播者经常讽刺新技术并过分强调它们的激进能力。<sup>271</sup>如许多人认为短信的盛行正在破坏年轻人的写作能力。Szablewicz 展示了对中国网络成瘾的恐惧如何揭示文化权力和精英定义，<sup>272</sup>这一发现与上一代人对危机的警务研究产生共鸣。<sup>273</sup>同时，数字媒体为道德恐慌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导致羞辱事件和更个性化的焦虑表现。<sup>274</sup>Marwick 采用术语“技术恐慌”来描述与数字媒体创造的新能力和空间相关的道德恐慌的特定范围。<sup>275</sup>她的研究调查了针对未成年人上网的绑架和性不当行为的恐惧，但其概念框架对于技术本身成为罪魁祸首的情况很有用。

## 二、道德恐慌的蔓延机理

道德恐慌是社会主流价值群体因感到对当下普遍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威胁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情绪。需要说明的是，“道德恐慌”中的“恐慌”并不是个人的恐慌，而是集体的或人群的恐慌。“恐慌”一词被“道德”所限定。它是集体或人群共同经历的，被某种事件共同激发的，具有共同指向性的一种社会文化或道德现象。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博士论文《民间魔鬼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Moral Panics），“道德恐慌”的进程模式包含首尾相继的七个环节或步骤：出现（emergence），媒介库存（inventory），道德卫士，专家（experts），处理和解决方式，消褪（fade）和社会遗留（legacy）。<sup>276</sup>

根据经典的道德恐慌过程框架，全面的道德恐慌是道德运动过程的最后阶段：意识、道德转变和道德恐慌。通过这些阶段，公共道德得以建构、制造和传播。在“意识”阶段，通过引用统计数据、案例、展示“专家”来证明他们的主张以及使用激烈的修辞方法，产生与问题相关的信息。第二个阶段，“道德转变”

利用“戏剧、新奇或文化神话的元素”，其中企业家利用广泛的媒体报导并经常寻找名人或政治领导人来说服大众。通过这些代理发起人，道德企业家使他们的主张合法化并说服公众加入运动。在最后阶段，“道德恐慌”，媒体和立法机构对一个有问题的问题引起了暂时和广泛的关注。此外，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将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目标群体或“民间恶魔”，他们成为更大的社会弊病替罪羊。经典的道德恐慌过程：意识→道德转化→道德恐慌。

“媒介库存”（inventory）所意指的是通过一种模式化和象征化的报道来完成。它主要关涉到四种策略，即“夸张”，将小范围的数值和事件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扭曲”，对事件具体的物象进行有悖于原意的理解和发布；“预言”，根据已有的事件现象随意预测类似的未发生事件；“象征”，即当中下层媒介的程序化、陈规化、夸张和歪曲等特点能够被高端媒体所复制，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议题进行反应，“象征”便产生了。比如《每日镜报》头条报道：“快餐定时炸弹：随着汉堡、炸鸡及比萨连锁店在英国的商业街一哄而上，肥胖恐惧接踵而至。”<sup>277</sup>英国《都市地铁报》报道“西方国家的男性面临生殖‘定时炸弹’”。<sup>278</sup>还有一则报道称，一名继父将5岁的继子殴打致死——显然，这位继父“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sup>279</sup>《牛津英语辞典》将定时炸弹（time bomb）定义为“可能在未来某时带来或导致突发性灾难事件的人或物”。<sup>280</sup>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隐喻面向未来的定位至关重要，因为该定位将定时炸弹这一隐喻滥用在表述迄今为止被视为技术或个人问题的事件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热衷最坏情况思维这一倾向。媒体常常用夸大其词的比喻“定时炸弹”来表述个体不确定、不可预见、不受控的心理行为。促使人们使用定时炸弹隐喻的文化脚本对人们思忖未来困境而言，并无多大指导作用。从前有关未来的故事涉及启示、救赎、进步、解放或者更多，当今定时炸弹隐喻仅仅暗示我们将来的生命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或祖辈相比，当今世代的寿命更为短暂这一论调突出显示了文化悲观主义心态。在2005年流感肆虐时，职业“媒体医生”科波菲尔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写道：

现在媒体上大量数据纷纷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且病毒活动突破了物种界限，开始感染人类。是的，伙伴们。忘掉市值蒸腾的养老金吧，在即将爆发的流感中，反正人们都要死的。如果从好的方面看，

禽流感的爆发延迟了 20 年，我们已经幸运地多活了这么多年。<sup>281</sup>

科波菲尔对待大规模死亡的方式朴素而且诙谐，反映出当今用随意且轻松的态度看待灾难的趋势。关于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大规模死亡预言的扩散，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阐释为恐惧文化的威力战胜人类想象力最重要的症状。毋庸置疑，经常性的末日言论传播对人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观都有影响。

活跃于大流行中享受更多互联网访问的权力结构顶端的演员利用不同的特征，如贬义图片、夸张图片和歧视性漫画，有效地将种族歧视的网络道德恐慌传播给他人，这是然后由个人主要也通过网络空间复制和传播。在线社会权力不再简单地掌握在少数人或精英手中。虽然道德企业家和政治家可以对媒体和社会思想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但观众在创造、复制和影响内容方面同样积极。<sup>282</sup>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互联网都允许一种新形式的网络空间社交，其中包含许多技术进步，用作人们交换信息、享受相对匿名和向未开发的大众受众分享他们的社会观点和价值观的渠道。<sup>283</sup>

媒体传播信息往往通过引发人的焦虑和恐惧而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进行的。媒体种种耸人听闻的伎俩有据可查。与其说媒体制造了恐慌，倒不如说它提供了让人们间接体验恐慌的媒介。法学理论家克里斯托弗·古泽利安认为，美国电子时代的大多数恐慌是“向社会传达风险信息”的结果，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今制造恐慌的多是风险的传播而非个人经历。”<sup>284</sup> 在影响社会恐慌方面，媒体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文化脚本——具有戏剧性的内容和强有力的象征。媒体以这种方式在构建背景和外界的文化敏感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们应对所遇到的挑战、风险和威胁提供指导。媒体时不时地采用灾难性的世界末日般的言论的主要结果是强化了早先就已经存在的悲观论和宿命论心态。媒体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它塑造和传播一个具体威胁的方式，而在于它在对用以解释社会经验的一种语言和一套符号及意义系统进行普及宣传和正常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媒体并没有造成这些焦虑，但是在创造那些出没于我们的想象世界的符号和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在让我们的恐慌明显化、视觉化、戏剧化和特别个人化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的威力体现在它有能力影响语言的使用以及将恐慌修辞普及化。简单地重复诸如“超级病毒”、“流行病”、“灭绝”、“毒品”、“厄运”的词语有助于赋予威胁一种关乎生死存亡的性质。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警告性的话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Nexis 显示，收录在耸人听闻者的辞典中的大部分词语在当今报纸中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 20 年前。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耸人听闻的通俗小报上，同样非常明显地出现在所谓的优质媒体使用的语言中。以英国日报《卫报》为例，1988 年，“extinction(灭绝)”一词在该年度出现 93 次；2007 年该词出现的次数增加到 207 次；到了 2016 年，则达到 602 次。在 1988 年至 2007 年间，“Pandemic（大流行病）”一词的使用次数从 11 次增加到 73 次，近 20 年间增加了近 6 倍，而“epidemic（流行病）”的使用次数也由 181 次增至 291 次，2016 年提到“pandemic”一词 171 次，提到“epidemic”1319 次。

新习语、新表达方式的普及反应了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媒体不仅动员了现成的悲观词语，它还在创造或普及让人产生恐惧情绪的新用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像天气预报这样平淡无奇的节目也变成了一个迷你剧场。因为它采用夸大威胁的修辞，把正常的情况说得极其可怕。风暴、大雪或高温等常规天气已经被媒体重新表述为“extreme weather（极端天气）”。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extreme weather”迅速得到广泛的使用，Nexis 数据库中出现了 69 个包含该术语的标题。在随后的十年里，这项数据上升到 1045 个；2001 年初至 2006 年底，该数据又上升到了 5599 个。“extreme weather”是表达恐慌的一个典型用语，作为形容词，“extreme（极端）”指一种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状态。从概念上讲，将天气与“极端”联系起来表明，人们越来越倾向夸大自然现象带来的风险，突出这种非正常现象出乎意料和不可预测的特性。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隐喻，倒不如说它是捕捉了我们时代的焦虑的文化隐喻。在当代文化中，极端天气往往被解释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叙述——认为它是不负责任的人类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

## 第二节 英国 MMR 疫苗事件的媒体道德恐慌

框架分析是社会学家用来研究人们如何理解某些事件和问题的一种多学科研究方法。多数研究基于实证假设，即存在一个可以“发现”的事实，并且它是直接“可观察的”。部分研究基于定性分析，采用诸如语篇分析法。人类学家 Bateso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使用“框架”(frame)概念。<sup>285</sup>Goffman 被认为奠定了“框架的社会学基础”。他说，框架可以帮助人们整理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能够理解周围的世界。他将框架称为“解释方案”，即将“原本将场景中无意义的部分呈现为有意义的东西”的框架。<sup>286</sup>Entman 将个体框架定义为“思想上存储的思想簇，指导个体对信息的处理。”<sup>287</sup>

框架也是一种宏观结构，指记者和其他传播者提出问题的方式，以使其与听众的基本模式产生共鸣。以 1974 年 Goffman 的工作为基础，Tuchman 是第一位“认识到框架在媒体工作者的新闻收集和受众的新闻处理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sup>288</sup>他将其定义为：“新闻框架组织了日常现实，新闻框架是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sup>289</sup>Gitlin 将框架定义为“选择、强调和排斥的持久认知，解释和表现形式。”<sup>290</sup>Gamson 和 Modigliani 都将媒体框架定义为“为不断发展的事件提供意义的中心组织思想。”<sup>291</sup>长久以来，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价值观在意见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因为“个人依靠自己的道德观念来形成意见。”<sup>292</sup>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框架可以作为“对某个特定位置的正确定位的定义。”<sup>293</sup>本节所采用的理论基础为“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新闻框架分析所关注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在理论上强调框架建构的过程与动态。本节仅考察“话语”的范畴，即疫苗事件新闻/媒介文本，以内容分析的方法抽取文本中的“框架”，“再现”(representation) 疫苗事件这一传媒公共议题。

2005 年国务院发布了里程碑意义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提出了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工作原则及特别声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sup>294</sup>笔者据此将 2005 年划为研究起点，对 2005—2018 年间发生的 9 起疫苗事件 403 篇报道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本研究通过检视疫苗事件的新闻报道相似性或差异性探究媒体框架设置，试图剖析：（1）新闻价值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疫苗安全问题的认知；（2）主流媒体如何确定主题框架、增强信息传播

效应以及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

英国主流媒体对疫苗报道存在明显的恐慌情绪传播趋势；目的在于唤起公众对疫苗问题的重视程度，配合政府接种疫苗，防止大规模疾病扩散；恐慌情绪传播的社会根源既有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现实的社会危机。笔者在反思之余，提出媒介报道的情绪需要把握一个平衡尺度，过犹不及，恐慌情绪传播能唤起公众重视，也能激起社会过度紧张的负面影响。

### 一、媒介恐慌情绪

西方媒体在向受众宣传健康风险和突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很少有研究人员对媒体的传染病报道给予媒体积极的评价，认为报道经常引起恐慌。Lewison 在《2003-2004 年新闻媒体报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风险》一文中指出，媒体过去夸大了疾病的潜在危险。<sup>295</sup>新闻报道最常强调恐慌诱发因素，媒体通过强调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来助长公众的恐慌。Ungar 发现，媒体利用威胁和风险，不可避免地刺激公众的恐慌。<sup>296</sup>在《传播埃博拉恐慌：2014 年埃博拉健康危机的报纸和社交媒体报道》一文中，作者指出，在严重危机时期，传统新闻机构历来通过强调风险和不确定性来助长公众的恐惧和恐慌。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造成这种恐慌的程度对于在新媒体领域中的考虑至关重要。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在 Reddit 上分享的新闻扩大了围绕埃博拉病毒的恐慌和不确定性，而传统的报纸报道显着降低了引起恐慌诱导覆盖的可能性。<sup>297</sup>Finn&Pails 指出，美国埃博拉媒体报道的数量、速度、呼吸困难，以及该报道内容的荒谬，在塑造美国人威胁概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sup>298</sup>

大众传媒作为危机信息的另一权威来源，通过三种主要机制，在指导网络舆论和控制突发事件引发的公众恐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紧急情况期间，政府将社交媒体视为与公民沟通和发布官方危机信息的重要渠道。<sup>299</sup>其次，作为危机信息的主要权威来源之一，大众媒体发布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线社区系统中的大多数代理人接收并相信危机信息来自大众媒体。<sup>300</sup>第三，大众传媒作为各种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而提高了在线意见传播的速度和范围。<sup>301</sup>由于大众媒体在网络意见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的危机信息发布策略在紧急情况下对公众恐慌产生不同影响。<sup>302</sup>在上海（2013. 8. 31）液氨泄漏事故期间，大众媒体立即公布了紧急事件的真相，有效地阻止了谣言传

播。大众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明确的。<sup>303</sup>

时至今天，接种疫苗已成为人类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疫苗问题由来已久，在国外，学术界常用英国百白咳疫苗危机、MMR（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疫苗与自闭症恐慌、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疫苗问题、流感疫苗问题等事件作为经典案例进行相关研究。学者 Avery Holton 等人立足责任框架，结合 281 篇相关报道分析了媒体将 MMR 疫苗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何者、用于支持这些归因的消息来源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研究结果强调了新闻媒体如何在健康风险传播中归咎责任，以及这种归因如何在塑造公众行为中扮演潜在的重要角色。讨论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sup>304</sup>

研究发现媒体具有指向性的责任框架，将 MMR 疫苗争议矛盾源头指向虚假论文始发者安德鲁•维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同样聚焦媒体报道与疫苗问题事件之间议题的还有 Erika Franklin Fowl 等人，通过分析美国 101 家地方报纸报道关于 HPV 疫苗争议的报道文本，研究发现随着事件的动态变化，刚开始媒体的报道未必会引起争议与广泛关注，但随着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和行动者增多也影响了争论的论点类型。<sup>305</sup> 疫苗争议的出现与扩散与媒体报道存在关联，媒体的报道选题、倾向、信源、证据平衡等因素也影响着公众在疫苗争议中的观点与情绪，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较早地遭遇疫苗信任危机，随着当代疫苗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面临疫苗问题，如东南亚国家的登革热疫苗问题、日本 HPV 疫苗问题、包括中国国内出现的狂犬疫苗问题等，都影响着疫苗的接种率，群体免疫效果受到挑战。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任，降低公众恐慌，从风险传播视角提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参考国外治理与应对疫苗争论问题策略上有着经验性的价值，但在国内的传播学领域，关注具体的国外疫苗问题事件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大多立足于以本国发生的疫苗事件。故选取国际上影响深远的英国 MMR 疫苗事件的相关主流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

MMR 疫苗事件起源于安德鲁•维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著名医学期刊《Lancet》（《柳叶刀》）上发表伪造实验数据的论文，论文发现接种 MMR 疫苗容易导致自闭症和结肠炎等症状。部分媒体带有主观性、情绪性报道，公众对 MMR 疫苗的恐慌日益严重，MMR 接种率持续走低，公众对疫苗安全保持怀疑的态度，导致麻疹疫情卷土重来。近 20 年来，政府和专家学者采取了普及疫苗的

安全性、批驳维克菲尔德的虚假研究、研究证明 MMR 疫苗与自闭症毫无关联等一系列补救举措，英国公众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对 MMR 疫苗的接种率仍难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95% 标准线，群体性免疫无法完全保证，为麻疹疫情爆发埋下祸根。

英国 MMR 疫苗事件作为公共卫生性事件，关乎全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本土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倾向、信源取向、报道角度、选题等方面都影响着公众对 MMR 疫苗的态度与认知，因此，通过分析 1998—2018 年 20 年间 391 篇英国主流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梳理了事件发展的四个阶段，统计分析媒体关注的焦点与视角，结合媒体报道采用的信源，分析英国本土主流媒体在 MMR 疫苗事件中的报道特征，其中结合全国性综合日报与通俗小报两类报纸进行具体分析，归纳与思考英国媒体在 MMR 疫苗事件报道中的策略，为我们媒体应对负面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由此，本节提出三个假设问题：1. 英国主流媒体的疫苗报道是否存在恐慌情绪传播？2. 恐慌情绪传播的舆论导向何在？媒体的意图是什么？3. 主流媒体恐慌情绪传播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 二、媒介恐慌情绪的维度

以英国主流媒体对疫苗报道为评估对象，在借鉴其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从框架、信源和关键词三个方面，对英国五份主流报纸 391 篇报道进行数据统计与科学分析，归纳媒体传播的特点、舆论偏向，展望其发展态势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 （一）指标体系

项目组在考察其他研究机构对主流媒体报道研究的基础上，从框架、信源和关键词三个方面对媒介公共卫生事件的情绪态度进行考察，并将其设立为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立若干二级指标，具体意义如下：

#### 1. 框架

学者们发现了一些可以增强公众恐惧和恐慌的新闻线索。如媒体框架通过使事件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为突出而导致恐慌。<sup>306</sup>选择性现实的强调和遗漏可能会导致某些信息被公众减少，并有助于提高对传染病传播潜力的恐慌。如 Ungar (1998) 说明报纸如何倾向于强调威胁，这与恐慌关联的风险，同时遏制强调减少恐惧。媒体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强调解决方案以及控制和控制健康危机的努力来减少恐慌。

## 2. 信源

通过推测或强调某人或某事而不确认这一点，即猜测或误报。新闻媒体会因此而助长公众的恐慌情绪。如斯温在 2001 年美国炭疽病发作的新闻报道中，人们发现了一种强烈的猜测和误报。在埃博拉的报道汇总，还有一些国际上的猜测和误报。这种投机的强调引起了公众的恐慌。<sup>307</sup>

## 3. 关键词

媒体报道中标题和内容的情绪关键词非常重要。这些情绪关键词会刺激公众的敏感神经。那么，这些词汇无外乎是对立的一组关系，责备和赞美。责备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行为者作为问题的根源和原因，集中了公众的感知和集中恐慌。责备可能导致耻辱，标志着社会耻辱的目标。<sup>308</sup>指责的媒体报道引起了公众对特定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和愤怒。在健康的背景下，指责还会重现权力关系，使社会分化为健康和不健康。<sup>309</sup>因此，媒体报道中存在的责任可能引发愤怒并增加恐慌。反之，赞美负责传播或控制局势的特定个人的努力。赞美个人或集体通过强调努力控制局势或找到解决方案的特定行动者的努力来减少恐慌。

## （二）指标权重

共建立了 3 个一级指标和 8 个二级指标，在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打分；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具体权重如下（见表 3-1）：

表 3-1 媒体恐慌情绪传播各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框架	官方回应/专家答疑/民众亲身体验/补救措施	正向情绪框架
	疫苗争论/疫苗致病	负向情绪框架
	疫苗科普/疫苗接种/民众意见/调查进展/本国疫苗情况	中性情绪框架
信源	专家学者/官方机构	正向情绪信源
	模糊信源（猜测/误报）	负向情绪信源
	其他组织/普通民众	中性情绪信源
关键词	赞美词汇	正向情绪词汇
	责备词汇	负向情绪词汇

## 三、媒介恐慌情绪传播的呈现

内容分析法是本文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将结合使用质性研究工具 NVivo12 进行。

## （一）抽样与样本

## 1. 事件样本

本文研究时间范围选取为 1998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样本的来源为美国 NewsBank（新闻银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数据库之一的《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检索关键词为“MMR”，“vaccine”（疫苗），“autism”（自闭症）；国家地区为“England”（英格兰）、“Wales”（威尔士）、“North Ireland”（北爱尔兰）和“Scotland”（苏格兰）；来源为“Newspaper”（报纸）；媒体分别为《Times》（《泰晤士报》）、《The Sun》（《太阳报》）、《Daily Mirror》（《每日镜报》）和《The Guardian》（《卫报》）；排列顺序为“oldest”（最早）。初次检索共获报道 1385 篇，运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共抽样得 500 篇报道，经筛选与 MMR 疫苗事件无关的报道，最后共获有效报道样本 391 篇。

## 2. 媒体选择

为较为客观地反映英国媒体报道全貌，故本文选取了以《Times》（《泰晤士报》）、《The Guardian》（《卫报》）为代表的全国性综合日报，《The Sun》（《太阳报》）、《Daily Mirror》（《每日镜报》）为代表的通俗小报两类报纸作为样本来源。《Times》（《泰晤士报》）、《The Guardian》（《卫报》）同属英国三大报，全国发行且影响区域广泛，且丰富多元的内容深受民众欢迎。而《The Sun》（《太阳报》）、《Daily Mirror》（《每日镜报》）同属默多克集团旗下的通俗类小报，是不分阶层的广大平民百姓所喜爱的报纸，销量一度超过全国发行的综合性报纸，其报道内容偏向娱乐化，风格也较为轻松，相比综合类全国通行的报纸报道的体裁较短，信息量较少。

## （二）基本状况

### 1. 报道数量及分布

依据抽样与筛选前的数据，1998—2018 年间，四家纸媒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共计 1385 篇，依报道数量变化趋势图将事件归纳为四个阶段（见图 3-1）。

第一阶段：潜伏期。时间范围为 1998 年至 2001 年。这一阶段维克菲尔德已在《Lancet》（《柳叶刀》）上发表 MMR 疫苗恐慌的相关的论文，但该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广泛关注，讨论度也较低。

第二阶段：高潮期。时间范围为 2001 年到 2004 年。这一阶段关于 MMR 疫苗的讨论到达顶峰。维克菲尔德为他 1998 年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他发现在自

闭症患儿肠道中存在麻疹病毒，而这些病毒正来自于 MMR 疫苗。同时，部分自闭症患儿家庭出现在媒体上，控诉 MMR 疫苗是导致自闭症的罪魁祸首，而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因拒绝回答记者其儿子是否接种 MMR 疫苗的问题，致使公众关注度与对 MMR 疫苗的怀疑到达顶峰。

**第三阶段：缓和期。**时间范围为 2005 年至 2013 年。这一阶段讨论之声稍有缓和，报道主要聚焦于疫苗科普之上，潜移默化之下让公众恢复对疫苗的信心。此时关于疫苗的争论也逐渐回落。

**第四阶段：发酵期。**时间为 2014 年到 2018 年。这一阶段维克菲尔德与他的反疫苗影片《疫苗黑幕》将 MMR 疫苗争论重又带回大众视野，反疫苗运动也在社交媒体上蓬勃传播，关于 MMR 疫苗的报道呈现平缓上涨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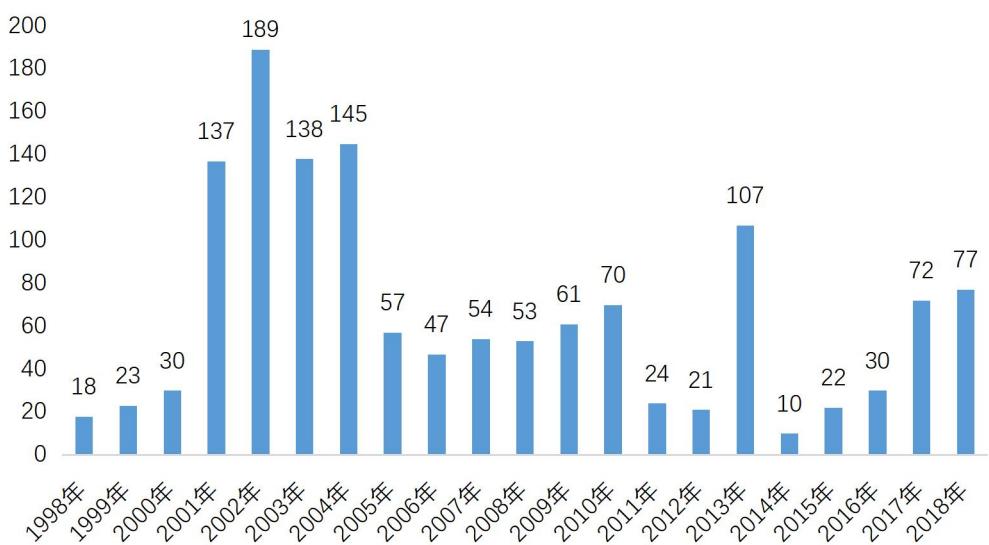


图 3-1 英国 MMR 疫苗事件四家纸媒报道趋势图（1998—2018 年）

通过每一年的关于 MMR 疫苗报道数量，通过比例筛选出 500 篇报道，剔除不相关的部分剩余 391 篇报道。将其在四家主流媒体中的比重做成表 3-2：1998—200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媒体统计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泰晤士报和卫报这两家综合性全国发行的报纸篇数最多，占样本容量 64.45%，地方性的通俗小报每日镜报和太阳报占 35.55%。

表 3-2 1998—200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媒体统计表

媒体名称	数量	比重
泰晤士报	154	39.39%
卫报	98	25.06%

每日镜报	85	21.74%
太阳报	54	13.81%
总计	391	100.00%

## 2. 报道体裁

抽样与筛选后，390篇报道中，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MMR疫苗事件的报道体裁较为丰富，主要以消息呈现为主，占比最大，比例为65.71%，总体呈现客观中立的倾向；而评论次之，也仅占有12.28%，往往带有评述者主观的态度与观点，总体上出发点大多出于维护疫苗安全；通讯、读者来信、特写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分别为7.93%、5.12%与6.65%，主要聚焦于专家学者、民众、自闭症家庭的新闻内容，行文上可读性强，观点也较为多元；而呈现单独的人物经历的人物专访与其他体裁占比较少，仅为1.79%与0.51%（见表3-3）。

表3-3 抽样后英国MMR疫苗事件四家纸媒报道体裁统计表（1998—2018年）

报道类型	数量/篇	百分比(100%)
消息	257	65.73%
评论	48	12.28%
通讯	31	7.93%
读者来信	20	5.12%
特写	26	6.65%
人物专访	7	1.79%
其他	2	0.51%

## (三) 编码与信度检验

本文391篇报道由两位编码员共同完成，对体裁、信源、报道倾向与报道角度四个类目进行编码。正式编码前两位编码员已进行信度检验，运用霍斯提系数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每一类目信度系数在0.9以上，确保后续文本编码结果可靠。

### 1. 框架分析

首先从报道角度及类目建构。本文采用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建构框架类别，再讲文本提及的框架进行量化的统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为：一是选择1998—2018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MMR疫苗的相关报道；二是大量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建构类目；三是在对每篇报道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人工阅读识别报道角度，将编码对应的具体文本纳入对应的类目中；四是结合“关键词”和“消息来源”，对框架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在开始阶段建构的“类目”，

并不是“框架”。而是更像“报道角度”的类目，但是从操作的可能性上来说，只有从单篇的“报道角度”切入，发现一致的视觉才能进一步地提炼“框架”。

经过 2 名编码员的讨论，将报道角度分为表 3-4 所示 11 个类目。因为每篇报道的文本角度可能不止一个，我们限定每篇报道的报道角度不超多 4 个。11 个类目以及操作性定义如下：

官方回应：国家机构关于疫苗问题作出的回复。

本国疫苗情况：在报道中提及关于本国 MMR 疫苗注射的统计。

疫苗争论：关于讨论 MMR 疫苗是否会引起孤独症以及其他疾病的争论话题。

补救措施：官方对于 MMR 疫苗会导致孤独症等疾病说法采取的措施。

调查进展：关于 MMR 疫苗是否会导致孤独症和疾病的最新进展报道情况。

专家答疑：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关于 MMR 疫苗问题进行情况说明的报道。

民众意见：民众提出对 MMR 疫苗问题的建议的报道。

疫苗科普：关于 MMR 疫苗以及疫苗原理等科普性报道。

疫苗致病现状：MMR 疫苗导致孤独病以及其他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报道。

疫苗接种情况：MMR 疫苗的争论出现后，国内 MMR 疫苗的接种率。

人物亲身体验：通过报道 MMR 疫苗致病儿童或父母的情况。

表 3-4 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报道角度

报道角度类目	数量	比重
官方回应	47	6.21%
本国疫苗的情况	55	7.27%
疫苗争论	154	20.34%
补救措施	29	3.83%
调查进展	93	12.29%
专家答疑	56	7.40%
民众意见	44	5.81%
疫苗科普	32	4.23%
疫苗致病现状	112	14.80%
疫苗接种情况	99	13.08%
人物亲身体验	36	4.76%
合计	757	100%

\*信源和报道角度不止 1 个，信源最多选 3 个，角度选 4 个，故数量会超过实际的文本量。

## 2. 信源分析

在对 MMR 疫苗报道事件框架识别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文本的信源进一步地统计和分析。信源对于框架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是影响框架效应的变量之一。美国说服研究专家卡尔·霍夫兰 (Carl Hovland) 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大众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源,效果的差异有时取决于信息的来源者是谁。对每篇报道使用的信源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表 3-5: 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信源统计表。在新闻报道中,四家主流媒体用了大致 642 处的信源。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最多的是专家学者和官方机构的信源,分别是 206 篇和 185 篇,占比 32.09% 和 28.82%。再次引用其他组织的信源共 109 处,占比 16.98%。普通民众和模糊信源使用是 98 处和 44 篇,占比 15.26% 和 6.85%。

表 3-5 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信源统计表

信源	数量	比重
专家学者	206	32.09%
官方机构	185	28.82%
其他组织	109	16.98%
普通民众	98	15.26%
模糊信源	44	6.85%
合计	642	100.00%

注: 单篇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可能不止一个,本研究在归纳的过程中限定单篇的消息来源不超过 4 个,因此信源统计的数量会超过选择的文本总量。

## 3. 关键词分析

通过专业的统计手段分析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得到最直观的数据去展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框架往往包含着特定的关键词、习惯用语等。本文运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词频统计参数设置为最短单词字数为 3,导出频数前 100 的高频词,选择近义词合并,停用无实义的词语后获得符合条件的前 15 高频词和前 100 的词云图(见图 3-2)与频数统计表(见表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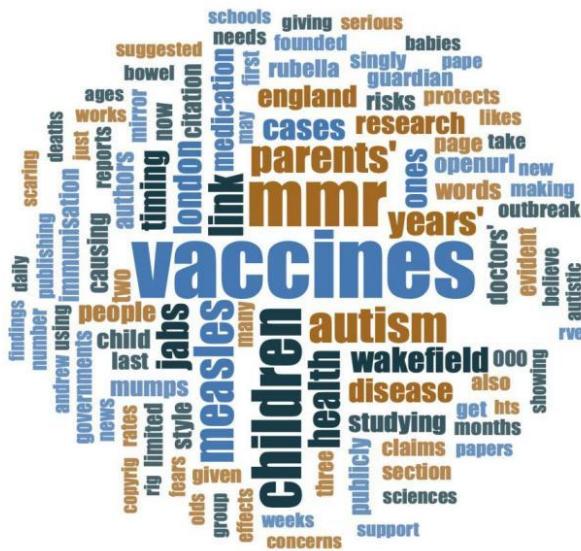


图 3-2 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报道关键词词云图

表 3-6 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报道高频词统计表

序号	Word (词语)	Count (数量)	Weighted Percentage (加权比例)
1	vaccines (疫苗)	2832	2. 10%
2	MMR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 疫苗)	2148	1. 59%
3	children (儿童)	1757	1. 30%
4	measles (麻疹)	1319	0. 98%
5	autism (自闭症)	1256	0. 93%
6	link (联系)	1077	0. 80%
7	parents (父母)	1060	0. 79%
8	jabs (注射)	962	0. 71%
9	health (健康)	939	0. 70%
10	London (伦敦)	769	0. 57%
11	wakefield (维克菲尔德)	741	0. 55%
12	cases (案例)	708	0. 52%
13	timing (时间)	6	0. 50%
14	disease (疾病)	7	0. 49%
15	research (研究)	8	0. 42%

对前 15 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出现了以下热点词汇： vaccines (疫苗) 、 MMR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 、 children (儿童) 、 measles (麻疹) 、 autism (自闭症) 、 link (联系) 、 parents (父母) 、 jabs (注射) 、 health

(健康)、London (伦敦)、wakefield (维克菲尔德)、cases (案例)、timing (时间)、disease (疾病)、research (研究)。可以看出英国主流媒体更多地聚焦本国的 MMR 疫苗事件，并对 MMR 疫苗是否会导致孤独症以及其他流行病的证实研究进行重点关注，且大多从比较中立科学的态度去报道本国的 MMR 疫苗事件。Wakefield 成为了重点关注的人，因为他发表的论文让越来越多人相信 MMR 疫苗会导致孤独症，父母开始拒绝让其子女接种 MMR 疫苗。

#### 四、媒体制造道德恐慌的舆论偏向

前面大多是从静态分析了近 20 年来英国主流媒体对疫苗事件的报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疫苗技术的不断改进，在新的环境下，媒体对疫苗的报道也将呈现出变化。

##### (一) 报道倾向

新闻报道往往可以反映出报道者的倾向，根据框架分析的结果，本文将报道的内容分为正面、中立、负面报道三种倾向，以此来界定四家主流媒体在报道上的立场。本文界定三种报道倾向的标准为：正面是对文中肯定 MMR 疫苗是安全的，使用少量的批评用语；中立是文中对 MMR 疫苗是否安全不给予评论，呈现肯定与批评两种观点，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负面指的是文中对于 MMR 疫苗安全的描述是负面的情况比较多，对 MMR 疫苗产生怀疑，否定。

根据以上标准对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报道进行统计，得出表 3-7：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统计表。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正面报道有 72 篇，占研究总量的 18.41%；中立报道 265 篇，占研究总量的 67.77%；负面报道 54 篇，占研究总量的 13.81%。数据显示，英国四家主流媒体对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持中立的态度。正面和中立的分布都比较均匀。在 265 篇中立报道中，主流媒体通过对 MMR 疫苗事件的进展不断跟进，以及呈现反疫苗运动和政府不同的声音，更多地将原本的事实和观点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有单剂疫苗与 MMR 疫苗之间的安全性讨论，多方声音在报道中表达，大致做到了平衡报道。72 篇正面的报道主要集中报道 MMR 疫苗研究的最新进展，并且有研究证据表明 MMR 疫苗是安全的，肯定政府一直以来致力于让群众相信 MMR 疫苗是安全的观点。54 篇负面的报道主要是报道 MMR 疫苗的实验表明会导致自闭症以及其他流行病，还有从父母们因为的恐慌而拒绝给自己家的儿童接种 MMR

疫苗，导致总体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等流行病爆发。文中还谴责政府对待 MMR 疫苗的研究不够长久，无法说服父母相信 MMR 疫苗。

表 3-7 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

报道倾向	数量	比重
正	72	18.41%
中	265	67.77%
负	54	13.81%
总计	391	100%

## (二) 变化趋势

在 1998 年到 2018 年期间，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我们用图 3-3：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变化图来呈现。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将数据导入 EXCEL 制成表 3-8：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变化统计表。通过两个表格的辅助分析，从整体的趋势看来，前两年和后面的十年，报道趋势的变化并不明显。三种报道倾向都相互有交叉。形成反差比较明显的是中立报道，在 1999—2005 年间，中立报道从 1999 年逐步增加并在 2002 年达到巅峰，随之逐渐下降。2005 年之后负面报道的数量开始减少，正面报道小幅增加，但仍然中立报道占据上风。



图 3-3 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变化图

表 3-8 1998—2018 年四家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倾向变化表

年份	正面	中立	负面
1998 年	0	5	1
1999 年	0	3	4

2000 年	1	8	0
2001 年	5	42	2
2002 年	0	60	4
2003 年	0	43	2
2004 年	3	29	5
2005 年	3	4	5
2006 年	4	4	2
2007 年	5	7	2
2008 年	5	8	1
2009 年	4	8	2
2010 年	6	9	3
2011 年	3	4	0
2012 年	2	2	1
2013 年	11	14	10
2014 年	0	0	1
2015 年	3	1	1
2016 年	2	1	1
2017 年	12	5	1
2018 年	3	8	6

### (三) 报道特征

从上面对英国主流媒体关于 MMR 疫苗事件报道的基础分析、框架分析以及 20 年来的报道趋势分析，本节尝试对其报道特征进行相关解读。一是报道倾向整体呈现中立，政府对 MMR 疫苗安全问题不断跟进调查是主要的原因。英国主流媒体奉行客观公正的新闻主义，在报道负面事件时，会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紧紧围绕在问题的解决上，以中立报道为主。2002 年是英国父母对 MMR 疫苗恐惧，不愿意接种 MMR 疫苗，导致英国麻疹等流行病的爆发。单剂疫苗的出现引起了父母与政府的观点冲突。媒体在报道这类争议时，尽可能会原文呈现事实。二是报道内容角度多元，主体多样，力求呈现多种“事实”。英国在报道 MMR 疫苗事件的内容多种多样。有对 MMR 疫苗最新研究的报道，也有呈现单剂疫苗与 MMR 疫苗的讨论，父母的担忧，疫苗接种率降低，麻疹疾病爆发等。三是报道体裁多样，主体的覆盖面广。报道的体裁虽然多以消息为主，但是评论、通讯、读者来信、

特写等体裁仍然呈现。除疫苗事件涉及主体，还有许多专家、有关组织研究报道，整体而言，反映出整个舆论环境都是朝着稳定有序地方向发展。

## 五、生物权力论视角下的道德恐慌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使用的生物权力概念主要来自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福柯所有的学术论著中，权力如同幽灵一样到处游荡。在《性史》第一卷，福柯对生物权力的界定如下：“一套涵盖力量关系的矩阵，将生命和生命的机制纳入明确的演算之中并以知识型权力作为改变人类生命的动力。”

<sup>310</sup>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弥漫于现代社会之中，充斥在监狱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统计制度、审计制度之中，致使个人的私有空间成为被国家和社会仅仅监视并不断规范的暴露性空间，致使个人的偏好、身体、行为、思维乃至人类的性欲都成为被规训的对象。”<sup>311</sup>福柯的《疯癫与文明》阐述了西方文明视角下对麻风病患者的强制性隔离措施是一种野蛮的文明手段。中世纪以来将麻风视为洪水猛兽，将麻风病患者视为异端，被上帝排斥的另类人群。一直遭到文明的打压和迫害。西方文明建立在对麻风病人的残酷迫害上之上。这种文明的认知根源一直延续下来，影响着人们的偏见和认知。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麻风病作为种族、殖民医学或“帝国的危险”问题，“尤其是英属非洲、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前殖民地的语境中，已被反复探究。”<sup>312</sup>它是涉及人权和身份问题的富于同情心的讨论主体，突显了美国和日本等非殖民地的污名化和强制隔离。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层面，作为复杂殖民医学和种族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也涉及国家治理与疾病控制层面，学者梁其姿在麻风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中谈及“中国麻风控制的每个阶段都和重大政治运动或当是的取向完全合拍。”<sup>313</sup>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治理麻风病的过程中存在宣传方式粗暴等问题，导致民众对麻风病的恐惧。在景军教授的研究中记叙了麻风病人的回忆录，谈及政府的过度宣传导致社会认知的偏差，“依托于夸大麻风病传染的社区宣传和送药上门导致的病人身份暴露。在公众对麻风病的恐惧被大大加剧的社会生命氛围内，社会歧视接踵而来，病人和病人的家庭陷入普遍遭受社会排斥的困境。”<sup>314</sup>长久以来的治疗控制方式，隔离、歧视、排斥一直是麻风病的标签符号，是人们挥之不去的恐慌记忆。夸大麻风病传染性的做法，使得长期以来在民间存在的麻风恐惧文化得以巩固，甚至到“大跃进”期间升级到草木皆兵的境地。

现代媒介在这种恐慌情绪的引导下，过度关注麻风病情，呼唤人们注射 MMR 疫苗，基于对麻风病的恐惧诉求。然而，媒介过度的报道与有意识的舆论偏向，使得人们对麻风病患者的恐慌与偏见。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人文环境让人们从疾病本能地恐慌，拒打疫苗引发疾病扩散的社会危机，在英国 MMR 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盲目推崇科学家、医学权威人士导致公众对疫苗接种产生抵触的恐慌情绪，媒体将疫苗的危害过度放大，并不断制造新的争议话题，引发公众的多重恐慌臆想，尤其是疫苗纪录片的上映，更加剧人们对疫苗误判的道德恐慌，激起公众抵制疫苗接种的反社会行为，使得媒体陷入集体恐慌情绪传播中，希冀以恐惧诉求唤起公众的危机意识。

### 第三节 中国疫苗事件的媒体舆论引导<sup>315</sup>

检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主流媒体对以疫苗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呈现模式。笔者通过对三类主流媒体 403 篇疫苗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责任框架、人情味框架和冲突框架、信息补偿框架是三类媒体架构疫苗议题的主要模式。在信息报道角度和信源选择上，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存在模式刻板的缺陷。互联网成为公众主要利用的渠道，主流媒体应关注公众的疫苗接种态度、疫苗安全的损益平衡、公共卫生的社会公正性等议题，加强信息补偿框架，增加信息来源，合理引导舆论，避免媒体过度恐慌导致舆论偏见，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

2019 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国，使得公共卫生、健康传播的话题再次引发公众热议。早在 2003 年 SRAS 疫情爆发与控制后，我国公共卫生管理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健康传播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体议题。在众多公共卫生议题中，疫苗议题在近年来备受公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就曾出现过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声音：既有宗教原因，部分神职人员反对将动物制品注入人体；也有伦理考量，强制接种疫苗侵犯了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近年来频繁曝光的疫苗问题引发的社会关注使得该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传媒是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个人还是大众层次，传媒所传递的健康信息影响着公众对健康议题的感知。风险专业人士和学者长期以来一致认为媒体是风险社会建设中的关键角色。当记者承担风险时，他们会通过辨别值得关注的观点和不值得关注的观点来使用框架界定当前的问题。传媒如何呈现疫苗事件这一公共健康议题成为传播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 一、公共卫生议题的研究缘起

国外学者对疫苗问题的关注视野主要聚焦于：一是从社会运动视角关注公众抵制疫苗运动的行为研究。如《反疫苗积极分子，web2.0 和后现代模式-反疫苗运动在网上使用的战术和策略概述》指出，反疫苗运动所使用的技术是狡猾的，因为他们的抗议伪装成了支持的言论，如“知情同意”、“健康自由”和“疫苗”。<sup>316</sup>《反疫苗接种运动及其解释》结合英国和荷兰关于反疫苗接种运动的实证数据，对两国反疫苗接种所造成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进行科学解释。<sup>317</sup>二是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关注公众的焦虑心理与自我效能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如《接种疫苗还是免疫接种？搜索词对互联网的影响》指出，医生与病人的沟通和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如

何最有效地减少抗疫苗接种错误信息的影响。<sup>318</sup>《一个相互冲突的规范？在报纸对自闭症疫苗争议的报道中动员和问责信息》影响动员风险信息是否出现在新闻媒体对健康问题的报道中的规范和规范冲突。<sup>319</sup>《风险、责任与负面反应：父母对儿童接种疫苗的信任的定性研究》探讨父母如何谈论为孩子接种疫苗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sup>320</sup>国外学者将公共卫生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注重探索传媒与医疗的关联性，强调疫苗争议的出现和扩散与媒体报道存在关联，媒体报道选题、倾向、信源、证据平衡等因素影响着公众在疫苗争议中的立场与情绪。关注公众接种疫苗意愿、疫苗的社会风险及互联网环境下媒介对公众疫苗与接种意愿的影响程度等。研究方法偏质化分析，多采用访谈与个案研究。

国内学者关注视野聚焦在：一是从管理学视角探究疫苗接种意愿及效果。如《成都地区女性患者对宫颈癌筛查和 HPV 疫苗认知调查分析》指出，电视、网络是获取疫苗信息的主要途径，年龄、文化程度、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是影响 HPV 疫苗认知度的重要因素。<sup>321</sup>《南京市儿童家长手足口病认知和 EV71 疫苗接种意愿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南京市抽取 300 名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回归分析手足口病认知的影响因素。<sup>322</sup>二是从心理学视角关注公共卫生中群体心理调适机制。如《广州市大学生 HPV 疫苗的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表明：HPV 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的接种意愿并无差异。<sup>323</sup>国内学者关注公众对疫苗认知程度、医学素养、疫苗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致力于探索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任，降低公众恐慌，从风险传播视角提高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研究方法偏量化分析。

综上，国内外疫苗问题研究涉猎较广，杂糅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呈现出学界对该领域的浓厚兴趣。然而，现有研究成果的衡量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多为有限样本的验证（即使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也存在样本多样性的局限），缺乏大规模数据的精确分析，导致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较弱。尤其从传播学视角探索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导向与民众风险认知、医疗素养等之间的关联性仍有拓展空间。

## 二、案例选取、研究样本与数据

### （一）抽样与样本

#### 1. 事件样本

本节研究范围为 200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样本来源为“超星发现系统”及“百链学术搜索系统”的“报刊高级搜索”。共筛选整理出 9 起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疫苗事件。分别是：2005 年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2008 年江苏造伪疫苗事件、2009 年大连违规疫苗事件、2010 年广西来宾“开水疫苗”事件、2010 年山西失效疫苗事件、2012 年山东潍坊非法疫苗案、2013 年深圳注射死亡婴儿案、2016 年山东非法疫苗案、2018 年长春长生疫苗案。检索报道 596 篇, 其中通稿 193 篇, 去除后最终获得样本量 403 篇。

## 2. 媒体选择

依据事件及报道篇目来划分媒体, 本文选择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 8 家“中央级媒体”; 《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 3 家“南方系媒体”; 《山西日报》、《长春日报》等 80 家“事发地媒体”。划分理由: 近 20 年来我国疫苗事件呈周期性增长、间歇性爆发, 且爆发周期日益频繁。围绕疫苗安全议题的报道成为媒体重要议程。基于此, 本文将分析对象锁定为三类: 中央级媒体、事发地媒体及南方系媒体。以南方系媒体为独立样本, 主要基于其作为专业主义媒体代表及舆论监督影响力考量。

### (二) 基础分析

#### 1. 报道数量及分布

经统计, 南方系媒体报道量最高, 为 247 篇 (61%), 事发地媒体报道量为 84 篇 (21%), 中央级媒体报道量为 72 篇 (18%)。中央级媒体对于疫苗事件的报道多为宏观全局的政策指示。如《国务院调查组公布吉林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进展》。事发地媒体多为转发中央级媒体的通稿; 南方系媒体报道形式较为多元, 舆论监督报道居多, 如《疫苗事件凸显第三方调查滞后》。

#### 2. 报道体裁

在分析样本中, 消息 323 篇 (80%); 通讯 38 篇 (9%); 评论 33 篇 (8%); 新闻特写 7 篇 (1%); 深度报道 1 篇, 专访 1 篇 (见表 3-9)。具体而言, 各类媒体报道体裁的共性是以消息为主, 通讯、评论为辅。消息时效性强、言简意赅, 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特性。南方系媒体发布的评论较多, 内容常为反思性报道; 呼吁各方对疫苗问题重视的报道, 以及揭露疫苗问题利益链的监督报道。

表 3-9 三类媒体的报道体裁比较

媒体类型	消息	通讯	评论	新闻特写	深度报道	专访
中央级媒体	68	2	2	0	0	0
事发地媒体	143	21	13	4	1	1
南方系媒体	112	15	18	3	0	0

### 3. 编码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组经过培训后的两名研究生担任编码员，研究者从样本框架中随机抽取了 20% 的样本进行信度检验，运用霍斯提系数进行检验，两名编码员在各类目上的信度均达到 0.9 以上，能达到对编码员间信度的要求。

## 三、框架视角下公共卫生议题的媒体呈现

### （一）报道角度及类目建构

在阅读报道文本的基础上建构出框架类别，制定本土化定义，对报道角度进行分类。在一级编码的过程中，组织两位独立编码员经由讨论，将收集文本的报道角度分为 10 类，归纳具体含义。三类媒体常用报道角度分别为“调查进展”（29.57%）、“政府发声及回应”（24.38%）、“补救措施”（11.73%）（见表 3-10）。

表 3-10 三类媒体的报道角度及数量

序号	报道角度	具体含义	出现频次及百分比
1	政府发声及回应	政府部门对于疫苗事件进行对外发布与回应现状	108 (24.38%)
2	涉事企业情况	疑似生产问题疫苗的相关企业在疫苗事件中的状况和举措	30 (6.77%)
3	本省疫苗情况	疫苗事件中，报道媒体所在省份的疫苗储存、使用及处置等情况	36 (8.13%)
4	疫苗争论	社会各方关于疫苗的多方面争论	8 (1.81%)
5	补救措施	行政部门及卫生部门在疫苗事件发生后为避免情况恶化而施行的补救手段	52 (11.73%)
6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	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疫苗事件作出的反应和指示	10 (2.26%)
7	调查进展	执法部门对于疫苗事件相关情况的调查现状	131 (29.57%)
8	专家答疑	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对于疫苗相关问题的解释说明	20 (4.51%)
9	民众意见	普通民众对于疫苗事件的看法与感受	9 (2.03%)
10	疫苗科普	对于接种疫苗相关问题以及重要性的科普	39 (8.80%)

具体而言，“中央级媒体”和“事发地媒体”多采用“调查进展”及“政府

发声及回应”的角度。以宏观大局的视角去回应公共卫生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中央级媒体”报道角度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除“调查进展”与“政府发声及回应”两个角度，其他角度的报道数量极少。相比之下，“事发地媒体”的报道角度较为多元，增加了对于涉事企业情况的介绍，对民众关心的疫苗安全问题进行信息补偿报道的框架——疫苗科普，以降低群体性焦虑和恐慌情绪，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增强政府信任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报道能够体现事发地政府的服务意识，既有宏观的“政策指导型”报道，也有接近民意的“接地气型”报道。而“南方系媒体”相较于前两类媒体，报道角度更多元、开放，尤其是“调查进展”、“补救措施”的报道视角最多，体现出专业主义媒体的职业精神，秉持为公众解疑答惑，探究事实真相（见表 3-11）。

表 3-11 三类媒体的报道主题比较

媒体类型	政府发声及回应	涉事企业情况	本省疫苗情况	疫苗争论	疫苗科普	补救措施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	调查进展	专家答疑	民众意见
中央级媒体	21	3	2	0	0	2	4	34	3	1
事发地媒体	73	19	10	1	23	31	1	72	13	6
南方系媒体	14	8	24	7	16	19	5	25	4	2

## （二）信源分析

新闻框架是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信源作为新闻事实的证据来源，通常也被视为塑造新闻框架的重要元素。信息源越权威，信息可信度就越高，传播效果越佳。一篇报道中信源越多元，其观点和立场就愈显客观、平衡、说服力强。除却 34 篇评论文章不作信息来源统计外，本文将其余 369 篇新闻报道都纳入统计分类。经过两位编码员的讨论，本文把信源归类为 6 个种类，即“官方机构”、“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及“模糊信源”（见表 3-12）。

表 3-12 三类媒体报道的信息来源及频次

序号	报道角度	具体含义	频次及百分比
1	官方机构	国务院、政府、药监局等官方机构	308 (62.47%)
2	媒体机构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及通讯社	76 (15.42%)
3	非政府组织	民间团体、世界卫生组织、学校、企业、医院等组织	41 (8.32%)

4	专家学者	医学专业专家学者等	40 (8.11%)
5	普通民众	问题疫苗受害群众及家属	21 (4.26%)
6	模糊信源	没有清晰信息来源	7 (1.42%)

从表 4 可知,共引用 493 个信息来源。三类媒体引用次数最多的信源为“官方机构”,频次为 308 次 (62.47%)。“官方机构”可细分为政府及其公告、新闻发布会、官员言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等,具有权威性,成为疫苗事件中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反映出政府在公众心目中具有较高的信任度。次之是“媒体机构”的信源,频次共计 76 次 (15.42%)。其余四类信源使用率依次是:“非政府组织”41 次 (8.32%);“专家学者”40 次 (8.11%);“普通民众”21 次 (4.26%)。反映出我国公民参与社会公共讨论的开放度和平台还有待提升和拓展。“模糊信源”引次仅为 7 次 (1.42%)。慎用该项信源反映主流媒体对民众的负责任态度与职业操守,以透明、真实的信源组织报道、告知受众。相比之下:“中央级媒体”的信源多为官方机构;如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权威机构。事发地媒体和南方系媒体的信源除了“官方机构”外,“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的信源较多,反映出地方媒体设置议程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普通民众”的采访展示了地方媒体呈现民间话语和视角的新闻理念(见表 3-13)。

表 3-13 三类媒体报道的信源比较

媒体类型	官方机构	媒体机构	非政府组织	普通民众	专家学者	模糊信源
中央级媒体	60	0	3	2	4	0
事发地媒体	138	67	22	13	24	2
南方系媒体	110	9	16	6	12	5

### (三) 关键词分析

学者 Entman 认为,“媒介从业人员对事物的选择和凸显会影响受众对事物的理解,侧重于框架的传播效果。”<sup>324</sup>在新闻文本中,媒体通过选取定性关键词或者具有特定意味的图像、视频等,能够塑造特定的新闻框架,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本文借助质化分析软件 NVivo11 对文本关键词的词频进行分析,整合了前 20 个报道高频词(见表 3-14)。以高频词归纳三类媒体报道呈现如下特征:

#### 1. 遣词中性为主,慎用负面词语

从词语的感情色彩来看,三类媒体几乎都采用客观陈述事实的中性词,在情

感导向方面以稳定大局为主导方向。体现在行为动词的选用上：接种、生产、预防、反应、调查、进行及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能够客观地传达疫苗事件的实情、进展给受众，抑制社会负面情绪、恐慌心理等的蔓延。但报道中如果中性词过度，缺乏情感类词语修饰，会让读者感觉冰冷，缺乏人情味。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媒体如果缺乏对民众主体的情绪关照，在社会创伤的安抚方面就会失去态度和温度。此外，媒体使用负面词语较为慎重，排名前 20 的高频词只有“死亡”一词。媒体控制负面话语可使报道框架趋向客观、平衡，同时也能把控社会恐慌情绪的扩散，及时达到舆情降温的效果。少数充斥着强烈感情色彩词汇的报道实属例外，如《追责疫苗造假还须多问几个为什么》一文对企业造假发出严厉的道德质疑，使用“胆大包天”、“伤天害理”、“草菅人命”、“无底线”、“丑闻”、“漏洞”、“恶劣”等一系列贬义词，批判立场旗帜鲜明（《羊城晚报》2018.7.17）。

## 2. 聚焦政府反应，追责涉事企业

从词语涉及的问题指向来看，如：疫苗、乙肝、药品、问题、国家、中心、公司、企业、记者、部门、事件。媒体主要围绕涉事企业作为报道主体，就疫苗安全问题、事件调查进展、国家卫生部门执法情况、政策法规、涉事企业处罚力度等备受关注的视角进行报道。三类媒体在报道涉事企业时，几乎都形成了一套新闻生产流程，即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公布调查进展——交由执法部门进行处罚——涉事企业重整或破产。如《山东问题疫苗后，药品流通领域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一文，批评企业“潜规则”，揭露药品流通中的“利益链”，肯定政府严打的“风暴”，并对“两票制”能否彻底斩断利益链发出疑问。（《南方都市报》2016.6.1）

表 3-14 三类媒体报道文本的前 20 高频词

序号	词语	计数	加权百分比 (%)	序号	词语	计数	加权百分比 (%)
1	疫苗	7987	4.40	11	预防	767	0.42
2	接种	2767	1.53	12	反应	764	0.42
3	乙肝	1385	0.76	13	调查	756	0.42
4	生产	1348	0.74	14	进行	745	0.41
5	药品	1115	0.61	15	记者	636	0.35
6	问题	1021	0.56	16	死亡	632	0.32
7	国家	943	0.52	17	使用	579	0.32
8	中心	868	0.48	18	部门	579	0.32
9	公司	835	0.46	19	事件	569	0.31

10	企业	788	0.43	20	生物	562	0.31
----	----	-----	------	----	----	-----	------

#### (四) 媒介框架提炼

界定问题、找出问题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追究责任于行为者并提供道德评价，被称为框架的四个功能。为了完成这些功能，框架借鉴了任何给定文化中流行的思想、价值观和规范。这意味着“框架是受文化约束的。”<sup>325</sup>媒体人的工作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对事实进行报道叙事，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特定的框架来简化或赋予事件意义，并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介框架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解读模式，“使受众能够感知、组织和理解当中的信息。”<sup>326</sup>如果“公众对健康风险知之甚少，那么在媒体报道中通常会采用不确定性框架。”<sup>327</sup>学者 Valkenburg、Semetko 与 De Vreese 认为，新闻报道至少存在四种框架模式：“冲突框架（conflict frame）、人情味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责任框架（responsibility frame）及经济效果框架（economic consequences frame）”<sup>328</sup>（见表 3-15）。

表 3-15 新闻框架类型及其含义

框架类型	具体含义
冲突框架	强调个人、团体或机构之间的冲突
人情味框架	以个人为事例或强调情感
责任框架	将问题归咎于个人、团体、组织或政府的责任
经济效果框架	关注事件或问题对个人、群体、机构或国家的经济影响

三类媒体在疫苗事件报道中，运用最频繁的框架为责任框架。媒体从“政府发声及回应”、“本省疫苗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调查进展”、“补救措施”等角度出发，强调了政府妥善处理疫苗事件的责任，包括展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事件处理，中央政府积极跟进事态，同时地方政府也在排除疫苗事件对当地的风险等责任举措。如《山西疫苗事件务请媒体追问到底》一文中，记者反思疫苗事件的处理方式，指出：“媒体的责任就是呈现真相；只有全部的真相呈现在民众面前，民众才能感到踏实、安全。”（《南方都市报》2010.3.20）“涉事企业情况”的报道角度，媒体则提及企业在生产、管理疫苗等方面对民众负有的责任，包括涉事企业未来整改等举措也被媒体包含在责任框架之内。

媒体较少运用冲突框架和人情味框架。前者通常与“疫苗争论”的报道角度结合，总体报道篇目较少（9 篇）。媒体运用冲突框架展现了民众对疫苗暂时失

去信心，而相关专家、机构则建议民众不能“因噎废食”等疫苗接种意愿冲突；而后者见诸于“民众意见”报道视角，此类框架报道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较模糊，通常只以群体形象示人。党媒重视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舆论导向，刻意淡化民众意见冲突，突出民众关注的事件焦点，引导公众思索疫苗解决方案而转移个人遭遇的悲情色彩。如媒体通常将报道焦点聚集在相关涉事的孩子家长身上，反映民众对疫苗的看法，对疫苗渐复信心、要求政府加强监管等社会心态。以体现媒体人文关怀，重塑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整个国家医疗体系的信任。如《社论公开异常反应信息，重建疫苗社会信任》一文指出，“疫苗的安全与否依赖的是科学、专业的分析与判断，掌握科技资源和检测职能的政府格外重要。只有以信息公开促进社会信任才能确保中国公共卫生的安全。”（《南方都市报》2014.1.6）

疫苗事件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故三类媒体均未采用“经济效果框架”，而以安抚、疏导民众情绪为首要任务。因此，常用“专家答疑”和“疫苗科普”视角体现医疗卫生领域专家、组织对民众的责任。由此，不难看出，媒体以医学专家的答疑试图减缓疫苗事件对群体恐慌、抗拒疫苗接种等心理的贡献，从而也建构起媒体在普及疫苗相关知识，重塑民众信心等方面的努力，属于信息补偿框架。如《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解答疫苗接种有关问题》对疫苗接种的年龄、剂次、规格等问题做了详细的报道。（《光明日报》2018.7.27）信息补偿框架在中西方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西方媒体也常用此框架缓解民众的焦虑与恐慌情绪。分析结果显示，中央级媒体在疫苗科普方面的报道极少，专家答疑的报道仅3篇。事发地媒体在通稿压力下，努力尝试开辟新路径，以更多元的视角呈现疫情（“疫苗科普”视角23篇）。科普意义不言而喻，民众医疗知识匮乏容易导致认知失调，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易陷入被动、盲目的群体恐慌中。

Gandy创造了信息补贴概念，用于“描述对信息和材料的受控访问，而这对接收者而言几乎是不费力气的。”<sup>329</sup>本质上，信息补贴是框架产品。“尽管信息补贴减轻了记者收集信息的负担并缩短了发布时间，但记者知道信息缺乏客观性和平衡性。”<sup>330</sup>作为活跃的信息策划者，记者如何使用这种框架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新闻报道的动态。特别是在疾病大流行的情况下，这种大流行的特点是紧迫性，不确定性，缺乏信息来源以及政府信息的权威性。由于其“信誉和权威性，政府和官方资源是最重要的信息补贴。”<sup>331</sup>这是本文根据报道视角提出的一

个框架。从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医学素养来看，亟需媒体普及常识，增强民众对医学的认知，增进民众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见表 3-16）。

表 3-16 三类媒体的新闻框架类型及报道视角

框架类型	报道视角
冲突框架	疫苗争论
人情味框架	民众意见、补救措施
责任框架	政府发声及回应、涉事企业情况本省疫苗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调查进展
信息补偿框架	专家答疑、疫苗科普

#### 四、我国公共卫生议题报道的平衡策略

笔者以质化分析方法探讨了在健康风险传播时代，公共卫生议题在能见度极高的环境下主流媒体对疫苗事件的媒体呈现。以“框架分析”视野中的多维框架研究架构为理论基础，发现我国主流媒体的公共卫生安全议题报道，主要采用责任框架、信息补偿框架。鲜用人情框架与冲突框架。不同类别的媒体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框架呈现存在差异。中央级媒体倾向于采用权威机构的信源，以问责、颁布政策、法规、完善制度等报道视角。南方系媒体以专业主义媒体精神审视、探究、追问、追溯、反思等视角。事发地媒体多为贯彻中央指令、政府部署以及查处、问责、科普、答疑等方式呈现。结合近期新冠病毒疫情来看，媒体框架议程的设置已远远超越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社会功能，还有监督政府管理效能、城市综合治理、医疗体系完善与否等监督功能，更有科普知识的教育功能。综上所述，主流媒体在公共卫生议题的框架设置上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 （1）媒体报道框架应多元、应充分考虑公众信息诉求

疫苗安全问题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儿童的健康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保证儿童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事关家庭、社会、国家的稳定和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由于中国研制疫苗的历史较短，公共健康体系与政策尚待完善。主流媒体对疫苗事件的建构多为责任框架，责备涉事企业、追问管理制度，对疫苗整个生产流程及管理科普的报道较少。公众对相关医学的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公众容易面对突发事件时失去理性判断。而媒体鲜有历史纵深的回顾性报道、中外疫苗安全问题对比报道以及对疫苗安全保障体制的探索性报道。

南方系媒体更倾向关注疫苗的人情味框架、信息补偿框架。问责与科普并重，对疫苗安全导致的社会恐慌提出建设性意见。如《山西疫苗事件质疑与回应》指出，个人对健康信息的理解有所不同，健康信息强调了行为选择的成本与收益。解决不采取行动的代价的消息被标记为损失框架消息，而解决采取行动的收益的消息被标记为收益框架消息。（《南方都市报》2010.3.21）事发地媒体更关注从事故中汲取教训，提升民众的医学素养。因此，科普和专家答疑的信息补偿框架采用最多。人们通常在“面对损失的信息时会更倾向于寻求风险，而在面对某种行为的积极后果时往往更倾向于规避风险。”<sup>332</sup>对健康交流的研究表明：消息框架“可以在塑造人们做出特定健康行为的决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up>333</sup>在健康交流领域，风险披露是指“向患者提供重要的风险信息，使他们能够做出接受或拒绝侵入性医疗干预措施或服用潜在有害药物的相关决定。”<sup>334</sup>可见，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应充分考虑公众的信息诉求。

## （2）媒体应重视公共卫生与其他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性

在医学社会性基础上，公共健康不仅是一个关于卫生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中国疫苗研制方兴未艾，未来还需要公众的支持才能继续探索更长远的路径。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历过的疫苗安全问题比我国遇到的问题还多。诚然，在多元价值的社会环境下，公众的疫苗接种选择是自由的。但公众倾向于国外疫苗接种的意愿一旦发展成为趋势，疫苗接种就会逐步演化成为阶层分化的标志。经济富裕阶层选择国外进口疫苗；经济贫困家庭选择免费的国产疫苗。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将会衍生出群体不满情绪，继而演变为对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的不信任心态，不利于我国疫苗事业的研制与开发。社会不信任导致的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即使疫苗接种保持较高的免疫率，但人们仍然“担心疫苗的潜在副作用。”<sup>335</sup>“即使接种了疫苗的人也对疫苗的安全性表示怀疑和担忧。”<sup>336</sup>因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延迟或拒绝接种建议接种疫苗。作为主流媒体，应将医疗知识科普教育纳入常态化教育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民众普遍的医学素养离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关于病毒的各种谣言加剧群体恐慌情绪的蔓延。风险性增强是群体恐慌产生的客观原因。人类挑战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在实践中威胁自身生存安全。疫情爆发引起的群体性恐慌源自公众对风险社会的认知失调。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指出，风险已从不可估量的危害的潜在影响演变为社会不确定性的更广泛观念。风险“特别容易受到社会定义和构建的影响。”<sup>337</sup>公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与医学常识极其有限。通过阅读病毒有关的医学信息；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朋友/家人交谈和在线搜索信息。这些都仅限于事后补救式的恶补信息，极少有人防范了类似的社会风险，在信息搜索中也存在信息素养差异化导致的信任搜集与辨识能力的偏差。对谣言的误解、误判导致的过度恐慌等问题。因此，媒体在预测性报道中应充分考虑公共卫生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如风险防控、社会公平、民众心理等问题。

### （3）传统媒体应与互联网信息形成互补的传播模式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寻找与健康相关信息的主要媒体渠道。“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sup>338</sup>大多数寻求健康信息的在线访问用户生成的内容，如在线新闻组和公众号。在线材料提供了与健康相关的潜在危险建议。

<sup>339</sup>疫苗预防接种运动已经利用互联网作为通过廉价手段向大量人传播信息的场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互联网和在线用户生成的内容，以获取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在接受新疫苗时，人们特别容易受到在线抗疫苗信息的影响，因为他们对这些疫苗知之甚少，并且相当不确定。如果政府不强制接种疫苗，是否接受疫苗将由个人决定，这将使在线误导性信息更有可能影响疫苗的使用。尤其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往往更愿意求助于一些互联网公众号，在线获取信息。

在新冠病毒事件中，人们对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依赖超过以往任何事件中对互联网的使用。医学科普知识点的公众号——丁香医生影响着公众对新冠病毒相关风险感知和决策的见解。主流媒体应关注：哪些社会人口群体更可能接触或查找此类公众号？哪些心理因素是寻找抗疫情公众号的最佳预测因素？这些公众号具有什么内容和结构特征，了解这些问题将为以后的病毒研究提供有用的方向，这些研究旨在评估医学类科普公众号在疫情风险交流领域的影响。随着人们在线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健康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员需要超越简单地监视有关疫情信息的范围，并着手评估这些信息的后果。用户生成的内容在影响与疫情相关的风险感知、态度和行为意图方面的作用。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展示科学的病毒信息，并在线对抗误导性但功能强大的抗病毒信息，对于最大化公共卫生健康保护潜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 Web 2.0 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非常需要系统地解释在

线疫情信息暴露对公共卫生相关决策的影响研究。

#### （4）合理引导舆论，避免媒介恐慌导致舆论偏见

媒体在向受众宣传健康风险和突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性质的媒体因舆论导向偏差而对社会影响不同。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依然发挥着正面、积极的引导作用。偶尔批评，也是建设性意见居多。然而，互联网传播语境下，自媒体商业属性决定其舆论引导偏向，未必对传染病报道给予积极评价，反而经常引起恐慌。如媒体框架中的要素——信源，通过推测或强调某人或某事而不确认这一点，即猜测或误报。信源权威、清晰，就能降低公众恐慌情绪；反之，信源模糊，且不够权威，报道以揣测、推理为逻辑，就会加剧公众恐慌。如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报道猜测和误报引起了公众恐慌。<sup>340</sup>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由于病毒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破坏力，自媒体报道信源五花八门，模糊信源或推理性报道导致虚假信息泛滥，人们面对疫情时往往出现紧张、恐惧、焦虑等情绪。民众淹没在信息海洋中失去理性的判断，陷入群体性恐慌。

### 五、小结

媒体的情绪关键词同样非常重要。这些情绪关键词会刺激公众的敏感神经。如媒体常用责备（贬义）或赞美（褒义）的情绪关键词传播舆论导向。责备重在“探索问题的根源，寻找事件的真相，集中了公众的感知和恐慌。”<sup>341</sup>指责的媒体报道引起公众对特定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和愤怒。因此，媒体报道中存在的责任可能引发愤怒并增加恐慌。如一些自媒体公众号不断以质疑相关研究机构来加剧群体的愤怒和质疑，导致群体恐慌情绪蔓延。反之，赞美个人或集体通过努力控制局势或找到解决方案的特定行动者来减少恐慌。如新冠病毒疫情的报道中，各地驰援武汉和湖北的医务人员报道，以积极的抗疫决心和勇气激励民众，起到了缓解恐慌的效果。总之，媒体的框架设置通过“强调、肯定某方面的重要意义，否定其他方面的作用而引导公众的认知判断，从而加剧或缓解恐慌。”<sup>342</sup>媒体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强调解决方案及控制健康危机的努力来减少恐慌。如对世界各国的疫情报道，我国党媒的报道视角较为单一。一些自媒体缺乏公共媒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以流量和营利为目的，热衷于迎合特定群体的信息需求，缺乏真实、客观地呈现他国在抗疫过程中的先进做法而误导民众。因此，主流媒体应从民众信息需求出发，客观、多元地设置报道框架，避免媒介恐慌导致舆论偏见。

一切媒介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完全透彻的。媒介影响的穿透力极强，无所不在。在个人、政治、经济、审美、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我们的一切方面无不被触及、被影响、被改变。（马歇尔·麦克卢汉）

## 第四章 传播客体维度：群体恐慌的媒介臆想

群体恐慌情绪宣泄很多途径，制作抗疫 Vlog 无疑是宣泄、缓解焦虑、恐慌情绪的一种方式。新冠疫情中，新兴的媒介技术勾连起各种社会群体关于疫情事件的“集体记忆”，通过再现“当时”的景象，生动地还原人们曾经的经历以及刻在记忆中的各种复杂情感，在再现的景观中回味对疫情的想象，从而激起人们的兴奋、悲伤、感动、怜悯等情感，释放了对疫情怀有的恐慌、焦灼情绪。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认为，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

### 第一节 恐慌情绪蔓延：寻找替罪羊、疾病污名

网络舆论影响的日趋扩大使得网络群体情绪研究渐成热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频现网络暴力。以“成都女孩”和“广州阿婆”两个事件为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网络暴力特征。同为女性感染者，“成都女孩”遭到网络暴力；“广州阿婆”却获得网民谅解。运用“猎巫运动”理论来剖析两个案例，笔者发现：“猎巫运动”中对“成都女孩”的鞭挞定罪来自于群体对疾病不洁、道德败坏的关联想象，群体对女孩行踪的符号化解读与刻板思维；“猎巫运动”对“成都女孩”的惩罚来自群体情绪感染下所形成的群体性攻击与网络暴力。

#### 一、“猎巫运动”的内涵

“猎巫运动”起源于 15 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人们认为巫术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威胁，必须予以严厉的镇压和惩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大肆地将许多所谓的“巫师”绑上“道德十字架”，最终遭到迫害。“‘猎巫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女巫的迫害。”<sup>343</sup>此运动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终于在启蒙时代受到自由-理性主义者们的拷问和反思，他们认为“巫术在中世纪是反理性与科学并且为虚无、迷信之物，被当时的教士和教会法庭视为天主教会假借猎

巫之名而实行对大众的迫害，从而强加的‘猎捕罪名’”。<sup>344</sup>在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了对猎巫运动的第二种解释，“把巫术信仰看作是过去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巫师和魔鬼并非是虚幻的，而猎巫运动则是教会和封建统治者对借助巫术信仰来反抗压迫的民众所进行的一种迫害。”<sup>345</sup>再到19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者指出，“女性占遭受迫害的巫师的大部分，在猎巫中，女性则成为了教权与父权统治者加以攻击的对象，而女性原罪的本性是主要原因。”<sup>346</sup>随着20世纪的发展，受到各种思潮和学科的影响，对于猎巫运动的研究视野也得到拓宽，其考察维度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在二战后，猎巫运动研究更是有了跳跃式的发展，英国两位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和诺曼·科恩认为意识形态在猎巫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克里斯蒂娜·拉纳和罗贝尔·穆尚布莱也将文化同化理论运用到猎巫运动研究中。新历史主义和社会性别问题在猎巫运动中的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发展到后来，林姐儿·罗珀、约翰·迪莫斯、罗宾·布里格斯、黛安娜·珀基斯等学者也开始用精神分析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猎物运动。对于猎巫运动的研究，其重点“从注重物质条件与环境之探究，到专注于精神、心态与各种社会关系之考察；从精英作为研究的对象，到社会下层、边缘群体成为考察主体。”<sup>347</sup>

通过梳理和回顾近现代的各种研究，我们发现关于“猎巫运动”的内涵随着其考究领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猎巫运动“找寻替罪羊”这一重要内涵是解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起集体恐慌情绪传播，大众在全球各国掀起猎巫暴力的本质原因。在《圣经》中，亚伯拉罕以羊代子的故事使得古犹太人有了“以羊转罪”的习俗。欧洲之所以会掀起“猎巫狂潮”也是因为当时黑死病流行，人们对于死亡充满集体恐惧，迫切地需要寻找“毒物”的源头，最终找寻女巫作为其“替罪羊”，启动了所谓的“防疫抗灾”的“烧巫程序”。并且通过在大众面前进行“猎巫审批”，可以在仪式化的社会暴力中，“人们藉此克服集体恐惧，并凝聚因恐惧、猜疑而濒于分崩离析的社会群体。”<sup>348</sup>人类在社群性的恐惧中产生群体认同，并对可能携带“病毒”的人进行群体性排斥，甚至是人身攻击。再看新冠病毒爆发初期，群体情绪在恐慌中广泛传播，人类社群会采取封闭而寻求安全感，甚至对部分群体实行“语言暴力”，以此发泄内心的恐惧，无异于是一次新的“猎巫审判”。

在全球化的当下，网络讯息可以实现瞬间传播，在让人们感觉“空间距离”被无限压缩的同时，陌生的“异物恐惧感”也会随即而来。“人们对陌生事物与人群的无知或错误认知，以及因此不能理解与宽容，常因于社会大众普遍对传播媒体的依赖。”<sup>349</sup>大众传播时代，猎巫运动不仅成为人类为群体恐慌“找寻替罪羊”的发泄途径，还是大众媒介依赖使其成为群体霸凌的工具。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指出，“电视媒体不仅提供娱乐，也将政治、宗教、教育、商业等娱乐化及肤浅化。”<sup>350</sup>社会大众在媒介作用下，出现麻木、思辨性下降的情况，失去敏锐的社会批判意识。大众在“媒介拟态环境”中不愿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思索问题的真相，裹挟在群体无意识的情感氛围中，形成“找寻替罪羊”的群体想象。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的，”<sup>351</sup>我们会根据固有经验或者说是固有成见，先入为主地将事物进行划分和定义，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也认为，“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sup>352</sup>因此，当群体关联想象发展到一定程度，猎巫运动的集体性行为在互联网时代造就出新的“网络猎巫暴力”。

## 二、群体情绪传播的数据挖掘与处理

当代媒介具有越来越强的杂合性，人们同时运用文字、声音、图像、身体动作等交错拼接，通过调动情绪情感，使得所传达的观念和意义更容易被接受。

###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试图探究2020-2021年疫情期间影响力较大的“成都确诊女孩”事件及“广州确诊郭阿婆”事件网络舆论的差异性。本研究通过后羿采集器以及八爪鱼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选择“新浪微博”与“哔哩哔哩弹幕网”为媒介来源。选择这两个平台的原因一是这两个平台日活用户量与用户活跃度高，二是在地域分布上较为广泛，样本具有代表性。在对“成都确诊女孩”事件的相关评论采集中，以事件首次通报的2020年12月8日到事件舆情逐渐衰退的2021年2月18日为区间，时间周期共75天；与“广州郭阿婆”事件相关评论的采集时间区间为2021年5月21日至2021年8月6日，时间周期是77天。

### （二）数据预处理

数据采集过程中，在两个平台上使用事件相关关键词与热搜话题并筛选时间

区间进行搜索，爬取事件相关内容的一级评论文本。在爬取初步数据后，我们构建数据表对评论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和存储，主要包括发布内容用户昵称、评论用户昵称、评论内容、发表时间、点赞量等数据。在获得初步数据后，我们经过二次检索，剔除空白、表情以及重复等无效字符等数据清洗操作，最终得到 12789 条评论，其中“成都确诊女孩”事件有效评论为 9814 条，“广州确诊阿婆”事件有效评论 2974 条。将经过数据清洗的数据导入到 Divominer 平台，使用 Divominer 中文分词系统对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分词后的结果使用 Divominer 情感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与编码。

对微博、B 站中的疫情传播信息贴进行爬取，构建数据表对评论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和存储，主要包含发布文章（视频）内容、发表时间、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评论人、评论内容和评论时间。用户评论分析中，通过 NLPIR 汉语分词系统，将评论文本集合进行分词，然后根据 TextRank 算法根据频率对分出的词语进行排序，共得到 48653 个词语。经过无效字符过滤，去除相同词义词语、虚词、语气词等，移除高频无效词和低频错误词，即在文本集合中出现次数较多但无实际意义的词，如“的”、“等”、“这”等，提取前 500 个高频词作为候选词汇，根据出现频次及语义关联分析，进行属性词语与情绪词语的识别。

### 三、群体情绪传播分析

按照分析思路，本部分将对从“新浪微博”（以下简称微博）、“哔哩哔哩弹幕网”（以下简称 B 站）获取的评论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同时对两项舆情事件的有效评论文本进行词频及情感分析，从而得出关于成都女孩及广州阿婆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特征。

#### 1. 评论时间序列分析

一般来说，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酝酿、发展、高潮和衰退等阶段。以下是以天为单位对微博及 B 站有关“成都女孩”及“广州阿婆”事件的评论数据分析，从而得出日评论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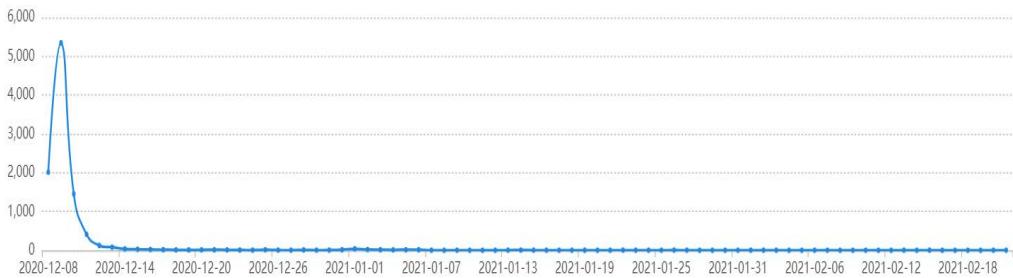


图 4-1 “成都女孩”事件相关评论发布时间序列变化

如图 4-1 显示，从整体来看，“成都女孩”事件在微博及 B 站的网络舆情路径整体呈“倒 V 型”。从舆情开始到完全平息共经过了 75 天，其中变化显著的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到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共 8 日。超过 1000 评论的天数为 3 日，最大评论数为 5400。从事件舆情具体发展阶段看，从 2020 年 12 月 8 日首次有评论发布到 2020 年 12 月 15 日之后事件逐渐平息，重要的时间节点为 12 月 8 日、12 月 9 日及 12 月 10 日。12 月 8 日，事件首度在网络曝光，酝酿期和发展期在短短一天内完成；12 月 9 日，关于“成都女孩”的讨论达到了顶峰，舆情发展进入高潮期；从 12 月 10 日开始，事件热度断崖式下降，舆情发展进入衰退期；到 12 月 15 日，网络舆论场关于该事件的讨论基本归于平静。从“成都女孩”整个事件的舆情演化路径看，基本与传统舆情发展理论中酝酿、发展、高潮、消退的顺序保持一致，但整体演变十分迅速，各个阶段之间的界限分野并不十分清晰，从酝酿到消退，呈现“倍速快进”的发展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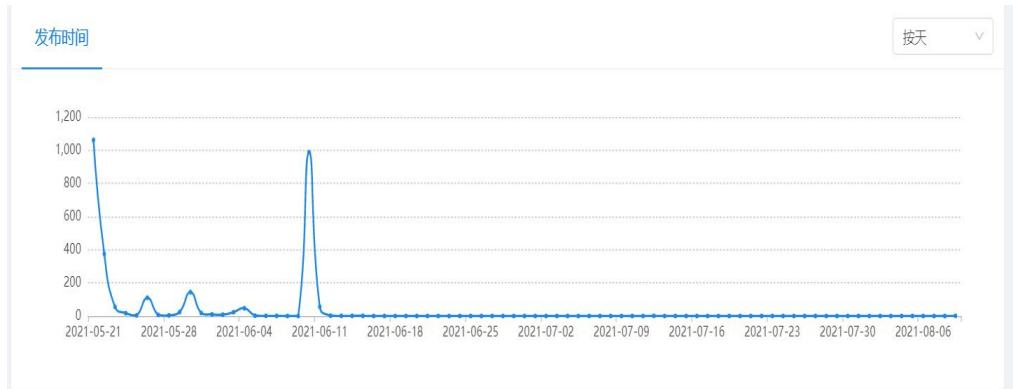


图 4-2 “广州阿婆”事件相关评论发布时间序列变化

图 4-2 为“广州阿婆”事件相关评论发布时间序列变化。整体上，“广州阿婆”网络舆情从发生到平息共经历 77 天，其中变化显著的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到 2021 年 6 月 12 日，共 23 天，整体的舆情变化路径呈现波形。超过 1000 评论

的天数为 2 日，最大评论数为 1080。

从舆情的具体发展阶段看，广州阿婆事件网络舆情发展呈现出“双顶点”形态。2021年5月21日，广州市荔湾区报告某郭姓阿婆感染印度变异新冠病毒，关于该事件的评论随即突破1000，随后事件舆情进入波动期，从2021年5月22日到2021年6月9日，相关评论形成了两个“小高峰”，但总体发展态势较为平稳。2021年6月10日，广州郭阿婆出院，新浪微博话题#广州郭阿婆称每天都想去饮茶#、#广州郭阿婆与医护相约得闲饮茶#等成为热点话题，相关评论数量达到第二个高峰。2021年6月11日之后，该事件舆情进入了最终衰退阶段，没有再产生其他评论峰值。

将“成都女孩”和“广州阿婆”两个舆情事件的演化路径放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整体上，“成都女孩”的舆情热度更高，评论数量峰值是“广州阿婆”事件的五倍，但整体持续时间更短，其舆情演化路径基本遵循了从酝酿到衰退的四个步骤。“广州阿婆”舆情事件则围绕着不同衍生话题产生了两个评论高峰，体现出同一关键词不同话题的特点，整体持续时间为“成都女孩”舆情事件的四倍。

## 2. 评论文本词频分析

词频分析是一种对文本资料中重要词汇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分析的研究手段，其原理是通过词频来确定热点及其变化趋势。词频分析也能应用于网络舆情相关研究，评论文本中的高频词汇能够有效反映出网民针对某一社会热点的观点、态度与立场。新浪微博和哔哩哔哩弹幕网作为当下用户日活较高，用户分布范围较广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及视频平台，其用户发布的评论对整体的互联网意见生态有较高的代表性。图 4-3 及图 4-4 分别为“成都女孩”事件和“广州阿婆”事件微博及 B 站相关评论 TOP100 词频可视化词云图，出现频次越多则字体越大。



图 4-3 “成都女孩”事件评论可视化词云图

词云



图 4-4 “广州阿婆”事件评论可视化词云图

在“成都女孩”事件评论中，词频在 500 以上的词按照出现次数依次为“酒吧”、“不是”、“成都”、“自己”。除此之外，词频出现 100 次及以上的词语（见表 4-1）。观察两个平台的评论文本高频词，可以发现针对“成都女孩”事件，网络舆情体现出一定的观点分化趋向。一方面，“加油”、“早日康复”、“好女孩”等词分别出现了 497、181、169 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舆论环境中倾向鼓励、祝福的一面；另一方面，“道歉”、“受害者”、“敌人”等倾向归责与攻击的词汇也分别出现了 266、254、145 次；同时，描述客观情况的“疫情”、“病毒”、“确诊”等词分别出现 327、278、242 次，体现了网民对疫情状况本身的关注。

表 4-1 成都女孩事件评论文本词频 100 以上的词语列表

属性	出现频次	属性	出现频次	属性	出现频次
酒吧	764	希望	230	已经	133
不是	667	感染	218	配合	133
成都	557	评论	206	防疫	133
自己	509	出来	194	真是	133
加油	497	生活	194	暴力	121
没有	448	时候	181	夜店	121
知道	412	早日康复	181	微博	121
真的	400	网友	169	同事	121
应该	376	好女孩	169	他人	121
口罩	363	正常	157	隐私	121
疫情	327	为什么	157	确实	121
信息	327	检测	157	因为	121
女孩	315	有点	145	曝光	109
人家	303	不要	145	媒体	109
病毒	278	不能	145	可怕	109

网络	266	社会	145	键盘	109
道歉	266	他们	145		
受害者	254	影响	145		
确诊	242	敌人	145		
如果	230	公布	133		
奶奶	230	泄露	133		

在“广州阿婆”事件中，词频超过 50 的词为“广州”、“阿婆”、“饮茶”。词频超过 50 的词（见表 4-2）。整体来看，在“广州阿婆”事件中，评论高频词体现出相对轻松的偏向，值得注意的是，“早茶”、“饮茶”这两个体现广州生活方式的词语分别出现 169、80 次，高于严肃议题如“疫苗”、“疫情”。

表 4-2 广州阿婆事件评论文本词频 50 以上的词语列表

属性	出现频次	属性	出现频次	属性	出现频次
广州	246	疫情	73	恭喜	51
阿婆	227	希望	62	早日康复	51
饮茶	169	得闲	62		
评论	88	哈哈哈	55		
早茶	80	可以	55		
疫苗	80	出院	55		

### 3. 评论文本情感分析

文本情感分析是对具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通过文本情感分析，可以了解大众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事物的基本观点与情感。对“成都女孩”事件中的 9814 条评论、“广州阿婆”事件中的 2974 条评论分别进行情感极性分析。计算分析后发现，关于“成都女孩”事件的评论中，正面倾向的为 3078 条，占 31.4%；中立的为 1491 条，占 15.2%；负面倾向的为 5245 条，占 53.4%（见图 4-5）。可见，网民针对“成都女孩”事件的评论以负面倾向为主，其比值超过 50%。



图 4-5 “成都女孩”事件评论情绪倾向分布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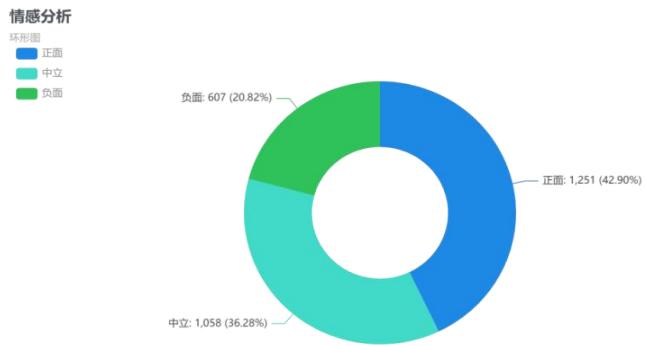


图 4-6 “广州阿婆”事件评论情绪倾向分布对比

关于“广州阿婆”事件的评论中，正面倾向的为 1251 条，占 42.9%；中立的为 1058 条，占 36.28%；负面倾向的为 607 条，占 20.82%（见图 4-6）。可见，网民针对“广州阿婆”事件的评论以正面及中立倾向为主。

#### 四、“猎巫运动”视角下的群体情绪恐慌

##### （一）“猎巫运动”的罪：疾病与不洁、道德败坏的关联想象

疾病隐喻的性别歧视由来已久，史书记载，每个时代对疾病道德恐慌的描述不尽相同，但一直延续至今，让人们形成了对疾病的污名化想象。“如麻风就引起普遍大众的焦虑、恐慌和嫌恶。被视为道德败坏之人的疾病，耽于肉欲，生活没有节制。”<sup>353</sup>在这两个案例中，笔者发现，网民对成都女孩的责备、责骂、辱骂更多，理由主要是“带着病毒到处跑”，撒播病毒，伤及他人。如抨击她故意撒播病毒，“她说她是乱逛的，她可不是乱逛的啊，酒吧夜店，都是人多地方，她是有备而来。我劝，这位小姑娘，要耗子尾汁，好好反思，不要再逛这样的酒吧，小酒吧啊。”<sup>354</sup>甚至有网民将女孩去的酒吧联系为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网络上充斥着如下言论：“我真的觉得常去夜店的不是啥好人，周围泡夜店的大多私生活混乱，但是他们一般不承认都说自己去放松。”<sup>355</sup>“一个 20 岁女的一晚上跑 4 个夜场，至于干什么的不敢想象。”<sup>356</sup>而反观广州阿婆，网民更多的是将阿婆与早茶、广州美食联系在一起，不仅没有泼脏水，反而充满温情的关怀老人，关注阿婆的健康状况，发布祝福阿婆的信息。“祝郭婆婆早日出院，等得闲无事再约过饮茶好彩婆婆及时就医发现得早。”<sup>357</sup>甚至因此调侃阿婆没有选择的茶楼，“看到没有，广州人喝茶都不去点都德。”<sup>358</sup>

网民态度之所以截然相反，一是对涉事主体的道德审判不同。一个是年轻女孩，一个是年迈阿婆。从道德文化角度来看，人们更倾向于“原谅”长者、弱者，

容易对年轻女孩架上道德审判的枷锁。毕竟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们通过低成本展现自我品德的方式。“基于对社会弱者的同情，一些社会公众声援弱者，并因此获得一种使命感与道德感。”<sup>359</sup>广州阿婆作为一位老者，人们通过对她的关心和包容，从而展现自我道德修养，同时社会的从众心理会驱使部分认同在群体感染中呈现群体大协同，如同前文对于广州阿婆案例的情感分析结果，正面和中立的评论是占据大多数。而对比成都女孩事件，年轻女孩的社会身份有所不同，其代表了被贴上“个性”、“潮流”、“疯狂”、“标新立异”等标签的新时代年轻人，与人们心中对于这类群体想象的“年轻人更会玩，更疯狂”的刻板印象不谋而合。

同时，新媒介和新传播语境的发展也将人类带到温伯格所言的“大到不可知”的网络世界中，学者胡泳认为其呈现两大特征，分别是“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和“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sup>360</sup>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化世界中有自己的“真相”，于是受众根据群体的固有印象贴上相对应的“人设标签”，既可能是体现对于弱者的人文关怀，也是在媒介舆论场中开启一场全新的“猎巫运动”，凭借自己认定的“真相”，将一位年轻女孩架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利用群体舆论实行“猎巫暴力”。而这也与疫情带来的群体恐慌的社会背景以及“猎巫运动”的本质内涵相契合。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受到疫情的影响，新冠病毒为群体带来日积月累的危机感，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只“替罪羊”，为一直持续的疫情防控寻找“携带毒的女巫”，更为群体情绪的恐慌寻求宣泄的出口，显然成都女孩事件是一个新的媒介出口。

二是对地域符号化解读不同。女孩一夜去多个夜场，容易让人们联想为私生活混乱，戴上道德锁链。加之，疾病的刻板成见与道德不洁相关联，极易让人们对于女孩进行道德审判。阿婆去的地方都是茶楼等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不带道德不洁的痕迹。因此，更容易被人们谅解。在公布女孩和阿婆的行踪轨迹前，主体不同带来的固有印象会让大众对于其行为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加之人们对地域的刻板印象，会进一步巩固对女孩的成见，从而将其选为“猎巫”对象。

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中引用“刻板印象”一词，“用以解释人们对世界的错误观念和偏见，指那些事实上不正确的、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sup>361</sup>从而“首次将该词从印刷技术领域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sup>362</sup>人们对于“夜店”、“酒吧”等地域场所本身就带有偏见，这些特定地域被标签化、符号化，与疾病、不洁甚至是道德败坏等成见挂钩，这让不明真相的人对此感到

恐惧。女孩和阿婆在无症状感染之后，都曾出入多个人群密集的场所。从公众舆论的情感态度来看，人们更倾向于攻击女孩出入多家“夜店”，甚至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将女孩的形象污名化，“公众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经常无视特定人群正面的东西，只关注负面的东西，甚至夸大、捏造负面的东西，这导致特定人群形象污名化甚至妖魔化。”<sup>363</sup>因此，大众从女孩的行踪轨迹就将疫情爆发的矛头直指其不洁、道德败坏的品质问题，在极端化、一边倒的公众舆论中形成群体性的关联想象。而阿婆的行踪更多是“茶楼”等饮食场所，这在大众的认知中是正常的，是可以被接受和谅解的，所以“猎巫”矛头对准的是象征疾病传染、道德不洁的“夜店女孩”，而不是象征着美味佳肴、休闲娱乐的“茶楼阿婆”。可见，地域文化符号对人们的恐慌情绪也有一定的影响。

## （二）“猎巫运动”的罚：群体感染下的网络暴力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在某个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带着一股令人无法招架的狂热而完成某些行为。”<sup>364</sup>显然，裹挟在网民群体的讨伐声浪潮中，多数网民也失去理性判断，纷纷表达从众的观点，对成都女孩口诛笔伐，理性的声音淹没在网络暴力洪流中。“微观的个体，强调其易受群体心理和群体情绪影响，进而做出非理性的暴力行为。”<sup>365</sup>在群体影响下，个体声音汇入在大众舆论的漩涡中，很多群众只是抱着“吃瓜心态”，并未真正了解事件原貌，而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在“猎巫运动”造就的谣言中一步步将舆论推向高潮，也让“成都女孩”成为网络暴力下遭遇迫害的“替罪羊”。尽管一片抨击声浪中也不乏偶有理性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还是太小，以致于完全不能感染网民群体，“哪些人格足够强大因而本可以抵御暗示的人，由于势单力薄而无法抵抗潮流。他们顶多试着用另一个不同的暗示，来使群体分散注意力。”<sup>366</sup>

在“成都女孩”事件“猎巫运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勒庞所说的“群体感染”现象，互联网的舆论会迅速聚集起一群所谓“声张正义”的“好事之徒”，他们试图为疫情下的恐慌搜索一位合适的“女巫代言人”，并试图裹挟其他的个体。“一旦网民被裹挟进来，个体参与到这样的群体中并且获得认同的快感，容易抵消反思和内疚，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施暴。”<sup>367</sup>“成都女孩”和“广州阿婆”都是在无症状感染的情况下，无意识地将病毒进行传播，古言“不知者无罪”，广州阿婆得到了众人的谅解，但女孩却是获得了一场如同“猎巫运动”下的惩罚，大多数人在群体感染中对其进行网络施暴，其在“乌合之众”的同质化中丧失了独立意识，将对疫情的群体恐慌情绪转化为对女孩道德审判的悲愤情绪。正如勒

庞所说，“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集合行为中的暗示更接近催眠。集合行为的参与者通常处于昂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现为一味的盲信盲从。”<sup>368</sup>

古老的“猎巫运动”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迷信甚至是荒谬的“找寻替罪羊”的暴行。时至今日，“新冠病毒”被赋予了道德、文化、群体偏见的联想，更在网络媒介中施行更为惨重的暴力行径，人们对新冠病毒的群体恐惧在各种联想和感染中，发生类似成都女孩遭受排斥、辱骂的替罪羊现象。其背后成因既是源于“猎巫运动”的罪，其群体关联想象下对于女孩的“定罪”：疾病与不洁、道德败坏，在网络媒介中施行“猎巫运动”对于女孩的“刑罚”：群体性攻击和网络舆论暴力。透过“猎巫运动”视角对比成都女孩和广州阿婆两个事件中网民截然不同的“审判态度”，公众因疫情而长期难以缓解的群体性低潮情绪，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个出口，所以基于涉事主体、根源性的社会偏见，以及群体感染下的“狂欢”，致使他们选择女孩作为媒介平台宣泄的对象，“网络群体极化事件既是一个引发群体亢奋和群体狂热的诱因，同时也是群体情绪的‘减压阀’，为疏解和宣泄网民浮躁、焦虑情绪提供通道。”<sup>369</sup>在群体极化的情况下，疫情背景下的替罪羊女孩也将猎巫运动的内涵体现得淋漓尽致。

## 五、小结

“猎巫运动”视角下，通过“成都女孩”、“广州阿婆”两个事件的大众评论分析结果来看，充斥着对于性别偏见、道德绑架，甚至在群体狂欢中造就一场网络暴力。其成因：一是群体因“外界之毒”形成了情绪恐慌，根据自己所谓的“真相”进行道德审判，寻求“替罪羊”作为其“防疫抗灾”的良药；二是猎巫运动的本质体现了大众的群体盲目和公共舆论的风险和危害。从个例的差异性出发，延伸至当下的全球化背景，某些不怀好意的政客，尝试利用“猎巫运动”的“寻找替罪羊”心理和群体恐慌情绪，以性别偏见、道德文化、群体性质等诱因刺激大众，从而为别国定罪，并在群体感染中进行“网络猎巫暴力”，试图阻碍别国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

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结果，如同“放大镜”将全球化必然趋势进一步展示在世人面前，在此背景上，“昔日由霸权国主导的超级全球化将面临实质意义上的终结，与此相对应，以多元化、慢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将会产生。”<sup>370</sup>欧洲的“黑死病”造就了“猎巫运动”，让更多学者在探究运动之下的真正成因，瘟疫促使人类去思考：其群体情绪造就的罪罚的弊端，以及人类应该

如何拯救自身？同样地，在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病毒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对疾病的群体恐惧本身究竟又可能带来什么新的“病毒”，又将如何被利用造就新的“猎巫运动”，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中特别强调，“当危险伴随着政治无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包含着一个固有的成为替罪羊社会（scapegoat society）的倾向：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sup>371</sup>

面对全球化的风险和媒介权力下的当下，人类应该如何应对？福柯的权力主体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福柯认为，处于权力关系场域的主体不再是“无助地臣服于固定不变的权力体系”<sup>372</sup>，有学者提出“福柯的这种‘主体观’不但有助于世界上广大地区走出后殖民主义身份观，而且丰富和重构了后现代视角下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建构与传播框架。”<sup>373</sup>因此，主体本身应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构建微观、动态的作用开始，从而回归本质去看待“猎巫运动”视角下给予我们对于群体情绪传播的思考。

其一，警惕群体情绪的煽动性。网络造势的传播环境，极易利用“猎巫心理”将其个人意志削弱，强化群体盲目性，应当从自身做起，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增强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在“一边倒”的网络舆论中坚持己见，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不妄加评判、坚持事实求是的“微光”也会在开放、自由的网络环境打破“沉默的螺旋”，终将照亮“网络暴力”这片阴霾。

其二，警惕虚拟环境的“真相”。信息爆炸时代，某些发达国家试图利用舆论压力制造群体恐慌，捏造“真相”，大肆宣扬别国“崩溃论”和“威胁论”。将网络暴力从个人上升到国家层面。对此，我们需要制止猎巫暴力的行径，需要人们遵守法制法规，更需要警惕网络世界的谣言，防止在极端情绪中进行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迈出“猎巫运动”的视角，由群体对疫情恐慌情绪为起点，以群体对“替罪羊”的泄愤情绪传播作为落点的循环，才能客观、冷静地应对全球化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富强之伟大蓝图。

## 第二节 恐慌记忆形成：群体记忆及媒介恐慌臆想

法国学者莫伊西指出，恐惧是“一种面对即将到来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夸大的危险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sup>374</sup>恐惧导致防御性的反应，揭示并反映出一个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身份，及其在某个特定时刻的脆弱性。

### 一、集体记忆及问题缘起

西方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了对“记忆”的研究，中国学界则在21世纪后才开始对“记忆”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集体记忆理论源自于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关于“集体记忆”的概念，其理论被学界公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起点。卢梭提出了集体性的概念，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意识”、“集体欢腾”以及“集体记忆”等相关概念，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由社会成员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共同价值评价等而形成的共有思想观念”<sup>375</sup>；“集体欢腾”则是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温床，宗教观念诞生于欢腾本身，因为“惟有集体思想具备这种效力，要创造一个观念的世界，就必须得有一种智力的过度兴奋。”<sup>376</sup>哈布瓦赫对记忆研究的生理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反思与扬弃是他集体记忆的研究起点，他认为是集体记忆使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在常规的实践中保持了新鲜与活力。<sup>377</sup>至此，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概念就产生了。

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额延续性”。<sup>378</sup>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如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sup>379</sup>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在人那里，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象或摹本。它包含着一个创造性的和构造性的过程。”<sup>380</sup>

当前数字化生存已成常态，大众媒介在记忆的储存和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媒介将个人、群体、社会的记忆中介化，通过采集、编码、叙述、储存等一系列过程，完成对集体记忆的建构。<sup>381</sup>在研究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媒介记忆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大众传媒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形塑公众的集体记忆。二是不同的媒介形式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慰安妇”的集体记忆建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而纪录片

《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则以慰安妇为主体，以宏观的表现形式实现了揭露人性之恶。<sup>382</sup>三是媒介记忆是集体记忆承载。作为集体记忆的“刻写者”，媒介记忆书写并储存了集体记忆；摄影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回忆过去的事情或事件，以至于照片常常成为记忆本身的主要标志。<sup>383</sup>

在媒介化环境下，群体间互动传播更加剧对危险的夸大的判断。选择性接触负面信息必然会增加阅读者的心理焦虑，对客观环境的放大威胁的判断。恐惧会误导人，有时还会很严重。恐惧提升焦虑感，至少会让人心不在焉，最坏的情况是它还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选择娱乐信息、轻松幽默又无需动脑的信息会缓解阅读者的心灵负担，使其放松或暂时遗忘客观环境的危险程度。大流行激起人们内心的恐惧，或者说激起人们早已存在的恐惧文化。诚然，恐惧是对过分自信的危险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保护。与此同时，恐惧也有正面刺激作用，如它能够让人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反而让处于十分危险的人获得生存的锻炼。在大流行中，人们在恐惧万分的信息裹挟中，不断寻求健康资讯，增加防疫知识，增强体格锻炼，抵御病毒侵蚀都是积极的生存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公众恐慌、激发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稳定。公众容易出现耗竭感，产生焦虑、愤怒、抑郁、无助的情绪，甚至可能出现行为上的失控。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悲观失望、易激惹、自怨、自责、自卑、自暴自弃、自伤、自杀等心理行为反应。疫情期间，各类网络谣言频繁出现，疫情引发的网络舆情致使网络公共秩序出现混乱，民众对海量信息难以分辨真伪，紧张与焦虑情绪日益加重，网络舆情的峰值波动呈现极化趋势。一些敌对力量恶意发酵争议性话题，试图扰乱国内网络舆情秩序。即使当疫情逐渐消解，缓解。民众依然心有余悸。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体情绪状态如何做分析，笔者通过建立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以获取丰富的访谈记录，力图呈现群体在经历疫情后，回忆当时的情感经历及抗疫体验，还原事件真相和原貌，在媒介传播之中，个体记忆也逐渐建构为集体记忆。访谈目的在于为群体恐慌情绪的分析提供充足的原始资料，在不断比较和概念提取的过程中形成概念范畴和理论，能够较为客观和深入地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中群体情绪如何受到媒介传播的影响，产生恐慌臆想，探讨群体内部相互传播产生的影响。

##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准备 研究过程划分为前期准备、数据处理和研究理论形成 3 个步骤：一是前期准备阶段，通过现象观察提出研究问题，在文献研究后列出访谈所需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情绪传播的半结构化访谈问题大纲。在对受访者进行简要介绍后，将正式访谈记录录音，并完成数据收集工作。二是数据处理阶段，通过转化录音文件进行文字处理，因 MAXQDA 软件能够协助研究人员完成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与呈现，增进质性研究的严谨性和信实度，采用 MAXQDA 2020 对文本资料进行三级编码。三是理论形成阶段，本研究通过软件编码后得到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绪传播的影响因素。在理论初构的基础上，进行饱和度检验得到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运用影响因素范畴矩阵和结构模型方程。

(二) 研究方法 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扎根过程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3 个部分。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多以社会现象和当前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不断的抽象和高度的概括，经过科学、规范的编码过程最终得出经得起检验的理论模型。

研究样本对访谈结果的质量有直接影响。笔者在考虑样本来源时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地域原则：疫情最严重是武汉及湖北地区，选择 3-4 人，有亲历者、有关联亲属在湖北、或曾经旅居湖北一年以上，对其地域文化较为熟悉；疫情常态化的地区——广州，一直都是疫情活跃区域，但抗疫效果佳，民众心态乐观，样本具有可推广性，选择 5-6 个人；疫情最轻微的地区——贵州，抗疫管控非常严格，在此状态下的民众情绪如何也值得关注，样本数 3-5 人。以上对象全是成年人，经历过疫情，居家隔离。

本文在获取研究样本的过程中采取了滚雪球抽样，这是指先随机选择一些被访者并对其实施访问，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属于所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根据所形成的线索选择此后的调查对象。滚雪球抽样往往用于对稀少群体的调查。在滚雪球抽样中，首先选择一组调查单位，对其实施调查之后，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属于研究总体的调查对象，调查人员根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此后的调查。最后获得样本数 13 人。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统计量	频次	比例
性别	男	3 25%

	女	10	75%
学历	大专及以下	1	8%
	本科	4	33%
	硕士	7	50%
	博士	1	8%
职业	医务人员	3	25%
	教师	4	33%
	学生	3	25%
	公务员	2	8%
	媒体	1	8%
	企业	0	0%
	个体工商户	0	0%
年龄	15-25 岁	3	25%
	25-35 岁	2	8%
	35-45 岁	7	58%
	45-55 岁	1	8%
	55-65 岁	0	0%
地区	广州及广东其他地区	7	50%
	贵阳及贵州其他地区	5	42%
	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	1	8%

(三) 访谈资料收集 访谈提纲形成于阅读和整理其他文献的基础上，并在实际采访中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及访谈对象的职业特殊性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以保证采访内容的全面性。访谈形式包括线上语音访谈和面对面访谈两种。每次访谈由研究者对一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约为 40-60 分钟。在采访过程中，对受访者的全部采访过程进行录音并保存，后续进行语音识别，转换为文本后进行分析研究。整理资料后获得 10 万字文本素材。

主要的访谈内容涉及疫情初期的情绪反应、接触媒体是否加剧恐慌情绪、情绪感知、是否影响日常生活、群体情绪感染、风险感知、疫情反复是否加深恐慌、疫情后的心理康复。具体提纲如下：(1) 年龄、性别、学历、地区、家庭结构等基本情况；(2) 对于武汉“封城”的情绪反应；(3) 媒介接触渠道、信息接触频率；(4) 情绪感知：有无恐慌的生理反应；(5) 疫情是否增加日常生活难度，举例说明；(6) 疫情期间如何与家人、朋友、同事信息互动或交流；对于缓解疫情焦虑是否有用；(7) 风险感知：对病毒的认知程度；(8) 疫情反复是否增加对病毒的恐慌情绪；(9) 对中国抗疫行动的整体评价；(10) 疫情结束后的心理变化。为保证受访者理解本次研究问题，笔者在访谈前对访谈目的、内容做一简单介绍，并约定正式访谈时间。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具体情况适当调

节叙述和表达问题的方式，以保证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获取准确有效的访谈结果。本次深度访谈样本总量为 13 人。为了方便样本统计以及保护访谈对象隐私，本研究对访谈对象均予以编码。如首字母 F 表示女性，M 表示慢性，第二字数字表示访谈对象的序号，第三个数字表示访谈对象出生年份，第四个字母为访谈对象姓名首字母，如 F-01-01-CBY 表示：该访谈对象是第一个受访者，是一名出生于 2001 年、姓名缩写为 CBY 的女性。

### 三、影响因素分析

#### 1. 开放式编码

概念是代表资料中所含的思想观念的词语，编码则是从原始资料中提取概念，并在属性和维度上发展这些概念。开放式编码是对本研究中深度访谈内容和田野调查等资料不断进行收集、分析。编码的过程是对收集资料的相似点和差异性进行分类和持续比较，寻找合适的语言——既包括受访者的真实语言的鲜活编码（In Vivo Codes）也包括分析者命名的概念标签贴到分析资料上，再将这些概念按类属（Categories）进一步范畴化。在对 13 名访谈对象的深访内容进行分析，共获得 153 个编码（见图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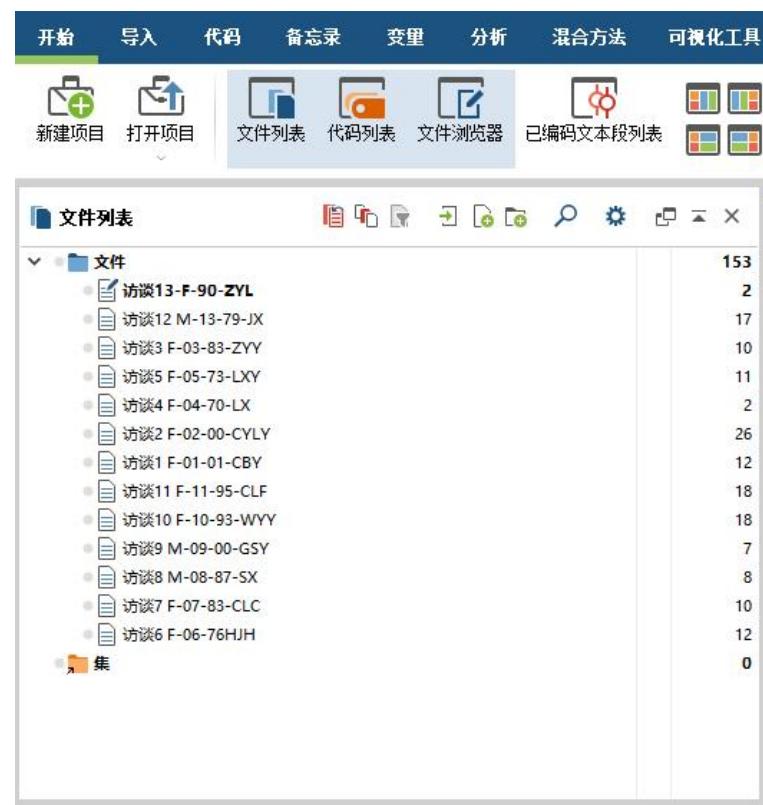


图 4-7 MAXQDA2020 工作界面显示的原始资料及其编码数量

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本研究获得 38 个概念，6 个范畴。表 4-4 将对 12 名受访者的深访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过程及其结果做了具体展示：

表 4-4 开放式编码过程

资料出处	范畴化	概念化	访谈资料举例（贴标签）
F-11-95-CLF		信息需求	其实我觉得好像挺矛盾的，你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一方面你又觉得增加多了一点其他更多的小道消息、更多的信息量好像觉得说有。这就是满足了自己想要去搜索、获得更多信息的一种心理，但是又也会加剧恐慌。
F-11-95-CLF		信息饥渴	它是在告诉你怎么去防范，包括它的传播传染的渠道啥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么容易就会被传染到了，那就会让我很焦虑。比如说像我就是那段时间出去，出去回来就要从头洗到尾全身洗干净。就觉得好像头发都装的都是病毒一样，包括像门把手什么的都要去消毒。因为这些文章他就会跟你说这些东西上面都会附着这种。
F-10-93-WYY		媒体印象	方舱医院是后来的时候因为医院的负荷实在是太大了，像火速建成的雷神山、火神山，这医院的新闻很震惊，新闻上也会有动图，10 天建成一座医院的画面就很震撼了。
F-03-81-ZYY		媒体感染力	我觉得就是当时有一张照片，在隔离仓里，有个人那还躺在里面，拿本书在看，好像是一个博士回来之后被感染了，当时我觉得那张图片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其实人在这个时候其实处于悲观当中，你都应该进行自己该做的生活就尽量去做，也没必要去悲观了。
F-02-00-CYLY	媒体期待	自媒体营销	我不咋看丁香医生，我觉得他就是营销号，营销号我感觉他广告、内容运营的痕迹挺重的，因为我们学新媒体，我一般看官媒比较多，我不爱看那些非官媒的报道，我觉得就是在煽动情绪，写的内容也不是特别真实，就觉得去转发这种情况，特别蠢。
F-03-81-ZYY		媒体公信力	新闻还是以官方媒体为主。再看的时候也没那些恐慌。
F-11-95-CLF		媒介制造恐慌	她还发了方方日记，他们很信方方日记。他们会觉得那才是真实的。那怕她已经被网友质疑说那些都是故事，并不是她亲眼所见，有些是她听到的，有些是她在网上看了别人写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的，连方方自己也承认，有一些并不是他亲眼所见的。可能很多人才都是一知半解，就像我们这种二次接收到信息的人。
F-11-95-CLF		谣言恐慌	大家现在还在谣传，像你二十几岁以为治好，再过 30 年、你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会不会再复发，你会

			不会再复发其他疾病什么。像非典时，很多人治好后得到了后遗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媒介信息的输出所导致大家的一种恐慌
F-02-00-CYLY	管理混乱		那种情绪是很焦虑的嘛，很恐慌焦虑、恐惧，甚至无助，甚至埋怨政府，可能都有。
F-05-73—LXY	奖赏不公		一个叫苏娟的姑娘，确确实实她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她是在里头总督监护室里头担任了很多工作，但是她回到医院以后，因为各种原因，说难听一点就是没背薄（后台），最后她得到待遇是最少。
F-02-00-CYLY	资源不均		湖北的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而且因为武汉被报道多，所以它受到关注也最多，它资源相对来讲也最好。
F-02-00-CYLY	管控难度		国家肯定要管，要管就一定得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疗，我觉得是一次很大的消耗。所以我觉得把防疫措施做到位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F-05-73—LXY	防控艰辛		我们都天天顶班，天天顶了几个月。
F-05-73—LXY	管理形式化		医院管理不合理的地方是处处形式主义。比如你在网上看到哪个地方一剃头发，大家跟着剃头发，看到哪点在写血书，就一起写血书，还有写请战书。在很多人的眼中实际上都是所不齿的。
M-08-87-SX	制度优越性	政府管理问题	你说看英美也好、印度也好，他们的抗议就我们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性，很多时候我的感受包括同一思想有时候可能都会很难。
F-06-76HJH	防控过严		我家幺儿就摔倒在地上，碰到额头，当时就流血还是比较严重，我们就送到马关镇卫生院，大概他们当时的所有精力都是放在疫情防控上，那就要求我们自己去普定县医院了。
F-02-00-CYLY	农村医疗条件		农村的隔离点挺差的，包括一些小县城的社区管理条例也不好。那种隔离点就是临时的，是吧？它不是正规的医院里面。
M-09-00-GSY	国家认同		我感觉还是希望疫情形势越来越好，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少越好，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管控的信心还是比较足的。
F-10-93-WYY	中国抗疫行动		就一开始就觉得叫做中国速度，武汉“封城”，“封城”之后好像用了一个多月，就那个数字就已经控制住了。
F-02-00-CYLY	中外抗疫成效		这国情的问题，中国人口那么密集，你又他我看中国如果放任不管那就不得了。
F-06-76HJH	网课效果		有些学生就属于留、守两种状态，就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一起，他们实际上爷爷奶奶也最多就是你要好好学了。但是不是读书到位其实是很难的。
F-07-83-CLC	生活状态	日常生活影响	超市我印象中是开的，但是不太敢去。
M-09-00-GSY	亲身经历		很紧张，我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刚开始那个阶段那天我突然就发烧了。
F-06-76HJH	影响工作		即便他拍了个照给你把作业拍给你了，看他的作业，

			他自己用心做的，还是在网上搜、打给我们的？其实你不可知。
M-08-87-SX	收入减少		没有哪个人能够逃得过这种这种时代或者是命运，财政收入减少了。
F-10-93-WYY	接触经历		当时就吓死了，就因为我们要拍一个去我们医院收治的第一位病人，就是从武汉过来的那个病人。
F-06-76HJH	群体恐慌		当时所有人都很惶恐了，因为刚刚你晓得以前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病是会死人的，所有的行政单位这些都是都是很害怕。
F-10-93-WYY	群体传播	群体影响	他们发的信息身边同学，就因为可能他们不是在医院或者本身不是医疗行业这一块的，就他们我看他们发出疫情的更多的就只是说祈祷快点过去，不要阻碍我出去玩。
F-07-83-CLC	疫苗接种经历		打过一个百日咳的，结果她上小班、中班、大班的时候就得了就得那个百日咳了。
F-03-81-ZYY	疫苗接种态度		有讨论。我身边的有一些人会对疫苗、对这个病情，比较持怀疑的态度。
F-03-81-ZYY			我晓得的时候其实不疯狂，最开始我要回老家，我还不太相信有这种事情，也预判不到这种严重性
F-11-95-CLF	疫情态度		像现在其他城市的一些流调，大家反而会用这些流调来讲故事，用它来讲一些现代人生活很不易的故事。
F-02-00-CYLY	个人健康素养	疾病歧视	其实我没我不是痛恨他，但是我也会有可能会天然的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其实我也知道他没有错，但是你会有不满意。
F-10-93-WYY		疫苗副作用	我身边就有一个负面案例。我们医院有一个医生，他接种了之后，头发就斑秃了，所有医生只有他一个斑秃。他没接种之前，他真的是一头很浓密的头发，就真的很巧合，接受完了之后就开始犯错。
F-03-81-ZYY,		情绪反应	新闻还是以官方媒体为主。再看的时候也没那些恐慌。
F-02-00-CYLY		心理恢复	感觉自己还没有走出来那个低潮情绪，它会有一定的持续影响力。
M-09-00-GSY	情绪缓解方式	情绪压力	还是会有紧张的，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大概关注关注疫情大概一两周的时间。
F-10-93-WYY		情绪波动	刚开始是会的有的，慢慢得到缓解，是呃也是经过了武汉解封之后，才真的开始有所缓解。
F-02-00-CYLY		情绪带入	当时新冠疫情的一些文章。就像今天不是出个电影叫中国医生嘛，我当时去看了，我跟我同学形成了截然相反对比的反差，就我基本是从头哭到尾，因为我特别有代入感。

## 2. 主轴编码

本研究对开放式编码的 6 个范畴进行归纳整合，最终形成 4 个主范畴，分别

是媒体传播、政府管理、个人健康素养、群体传播，进而归纳为传播主体、传播客体、渠道三个维度，如表 4-5 所示：

表 4-5 主轴编码过程

维度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渠道	媒体传播	媒体期待	公众对媒体信息的需求以及对媒体传播的影响
传播主体	政府管理	政府管理问题	公众对政府在抗疫行动中的能力评价
传播客体		日常生活影响	疫情对公众在生活、工作、学习方方面面的影响
		个人健康素养	公众的健康风险观念、保护意识、对病毒的认知以及疫苗接种态度等
个人健康素养		情绪缓解方式	公众在疫情期间各种情绪反应，情绪压力及情绪波动、心理康复等
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		群体恐慌对个体防范意识及行为的影响

###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作为扎根理论方法的第三步，目的是对主轴编码的范畴进行提炼整合，并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作用和影响关系。本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主轴编码中的 4 个主范畴，揭示了主范畴中各个典型关系的结构，如表 4-6。根据扎根研究结果，以新冠疫情为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渠道作为共同作用和影响，其中最直接的是政府管理会影响到个人健康素养的风险防范与应对，政府管理和媒体传播会影响个人情绪缓解方式，个人情绪缓解方式与群体传播相互影响。

表 4-6 选择性编码过程

维度	典型关系	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渠道	媒体传播 → 情绪缓解方式	直接影响	媒体传播或制造恐慌加深公众的焦虑、紧张情绪；或缓解公众的情绪
传播主体	政府管理 → 个人健康素养	间接影响	政府管理水平高低影响到公众自我保护能力的取舍。大多数公众是信任政府的，对政府的举措深信不疑。
传播客体	个人健康素养 → 媒体传播	直接影响	公众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其选择媒体信息，以及辨识媒体信息真伪
	个人健康素养 ← → 群体传播	双向影响	公众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其受群体传播影响的程度

本文根据扎根结果归纳出的 3 个维度，以融合主体维度、客体维度、渠道维度为组成元素构建了突发公共事件情绪传播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4-8 所示。本文总结出的模型，包括主体（Subject）、客体（Object）和渠道（Channel），简称 SOC 模型，这 3 个因素相互作用并影响着情绪传播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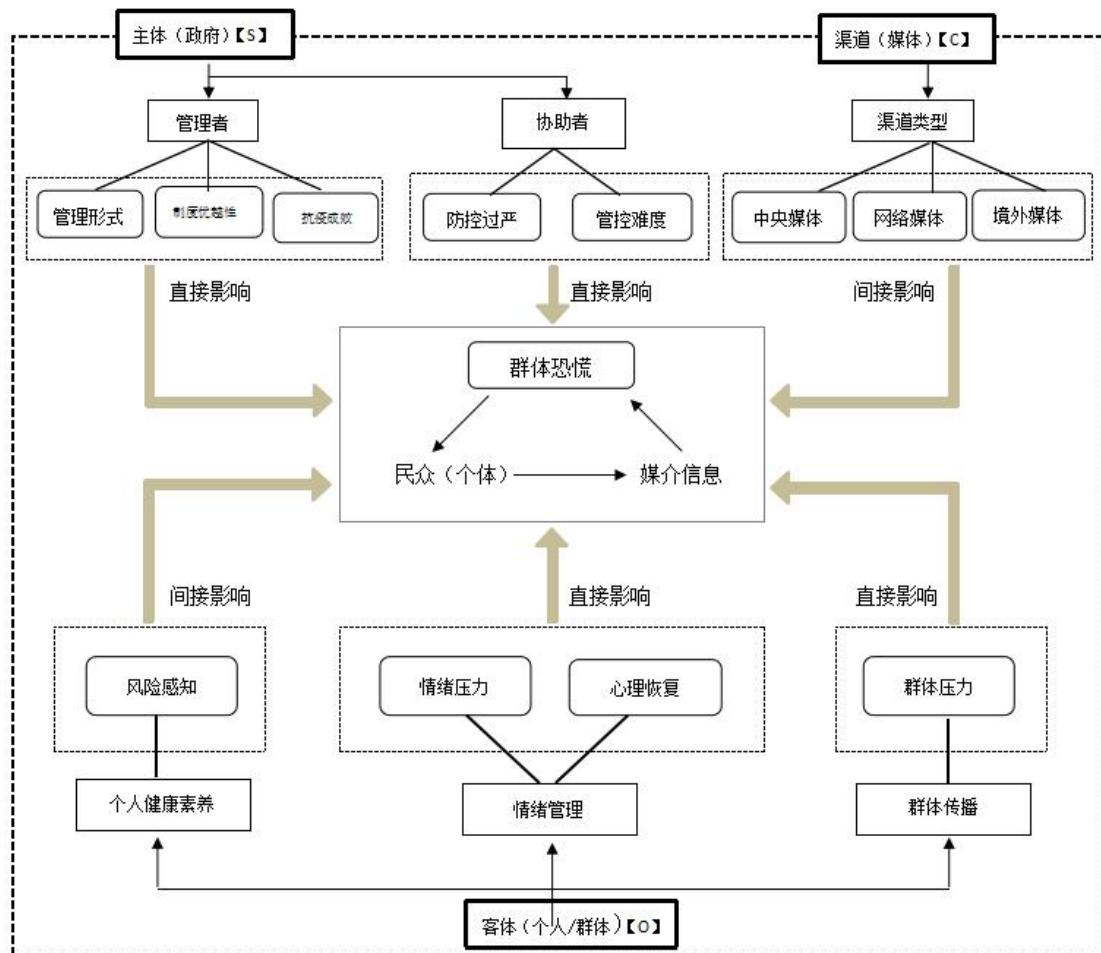


图 4-8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恐慌情绪传播影响因素 SOC 模型

#### 四、疫情中的恐慌记忆及媒介恐慌臆想

鲍曼指出，“恐惧与邪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道德上的‘连体双胞胎’，我们所害怕的是邪恶，邪恶就是我们所害怕的东西。”<sup>384</sup>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公共危机事件的背景下，当我们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开始拷问，那些留在记忆深度的印迹是什么？带着怎样的伤痕？这种记忆是我们内心深处自己的烙印还是外在的环境投射过来，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在深度访谈的这 13 个人中，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媒介接触习惯，他们对疫情的感受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相通之处，就是对媒介的认知都有或多或少的放大其负面效应。尤其是对自媒体，爱恨交织。

##### （一）数字技术延伸个体记忆，有效信息不足引发的恐慌

哈布瓦赫明确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社会建构的过程<sup>385</sup>”。数字技术的赋权使个体记忆得以拓展和延伸，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个人

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提供了可能性。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感觉和感官的延伸<sup>386</sup>。具体来说，媒介记忆也是人类记忆的延伸。疫情期间，人们通过将分散的、碎片化的记忆进行记录和分享，甚至在社交媒体与其他个体产生互动和联结，形成了部分群体在网络社交中的共同记忆。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恐慌的应对方式不同。突发事件发生初期，社会环境往往出现非常态的、有威胁性的局面。民众由于自身及外部环境的限制，不能立即判别道听途说的信息的真实性，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通常会希望通过官方媒体渠道获取权威信息以尽快了解相关危机信息，此时民众处于一种信息“饥渴”状态，通过对周围环境状况的变化趋势的预判来做出相应的应对准备，如果此时管理部门或官方媒体缺位或“失语”，不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人们便会倾向于相信小道消息和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不管是否疫区，不管受访者年龄、职业是什么，几乎都在疫情初期存有恐慌情绪。在电视台做记者的95后女孩小陈表示：“当时一开始就先百度了，百度它（病毒）的症状，你会发现信息都很同质，没办法获取更多的信息。就总是很想去搜索更详细的关于病毒的描述。后来我才关注丁香医生的。每天我都要看国内的病例有多少？广州的病例啥的，想要关注疫情的整个变化或者病例的增加。丁香医生每天会很详细的跟你说这些信息，包括每一个流调。”

(F-11-95-CLF)

尽管已经工作了3年，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当时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非典缺乏记忆的95后来说，小陈还是对新冠疫情心有余悸。尽管在媒体工作，每天都能接触到相关报道，但是对个体而言，疫情爆发之初的信息不足还是引起她，以及周围很多同事的恐慌。

不同年龄层的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情绪，1983年的高校教师迟老师，已经工作16年，谈及“封城”时的反应依然记忆犹新。她说疫情爆发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她也没有在网上科普搜索，就是直接问周围学医的人，向熟人请教，但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答案。“问周围学医的那些，他们也不懂，他们说哪里痛就治哪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是吧？就是咳嗽当时他们其实也很迷茫。”(F-07-83-CLC)也许是工作阅历较为丰富，这个年龄段的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当面对情况不明的病毒来袭时，他们更多借助社会资本，寻找熟人关系，在熟人交际圈里寻觅专业信息，以消除信息不足带来的恐慌感。

## （二）政府管理成效影响到恐慌情绪的蔓延

在疫情传播初期，确实存在医学认知上的障碍，混沌不明朗的认知情形、与重要的事物相关、该事物为群体中多数成员所关注。社会信息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社会信息不能有效公开，民众势必会对事态的进程产生种种盲目性猜测，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民众恐慌情绪蔓延。例如，疫苗接种时民众的犹豫态度，官方媒体也缺乏有效的、全面的科普来动员民众，导致民众较为抗拒疫苗，加之，近二十我国疫苗不断爆出一些质量问题，使民众对疫苗接种产生不信任的质疑态度，在此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也表现出来，1987年出生的公务员史某就谈到官媒信息传播的不足导致谣言四起。“我觉得包括官方媒体在疫苗接种当中也没有全方位的科普，关于疫苗的基本常识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导致了这种谣言。”（M-08-87-SX）史某也谈及疫情初期的一些混乱，包括基层单位在面对这次突发灾难时的过度紧张，导致的管理规则过严、管理尺度过大，甚至因为不近人情而给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困扰。这些都是疫情管控初期出现的弊端，后来逐渐矫正过来，人们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00后的湖北女孩CYLY经历了黄冈的疫情防控，她当时正读大二，寒假回家过年。她表示在武汉“封城”后，整个湖北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武汉被全国媒体高度关注，还能得到一些医疗资源的救助，湖北其他地方，尤其是基层，一些偏远的农村就难以保障医疗资源了。她谈及这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湖北的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而且因为武汉被报道多，所以它受到关注也最多，它资源相对来讲也最好。”“农村的隔离点挺差的，包括一些小县城的社区管理条件也不好。那种隔离点就是临时的，是吧？它不是正规的医院里面。”（F-02-00-CYLY）

她在疫情初期还做过热线救助电话的志愿者，帮助患者及其家属下情上达，传递病情信息，但是这个过程中，志愿者的情绪波动非常大，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传递信息，工作范围就是接话员，工作职能决定了他们工作的管理成效主要取决于医疗资源的分配。但从病患者及家属一方而言，他们认为志愿者的主观意愿以及主观能动性决定了能否帮助自己获取到医疗资源，所以得到救助者觉得志愿者理所应当，而没有得到救助的病患者及其家属就将怨怒之气撒到志愿者身上，CYLY表示，她当时每天都经历很痛苦的煎熬，后来不做志愿者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都还经常噩梦不断。她甚至都不愿跟任何人提及此事，就想让它慢慢地遗忘在

时光的岁月里，忘掉这段极其难受的心理阴影期。她表示，不同群体的人在当时极度恐慌的状态中：“那种情绪是很焦虑的嘛，很恐慌焦虑、恐惧，甚至无助，甚至埋怨政府，可能都有。”（F-02-00-CYLY）

抗疫行动原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救援行动，也是彰显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整合资源能力，固若金汤的凝聚能力、高效快速的协同能力。但是，任何事物的两面性决定了在这场抗疫行动中，管理机制还是存在一些漏洞的。抗疫志愿行动中，有不计回报付出的志愿者，也有投机倒把的获利者。一些基层单位面对突发疫情时的慌乱，应接不暇，措手不及等都暴露出我们的制度还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在采访中，笔者发现，医务工作者中赏罚不均存在一些怨言。在西南某省医院工作了快30年的罗护士长表示，疫情爆发之初，所有医护人员都群体情绪高涨，主动请战支援武汉的人非常多，大家很踊跃报名，希望能帮到湖北疫区的人民。但是名额有限，能去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只能留守后方，并且还需分解救援医护人员的工作任务。当武汉解封后，疫情得到控制，救援人员返回原单位，大多数都得到了火线提拔，而有的救援人员依旧默默无闻，原地不动。留守后方的医护人员没有得到任何奖赏。这让留守医务工作者与救援湖北的医务志愿者之间差生了明显的感情裂痕，同样是为疫情付出劳动，就因为头顶光环就得到奖赏，而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却被埋没。罗护士长表示，他们已经连续加工了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跟前方归来的志愿者相比，待遇可谓天差地别：我们都天天顶班，天天顶了几个月。（F-05-73-LXY）这也是某些省份在管理机制上的形式主义、僵化主义所致。大疫当前，当然是头等大事，但是，奖赏与惩戒也应有度，过于拔高或无差别地对待医务工作者，只为对外宣传时有亮点、有素材，这种形式主义作风确实拔苗助长，反而伤害了整个医疗队伍的和谐共生环境，让医务工作者之间横生芥蒂，矛盾升级。

### （三）民众的科学素养参差不齐

历史上许多因不实信息导致的群体非理性应激心理与行为事件，都是源于人们的封建迷信或对科学的无知。随着现代科技的长足进步、科学知识的日益普及，它们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利用普通民众有限的科学知识、对科学的盲目迷信崇拜等心理来蒙蔽、迷惑民众。多数访谈者流露，疫情爆发初期，不论是否身在疫区，内心都是紧张的、焦虑的，甚至是恐慌的，尤其是自己碰巧感冒或是参

加了集体活动，都会担心自己会感染。00后的小郭还是大学生，新冠病毒爆发时，他正读大一，寒假在家过年。父母都是医护工作者，父亲常年驻外从事医护工作，母亲经常加班到深夜才能回家。小郭在“封城”新闻出来后碰巧也感冒了。因此担忧自己感染新冠。他谈及那段经历时仍然后怕。“很紧张，我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刚开始那个阶段那天我突然就发烧了。”(M-09-00-GSY)

记者小陈也有类似恐慌经历，疫情爆发时，她们正在广州花市做一个视频节目，大家都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过几天“封城”的消息出来，她们那一期活动的记者全都感到紧张、恐慌。“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武汉‘封城’还是会挺让人焦虑的，因为在过年前，我们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疾病的是的严重性的时候，那时候广州还搞了花市嘛我们还去花市搞了活动。搞了活动之后听说了这个新冠的传播性很强，那几天很紧张，就会不断的去搜索说它的症状是什么，它发病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去对照自己说有没有感染到。”(F-11-95-CLF)

在高校执教 17 年的 81 年张老师，疫情时恰逢回农村老家过年，谈及那段短暂的时光，张老师依然记忆犹新，她说当时，大人们一点警觉都没有，基础的防护意识都没有，反倒是她的 11 岁女儿有健康防护意识，一直坚持说要买口罩，幸亏她女儿的再三坚持，大人才买了一包口罩，结果成了在老家隔离期间的唯一保护工具。年初“封城”后，大家都被隔离在农村，有个从武汉返乡回来的村民，引发了大家的紧张，在农村，信息渠道没有城市传播那么发达，人们对病毒的认知更是一知半解，大家也不敢相互串门。“农村可能消息这些比较闭塞，他接触的人也不是太多。”(F-03-81-ZYY)张老师表示，在老家待到初三就赶紧逃一样的回到省会贵阳，再也没去哪儿，小心翼翼在家隔离。整个“封城”期间，最大的负面情绪应该是生活不便、出行不便的隔离状态让人产生无聊、闷、烦的情绪，而病毒由于离得较远，反而不太恐慌。

#### (四) 媒介协作建构记忆文本，自媒体传播的放大效应

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协作建构第一手记忆文本，缓解信息匮乏带来的恐慌和焦虑，也在第一时间为大众提供情绪宣泄的平台，进一步提升记忆文本的增量。有学者提出“官方记忆场”与“民间记忆场”的概念，前者是指依托官方媒体的主流媒体记忆实践，后者是依托普通民众的互联网记忆实践。集体记忆的建构过去只能是依靠官方媒体和专门媒介的媒介平台，如今数字技术对公众的赋权带

了个人书写的可能性，也让“民间记忆场”与“官方记忆场”可以进行协作和对话。由于武汉“封城”实行严格管控，官方媒体也需一定时间才能深入第一线报道新闻事件。自媒体受制于部分渠道特性，其信息传递碎片化，传播氛围相对浮躁。一些自媒体公众号往往用煽情的语言、夸大其词的故事来引发民众的焦虑情绪，导致民众陷入恐慌中。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年轻一点的受访者以接触新媒体平台为主，她们容易接收到那种自媒体公众号推荐的故事。记者小陈谈到：“那种以感情为主导的小公众号，思想聚焦、吸睛的这种，它就会很故意的去放大这种情绪、渲染这些故事。那些小媒体，会很仔细的去描述说这个人副作用怎么样、状态怎么样，对病患者的细节渲染的特别细，然后又没钱治病，又家里又很很凄苦，好像还不如当时死了算了的那种感觉。一家人都一直都被他拖累，一直人家都歧视他的那种。”(F-11-95-CLF)

新的媒介形式解构了传统记忆叙事的权威性和唯一性，碎片化小众化的个体记忆成为权威记忆的补充。在此类公共危机事件中，有效补充了疫情初期信息较为匮乏情况下大众记忆的缺失，媒介通过对记忆文本的协作书写，也共同建构了疫情期间珍贵的集体记忆。当疫情爆发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喧嚣起来、兴奋起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恰巧吻合当下风险社会的民众固有的心态，经过渲染与放大的故事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读本。“其实我觉得好像挺矛盾的，你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一方面你又觉得增加多了一点其他更多的小道消息、更多的信息量好像觉得说有。这就是满足了自己想要去搜索、获得更多信息的一种心理，但是又也会加剧恐慌。”(F-11-95-CLF)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自媒体的受众还是以年轻人居多。年纪稍长的访谈者张老师表示，更愿意相信官方媒体的信息，她觉得官方媒体的可信度更高。“反正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主流媒体。包括看到一些视频，好多人都传给我，我还是表示一种怀疑态度，读了也不会去转发，自己懂得去衡量这个视频的真实性。”(F-03-81-ZYY)

对自媒体信息的真实性判断因人而异，有些传媒专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信息辨识素养，明确表示不相信自媒体的信息。“我不咋看丁香医生，我觉得它就是营销号，广告、内容运营的痕迹挺重的，我一般看官媒比较多，我不爱看那些非官媒的报道，我觉得就是在煽动情绪，写的内容也不是特别真实，就觉得特别蠢去转发这种情况。但是我姥姥非常喜欢看。”(F-02-00-CYLY)

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的革新创造了新的权利关系，集体记忆的建构不再局限于官方或专业机构，大众的主观能动性被进一步唤醒，可以通过 UGC 生产方式进行新的建构。这也标志着新媒体技术赋能的时代下，不仅使个体记忆得以拓展和延伸，还使集体记忆的权利流向普通大众。也有传媒学生选择性相信自媒体，常刷抖音、小红书短视频，对丁香医生的接触也较多，并成为疫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由此可见，媒介素养高低与所学专业并非一一对应，学新闻传播专业的访谈对象也未必比其他专业的人更具敏锐的媒介素养判断，还是跟个人媒介接触习惯以及个体文化积淀有关。

#### （五）场域符号建构集体记忆，群体互动加剧媒介恐慌臆想

“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用来分析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场域空间中，所有主体通过符号竞争来形成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sup>387</sup>记忆场域具有明显的时空属性，不同年龄的人，但他们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共同的时间符号组成“命运共同体”，共同讲述自己与疫情的故事。每个人对于这些符号可能有不同的记忆和经历，但这些符号也使不同的个体记忆提取其中的共性，共同建构了关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最终上升到扎根理论体系中情感认同。

群体的恐慌来自想象，来自媒体的助推的想象。来自对意义的过度解读的想象，来自对仪式感、对神秘事物、离奇事件的想象。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影响群体想象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得以扩散以及呈现的方式。通过对事实进行提炼——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述的话——群体会制造出一个惊人的形象。”<sup>388</sup>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就会湮没，独立的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职业对人们的情绪管控有一定影响。在医院工作的人相对来说情绪管控得更好，作为医务人员，即使内心恐慌，但也得面对病患者或者存在被感染的风险时也只能保持冷静。医务人员群体是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群，群体间的传播更多是专业知识的流动，对于恐慌情绪起到缓解作用。93 年的医务宣传人员小温表示在专业人士的朋友圈里，比其他群体更懂得保护自己，自我保护意识更强，恐慌感就能降低一些。

“在医院上班之后，会加很多医生、护士的朋友圈，他们就相对会发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链接出来，就比如说怎么防护、要吃什么、做什么这样子。”  
(F-10-93-WYY)

医护人员往往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极少关注传媒，除非医院宣传部门工作，此外，大多对媒介的接触频率不高，更多信息来自群体传播或直接接触获取。但其他职业群体就未必如此。记者小陈所在的媒体是制作娱乐节目的，圈群文化偏向娱乐、八卦，专业信息流动不大，小道消息传播迅猛。因此，小陈对病毒信息的认知反而更强调追根溯源、穷追究底。“大家现在还在谣传，像你二十几岁以为治好，再过30年、你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会不会再复发，你会不会再复发其他疾病什么。像之前非典说很多人治好后得到了后遗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媒介信息的输出所导致大家的一种恐慌。”(F-11-95-CLF)

正是这种小道消息四处传播，经过群体间讨论后不断放大，人们出于自身安全的保护，便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那些能轻易在群体中流传起来的传说，并不仅仅是由群体的极度轻信所导致，还因为群体的想象对事件做了惊人的扭曲。群体亲眼所见的最简单的事件，很快就会被完全曲解。群体通过形象来思考，然而被唤起的形象，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原来的形象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其他形象。”<sup>389</sup>群体通过讨论延伸了对恐慌的想象，小陈表示，办公室微信群里谁发了一条疫情负面信息，大家就会在一起回复讨论，最后所有人都会紧张、焦虑起来。“肯定还是会更紧张，因为比如说其实像一些文章，它是在告诉你怎么去防范，包括它的传播传染的渠道啥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么容易就会被传染到了，那就会让我很焦虑。其实我觉得为什么父母他们当时没有我这么紧张，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信息没有我多，那些公众号也不会给他推这些，他们就接触面没那么广，就可能还没有我这么恐慌。”(F-11-95-CLF)

#### （六）仪式造势巩固情感能认，利益驱动下的群体感染

前文提及，在抗疫中的种种表功、表演行为，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中介，这种媒介新形式也因其媒介仪式进一步巩固情感能认。英国传播学者库尔德里提出“媒介仪式”的概念，其含义是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些共同事件或活动中，呈现出一种具有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和行为。<sup>390</sup>剃头、写血书等行为使得他人在表演时获得沉浸式体验和在场感，产生共鸣，由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连接成的集体记忆，构建成“情感共同体”甚至“民族共同体”，产生或进一步巩固

情感认同。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指出仪式观下传播的意义在于互动和共享。在媒介仪式下，这些抗疫行动可以让大众通过分散的特定符号唤醒个体记忆，并在与他人的互动分享中形成集体宏观记忆，也建构出基于国家和民族重大事件的集体情感认同，具有承载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精神与凝聚性力量的意义。

当然，这其中不乏投机取巧者。在利益驱动下，多数群体会在群体情绪感染下做出非理性行为。罗护士长表示，不仅待遇差别天地之遥，就是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已经导致医院的群体价值观变味了，处处充满了形式主义风气，她说到：医院管理不合理的地方是处处形式主义。比如你在网上看到哪个地方一剃头发，大家跟着剃头发，看到哪点在写血书，就一起写血书，还有写请战书。在很多人的眼中实际上都是所不齿的。（F-05-73-LXY）

疫情期间，网络上确实流传很多版本相似的抗疫激情行为，剃头、写血书、写请战书。如果说这种激情行为带有群体感染、群体效仿的示范作用。勒庞认为，“纯粹而简单的肯定，不带任何的推理和证据，便是把一种思想渗入群体脑海中的最牢靠的方法之一。肯定越简洁，越显得缺乏证据和推论，它的权威性就会越大。”<sup>391</sup>在群体互动中，成员之间的行为（写血书、剃头等）具有了表演的意味，甚至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些行为的初衷，彻底沦为谋取私利的手段。群体在这种表演行为中既有释放压力、恐慌情绪、激发群体情感的真情，也有恐被排斥的从众心理驱动。使得全国多地都发生类似的群体行为。

这种行为的背后也有管理部门的默许、纵容或者说激励，毕竟，管理部门也希望借此行为得到媒体更广泛的关注和宣传，以此向上级部门邀功。简言之，这种群体行为背后或为功利所驱，或为群体从众所感，或为无意识的掺和等多种因素，促成了全国上下一起联动、交织的群体情感动员。即使在疫情已经结束后，这种动员行为依然未减热情，人们在互动中，在激情行为表演中俨然已经视为缓解恐慌的一种手段，共克时艰的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情绪宣泄和治愈受众心灵的作用。群体行动能带来莫名的鼓舞，仿佛病毒真能被人们的激情所驱赶，在群体臆想中战胜恐慌情绪。这也许才是群体行为的真正动力。

### 第三节 恐慌情绪释放：抗疫Vlog的群体情感释放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群体恐慌情绪，过度紧张、焦虑、恐慌的情感创伤需要借助媒介内容生产来按摩、释放、宣泄，以达到群体情绪平复、情感修复的作用。本节内容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武汉、广州抗疫Vlog的热门评论进行分析，阐述了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媒介生产逻辑：通过媒介协作提供受众情感出口，在象征性符号中建立群体情感联结纽带，借助媒介仪式巩固受众情感认同；受众情感修复逻辑：以媒介数字技术为情感记忆的延伸点，通过触媒后的按摩，在群体感染中修复创伤，从而达到群体情感释放，完成情感治愈的历程。

Vlog中文名微录，是博客的一种类型，全称是Video blog或Video log，意为视频记录，视频博客、视频网络日志。<sup>392</sup>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Vlog成为人们记录生活、分享感受，留存记忆的新出口。自2018年起，抖音、快手等各大视频平台造势短视频市场，Vlog浪潮应运而生。同质化的PGC和粗放型的UGC无法和短视频一样可以在“快餐”消费中满足用户对于视觉文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Vlog快速成为了新媒体内容生产的必要补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封城”令国民骤然间陷入巨大的恐慌情绪之中，信息传播量不足、医疗资源紧张、病毒传染源头未明、谣言满天飞、民众对病毒的认知程度与情感刺激程度不成比例的蔓延。如何安抚民众的焦灼情绪，缓解社会各方矛盾冲突，自带按摩作用的抗疫Vlog应运而生。

抗疫Vlog，顾名思义，是战胜疫情的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达，天然地带有强烈的舆论引导偏向，以达到凝聚民众认同感，缓解民众焦灼感为目的的视频。Vlog通过视频网络日志的方式记录生活的内容创作，以个体记忆为主线，采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剪影为素材，还原事件真相和原貌的影像。民众在观看视频影像中产生关联想象，在传播符号的群体互动中得到媒介按摩，从而减轻对突发灾难带来的群体焦虑与恐慌情绪。大流行期间，民众通过Vlog的形式记录疫情下的生活状态，部分主流媒体也制作或征集Vlog再现疫情故事，正面引导舆论。笔者以B站中网民观看Vlog的感受（评论）为分析对象，运用扎根理论，阐述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媒介生产逻辑：通过媒介协作提供受众情感出口，在象征性符号中建立群体情感联结纽带，借助媒介仪式巩固受众情

感认同；受众情感修复逻辑：以媒介数字技术为情感记忆的延伸点，通过触媒后的按摩，在群体感染中修复创伤，从而达到群体情感释放，完成情感治愈的历程。

## 一、媒介按摩研究的文献回顾

### (一) 媒介按摩的相关研究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经典理论——“媒介即讯息”为大众所耳熟能详。麦克卢汉在该理论基础上还提出“媒介即按摩”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以致于默默无闻若干年。其实，媒介即按摩放置到当今中国的传播语境中，尤其是全球被新冠病毒肆虐的传播语境中，媒介按摩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按摩论是基于当时变动不居的媒介大环境、大变革时代而提出。意指媒介具有跨越障碍，帮助受众去思考、探索环境的功能。麦克卢汉这样解释，“‘媒介即按摩’说的是探索环境，目的是发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sup>393</sup>解说麦氏的学者持不同看法。保罗·莱文森认为，把‘message’改为‘massage’，并以此命名一本新书。在《把握今天》中，他又把‘massage’拆开，写成‘受众时代（mass age）’。<sup>394</sup>在这一点上，何道宽也持相同看法，认为麦克卢汉“用滑稽喜剧手法玩弄自己的表述，把 message 变成 massage、mass age、mess age，于是就弄出了‘媒介即按摩’、‘媒介即受众时代’、‘媒介即混乱时代’这样的文字游戏”。<sup>395</sup>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给我们大脑以讯息，就好比按摩女郎按摩我们的肌肉一样。<sup>396</sup>他在《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中提出，“一切媒介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完全透彻的，我们的一切方面无不被触及、被影响、被改变。”<sup>397</sup>媒介起到按摩受众的作用，而如果不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就无法了解任何社会文化变革。

现代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按摩的作用集中体现为“情感的体验”，“新的媒介形态改变（按摩）着我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经验，这种影响最终比它所传达的特定讯息的内容更重要。”<sup>398</sup>乔纳森·特纳也进一步阐述媒介之于情感体验的理论，“从生物学视角看，它包括身体系统的生理变化，例如自主神经系统、神经递质和刺激神经激活的激素等系统的启动；从认知角度来看，情感是对自我以及环境中客体某种有意识的感受；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情感是一种符号话语标签，即人们对特定生理唤醒状态的命名。”<sup>399</sup>在信息爆炸、谣言失控，公共危机事频发的年代，媒介按摩之于受众情感修复的作用亦愈发凸显。媒介按摩强调媒

介使用对受众身体和精神情感的影响，受众在使用媒介时即享受到媒介所传递的按摩服务，可以理解为麻痹作用、虚幻的满足感或是想象的幸福感。媒介按摩能够借助新媒介生产实践，从而满足受众对于事实真相的求知欲望，使得过度紧张、焦虑带来的情感创伤得到按摩、释放、宣泄，起到媒介按摩、情感修复的作用。

## （二）媒介按摩的当代价值

在《媒介即按摩》的护封上有这样一句话，“影响的清单，阐述麦克卢汉关于电子时代的预言”，<sup>400</sup>这句话点明了“媒介即按摩”这一理论之于新时代的作用和价值。“媒介即按摩”在新媒体时代中得到了一种最为清晰直接的呈现，将麦克卢汉式的“预言”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空间，为理解媒介在受众情感作用的影响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视角。“电路使得人们深刻地相互介入，信息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瞬息即达、连续不断。信息被获取之后，更新颖的信息迅速取而代之。”<sup>401</sup>新媒体时代，“电路”就是我们现在的各种媒介，尤其是像Vlog这种新社交媒体，让受众获得更直观的信息，让虚拟社群中的网民有了虚拟的联结，即“相互介入”，人与人之间不用相见就能够及时直观地关联，并且在同一个“媒介磁场”中得到情感宣泄、情感认同，在媒介按摩的作用下得到情感修复。

从长远来看，麦克卢汉的洞察对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即媒介不仅是讯息，还对全身的一切器官产生作用，对进行全身“按摩”。“特别是当信息传播从原来的辐射式扩散转化为多节点、无中心的‘多对多’传播时，内容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媒介本身的重要性逐步上升。”<sup>402</sup>传播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传输的信息内容上，还通过媒介按摩作用对人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会塑造人的意识和认知。达伊基认为，互联网通过“按摩”，“改变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sup>403</sup>使我们的大脑会“变得越来越心甘情愿地融入其中。”<sup>404</sup>媒介对受众的全方位进行“按摩”，也对其感觉、认知、情感和记忆进行全方位扩展，对大众的情感创伤进行修复，调适机体功能和心理状态以达到精神上自我恢复的享受。

通过对媒介按摩的内涵、发展及当代价值进行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按摩理论的研究仍然有限，针对Vlog媒介按摩的生产实践更是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笔者运用扎根理论对武汉、广州疫情爆发时两个具有代表性的B站Vlog评论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和分析，比较两者的关联和差异，从而总结

规律，深度还原抗疫Vlog是如何体现媒介生产逻辑，又是如何按摩受众的情感、修复受众的创伤，阐述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以此为新媒体内容生产提供一些思考与启示。

## 二、媒介按摩的媒介生产实践——抗疫Vlog的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美国学者Glaser和Strauss提出的一种用于质性研究的方式，产生于社会学领域，“通过深入情境地研究、收集数据和资料、对数据间的不断比较，从而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和分析，是一种从数据资料中归纳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的研究方法论。”<sup>405</sup>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受众的非理性行为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和即时反应性，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容易造成信息失真，且调查对象的规模与范围有限，无法全面反映受众的真实感受。因此，本文利用八爪鱼数据采集器提取B站上较有影响力的两个Vlog评论文本作为分析的数据来源，以广泛的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展开主体研究，更为真实、全面、立体呈现Vlog视频中的传播互动关联。

### （一）文本来源及研究工具

B站是目前使用非常广泛的视频平台，用户可通过弹幕及在评论区发表评论，从而进行情感宣泄、情感认同，利用媒介达致按摩的作用。因此，本文在B站上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抗疫Vlog，分别为：《武汉UP实拍，“封城”后的24小时，“空城”武汉的物价、交通、生活状态》（下文简称武汉抗疫Vlog）和《全国人都在关心广州，广州人居然是这样的……》（下文简称广州抗疫Vlog），其中武汉“封城”的实录具有近900万的播放量，广州疫情的实录具有近118万播放量。本文选取武汉抗疫Vlog的理由：武汉“封城”后，官方媒体因疫情防控无法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其作为全网首发展示武汉“封城”后24小时内真实状况的Vlog，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并经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官方媒体转发；选取广州抗疫Vlog的理由：一是广州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作为祖国“南大门”进行境外输入病例的“第一道防线”，防疫责任重大，防疫难度远超其他城市和地区。在“广州阿婆事件”后对重点区域实行暂时封闭和全广州大规模的筛查、管控，引发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二是广州抗疫Vlog通过展示广州各种生活情景及全员核酸下广州人面对疫情的真实写照，比起武汉“封城”的特殊和典型个案，广州抗疫行动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其他城市“多点小爆发”的现状更吻合，更具有参考价值。

研究工具为澳大利亚QSR公司开发的Nvivo11.0 Plus质性研究软件。Nvivo软件可以帮助研究者对图片、文本、表格、视频、音频及网页等资料的收集、存储、检验和处理，其优势在于可将整理的文本资料导入软件后，利用先进的数据管理控制系统、搜索统计和查询可视化工具，深度挖掘更多有价值的讯息，总结规律，可有效地增强文章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分析时的可信度、严谨性和真实性。

## （二）实施数据编码

将评论文本整理汇总成Excel文件，导入Nvivo11.0 Plus软件后新建研究项目，并运用扎根理论自下而上的逻辑方式，在仔细阅读资料文字的基础上，以描述性语言对导入资料进行开放式——主轴式——选择式逐级编码，再根据研究主题设置编码对应节点，并建立研究框架，对节点进行深入挖掘、细致编码。

###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初级类属来源于导入的Excel文件。在进行开放式编码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保持开放性思维和严谨性态度。”<sup>406</sup>笔者严格按照扎根理论的逻辑方式和编码步骤，对武汉抗疫Vlog的前2000条热门评论内容进行认真梳理并进行初步编码，共计获得268个自由节点，再对268个自由节点进行类属化分析，合并具有相同概念的节点，并赋予其新的概念，得到34个初始概念（见表4-7）；以此方法对广州抗疫Vlog的前2000条热门评论内容进行同样的文本分析，共计获得179个自由节点，35个初始概念（见表4-8）。

### 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目的是“深度挖掘概念群和初级类属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进而合理表现访谈文件资料中每个部分间的有机联系。”<sup>407</sup>笔者对两个Vlog的文本初始概念进行整理和归纳，分析每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获得主题类属，武汉抗疫Vlog获得10个主题类属，广州抗疫Vlog获得15个主题类属（见表4-9和表4-10）。

表4-7 武汉抗疫Vlog评论开放式编码的初级类属与初始概念（部分）

初始概念	初级类属
城市情感认同	今天，2020年除夕，武汉疫情爆发的第三天，对于每一个武汉人来说，这将是我们度过的最特殊的一个春节，城市道路封闭、公共交通停运、医院病床告急，整座城市处在低迷压抑的氛围之下，没人知道这场疫情会持续多久，但是，每一个身处武汉的人都在默默承受这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们选择了这座城，我们生在这，长在这，住在这；我们的家人在这里，我们爱的人也在这里，我们

	就将陪伴她度过这段阴暗的时光。2020，新春快乐.....
情感表达安慰	不是只有幾億人. 而是十几億人在關心著你們.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身为一个湖北人奉劝大家要尽量减少出门，做好个人卫生，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听信谣言，随时注意官方信息，相信最后患者都能平安无事，最后，武汉加油！！！
抗疫必胜的信心	98年洪水没能打倒它、03年非典没能打倒它，08年汶川地震也没能打倒它，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同样不能打倒它！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表4-8 广州抗疫Vlog评论开放式编码的初级类属与初始概念（部分）

初始概念	初级类属
城市情感认同	希望每一位外地游客都能在一声声靓仔下沉沦，最后在一声声老板中宾至如归
情感表达乐观	洒洒水啦，迟早过去的，茶楼等我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还没打疫苗能打上的去打吧，不论啥省份。
防疫措施	今天就去测核酸了，人没有很多，证明效率很高，整个流程井然有序，很快就测完了。加油广州！

表4-9 武汉抗疫Vlog评论主轴式编码（部分）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关注疫情的动态	讨论疫情起源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疫情下的人文关怀	呼吁提高防诈骗意识
	关注弱势群体
	为武汉人发声
	为所有人加油鼓劲
	关心视频博主的状况
	新年祝愿
国家情感认同	国家情感认同
	国家自豪感
	抗疫必胜的信心

表4-10 广州抗疫Vlog评论主轴式编码（部分）

主轴式编码	开放性编码
广州城市印象	广州人文的喜爱
	广州美食的喜爱
积极情感的表达	表达自身的感动
	表达自身的乐观
消极情感的表达	表达自身的焦虑
	表达自身的恐惧
视频生产的负面评价	补充视频中缺失的信息
	批评视频的内容部分失真
	吐槽视频的背景音乐

### 3.选择式编码

核心类属是对主题类属进行质性分析的结果，属于从属关系中的最终阶段，是媒介按摩生产实践研究的核心。为确定核心类属，在分析主轴式编码过程中所获得的主题类属基础上，研究样本的具体信息，深入探究每个主题类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寻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容性与关联性。通过对评论样本内容的编码及编码内容的逐步分析、整理和汇总，构建了扎根理论体系：新媒体语境下抗疫Vlog的媒介按摩生产实践分析，最终得出疫情防控、群体认同、群体感染、情感认同共4个核心类属，见表4-11和表4-12。

表4-11 武汉抗疫Vlog选择性编码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讨论疫情起源	关注疫情的动态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自身防疫情况	描述自身防疫情况	
武汉患者的自述		
表达对疫情的个人想法		
医护人员的自述		
请求支援		
口罩支援的信息		
防护服支援的信息	疫情救援信息交流互动	
描述所在地域的防疫情况		
提供疫情救援的相关信息		
批评谣言的散播		
澄清谣言		
科普疫情病毒的相关知识		
希望更多人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		
赞扬视频博主的奉献		
视频得到官方主流媒体的采用	视频生产的正面评价	群体认同
认可视频的事实呈现		
情感表达乐观		
情感表达信心		
情感表达感激	积极情感的表达	
情感表达感动		
情感表达安慰		
情感表达感动		
情感表达恐惧		
情感表达焦虑	消极情感的表达	
情感表达愤怒		
呼吁提高防诈骗意识	疫情下的人文关怀	

关注弱势群体		
为武汉人发声		
为所有人加油鼓劲		
关心视频博主的状况		
新年祝愿		
城市情感认同		
武汉城市印象	城市情感认同	
武汉城市记忆		
国家情感认同		
国家自豪感		
抗疫必胜的信心	国家情感认同	
中国人的责任		

表4-12 广州抗疫Vlog选择性编码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广州人文的喜爱		
广州美食的喜爱	广州城市印象	
对广东省的自豪	省份情感认同	
广州对全国疫情防控的贡献	广州城市情感认同	
对中国的自豪感	国家情感认同	
单纯地为广州加油		
以地域城市名义加油		
高考学子的自我鼓励	励志加油话语	
美食相关的励志话语		
医护人员相关的励志话语		
非典背景下的抗疫信心		
对中国抗疫必胜的信心	抗疫必胜的信心	
广州疫情起源的讨论	关心疫情的起源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疫情防控意识	
广州疫情的关注		
佛山疫情的关注	关心疫情的发展状况	
核酸排查到位		
广州防疫意识高		
医护人员专业素质高		
疫苗措施的推进速度快		
防疫志愿者团队完善	防疫措施的评价	
与美食相关调侃核酸排查的情况		
描述个人核酸排查的情况		
核酸排查现场秩序混乱		
核酸排查过程的插队问题		
吐槽疫情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外地人在广州疫情的生活状况	自身疫情下的真实情况	

学生群体描述自身情况		
自身所在城市防疫情况		
表达自身的感动	积极情感的表达	群体感染
表达自身的乐观		
表达自身的焦虑	消极情感的表达	群体认同
表达自身的恐惧		
对视频制作的认可	视频生产的正面评价	
视频带来更多真实的反映		
补充视频中缺失的信息	视频生产的负面评价	
批评视频的内容部分失真		
吐槽视频的背景音乐		

### 三、从媒介按摩到情感修复的生产逻辑

恐慌情绪本质上是人或者动物在遇到威胁时从内心到行为产生慌乱、失序的一种应激反应。相关研究证明，恐慌是个人意识到正面临着巨大的自身危机和可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失去对环境的信任，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安全感，从而导致了强烈的恐惧反应。在疫情期间，由于媒介信息的缺失以及突发疫情发展前期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机构的防控措施有待进一步优化的情况下，大众受到信息缺乏和生命健康安全危机的双重刺激，从而产生恐慌情绪。国内有学者也为疫情形成“恐慌情绪唤起-认知障碍”恶性螺旋的解决进行探索，研究强调公众所需要的杜会支持更多的是要提供包括情感、信息、自尊、社会人际网络等在内的多方面、全方位的支持。

媒介生产不仅是满足大众对于疫情期间相关讯息的需求，防疫措施的有效跟进同样也需要借助媒介生产实践的力量，比如从大众情绪宣泄中得知亟需解决的问题所在，并通过媒介传播使大众获知问题的解决效力，从而宽慰大众的恐慌情绪。根据上述扎根理论分析，研究文本呈现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受众对于疫情的焦虑恐慌在媒介协作提供情感出口后慢慢转化为对城市的眷恋之情，媒介按摩借助仪式造势和象征性符号将对城市的情感逐渐转变为民族情结，最后升华为国家情感认同、抗疫必胜的信心（见图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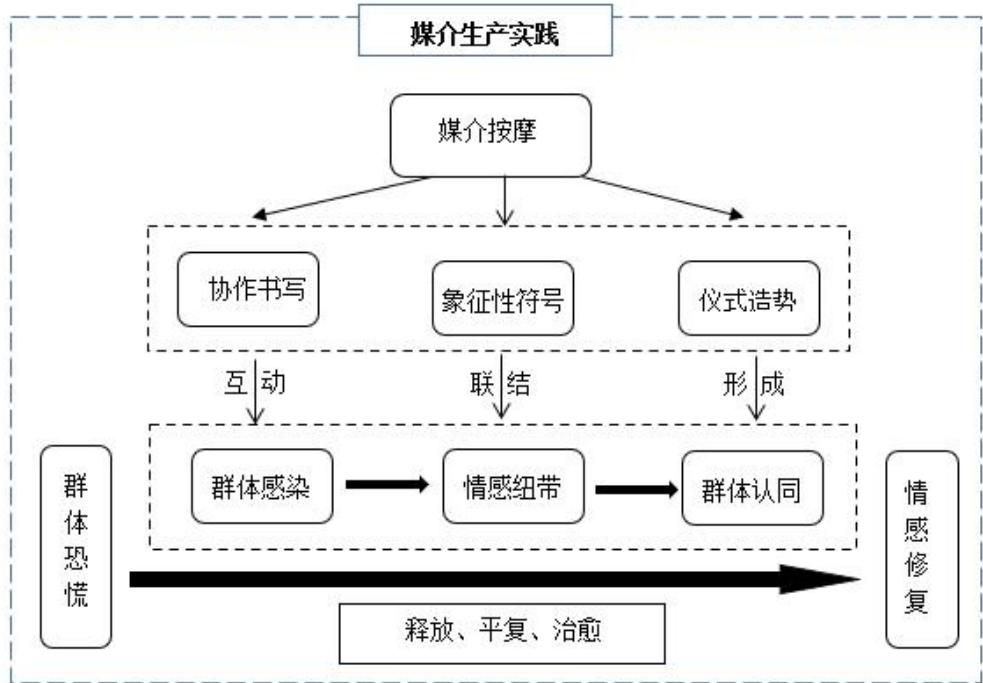


图4-9 抗疫Vlog的媒介生产实践模型图

### (一) 媒介按摩的内容生产逻辑

“焦虑不再只是个体层面的一种偶尔的心理不适或症状，而是已成为一种持续的、弥散的社会心态。”<sup>408</sup>特别是疫情以来人们的焦虑已经成为对新冠疫情和未来社会生态无法把握的情感表征。抗疫Vlog对受众在疫情期间的焦虑情绪进行按摩，宣泄和缓解了受众的群体焦虑和恐慌情绪。其生产逻辑体现为三个阶段：

#### 1. 媒介协作提供情感出口

媒介按摩的第一阶段：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协作有效地解决了受众在疫情初期信息匮乏的问题，缓解信息缺失带来的恐慌和焦虑，并在第一时间为受众提供情绪宣泄的出口，让受众在传播互动的群体感染中得到情感按摩。由于疫情传播迅速，且专业性强，普通民众认知匮乏，就连医学界也存在专业认知不足的困境。在灾难面前，各类群体都迫切需要获取专业信息来弥补认知不足带来的恐慌情绪。抗疫Vlog均在内容生产实践过程向受众呈现疫情防控的措施和实际情况，解构了传统记忆叙事的权威性和唯一性，碎片化、小众化的个体记忆成为权威记忆的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谣言且稳定了人心。如武汉自媒体博主率先采用Vlog形式记录武汉“封城”后的24小时状况，同时被多家官方主流媒体转发和推广，共同深入报道武汉“封城”的新闻事实。

情感宣泄的出口过去只能依靠官方媒体平台，而如今数字技术的赋能带来了个人书写的可能性，让受众随时可释放、宣泄情绪。网民在匿名化、相对自由化的自媒体社交平台中，通过评说自身对于防疫的担心、恐惧或乐观的感受，或受到其他人的安慰和鼓励，在网络群体互动中有效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并在群体情感裹挟中，不断受到群体感染、暗示，最终凝结成对城市美好生活渴念的情感依附，从而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与城市记忆，转化成积极正向的社会情绪，有利于助推主流媒体或政府的抗疫行动宣传。

## 2. 媒介象征性符号实现情感联结

**媒介按摩的第二阶段：抗疫Vlog**在媒介生产过程中，借助象征性符号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会，把群体情感固定在时空框架内，通过凝缩符号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转移群体恐慌情绪注意力，以此建立受众间的情感纽带。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在探索符号“三元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符号结构之间的必然关系或运用规律，推导出符号“三分法”的方法观。<sup>409</sup>皮尔斯将建立在人们的约定规则上的符号称为“象征符号”，随着抽象程度的加深，对于象征性符号的理解难度也逐渐增加，其发挥的作用也更加凸显。莫里斯·哈布瓦赫强调，“当我们回忆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保留下来的是主体的一般观念、一些象征性符号、一些特别生动感人或者风趣诙谐的事件小插曲。”<sup>410</sup>这些象征性符号无法真正还原事件的所有细节，但它们可以唤醒存在人内心深处的模糊记忆，使得一种连续的关系让认同感得以长存。

Vlog的受众原本是职业、性格和生活观念各异的人，但他们因疫情这一时间符号组成“命运共同体”，共同讲述自身与疫情的故事。他们以疫情下的城市（武汉或广州）作为空间载体，借助真实、可视、可听的Vlog中的象征性符号，构建了一段有共同记忆的“武汉情感”或“广州情感”。“创作者可以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号，唤醒受众的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sup>411</sup>如在武汉抗疫Vlog中，“热干面”、“樱花”等符号都是武汉城市印象的典型代表，寄托着民众对武汉这座城市美好生活的渴望。广州Vlog中，“早茶”、“烧腊”这些日常生活里寻常的烟火气息在疫情期间也成为民众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象征性符号。人们在关注武汉和广州疫情时，关于“热干面”或“早茶”可能有不同的记忆和经历，但共性情感经疫情防控这一共同事件得到提取和凝缩，实现了群体对于城市、国

家的符号情感联结，从而获得对城市的情感认同；媒介通过美食味蕾的享受等象征性符号分散了民众疫情恐惧和恐慌的情绪压力，从而达致媒介按摩的目的。

### 3. 媒介仪式造势巩固情感认同

媒介按摩的第三阶段：借助媒介仪式特征进一步巩固受众的群体情感认同。戴扬和卡茨在创造“媒介事件”的概念后，将其含义进一步发展成一种仪式类型。在英国传播学者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理论中，其含义是“广大受众通过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些共同事件或活动中，呈现出一种具有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和行为。”<sup>412</sup>国内学者郭建斌结合媒介传播进一步阐述其内涵，“媒介仪式与未经传媒记录和传达的仪式传统存在时空结构的差异，前者在既往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未被意识到，考察媒介仪式应由过程分析转向时空分析”。<sup>413</sup>

无论是武汉还是广州抗疫Vlog，都是通过人们Vlog日常打卡或记录自己生活的象征性符号，成为一种共同的媒介仪式。如视频中“高考学子的自我鼓励”、“医护人员的励志话语”在媒介互动仪式中被赋予了不同群体情感的连接，升华了群体情感认同。媒介仪式以媒介为中心，发挥着构建共同认同、形成情感链接、促成态度转变的作用。“媒介仪式理论在其新的发展中，也明显突出了对情感的强调。”<sup>414</sup>两个抗疫Vlog都在媒介仪式中因疫情防控常态化得以保存和延续，同时Vlog的第一人称视角使得他人在观看时获得沉浸式体验和在场感，产生共鸣并在媒介按摩作用下，由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连接成集体记忆，并且“在电子媒介时代，人们总有借助‘媒介仪式’实现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需求，在过度娱乐狂欢中获取精神意义的寄托。”<sup>415</sup>抗疫Vlog正是满足了受众的这一需求，借助媒介仪式在生产过程的按摩逐渐构建成“情感共同体”甚至“民族共同体”，产生或进一步巩固对于城市、民族乃至国家的情感认同，具有承载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精神与凝聚性力量的意义。

## （二）从按摩到修复的情感变化逻辑

民众在面对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难免产生恐惧、焦虑情绪。而缓解这种情绪压力的途径一是通过人际间的信息、情感交流，降低负面情绪的蔓延，缓冲过度紧张的情绪压力；二是通过媒介信息接触，增强对外部环境威胁的认知程度，采用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威胁。通过对抗疫Vlog中受众的

情感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发现受众通过触媒后，在媒介按摩作用下实现群体情感释放及情感治愈的历程。其情感变化逻辑分为两个步骤。

### 1.群体感染凝结情感记忆

受众在媒介按摩的作用下，延伸个人记忆，找到群体归属，在情感释放中得到修复和治愈。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感觉和感官的延伸。”<sup>416</sup>具体来说，媒介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延伸。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提供了可能性，数字技术的赋权使情感记忆得以拓展和延伸。疫情期间，人们通过Vlog将分散的、碎片化的记忆进行记录和分享，甚至在社交媒体与其他个体产生互动和联结，形成了部分群体在网络社交中的共同记忆。两个抗疫Vlog都是由自媒体博主先进行自我记忆分享的引导，受众在留言评论区进行个人记忆书写，记忆的领地和范围随之不断扩大，最终凝结成为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所有能够打动群体想象力的事物，都是通过一种十分鲜明且惊人的形象而展现出来，此外则没有任何附属的解释；或者仅伴有一些神奇或神秘的事件。”<sup>417</sup>当有一个网民在进行关于“抗疫自信”的情绪宣泄时，那怕只是简单的一串表情符号，其他网民也会受其情绪感染，激起情感共鸣，不断进行互动式的书写回应。

与以往主流媒体的宏达叙事不同，两个抗疫Vlog的民间叙事视角都采用一些更贴近民心、更吻合民意，更通达民情的元素，日常生活烟火气息浓郁，指向民众关切和纠结的一些情绪敏点。“具有主体间性的多元个体，以生命叙事作为情感联结的方式和关系中介，凭借媒介的传播实践，引发生命个体间的记忆联结和情感共鸣。”<sup>418</sup>在众多留言和回复中，受众会在呈现人格化感性的媒介作用下，迅速记住其中的情感属性，而记忆联结和情感共鸣很大部分是来源于疫情对于人类的创伤，勒庞认为，当群体传播中，“有意识的人格消失了，无意识人格起主导作用，观念与情感通过暗示和传染转向一致，以及将被暗示的想法立即付诸行动的倾向。个体不再是自己，而是变成了一具不受自我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

<sup>419</sup>网民在触媒（观看抗疫Vlog）之后实现自我披露和他人治愈的效果，尽管个体独立意识和人格消失，裹挟在群体情感宣泄的狂欢中，个体也能获得情感释放、从而达到按摩及修复的治愈功效。

### 2.群体认同修复情感创伤

受众在媒介按摩过程中通过协作、符号和仪式延伸情感记忆、治愈创伤，其构建的积极向上、共克时艰的集体记忆可以形成群体感染的情感共同体纽带，从而起到情感修复和治愈心灵的作用。“认同”一词源于拉丁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常用来指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特殊情感联系，Tajfel和Turner在进一步研究群际行为及其关系之后，认为群体行为是以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并提出著名的社会认同理论。<sup>420</sup>Algesheimer, R., Dholakia, U. M. & Herrmann, A.也提出，“群体认同是群体成员对群体规范、传统、仪式，与目标的认同，以及怀有促进群体发展的意愿。”<sup>421</sup>个人要发展成对一个群体的认同需要经过认知维度、评价维度以及情感维度，受众会在认知与评价的基础上在情感上认同其他成员及其组成的群体，获得情感上的群体认同，“同时成员忠诚度会随之增加，对于群体活动也会产生更高的参与动机。”<sup>422</sup>这意味着群体认同会让成员们更加愿意参与到集体建设中，共同治愈疫情带来的创伤。据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的创伤理论，“文化创伤建构具有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记忆特征。”<sup>423</sup>

两个Vlog文本都出现了受众在评论区进行情绪宣泄的大量评论，其中武汉抗疫Vlog比广州抗疫Vlog的情感表达更丰富。“书写实践可被视为一场协同生产仪式，而诉诸于社交平台的在线书写无疑拓宽了这场仪式的范围，丰富了私人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的想象力。”<sup>424</sup>在群体生产的大协同中，弹幕生产就像群体交织的大合唱，看似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部，但最终会将群体的声音协调起来，贯穿成相同的旋律。勒庞认为，“群体的信仰和想法得以传播，所凭借的机制从来都不是推理，而是感染。”<sup>425</sup>正是网民在内容生产实践中受到群体感染的影响，正面情绪的大合唱（大多数网评）终将感染多数人，将个别不和谐的杂声（个别负面情绪的宣泄）淹没在高亢的、激励人心的大合唱中，裹挟着网民的情感慢慢修复、愈合病毒所带来的恐慌记忆、伤痛记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理论延伸出媒介的抚慰功能，同甘苦共、患难真情让情感记忆得到深化并形成群体想象，网民在群体感染中获得群体性想象的力量，从而修复情感创伤，消解负面情绪，达致心灵治愈。

#### 四、小结

迄今为止，麦克卢汉的很多媒介技术理论仍然广受学界争议，但随着新媒介的高速发展，许多看似令人费解的预言都被逐一证实。“媒介即按摩”这一理论

是麦克卢汉媒介观中重要的一环，是我们拓宽媒介认知的“大门”，更是开启探索当下媒介如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变革，甚至在新世界格局中如何开启新视野的一把“金钥匙”。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造成深刻而沉重的打击，更让无数民众饱受谣言、阴谋论、恐慌、焦虑的困扰。“数字化的技术革命对于传播格局深刻而巨大的重构，使所有按照传统模式治理传播和舆情的做法都成为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菜鸟’操作。”<sup>426</sup>同时也在敲醒警钟：在媒介化环境中，媒介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可舒缓民意、可鼓动舆情、可释缓焦虑、可躁动恐慌。亦正亦邪，就看媒介掌控者的格局和立场。

现代社会的特征在鲍曼眼中是“无固定形态的、流动的、液态的、运动着的。”<sup>427</sup>随着全球化风险增多，贝克也在《风险社会》中提出人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景象。<sup>428</sup>后疫情时代，民众在信息匮乏及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产生的恐惧感，在谣言四起的网络舆论中甚至陷入情绪恐慌和情感抑郁。媒介是人的延伸，在社会变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数字技术赋能的时代，抗疫Vlog可使受众在面对疫情时的情感得到按摩、宣泄和修复，如同纪录片一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载体，“突破国家、地域、民族、宗教、信仰等藩篱，寻找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激发人类共通的情感，进而实现情感认同。”<sup>429</sup>

如何在当今变动的世界中解决受众因不安全感陷入信息匮乏、恐慌焦虑“情感深渊”的困境，如何激发人类社会的有机团结、情感共同体的群体力量，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媒介按摩就是吉登斯在现代化风险中强调的“重构现代化的重要动力”，<sup>430</sup>其作为“情感疫苗”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也愈发凸显。尤其是在媒介政治化的全球传播格局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国内民情的躁动、焦虑和潜在的社会行动，还包括消解国际舆论场中对我们的疾病污名化、政治标签化、传播偏见化的误区。媒介应真正起到按摩的生产实践作用，形成人心之上的凝聚力和安全感，使得民众可以消除情绪恐慌，修复情感创伤，从而打破国界、种族、文化的限制，在后疫情社会治理中拥有稳定、理性的情感生活。

在我们正在遭受的恐惧与民主理念的削弱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恐惧文化正在削弱曾经存在于民主和非民主政权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恐惧会促使国家侵犯他们自己的基于严格对法治的尊重而制定出的道德准则。<sup>431</sup>（法国学者莫伊西）

## 第五章 情绪共振维度：媒介化环境下恐慌情绪蔓延机理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冲击着所有制度下的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控制方案在风险社会中受到挑战与冲击。作为化解风险危机措施之一的道德恐慌策略频频被派上用场。这种策略以社会冲突论为其立论前提，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标签理论、种族偏见、民族主义、族群边界为其理论基础，在现实运用过程中存在着悖论。

### 第一节 道德恐慌蔓延与规避

在深受全球化影响并致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德恐慌的症结与回应

西方国家曾因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辉煌而产生幻觉，对技术理性推崇备至。然而当危险来临时，人类制造的技术并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因技术的滥用给世界各国带来灭顶之灾，人类的生存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恐慌程度。人们终于停下急遽发展的脚步，驻足反思人文理性，反思在技术滥用与资源过度开发的二元悖论下如何寻求生存；反思风险社会下国家暴力机器及其所掌控的社会控制手段即所谓的道德恐慌策略是否合理。在西方国家，道德恐慌策略一词被认为是政客们影响民意、操纵选民的手段，通常与“社会异常行为”、“社会控制”相关联。他们将道德恐慌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利用媒体制造恐慌，炮制危言耸听的各种概念，将常规的暴风雪、暴雨、台风定义为“极端恶劣天气”、将“定时炸弹”这个词滥用在一切日常生活中。媒体常常用夸大其词的比喻来制造恐慌，引发公众思考、担忧自身的异常行为导致道德的亲和力缺失，从而接受媒体对各种“怪诞的、异常的行为”标签的符号隐喻，产生道德恐慌。

前文已述，“道德恐慌”最早出现于科恩的著作《民间妖魔和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摇滚族的创造》，指的是“公众在错误的或被夸张的信息支配下所产生的风险认知和带有恐惧心理的集体反应……”<sup>432</sup>与通常的恐慌相比，集体道德恐慌的驱动力来自公众对某种威胁的一致性道德判断。科恩将新闻称为：“关于社会规范轮廓的主要信息来源。”<sup>433</sup>这种远见已从新闻内容的信息提供维度转移到了建立对是非的共同理解的道德角色。信息传播被用夸大的言辞制造威胁性的局面，并对小群体产生恐惧感。

在斯图亚特·霍尔等看来，暴力事件引发的道德恐慌所指向的是远远超出普通街头“犯罪”的、更为深远的统治危机，以及社会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转型；抢劫以及媒体围绕这一公共议题所建构起来的道德恐慌只是深层社会冲突的表征道德恐慌的媒体叙事，加剧了将某些特定阶级或种族背景的群体罪化为“民间恶魔”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危机的替罪羊的趋势。正是新闻媒体对“行凶抢劫”，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危机和道德恐慌之关联的建构，为后来的舆论对特定事件的定义提供了意义阐释的限定性框架，进而为更为广泛的趋向保守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转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sup>434</sup>

以技术为导向的道德恐慌的传播者经常讽刺新技术并过分强调它们的激进能力。<sup>435</sup>同时，数字媒体为道德恐慌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导致羞辱事件和更个性化的焦虑表现。媒介则被视为具有扩大这种“恐慌”的倾向。道德恐慌策略就是要在人们心中灌注恐惧，并就此鼓励他们回避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躲进一种城堡式心态——一种无望、无奈、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心态。西方政客炮制的阴谋论、谣言、偏见、种族歧视等虚假新闻更是充斥着媒体舆论空间，混淆视听。

在此，媒介所制造的道德恐慌客观上诱发了个体恐慌，在媒介化环境下个体恐慌在群体传播影响下又逐渐形成群体恐慌。在大流行初期嫁祸病毒缘起中国武汉，甚至命名为“武汉病毒”，妖魔化了中国人和其他亚裔美国人。“病毒”和“功夫流感”，将中国人妖魔化为威胁和危险的更大和熟悉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sup>436</sup>长期以来，精英们一直试图通过制定与福利和非裔美国人或移民和拉丁裔等群体相关的某些政策来塑造大众态度。<sup>437</sup>道德恐慌是分析媒介隐性意识形态导向的有利工具。那么，道德恐慌的蔓延机理是什么？其社会根源是什么？在经历了大众

媒介几十年的发展和衍生后，数字化时代下又应该如何警惕和防范？

## 二、道德恐慌的蔓延机理与社会根源

### （一）道德恐慌的蔓延机理

根据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博士论文《民间魔鬼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 Moral Panics），“道德恐慌”的进程模式包含首尾相继的七个环节或步骤：出现（emergence），媒介库存（inventory），道德卫士，专家（experts），处理和解决方式，消褪（fade）和社会遗留（legacy）。<sup>438</sup>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指出：“之所以提出这个模式不是因为要为其争得理论的正当性，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工具。”<sup>439</sup>可见，道德恐慌本身是一种引导舆论的工具。道德恐慌的七个步骤是如何实现引导舆论的呢？其蔓延机理如何？

第一步：“出现”是指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突发的、应激的、反常的事件或事物发生变化的端倪，媒体敏锐地捕捉到并将其曝光于民众面前，引发民众争议，使之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并赋予其道德隐喻或象征。如新冠病毒爆发后，西方媒体率先将其溯源为“中国病毒”，先发制人，从病毒命名开始就贴上歧视标签、偏见标签，赋予病毒政治含义，误导西方民众的医学认知与道德情感。

第二步：捕捉到敏感话题之后，媒体需要赋予话题一定的意义，即象征。赋予意义需要采用一定的策略来包装，接着就是第二步——“媒介库存”，也即是媒介使该议题变得显著的多种策略。一般有四种：一是“夸张”：将小范围的数据和事件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如夸大其词，将日常气候变化解说为“极端恶劣天气”，将天气变化与资源浪费之间关联到一起，赋予天气以道德含义，从而引发公众对破坏自然环境行为进行道德审判；

二是“扭曲”，对事件具体的物象进行有悖于原意的理解和发布。如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于2020年2月3日发布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污名化中国的不实报道。此前《华尔街日报》就多次发布辱华的歪曲文章，如《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物武器》、《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等污名化中国的恶劣行为》。这些都是违背事实、曲解疫情的恐慌策略运用，其用意不言自明，制造病毒政治舆论，让中国为病毒背锅。当然，美国媒体的警报功能也没发挥多大作用。著名电台评论员拉什·林博断言新

冠病毒“就像普通感冒一样”，大众对科学的无知和不信任导致许多美国人无视社会疏远警告并采取鲁莽行为，使得病例不断激增。<sup>440</sup>

三是“预言”：根据已有的事件现象随意预测类似的未发生事件。长期以来，美国精英们一直试图通过制定美国人与亚裔、非裔、拉丁裔美国人的福利政策区别来塑造大众的种族优劣态度。<sup>441</sup>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大流行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将“激活”大众中的反亚裔态度。右翼媒体的普通消费者有可能将这种流行病视为“自由主义骗局”，他们往往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采取羟氯喹等伪疗法并拒绝采取预防措施。<sup>442</sup>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说，美国的国家治理机构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情况变得更糟了。恶化的进程一直以惊人速度继续，并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民众的恐慌情绪、焦虑情绪受突发事件的刺激集中爆发，出现仇恨亚裔、民族主义暴力等极端恶劣行为。

四是“象征”：即当中下层媒介的程序化、陈规化、夸张和歪曲等特点能够被高端媒体所复制，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议题进行反应，“象征”便产生了。活跃于大流行中享受更多互联网访问的权力结构顶端的演员利用不同的特征，如贬义图片、夸张图片和歧视性漫画，有效地将种族歧视的网络道德恐慌传播给他人，这是由个人通过网络空间复制和传播。在线社会权力不再简单地掌握在少数人或精英手中。虽然道德企业家和政治家可以对媒体和社会思想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但观众在创造、复制和影响内容方面同样积极。<sup>443</sup>

第三步和第四步可以合并为同步进行：媒介运用这一系列的策略后，往往还不能完全说服民众，此时，媒介会将专家、道德卫士这样的权威人物抬出来，以增强其议题的说服力。政治精英扮演专家角色：大流行期间，西方政客一贯的甩锅行径暴露出资本主义腐朽、糜烂的本质。以特朗普为代表，炮制各种反智言论，制造种族歧视、仇外政策情绪，试图转嫁疫情治理不利的窘境。种族歧视在流行性疾病中早已存在。<sup>444</sup>特朗普和助手一再无视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和流行病学家的建议，连他的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都看不下去，领导了一场诋毁他的运动。<sup>445</sup>

第五步：处理和解决方式。长期以来一直助长民族主义幻想的美国例外主义传统对其发源国产生了残酷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对事实和专业知识不屑一顾，并相信宗教领袖，因此故意拒绝戴口罩等科学建议。对市场的信仰和顽固的个人主义导致许多人将公共卫生措施等同于奴隶制或社会主义。新冠病毒已经渗透到美

国社会的每一个裂缝和断层线，暴露美国深刻而长期存在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

第六步：消褪。人们不会长久地沉浸在媒介报道的恐慌议题中，民众会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如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通过分享代表民间草根价值观的图片、视频、表情包等信息减轻媒介所制造的道德恐慌。互联网允许一种新形势的网络空间社交，其中包含许多技术进步，用作人们交换信息、享受相对匿名和向未开发的大众受众分享他们的社会观点和价值观的渠道。<sup>446</sup>

第七步：社会遗留。经过媒介一番赋予含义的策略操作、权威人士解读后，道德恐慌产生，同时，道德恐慌会沉淀为民众的集体记忆，长久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当类似的突发事件再次发生时，人们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自然联想到该事件的道德含义。媒介通过扮演道德卫士来增强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无形中加剧了社会公众的群体恐慌，以致于当人类发生自然灾难或社会灾难，不仅是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暴雨洪水事件、大饥荒等等，媒介都会扮演道德卫士，不断强化标签化的信息。<sup>447</sup>

## （二）道德恐慌的社会根源

一是焦虑感与无助感：现代性社会急剧变迁带来的必然后果。大流行期间，过度个人主义、高度宗教信仰、对科学的无知、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以及对市场的迷恋。这些力量造成了一个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美国内矛盾重重，无暇维系社会秩序，疫情爆发后更暴露出国家治理中的种种缺陷。中国武汉疫情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贴各种病毒标签，企图以命名病毒的方式转嫁本国危机，引导民众关注焦点，赋予病毒传播以道德审判的逻辑。这种大流行初期的错误精英言论直接导致西方民众的反亚洲态度，表现在种族歧视、仇外政策情绪和一些大众公众的行为中，引发许多国家的骚乱、华人被殴打等暴力事件。这是政府与媒体制造的道德恐慌引发的社会焦虑感和无助感。人们在疫情爆发后处于深深的恐慌中，媒体的嫁祸言论、政客的甩锅行径无疑是赤裸裸的制造道德恐慌，加深疫情扩散所造成的精神伤害，让人们活在恐慌臆想的深渊中。

二是疲劳感与虚妄感：媒介频繁使用道德恐慌策略所诱发的信任危机。毋庸置疑，媒介运用道德恐慌策略可以帮助人们获得道德伦理上的安全感和平衡感，抚平人们在道德秩序遭到冲击时心灵所受的戕害。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德恐慌策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事物的两面性决定其必然带

来的负面影响，部分民众的心灵世界逐渐变得冷酷，他们乐于破坏、乐于消解、乐于攻击。如此恶性循环，基于道德恐慌策略所形成的对抗性社会关系将使道德情感暴虐化、普遍化，从而反过来不断破坏社会秩序。与欧洲或日本的同行相比，美国人更倾向于不信任他们的政府。<sup>448</sup>在市场信心和保守派媒体无情攻击的推动下，许多保守派尤其以高度怀疑的态度看待联邦政府。在最极端的表现中，这种不信任导致了荒谬的阴谋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拒绝遵循戴口罩等健康准则，甚至不愿意接种疫苗。<sup>449</sup>正是盲目的宗教信仰使得人们对科学认知表现出排斥态度，无视、轻视甚至藐视病毒。

三是挫败感与无助感：道德恐慌引发的民粹、反智与社会失序状态。据“韦氏辞典”解释，“反智”（anti-intellectual）是指反对或敌视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的观点或方法，该词首次出现于182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出。早在18世纪后期，美国就已存在反智运动，当时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中被用以攻击对方。随后由于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脱胎于欧洲文化下的美国急于摆脱欧洲印记，开始重视知识和科学的社会认知，社会中的反智浪潮才开始消退。20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极度泛滥，掀起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各个层面。<sup>450</sup>在此背景下，美国宗教在其内部制造了具有清教徒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清教徒怀疑受过教育的牧师作为中介会曲解对神的意志表达，更愿意自己从圣经中寻找神的指导。人们认为个人的实践经验比书本知识有用，而任何知识都是为实用主义服务，容易对知识产生蔑视心理。

20世纪80年代美国批评学家尼尔·波兹曼基于电视、印刷等媒介飞速发展的历史现实，指出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批评电视媒介娱乐化、碎片化、无逻辑性的表达使“我们不仅仅被剥夺了信息，而且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sup>451</sup>美国学者苏珊·雅克抨击美国的反智主义，称人们热衷于相信谎言，用非理性的方式抨击美国社会中的非理性现象，用反智语气讨伐反智主义。<sup>452</sup>戴口罩已被许多保守派视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专家”通常不被信任。

概言之，任何地域都具有仇外、排外的现象。从字面上看，仇外指的是对外族的恐惧。从现代思想体系的角度分析，仇外思想就是对外族的仇恨情绪。当帝

国主义自以为比其他民族高人一等时推行政治保护的政策，往往不考虑外来民族的存在。他们通常会竭力扼杀有竞争力的文化或民族对手。在帝国的形式下，蔑视胜过恐惧，狂妄胜过不安。民族主义更具戒心，其不安和仇恨更接近仇外思想。意识形态的倾向或是政治上的险恶用心需要寻找替罪羊。<sup>453</sup>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世界大战和文明冲突等各种危机以后，个体的心理失调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为西方社会的“病症”，它促使人们对社会运行秩序诱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德恐慌的规避

前文阐释了大流行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媒体在炮制道德恐慌时的策略以及运用的社会根源，对于我国如何利用媒体阐释公共卫生事件应当有所启示。当然，我们需要在批判西方媒体道德恐慌策略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在保障我国民众合法权益的条件下合法报道。

首先，我们必须牢牢掌握风险议题的设置与审查权，不能等到舆论环境恶化时才仓促应对。风险议题的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主动模式，即组织主动设置一些结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议题，并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和管理机制，使之成为目标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公共议题。二是借力形式，即组织针对外部的一些议题，特别是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议题，进行于己有利的引导和控制，实现‘外部议题-组织议题-目标公众议题’的良性互动，最终形成有利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舆论环境。

当然，要使这两种模式达到最佳效果，还须制定与实施一整套媒介策略以影响公众舆论导向。当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我们才有条不紊地开展。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问题上，需要立足于社会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条件，这是把握话语权的根本与关键。当前，我国借助新媒体抢占国际话语权，更是要把握历史性的生成性逻辑，把中国放置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分析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共性，打造出贯通中西方思想的当代话语体系。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西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国际社会出现众多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言论，包括“新冠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论”、“中国赔偿论”等，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巨大冲击。面临西方媒体的抹黑，媒体主持人、评论员先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今日俄罗斯”（RT）、半岛电视台、土耳其国家广播电视台（TRT）、埃塞俄比亚

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专访，及时反击西方不实炒作和辱华言论，以真实准确的数据全面、立体地展现事件真相，让抹黑中国的谣言不攻自破。

其次，我们需要掌握恐慌事件的话语权与解释权。我国媒体应该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根据它们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传播内容、传播框架和语言风格，寻找当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从而共同建构特定的传播叙事。同时，应对目标国的受众进行细分，有意识地传播更贴切的信息以提高中国的海外认同感与参与感，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传播覆盖。疫情发生以来，“截至 2021 年 3 月 7 日，中央广播电视台已与美国、英国、俄罗斯、阿根廷、阿联酋等 65 个国家的 70 多家主流媒体合作，提供了 138 次连线报道，制作的新闻、专题等节目被包括 CNN、福克斯新闻、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 24 电视台、“德国之声”等在内的全球 1650 多家海外媒体使用超过 9.8 万次。”<sup>454</sup>

最后，我们还要建构道德信念与安全的支撑体系，以消除道德恐慌的负面影响。以行动道义、大国责任和实际贡献来充当国际话语权的价值来源。在面对最紧迫的“免疫鸿沟”问题，中国在产能有限、自身需求巨大的情况下履行承诺，“向 80 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 43 个国家出口疫苗，目前中国已向全球供应 3 亿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sup>455</sup>一直以来，我国不断积累与分享抗疫成果，在疫情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有逐渐增强的态势，媒体应在国际舆论中继续加大构建“中国抗疫贡献论”、“抗疫国际合作论”、“全球公共卫生命运共同体论”等话语策略力度，持续对我国疫情对外援助等系列实践及成果进行针对性议题设置，在报道中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彰显我国负责任、和平、友好的大国形象，破除以美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我国的道德恐慌和政治污蔑。

臆想也好，凝视也罢，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认知，尤其是对中国的认知，充满了偏狭的刻板印象。在倏忽间崛起的大国面前，难免产生内心的恐惧和排斥。失范（anomie）最早由涂尔干提出来。失范既代表了社会秩序紊乱和道德规范失衡的反动倾向，又是这一理论无法逃避的社会基本事实；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序言中谈到：“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那些最强的势力就会在弱者的对抗中独占

上风，使后者屈尊于它的意志。”<sup>456</sup>在涂尔干看来，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里，道德的防线顷刻之间崩溃了，个体的欲望汹涌地喷发出来。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the moral vacuum），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引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变成了毫无控制的非社会存在(asocial being)。<sup>457</sup>我们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

## 第二节 群体动力论视域下的恐慌情绪蔓延机理

### 一、群体动力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社会集体行为的频繁发生就已引起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所谓集体行为，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sup>458</sup>即是指人们在暂时的、无结构的、非制度化的社会聚集人群中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共同行为。在不可预料、自发、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如集群、骚乱、时尚流行与恐慌等。将网络舆论中潜伏的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是保持社会稳定性的前提，是消除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社会运动的根本保障。

美国心理学家尼尔·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提出了一个解释群体行为的“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分析造成群体性事件发生所需的社会条件。斯梅尔塞认为，所有的群体性行为、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发生，都是由 6 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 6 个因素即是：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触发因素、行动动员、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当这些因素以孤立的形式出现时并不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有当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时，它们的价值才会被放大，群体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有学者认为其“阐述了风险因素累加形成的结构压力和群体认可在遇到偶然诱因时，就可能得到那些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处境相同社会群体的快速响应，如果政府疏导和调控不力，群体性社会冲突就会发生。”<sup>459</sup>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群体恐慌，在集体行为中进一步实现群体情绪感染、蔓延，其事态本质和发展机制都符合“价值累加理论”的六大因素。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及体制快速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结构、社会体制以及大众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各主体间的利益矛盾也成为群体性行为冲突的主要根源。疫情以来，人们在受到威胁、恐慌和不安等情绪感染的情况下，在群体中将情绪进行传播、蔓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指出，“有意识的人格消失了，无意识人格起主导作用，观念与情感通过暗示和传染转向一致，以及将被暗示的想法立即付诸行动的倾向。个体不再是自己，而是变成了一具不受自我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sup>460</sup>“价值累加理论”的诠释框架也将是我们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体情绪的特征及其蔓延机理的重要工具，更是直面

和解决中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中解决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现实借鉴。

## 二、情绪及群体情绪感染

### （一）情绪感染

情绪传染和扩散最终根植于人们的心理过程。情绪感染过程表现为个体在受到他人情绪影响后，无意识地情绪模仿中体验他人的情感，还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绪感染，尤其是群体内不同成员之间情绪的相互感染和扩散过程。在突发性事件爆发初期，人们的恐慌情绪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广泛出现，既是认知缺陷导致的恐慌不安；也是基于媒介化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带来的情绪感染，最终在群体内部相互影响后产生恐慌臆想，加剧恐慌情绪的扩散。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接受外界的所有信息，二是有所选择地接受一部分信息，忽略另一部分信息。选择性注意如同过滤器一样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筛选，英国心理学家布鲁德本特（D. E. Broadbent）提出了注意的“过滤器模型”。过滤器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只有新奇的、较强的、具有生物意义的刺激以及为人所期待的信息才能通过而收到注意。<sup>461</sup>个体情绪也在“过滤器模型”的不同情景下呈现多种类别，拉塞尔认为，“个体情绪主要有六种类型：兴奋、喜悦、轻松、愤怒、焦虑和悲伤。”<sup>462</sup>这六种情绪类型后来也被学者 Izard 分为正性、中性和负性，并且负性情绪一般比正性情绪更容易得到传播。在此次的新冠疫情中，个体情绪主要以负性情绪为主，并通过受众互动，以情绪感染为机制，个体情绪会在媒介中转变为群体情绪，同时“个体情绪逐渐扩散为群体情绪，群体情绪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个体情绪，这是一个情绪感染的过程。”<sup>463</sup>疫情中，个体由于对外界信息的选择以及信息不全面导致了恐慌情绪的产生，也通过互联网各种媒介将恐慌情绪在群体中进行大范围传播、感染，群体恐慌又会进一步强化个体的情绪，造就了一场情绪循环。

### （二）群体情绪感染

同质化情感群体内成员间交互性的情绪感染和情绪循环极易导致群体情感极化，是群体情感极化的前阶段。群体极化最早是指群体认知赫恩群体决策，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斯·斯通（James Stone）发现，“如果一开始群体内成员的意见比较保守的话，经过群体的讨论后，就会变得更加保守；相反，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的话，那么讨论后的群体决策就会更倾向于冒险，这种现

象被称为‘群体极化现象’。”<sup>464</sup>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也明确宣称：“群体会走向极端，进行讨论的一个群体的成员通常会到最后所采取的立场，与讨论前成员所持有的倾向总体相同，而且更为极端。”<sup>465</sup>

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多项研究，发现“群体决策在方向上与个人决策一致，但比个人决策更倾向于极端化。”<sup>466</sup>学界认为造成群体极化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服性理由假设（persuasive argument hypothesis），在群体讨论的过程，成员会不断提出新的理由支持某种观点，这也进一步使其群体意见趋于极端；第二种解释是基于社会比较和自我展示理论（self presentation processes），群体讨论的过程中，为获得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可，许多人往往会同意并跟随主流观点并将其展现得更极端；最后一种解释是社会认同过程（social identity process），个人希望得到群体的认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尽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群体的“集体声音”保持一致，呼应了“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群体的从众属性和无意识心理都为群体情绪感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群体观点趋于极化现象。加之，网络的匿名性、互动性为群体情绪感染和极化提供了“温床”，匿名性会降低网民对于社会规制的感知，在“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与网络社交互动中，群体恐慌情绪得以感染、扩散甚至是出现极化。

###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周期的情绪特征

从事件的宏观性视域即量的堆栈进行建模，可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生命周期划分成四个阶段：潜伏期、扩散期、爆发期、衰减期。（见图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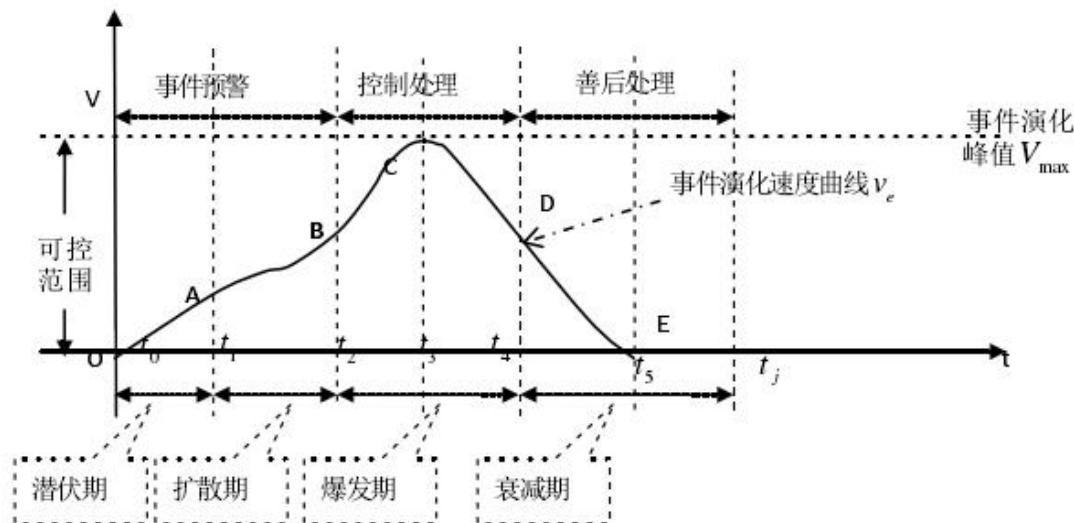


图 5-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引发大范围社会舆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信息的传播规律遵循着信息进化论的逻辑思路，可以在生理、心理、行为三个层面上协同进化，具体包括生物遗传信息进化路径、群体情绪感染路径及公共卫生事件行为结构路径。在潜伏期、扩散期、爆发期、衰减期这四个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模因是文化领域类似于生物学中基因的信息结构。理查德·道金斯 1976 年提出文化领域具有和生物学的基因功能相似的功能，他把这一功能单位命名为模因。<sup>467</sup>道金斯认为模因是基因的文化类似物，因为模因能够自我复制、变异，而且能够适应选择性压力，是传播话语、思想、观念、符号和实践等文化行为的复制因子，人类社会的进化既有基因复制的生物原理，也有模因复制的文化根据。基因的复制与疾病的传染具有相似的原理。从信息进化论视角审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体情绪传播规律（见表 5-1）。

表 5-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的群体情绪特征

突发事件 生命周期	生物遗传信息 进化路径	群体情绪感染 路径	公共卫生事件 行为结构路径
潜伏期	模因激活	群体恐慌	社会传染
扩散期	模因复制	群体盲从	社会围观
爆发期	模因变异	群体极化	社会冲突
衰减期	模因转移	群体理性	社会认同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伏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伏期，是网络上开始出现网民对某个事件的意见、评论、建议、态度和观点等。这些新的意见、评论、建议、态度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更新推进。当议题能够与网民产生共鸣时，越容易被公众注意和记忆。疫情爆发初期，公众处于信息饥渴状态，疫情的强传染性、高致病率以及疫情之殇的文化记忆都使得公众高度紧张，由此激活疫情相关议题。在互联网上，不同意见经历了零散、汇聚、分流的过程，完成了多元意见的重组、同化，最终以某种总体倾向或所指构成一致性建议。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于无形，病例的出现意味着存在病毒传播的风险，极易引起公众群体性恐慌，且伴随着群体动力机制的作用，恐慌情绪在更大范围内传染。网民就疫情议题展开对话、交流，舆情议题也以多种形态在社会网络中传染，如流言、谣言、八卦等。“情绪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影响人们的决策判断”，<sup>468</sup>

疫情初期专业人士也无法即时给出全部的权威信息，人们由于信息匮乏极易产生恐慌情绪，并在群体情绪感染模式中形成“情绪性谣言”。情绪性谣言在某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情感交流”，它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并为恐慌情绪寻得“情感出口”。当然，恐慌情绪并不会在谣言的初期便爆发，更多是在人类情感抑制机制中保护自我。乔纳森认为，负性情绪的防御机制框架主要以抑制、增强和转换为核心内容。情绪性谣言在抑制机制中也随之进一步聚集、扩散，使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伏期逐渐发展到扩散期阶段。

##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就是网民将所关心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点击、评论并加以复制和转发。如现在自媒体中通常的微信朋友圈、QQ 空间以及各大 BBS 论坛等就是点击和转发重要的扩散方式及平台，各网络新闻媒体的点击、评论也是事件扩散的重要方式。进入信息扩散期后，网络议题模因在网络传染中不断复制。疫情防控更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工作，散点爆发小范围疫情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进一步扩大疫情相关议题的影响力。在疫情网络舆情的特殊场域中，普通网民并不能迅速掌握全部信息，所持有的观点多来源于道听途说和主观猜测的结合，常常会陷入盲目从众。

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小范围爆发疫情往往会放大为全国关注的新媒体事件，引发网友围观，信息发展进入中期信息扩散期。网友对于信息的传播扩散行为，逐渐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在盲目从众的谣言和人际传播中也极易转化为危机事件。新媒体的普及使得“全民皆记者”，人人都可以手握麦克风的时代可以对疫情的相关内容进行转发、评论，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也使其传播内容包含更多的想象和揣测，形成“社会围观”的传播现象。社会围观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指向了一种信息流量，“所谓社会围观状态，即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的一种自觉化、普遍化的传播参与状态。”<sup>469</sup>围观者会弱化言论与其的关系，基于好奇心理、从众心理和漠视心态扮演“看客”的角色。新媒体赋权的结果，使得社会围观的对象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使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各类主体矛盾不断凸显，从而成为某一主体激发和宣泄情绪的导火索，迅速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和传播。

##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期，是指经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伏和扩散之后，舆情信息是在网络中进行海量传播和大范围扩散过程，参与的网民人数呈现

出指数增长，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阶段，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处理，因为舆情信息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临界值，有可能从网上发展到网下，形成线下的群体性事件。在舆情的高峰期信息高涨期，舆情态势复杂，疫情相关议题在被复制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修饰或者其他变化，即发生议题的变异。如初始议题深层挖掘产生次级议题，又或者偏离初始议题指向。疫情相关的众多议题也会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竞争、选择、淘汰，最终保留下来的议题就成为了整个疫情相关的中心议题，网络群体讨论极易造成群体舆论极化。随着疫情形势的不断发展，相关防疫信息持续披露，进入高峰期信息高涨期。疫情防控措施的出台会触及特定群体利益，引发一定的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是指规模较大的群体之间的对抗。网民由于沟通、抗议无果，进而通过网络相互联系，组织动员，开展网络集体行动是对抗性行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网民权益无法得到制度性保障时，往往会引发公共事件。曾建雄提出，“公共事件关涉公共利益，是指那些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牵涉面广、影响力大，从而被社会关注，并引发议论和参与的事件。”<sup>470</sup>在社会冲突形成的网络舆论会不断发酵，其中的“情感”也不断成为记忆点和传播点，也有学者提出“情感共振”是分析新媒体事件下社会动员的维度。<sup>471</sup>在带有情绪的舆论中，特别是负面情绪，古文有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情绪的煽动性也会促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向呈现爆发期。大众在恐慌、不安和压抑等负面情绪中迫切需要一个宣泄出口，加之媒介为其提供了便利性极高又具匿名性质的言论环境，大众的情绪言论也将如同“洪水猛兽”在各类公共话语空间中爆发式增长，转变为爆发期。

####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衰减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衰减期，有自然衰减和控制衰减两种。自然衰减是指不需要政府出面控制，网民由于时间的推移或者其他事件的涌现，分散其注意力，从而使得对事件关注的网民逐渐减少。出现自然衰减的原因一是疫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事件真相会得到时间的验证，很多谣言会不攻自破，网民的恐慌情绪会得到衰减，从而减少对事件的关注；二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不管是其注意的对象还是范围。互联网信息是爆炸性的，一旦出现其他更加新奇的爆点事件，网民的注意力会被迅速转移，同时网民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鲜度和热度也会出现下降。控制衰减则是政府需出台相关措施对新冠疫情进行管理，从而使得事

件逐渐平息甚至消亡。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威信息的不断公开和公共讨论的持续深入，信息发展进入后期信息衰减期，公众对疫情议题的讨论会逐渐走出感性，趋于理性，而当现实行动介入得当，事态逐渐得到控制，网民逐渐形成对该事件的一致看法，网络舆论逐渐消散。同时还有研究表明，“从传播者的角度而言，传播者的亲和力、专业知识以及使用策略等都是影响受众接受说服信息的重要因素。”<sup>472</sup>政府的控制衰减不仅可以通过权威信息的不断披露和深入报道，还可以通过专业知识丰富、可信度强的意见领袖有效削减网民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注意力。此次疫情中，出现如“钟南山”、“李兰娟”等权威意见引领人士，在公共视野中发表观点，从而安抚大众的恐慌情绪，最终使得事件的热度得到下降。

#### 四、群体动力论视域下的情绪蔓延机理

新冠疫情爆发后，网民疫情中政府管理水平、医疗机构的应急能力、社区救助、媒体传播等各方面进行评判，由此产生的各种情绪会即时映射在网络空间，并且基于不同的认知、态度、情感，形成聚合。特别是当这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众多网民关注并持续“围观”时，就会产生网民集群行为。当大量人群围绕特定主题聚集起来并且负面情绪逐渐高涨时，缺乏有效的应急响应就有可能由线上的负面情绪发展为线上线下的攻击行为。2003年SARS爆发时民众的恐慌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一样，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集中体现了民众在群体感染和群体情绪裹挟下，认知缺陷与媒介信息传播不畅造成的群体恐慌。类似的事件全球普遍存在，只是地域文化差异，人们的恐慌程度不同而已。“这些问题交织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这起看似“偶然性”的群体情绪背后存在着群体动力的“必然性”动因。

斯梅尔塞认为，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tiveness）是导致集合行为的一个首要因素，“特定的社会结构是造成特定群体性事件的温床。”<sup>473</sup>后现代社会中，西方社会秩序的混乱、信仰坍塌、民粹主义思潮蔓延、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这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流行，而是蔓延全球的思潮和运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幸免，如占领运动，从占领纽约、占领东京到香港的占领中环，台湾太阳花运动，都是弥漫全球的社会运动和民粹主义思潮所致。涂尔干认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里，道德的防线顷刻之间崩溃了，个体的欲

望汹涌地喷发出来。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人们找不到理想、信念的迷茫中，接受各种社会不公的事实，“躺平”、“佛系”“丧”流行在青年群体中，社会结构出现断裂是导致集合行为的必然诱因。

其次，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是集合行为的又一诱因。斯梅尔塞认为，结构性紧张“是人们普遍感觉社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如社会压迫与剥削等。而既有的社会权威与制度体系被认为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sup>474</sup>造成大众在疫情中的恐慌情绪，与“结构性紧张”下形成的相对剥夺感是分不开的，这也将加剧群体矛盾与冲突。在心理学领域，“相对剥夺感是当个体认为他们自己或其群体所得到的结果不公平时产生的愤慨感。它是一种对不公平的情绪体验——人们感到一种报酬或结果被不公正地剥夺了。”<sup>475</sup>Crosby 模型认为，“想要”和“应得”（或有权利）是引发相对剥夺感的关键因素。<sup>476</sup>新冠疫情的初期，大众对于全面、权威的信息无比渴望，人们迫切地希望可以知晓事件的全貌，从而保障个人生命财产安全，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的基本权利。再而是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之后，在现实中也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轨迹，这也将引起大众的反抗情绪，认为其被“限制”了自由，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

相对剥夺感的来源除了人们对于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之外，也可能是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获得的压迫感，这一点也是对结构性诱因的拓展和补充。“个人自我判断‘被剥夺’与否主要是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参照群体的地位作对比，如果所选择的参照群体不同，其认定的‘被剥夺’程度也不尽相同。”<sup>477</sup>社会的腐败问题在近年来的整治过程得到有效控制，但在疫情这个“放大镜”中也会被曝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需要职能部门的紧密配合和高效工作，即使是细小纰漏也可能影响大局，所以许多不曾关注或发现的问题在防控过程被放大，这也将引起群体性的不满。群体在平常时候缺乏合法渠道宣泄其不满，疫情的信息传播恰好是宣泄“被剥夺感”的绝佳机会。孙立平认为，“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sup>478</sup>因此，在此情况下，相对剥夺感引发的群体结构性要素紧张与脱节也为集体行为提供了温床。

第三，一般性信念（Generalized beliefs）是集合行为产生的必要因素。群体行为的参与者必须对他们诉求的社会问题达成一种一般性的共识，这个共识的产生要被所有参与者清晰的理解并赞同。社会意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当

民众无法通过主流媒体了解事实真相时，只有依赖互联网上的小道消息，结果产生的“一般性信念”即是对政府和主流媒体的不信任。社会学家赵鼎新指出，“在斯梅尔塞眼里，这种一般化共同信念或普遍情绪的形成，可能是出于愚昧和无知而产生的神话，但是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来源于一般化共同信念的认知，某种意义上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sup>479</sup>群体行为在感到结构性紧张之后对特定问题的产生症结和解决途径达成一般性信念，而小道消息也意味着其中夹杂着许多谣言。哲学界有句话，当真理还在穿鞋时，谣言已经走遍世界。有学者在研究 G·W·奥尔波特和 L·波斯特曼总结的谣言传播基本规律后，提出“谣言的流通量同问题对当事人的重要性以及有关命题的证据的暧昧性的和成比例。”<sup>480</sup>

一般性信念通常是人们基于正式渠道信息不足，从而围绕与切身利益相关或比较关心的问题通过谣言渠道寻求信息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主流媒体信息供给不足，加之政府舆论引导不足，就会促使人们把前文提到的结构性紧张转化为共同信念，或者称之为一般性信念。群体性突发事件一般都有潜伏期、扩散期的初期情绪酝酿过程，如果无法在事件发生后的黄金时间加以干预和引导，将使其发展为爆发期，虽然事件必然走向衰减，但自然衰减必将耗时更长、损失更大。因此，在第一时间及时、全面、客观地通过权威信息引导舆论，对于制止群体恐慌情绪蔓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黄金 24 小时”内进行处置，降低谣言基本规律中的暧昧值，谣言也将自动消失。

第四，触发因素（Precipitation factors）是集合行为的导火索，即直接诱因。斯梅尔塞认为，导火索事件往往具有偶然性，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色彩，直接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一个真切而敏感的具体刺激。有时这个导火索未必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的显著性和重要性，而在于出现的时机。“如果说有利的结构性条件、结构性紧张是为社会运动的发生做的铺垫，那么触发性事件就是发生社会运动的引爆机制。”<sup>481</sup>在有利的结构性诱因中，在严重的结构性紧张中，加之群体已达致一般性信念等多种因素的酝酿中，此时即使是一个很小的事件，都可以引爆整个集体行为的运动机制。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sup>482</sup>

在疫情期间，群体恐慌经过前期疫情报道的渲染、酝酿，如同随时爆发的火

球。如疫情中传播的谣言“双黄连可以抑制病毒”一经发出，便引起群体哄抢的行为，更有甚者哄抢兽用的双黄连以及双黄连月饼，在一个小小的切口中，群体的恐慌情绪一览无余。社会遭受疫情的灾害，人们对于生命健康保障的需求满足因其防控措施的进展受到抑制，已发生某些结构要素的紧张与脱节，人们根据互联网的各种谣言信息产生“为确定安全总得做些什么”的一般性信念，媒体关于“双黄连功效”的报道便成为触发因素，激活大众“集体求生”的冲动行为，造就更大的集体恐慌情绪蔓延。前期酝酿的恐慌情绪会使得大众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最终会在触发因素的引爆中引发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第五，行动动员（Mobilization for action）是继前4个因素之后的重要一环。斯梅尔塞认为，领导的权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无论如何，集合行为永远都不会缺少动员机制。集合行为的产生往往是受到个别意见领袖的动员，他们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煽动其他人跟从，成为有效的行动动员者。在每一个议题中，某权威人士的发言或是发言精辟的人都容易成为众人膜拜和追捧的意见领袖。在集合行为中，大多数网民只是盲从的发言，并非独立的思辨。在勒庞看来，“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sup>483</sup>若要将单独的个体汇聚形成群体，并发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首先是领导者的供给。在前期众多因素的酝酿中，一旦事件处理不够及时，再经领袖人物的煽动，集体行为将不可控。

同时，互联网是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其带来了“庶民”的胜利，让更多大众言论得以在舆论场上有一席之地。“互联网有着强大的信息传递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能实现快速、跨地域的信息沟通和策略制定，推动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要素快速形成。”<sup>484</sup>但作为拥有“第四传媒”力量的互联网，在大量舆论酝酿叠加和触发因素出现后，也成为了群体行为宣泄恐慌的工具。某些人在互联网上发表情绪性言论，激发其他零散的、并且有潜在行动动机的个体的共鸣，迅速将各个主体组织形成群体，在意见领袖的领导力以及谣言的助推下，借助网络的即时性、传播性，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会集体性行动。

最后，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Failure of social control）是集合行为产生的决定性条件。社会控制包括政府的政治、军事等法律机器，也包括报纸、

电台、广播电视台等舆论工具。社会控制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群体行为是否发生，在群体性行为走向危机临界点时，即使前五个因素都具备，如果社会控制能力较强就可以阻止集合行为发生，如果无能为力，集合行为就会产生。疫情当中，有些基层政府部门失职，不能及时有效地分析群体前期恐慌情绪的本质原因，并对其进行分析、监控、防范，将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究其根本，重大群体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大多数事前已发出预警信号，但因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使其从民意变成民怨，甚至发展成民怒，从而使恐慌情绪不断蔓延。当人们感到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没能得到官方纠正时，他们就自己运用法律的武器。现行的法律法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政府问责、满足民众的支持等保障仍有待完善，容易出现问责主体不清等问题，很有可能再次激起新一波的群体恐慌。当然，疫情的“放大镜”功能也使得社会控制能力有所提升，让许多问题得以浮现，从而在进一步建设中削弱群体恐慌情绪。但由于前五种因素的不断刺激，此时大众的恐慌情绪已到达新的顶点，群体的无意识性和盲目性让其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发表言论，使得舆论压力倒逼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得以提升。

## 五、小结

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诠释了集合行为的传播特征与诱导因素。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三个信息进化路径，在模因激活、群体恐慌、社会传染阶段，属于前期信息饥渴期，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事件发生信息，表明鲜明态度，防止谣言滋生；在模因复制、群体盲从、社会围观阶段，属于中期信息扩散期，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流调信息和权威处置措施，消除社会恐慌情绪。在模因变异、群体极化、社会冲突阶段，属于峰期信息高涨期，应不断更新感染人数，发布救援情况、逐步发布事故原因、消除社会谣言；在模因转移、群体理性、社会共识阶段，属于后期信息饱和期，相关部门应权威发布事件完整报告，公布相关责任追究措施，完善防范预警机制，实施整改方案，重塑良好公共形象。

有学者提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要取得突破，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分析当代中国国家—社会之间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作的复杂动态关系，才能找到较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sup>485</sup>集体行为在新媒体语境中愈发复杂，具有危机事件、冲突行为、网络舆论、多方对立等多重属性，并且集体行为的发生不会只因为单一的变量，而是由若干变量叠加累积共同发挥作用。研究

表明，“做到事件处置全过程的信息公开，可使事件尽快由‘公平性抗争’回归到合法渠道解决，避免因受蛊惑民众的参与而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升级。”<sup>486</sup>

如果我们可以充分把握斯梅尔塞的这一理论，从六个影响因素入手，密切监控网络舆情，从而在恰当时机控制恐慌情绪的蔓延，这也为政府有效解决群体性冲突事件问题打开新的认知世界。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使得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群体恐慌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播、蔓延的机制，更为我们认识不同性质的群体性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诠释视角。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动，无论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是国家间的冲突，都有可能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梳理集体行为发生的三个信息进化路径和六大发展阶段，得出群体性冲突事件的预防、控制方案，从而应对我国社会发展时期的各类群体冲突。对于世界性的群体冲突，摸清其情绪蔓延机理的前提下，将大大提高多方博弈的沟通效率，将冲突转化为正向的机制，改善群体关系，推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可以在实践中提高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维护世界稳定的秩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履行大国责任，在开放、合作与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见图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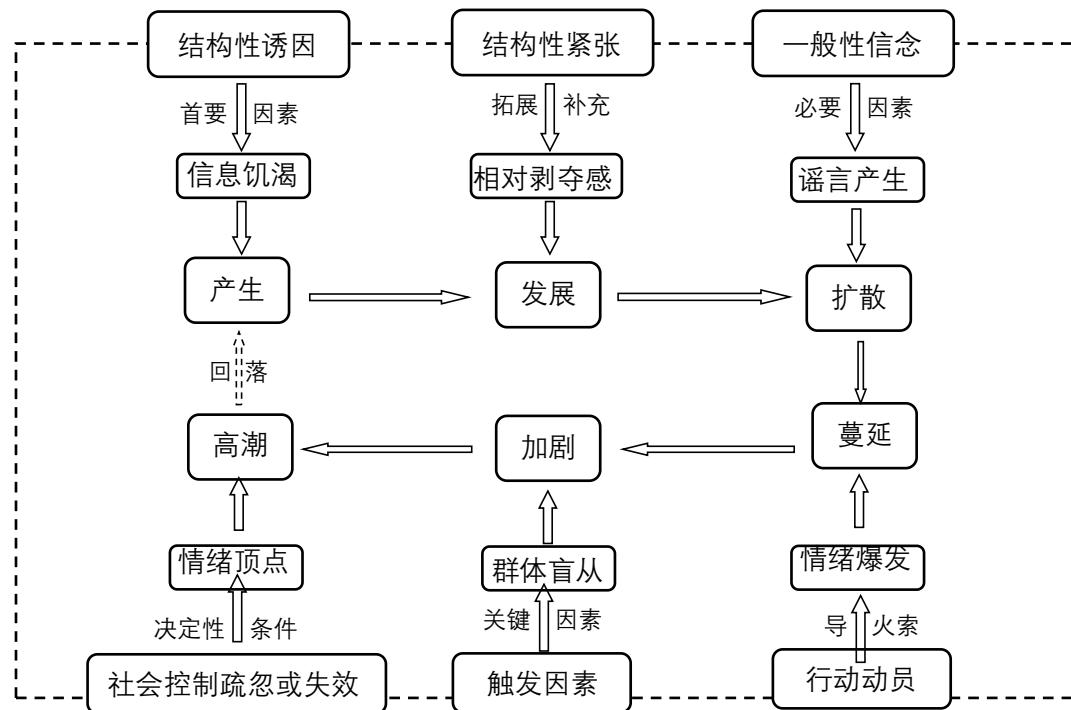


图 5-2 群体动力论视域下群体恐慌情绪蔓延模型

推动人类前进的恐惧和焦虑是认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

## 第六章 恐慌情绪疏导与健康传播环境的重构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迅速蔓延给全世界的人民造成健康威胁，引起了全球民众大恐慌，严重破坏人类健康共同体。群体恐慌是一种“以丧失自我控制为特征的急性恐惧反应，并具有非社会性和非理性的逃避，具体表现为行为上的无序和慌乱。”<sup>487</sup>在疫情期间，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政府和医疗部门应对病毒的经验不足、媒体负面信息传播等原因，引起个人内心失序进而引发群体恐慌情绪的大范围蔓延，甚至在恐慌情绪的作用下人们产生非理智行为。因此，需要对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并探讨消除群体恐慌的现实路径。

### 第一节 疏导之策：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

学界关于群体恐慌的研究较少从新闻与传播学角度研究消除群体恐慌的路径。本节基于情绪传染 SIR 模型，引入媒介环境因素 M（Media）并构建出 M-SIR 模型，以分析媒介环境中群体恐慌传播的产生机制；同时援引彼得斯对话与撒播观的理念，提出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应是摒弃霸权式对话，尊重事实的撒播，实现真正的“对话与撒播相交融”。宏观维度：政府应管控复杂的媒介环境，关注信息贫困群体；中观维度：媒体应尊重受众属性差异，深入一线撒播事实；微观维度：个体应提高应急信息素养，利用机会人人发声。

#### 一、极化：群体恐慌的表征及产生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给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的影响，产生了群体恐慌情绪，在恐慌情绪的作用下人们甚至做出非理智的行为。有必要探究群体恐慌产生的内在逻辑，这必将有利于今后对社会情绪的疏导。笔者基于彼得斯的对话观和撒播观来分析传播者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及现实路径，以期为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群体恐慌提供参考。

##### （一）群体恐慌的表征

一是心理层面：紧张、焦虑等应激心理蔓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指出，人类的需要包括了生理、安全、社会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方面的需求，其中，在高级需求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求。<sup>488</sup>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来临时，通常

会伴随着许多高度不确定和模糊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或群体会感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胁，并产生一种对环境的失控感，对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则变得十分迫切，从而激发出各类消极的心理应激反应。这种在心理上出现的紊乱状态，通常会使人们出现表现出紧张、担心、忧虑的心理状态，甚至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失眠、呼吸困难等生理反应。在新冠疫情早期，人们对病毒的认识不够，相关不实信息在群体中蔓延开来，对大多数民众造成心理冲击，群体恐慌现象尤为明显。

二是行为层面：盲从、激进等群体极化反应。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关于从众心理的“线段实验”，证明了在信息压力和趋同心理的作用下，个体一般会对多数意见实行服从态度。<sup>489</sup>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从众心理也是群体表现盲从和激进行为的心理特征之一。由于信息的高度不确定会将个体置于紧张焦虑的情绪当中，个体不得不去寻找相关的信息和相同的情绪属性以调节这种心理状态。而消极的心理使个体的知觉和记忆产生功能性障碍，并抑制个体理性的思维，导致个体对事物的判断力逐渐下降。<sup>490</sup>同时，群体对于事件的恐惧感也会由内向外地进行扩散，在这种暗示和感染下，群体恐慌情绪不断积压和升级。因此，当群体内部率先出现了行动时，大量个体就会表现出迎合的态度，盲从和效仿就会发生。如疫情期间的一则“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假新闻，使得药店中的双黄连药剂一夜脱销，甚至出现双黄连兽药、双黄莲蓉月饼被疯抢的荒诞闹剧。

## （二）群体恐慌的产生机制

情绪感染又称为情绪传播或情绪传染，是一种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诱发他人产生类似的情绪或行为的现象。<sup>491</sup>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信息传播通常伴随着相应的情绪感染。随着信息的扩散，群体间会产生恐慌、混乱、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随着程度的加深，会产生一些认知障碍或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1927年，学者 Kermack 和 McKendrick 在研究传染病传播规律时提出了传染病动力学模型 SIR 模型。<sup>492</sup>传统的传染病 SIR 模型如图 6-1 所示，<sup>493</sup>后续许多研究将该模型应用到情绪传染领域中。具体而言，可以根据恐慌度将 SIR 模型划分为易感群体 S (Susceptible)、感染群体 I (Infected) 和免疫群体 R (Recovered) 三种类型。其中，S 表示易感群体，群体还未受到网络情绪信息的影响。I 表示感染群体，即群体受到社会网络中情绪信息的影响，产生恐慌等情绪，并进一步向

他人传播信息和情绪。R 表示免疫群体，群体虽然接受到负面信息和情绪，但是却没有将这类信息传递给其他成员，相当于是信息的终结点。



图 6-1 传统的 SIR 模型

在传染病 SIR 模型提出后，众多学者将其进行改进，并广泛应用于情绪传染机制、信息传染机制等研究当中。例如，Hill Alison (2010) 以 SIS 传染病模型为基础，研究了积极和消极情绪状态的传递性质，为人际传播提供了理论框架；<sup>494</sup> Libi Fu (2014) 建立了 CA-SIRS 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提出初始感染人群对感染人群的比例影响不大，但感染频率会随着平均人群密度增加而增加；<sup>495</sup> Ajay Kumar (2020) 引入了驳斥谣言者这个因素，基于 SMIR 模型，分析了同质和异质社交网络中的谣言传播；<sup>496</sup> 陈福集等人（2014）构建 SEIRS 网络舆情传播演化模型，分析了话题衍生率等相关因素对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影响；<sup>497</sup> 丁学君（2015）引入接触状态（Contacted）并构建出 SCIR 模型，用以分析微博网络舆情话题的传播；<sup>498</sup> 万立军等人（2021）基于 SIRS 模型探索微博社区网民情绪感染，分析舆情不同演化状态下的阈值特征，并尝试进行舆情风险等级划分等等。<sup>499</sup> 这些研究都是在 SIR 模型基础上针对自身研究对象进行的改良。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反映媒介环境中群体恐慌传播机制的模型。

结合前文已述的内容，在媒介化环境下，群体传播受到媒介的感染和干扰较大，形成恐慌想象。笔者在原来 SIR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媒介环境 M (Media)，提出了全新的群体情绪传播模型 M-SIR 模型（图 6-2），以更好地体现出媒介传播的变化对于群体恐慌产生过程的影响。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当中，随着事件爆发和防控的进程，外部媒介在内容和方式上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负面信息，如媒体中关于疫情病例的数量、“双黄连能治疗新冠”的谣言等负面内容；同时也包括了信息的负面化，例如一些自媒体为获取流量，以“武汉不哭”“武汉擦干眼泪”等煽情方式来博取关注，过分地渲染了悲情和焦虑色彩，模糊了抗疫重点。

M-SIR 模型突出强调了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发展时间线中，媒体负面信息的

发酵、爆发和减少阶段分别对群体情绪状态转变的影响，以体现出群体恐慌在媒介环境中的产生机制。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确诊病例呈爆发式增长，整个网络环境中对于疫情的报道呈现很高的热度，其中不乏各类不实、歪曲、夸大等信息和言论，群体恐慌现象显著。由于新冠病毒的未知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媒介环境处于负面信息发酵阶段，各类负面内容开始涌现，比如“证实新冠病毒人传人”的新闻信息等等。S 状态下的群体在初步接触到这些负面信息的刺激后，极易处于情绪爆发的倾向中。紧接着，新冠疫情出现爆发式节点，类似于疫情爆发后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激增、前线物资的大量匮乏、部分地区的封锁等等负面内容频频出现。随着疫情的爆发以及民众一定程度的情绪积累，群体由状态 S 转化为状态 I，出现了恐慌、焦虑、悲伤等负面情绪。一些民众即使是在疫情可控的区域内，也时刻担心和怀疑自身感染新冠。同时，I 状态的群体也会通过虚拟社区中的各类评论、发帖等行为将负面情绪传染给他人，反向地影响了媒介环境。如在疫情初期，口罩的产量一时间无法跟上需求，部分自媒体过度渲染，导致社会民众患上了“口罩焦虑症”，在各类口罩抢购群、社交平台中持续活跃，并一窝蜂地涌向最高级别的防护口罩。随着疫情的常态化以及防疫的可控化，媒介环境中的相关疫情谣言等负面信息逐渐减少，群体由状态 I 转变为状态 R，情绪逐渐趋向稳定。M-SIR 模型着重强调媒介环境中负面信息传播对群体间情绪传播的影响，更清晰地呈现群体恐慌的媒介产生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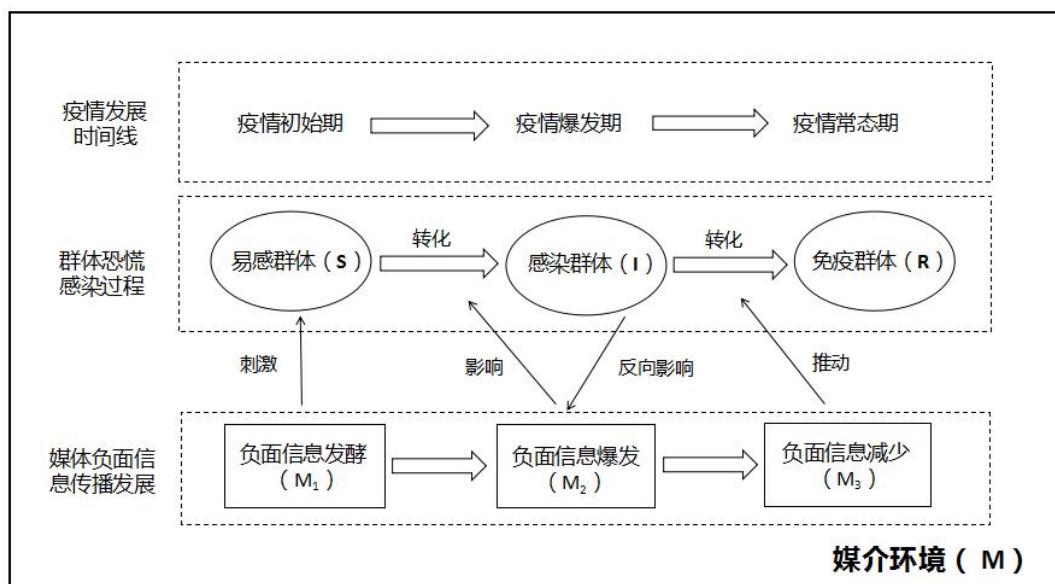


图 6-2 M-SIR 模型

## 二、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

### (一) 媒介环境下对话霸权增强，引发群体恐慌。

彼得斯溯源“对话观”的代表人物为智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对话观是把交流等同于爱欲，<sup>500</sup>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向往爱欲式的灵魂交往与灵魂互惠，将对话看作是完美的接触。彼得斯从苏格拉底以及中世纪对于“完美对话”的追求中看到了对话的交流观是人们一直追求的心灵融合和灵魂对话的交流欲望。但彼得斯的对话观认为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的，交流注定是充满沟壑的，人类追求交流美梦却又常常陷入难以互相理解的窘境，最终会导致人们神话这种不可触及的交流观，将对话放在过高的位置。然而长期处于较高地位却将本身平等互惠的对话变得霸道，再加上时间的不均等、话语的压制、讲话的次序和实施的反馈等原因，导致出现话语霸权的现象，使人们变得渴望夺得对话中的话语权，希望他人来理解自己，忽视了他人的交流意愿，总是将个人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彼得斯认为真正的对话是“偶尔与他者特性的接触，而不是彼此意识的相连。”<sup>501</sup>社交媒体虽然给予人们更多的发声机会，由于话语权的不平等导致在对话过程中，掌握话语权者更容易对他者造成信息压力和进行情绪操控，造成对话霸权愈演愈烈。

费斯廷格和凯利指出，当人们依赖于他人获得社会信息时，他人就获得一种权利，来影响人们的行动或态度，这些他人对人们具有信息性压力。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受众依赖其传递的信息，迫于信息压力，受众在接受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信息时，也被动地接受其情感态度。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难以判断病毒的危害，只能通过掌握更多信息源和话语权的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了解，在接受到媒体报道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武汉“封城”、医疗物资匮乏等负面信息后，人们容易产生恐慌等负面情绪，甚至处于低风险地区的人也会处于恐慌情绪中做出抢口罩和抢药等不理智行为。更有缺乏伦理观的媒体传播情绪性鲜明的内容和虚假新闻，煽动受众情绪，致使受众将理性和真相抛于脑后。如疫情初期，合肥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在抖音上发布“广州女毒王境外返回确诊4天坐遍广州市14条地铁”的视频，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情绪，导致视频中的女生遭到网络暴力。个体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会寻求归属感来消除个体危机感，形成一种集体心理，为了与其他人情绪保持一致更易接受群体的思想观点和情绪感染，导致群体恐慌短时间内形成扩散。<sup>502</sup>

## （二）媒介环境下对话撒播相融合，消除群体恐慌

一是撒播观以受者为中心，尊重个体差异。没有追求完美对话的霸道，撒播更加重视受者的权力，以受众为中心，尊重个体间的差异。“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应该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sup>503</sup>彼得斯的撒播观能让人们感受到尊重、宽容与关爱，降低冲突与隔阂带来的恐慌情绪。彼得斯主张转变交流目的，放弃交流的幻想，尊重个体间差异并拥抱交流的沟壑，以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sup>504</sup>

在疫情期间，人们对新研发的疫苗持有怀疑的态度，加上传播对象个体属性的不同，疫苗接种宣传成为一大难题。政府部门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发出科普文章，介绍新冠疫苗预防病毒的原理和适用人群等信息，公布疫苗接种志愿者的情况，报道钟南山院士等权威人士接种疫苗的新闻让受众更加信服，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公众关切问题，不仅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让受众放心，回应公众问题也间接让公众参与到对话交流中来。考虑到不同年龄层和知识水平的人群理解能力差异，大众传播媒介采用图画、视频等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在农村地区线下采用广播和张贴宣传口号、标语等方式来让受众了解疫苗及接种的好处，选择受众更易接受的说话方式进行撒播，有效改善受众怀疑态度和缓解群体恐慌情绪。

二是疫情下撒播事实真相，阻止谣言扩散。彼得斯的撒播观来源于耶稣。耶稣将知识比作种子，执着于撒播种子式的交流，他与世人交流的方式就是对着天空布道，这也就等同于在世间撒播知识。“他坚持‘有耳者，皆可听’的普世撒播观，不在乎自己的撒播是否会收到回信，或者是收到怎样的回信。”在耶稣眼里，交流的结果就像是不同环境中的种子，难以预料种子未来的发展趋势，各人有自己的解读和理解。<sup>505</sup>彼得斯的撒播观认为传播者应放弃对传播内容和意义的把控，宽容地对待受传者的理解或曲解，接受受传者根据个人认知去解读，以撒播的观念来正视交流的无奈和承认完美对话的不可能性。

大众传播的功能与撒播相似，通过远距离向不同受众单向传播信息，没有强制性和实时互动，公平地接受受传者解读方式的选择。新冠期间关于病毒的谣言满天飞，许多中国媒体放弃情绪性传播内容，客观地撒播事实真相，能够防止谣言扩散，舒缓群体恐慌情绪。如在面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和造谣时，中国用大量的一手资料、数据和防疫成果等事实向世界人民展示自身抗疫措施的

有效性，在全球防控疫情中的积极配合性，援助其他国家的防疫工作，以客观事实来澄清谣言，消除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因疫情和谣言产生的群体恐慌。中国消除群体恐慌的措施正呼应了彼得斯所谈的：“交流不是忠实地我们的地盘，坚持自己的理念并施加影响。交流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犹如你也不可能像他们自己那样看他们。”<sup>506</sup>

三是对话观撒播观相融合，消除群体恐慌。虽然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更倾向于支持撒播论，但彼得斯也不是完全否定对话论的。彼得斯认为：“对话可以是美好的，传播可以是压迫性的，反过来也是如此。”<sup>507</sup>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再三重申：“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共同开辟新的天地。”<sup>508</sup>彼得斯在此提及到的新办法即是让对话和撒播相互交融。他认为“没有对话的撒播可能会成为胡乱播撒，没有撒播的对话则可能是无休止的霸道。”<sup>509</sup>真正的交流应该是对话与撒播难以区别，每个人都应该说话，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被聆听，人人参与交流。在交流中，受传者不仅有接受与不接受传播内容的权力，也有与传播者对话、双向撒播的权利，这有利于受传者在交流中表达自身意愿，促进群体负面情绪消散。

疫情期间，民众渴望获得关于疫情的信息，但疫情期间海量信息接踵而来，受传者无法做到全盘接受，他们倾向于接受能够满足其信息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内容，以此来获取心灵上的安慰，减轻对疫情的担忧。同时他们也期望自己发出的声音能够被聆听，以此来寻求帮助和缓解恐慌情绪。受传者能够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疫情相关信息进行撒播，如疫情初期，微博与央视新闻联合扩展的超话#肺炎患者救助超话#接受了超过一万条求助信息，很多群众在超话中留下个人信息和患病求助，得到地方政府和部分网友的关注，从而获得解决办法。在疏导群体恐慌情绪的过程中，主流媒体也重视受众的发声，央视网转发 B 站 up 主林晨在武汉疫情爆发时拍摄的视频日志，从普通人视角来呈现武汉疫情、记录普在武汉的生活，更加亲切，减轻对疫情的担忧和恐慌情绪。许多主流媒体转发网友在网络上发布的居家隔离期间的视频日志，实现人人参与交流。

彼得斯的对话撒播观转变了交流的基本路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对方为中心；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人，影响他人，而是认识他人的特性；不是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而是选择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sup>510</sup>放

弃心灵完美交流的梦想，欣赏交流的沟壑，以受众为中心，采取受众容易理解的方式撒播真实信息，澄清谣言，能够减轻谣言带来的恐慌。媒介环境为传播者和受传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每个人既能选择聆听的信息也能进行传播，受众接受大量正向信息，从平民视角了解战疫情况，同时又能发声求助，这大大增强人们抗击疫情的信心，有利于消除疫情下的群体恐慌。

### 三、消除群体恐慌的现实路径

#### （一）宏观视角：管控复杂媒介环境，关注信息贫困群体

媒介环境中传播一方的霸权式对话，主要包括媒体的缺位，媒体的越位和信息的不实现象。<sup>511</sup>其中媒体的缺位即信息出现封闭或部分披露，导致了群体受限于媒体所营造的媒介环境中；而媒体的越位则集中体现为媒体报道的过度化和越界，如出现过度渲染、以偏概全的媒体报道行为；同时，媒介环境的失衡状态也催生出很多谣言、过激与别有用心的言论，不仅存在一些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的状况，也存在着部分民众刻意煽动情绪、部分别有用心的国际言论不当诋毁等情况。这三种现象都体现了媒介环境中的霸权式对话，它们阻碍事实的真实呈现，强迫受众接受与认同自身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群体的恐慌和焦虑情绪。

消除霸权式对话，政府管控发挥引导与约束作用。首先，政府应充分准备好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应对举措和步骤，制定和完善各类突发信息的发布机制。在突发性事件中及时查明事实，更加协调有序、合时合理地公布事件的权威真相，减少信息的缺位，化解公众的恐慌情绪。其次，发挥好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从政策上来管控媒体的越位式对话和信息的不实现象。如2021年1月份国家网信办发布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于打击虚假信息、虚假流量等行为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把握事态发展，健全和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突发事件爆发时，相关信息出现爆发式增长，不同声音交织着整个网络。在此如此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政府的舆情监测机构应及时关注舆论动态走向，了解民众的情绪状态和相关关联性线索，根据网民的具体情绪走向来制定实际的应对政策；同时加强对不实言论、过激言论的整治，避免网民情绪的二次爆发。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要完善好信息发布机制，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做好舆论监测，安抚公众恐慌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关注信息贫困群体，消除交流不平等困境。减少霸权式对话的同时，也要关

注边缘群体因信息贫困而无法平等交流的问题，落实好信息资源的分配。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21年6月，我国的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9.2%。<sup>512</sup>可见，尽管城乡数字鸿沟问题有所弥合，但仍有40%左右的农村人群未能跟上网络时代的脚步。在这些欠发达地区中，民众缺乏网络信息资源，对于外部环境的发展动态难以及时把握，容易在口语相传中出现“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现象。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后，容易产生恐慌情绪，也难以向外界表达自身困境。因此，加强社会数字赋能仍然是促进信息贫困群体发声的必要前提。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政策都在促进信息的普惠。<sup>513</sup>政府层面应当落实好政策举措，从基础设施的建设、网络通信的覆盖，到信息知识的普及、技术软件的操作培训等等，在宏观层面解决好因信息贫困所带来的交流不平等困境。

## （二）中观视角：尊重受众属性差异，深入一线撒播事实

尊重受众属性差异，提高新闻叙事理解度。“个体恐慌的产生与年龄、文化、环境、社会组织关系等密切相关。”<sup>514</sup>不同个体接受与理解信息可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对于学历低、年龄大、媒介素养不高的群体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外界的信息影响，出现群体恐慌情绪。如2020年6月广州疫情出现小高峰时期，类似《万分紧急！广州明日一个不留！》、《广州危急！明日戒严“封城”》等“标题党”“震惊体”新闻在老年人群体中扩散，导致部分区域的超市、市场出现了老年人抢购物资的现象。老年人群体因自身生理限制等因素对信息的理解能力较弱，更多地依赖于生活经验和对周围的感知。因此，媒体在考虑发布相关预警信息时，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严重”、“紧急”、“危急”等这些容易引发应激反应的词汇，并根据老年人的信息接受能力特征，创作更为通俗易懂的预警信息内容，<sup>515</sup>如附加上一些贴近生活的漫画形式的内容，及时帮助老年人对信息内容进行理解。尊重不同受众群体的属性差异，在新闻叙事时能够考虑到网络边缘群体的理解性，一定程度上降低因理解偏差所带来的恐慌感。

深入一线去感受与记录，客观解读当前应对现状。在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事件中，信息容易出现真空和闭塞状态，谣言不断滋生并裹挟着人们的情绪，也出现了一些来自国际的抹黑和诋毁。因此，应对疫情谣言的最好方式之一

就是及时深入一线，让受众在数据和客观事实中感受到抗疫现状和成果。疫情爆发后，如中新社在内的多家媒体深入武汉一线进行报道，聚焦了医院、社区等多个重点场所，将武汉的真实情况呈现给国内外公众。当然，撒播事实强调的是客观解读当前的应对现状，去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既要将抗疫显著成效摆出来，更需要强调一种公正的态度。在像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信息遮蔽、抗疫不力、抗疫不足等现象，而媒体则容易陷入“报喜不报忧”的局限中。客观地呈现抗疫情况，其实是在给国人提供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sup>516</sup>如应坚持真实客观地报道我国疫苗的研发和使用情况，更好地助力国内外疫苗的研究。真相的提供与抗疫过程的反思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人们降低群体恐慌情绪，更好地应对灾难，不分彼此地携手对抗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我国媒体应快速深入、积极介入事件报道，用翔实的事实攻破谣言，以严谨的论证证明科学，客观呈现真相，回应不实言论消除群体恐慌。

### （三）微观视角：提高应急信息素养，利用机会人人发声

提升自身应急信息素养，学会冷静辩证地看待信息。消除对话霸权提醒着我们既不要强加个人想法给他人，也不能缺少科学辩证的思考。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在人际讨论中表达、确认或改变对疫情新闻信息意义的解读。”<sup>517</sup>是许多社会成员在恐慌情绪作用下的认知经历。在危机事件中，任何有关危机发展动态的信息均有可能在媒介环境中被放大和误读，由此带来更强烈的群体恐慌感。因此，个体在网络社区的互动中要学会冷静思考，以平等交流为前提，既不主动制造谣言漩涡，将没有经过核实的信息传播给他人；也不被动踏入情绪陷阱，未经思考和辩证就接受不明信息。当前我们处于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中，无法预测未知危机，促使我们要不断提高个体的应急信息素养，消除话语中的不对等。

积极利用发声机会，记录与反思抗疫历程。彼得斯倡导着对话与撒播应融合，每个个体都应该有平等发声的权利、聆听的机会。撒播事实强调着平等地进行交流，关键在于以平等的方式提高个体的发声机会，消除话语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由于许多民众在媒介环境中获取信息，容易形成对疾病风险的想象。无论是抗疫的一线行动，还是帮助澄清污名和谣言，亦或是从小处和细节着眼去科普和宣传抗疫行动，都可以填补主流媒体声音中缺失的空白，减少媒介环境中的话语不平等所带来的疾病想象和情绪困境。自媒体博主林文华以“蜘蛛猴面包”的

账号记录了抗疫系列视频《武汉日记》，从记录者和志愿者的视角，让人们了解更多武汉与病毒对抗的真实情况。利用民间交流窗口，发挥多角度和多维度的信息补充，让主流媒体和个体声音平等交叉结合，能够促进对疫情的全面记录与反思，有利于缓解危机下群体的恐慌情绪，推进健康共同体的建构。

#### 四、小结

新冠病毒给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病毒的未知性、强感染性和变异性使人们惊魂未定。媒体对新冠疫情的负面信息报道、情绪性信息传播以及谣言散播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恐惧，群体间出现了恐慌和不安情绪。本节基于 SIR 模型，引入媒介环境因素  $M$  (edia) 并构建出  $M\text{-SIR}$  模型，以分析媒介环境中群体恐慌情绪的产生机制。 $M\text{-SIR}$  模型强调了在媒介环境中负面信息传播的各个阶段如何影响群体间的情绪传播，并呈现出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从负面信息的发酵、爆发到减少不同阶段对群体情绪状态转变的影响。本文将彼得斯的对话撒播观作为一种视角构建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在媒介环境下，对话霸权愈演愈烈，受众迫于信息压力被动接受媒体的情感态度产生负面情绪，而个体恐慌情绪扩散导致群体恐慌，应该摒弃霸权式的对话，提倡以受众为中心，尊重个人差异，人人参与交流的撒播观，以此降低人们恐慌情绪。

基于对话撒播观的逻辑，笔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来提出消除群体恐慌的现实路径。宏观视角提出应管控复杂媒介环境，关注乡村信息贫困。政府应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发挥法律效力并做好舆情监测来减少霸权式对话，安抚恐慌情绪，同时要关注边缘群体因信息贫困而无法平等交流的困境。在中观视角要尊重受众属性差异，深入一线撒播事实。媒体在进行新闻叙事要考虑不同群体的理解程度，同时要深入一线客观解读，撒播事实真相。媒介深度融合中城市智慧治理模式创新，打破大众媒介的功能理论，不仅将媒体视为一种传输工具和手段，而是将媒体深度融合看作当前中国城市的中枢系统，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全新动力。微观视角提出提高应急信息素养，利用机会人人发声。民众要学会冷静对待信息，不轻信谣言，积极利用发声机会来消除话语不平等所带来的恐慌情绪。

## 第二节 重构愿景：数字政府治理消除群体恐慌的逻辑、路径与保障

汉语“卫生”一词来自《庄子·庚桑楚》中的“卫生之经”，原本是单纯的卫护生命之意，其现代意义完全是近代西方以及日本影响的结果。医疗史学者于赓哲认为，“现代卫生体系是建立在对细菌、病毒和流行病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黑死病之后的欧洲，尽管距离实证主义阶段还相差甚远，但永久性的公共卫生部门的建立也以较为丰富的对病源的直观认识作为基础。”<sup>518</sup>因此，近代西方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公共卫生体系，而中国古代由于政府官员的认知，官医机构主要为宫廷和官府服务，因此，缺乏系统的社会医疗机构。加之，“中国古代对疾病的认识中没有细菌和病毒的观念。”<sup>519</sup>而将疾病归结于风物气候的习染，比如，“气”就是流通疾病传播环境中的主要成分，《诸病源候论》将传染病源归结为“鬼邪之毒气”、“客邪鬼气”、“邪毒之气”、“邪气”等。<sup>520</sup>气被视为疾病的载体，它通行于各种解释之中，可以弥平各种理论的裂痕，而它的特性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被躲避或者抵抗，但是却无法通过公共手段加以消除。受限于认知能力和时代思维模式，无论是医家还是政府、士大夫阶层都没有将“清洁”、防“未病”的举措上升为公共事务，在西学东渐后，人们才将公共卫生问题上升到国家现代化建设这个层面上思考，近代中国饱受鸦片的摧残促生了一种社会性焦虑，客观上迫切需要建立西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 一、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基础

当前学界较少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探讨数字政府应对社会风险的治理逻辑和路径。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公共危机，民众产生群体恐慌情绪，数字政府的社会治理迎来新的挑战。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政府，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基于信任关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数字政府可通过创建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民意收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三方面来实现社会治理。

当今中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本质上是社会快速变化带来的社会风险的体现。这些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现代性风险和现代化风险。关于第一类，即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和其他人提供了相当透彻的阐述。他们认为，总体而言，现代性的风险体现在资本的逻辑上，即“达到顶峰则开始下行”，

以现代科技和制度发展造成的自我毁灭悖论为代表。<sup>521</sup>关于现代化或社会转型的风险，托克维尔、罗伯特·古尔、塞缪尔·亨廷顿等人的工作反复证明，在旧体制动摇但新体制动摇的过渡时期，社会革命或动乱往往爆发。尚未牢固确立。<sup>522</sup>就中国而言，网络社会、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这三个潜在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放大，使得社会变革的风险更加复杂。<sup>523</sup>

从社会现象来看，中国近十年来发生的所有突发事件，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引发的。在社会变革措施方面，应急管理的结构表现在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和社会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上。社会风险引发的突发事件导致公共危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浮出水面。<sup>524</sup>因此，仅针对危险事件的应急管理只能控制局势或减少其负面后果，而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推进社会风险管理的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是将应急管理作为起点并将其扩展到公共管理。<sup>525</sup>在角色设置意义上，应急管理作为制度规划，是治理结构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也就是说，现有的治理结构隐含地决定了应急管理的结构。整体应急管理实践的全球趋势是促进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民众医学认知的缺陷或者说不足，导致在疫情初期产生群体恐慌情绪，在疫情反复过程中，民众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性焦虑情绪。即使疫情基本平稳后，民众的紧张、焦虑情绪依然没有完全平复。情绪修复是一个漫长且社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政府主导、媒体跟进、各基层单位协同，多渠道多元化的信息传递，让民众得到全方位的情感释放。本节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剖析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的群体性焦虑和恐慌情绪，从政府治理层面探索修复群体情感的逻辑、路径与保障。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论综合为自觉目标的另一种当代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 1926—1995）。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为这一学派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学派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不仅用它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是行动者所期望从多种可能的行动结果中获得功利的函数，也即行动者所追求的是价值或利益的最大化。该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认为现实生活中人

们的理性行动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文化、情感、政治等目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是否理性需要通过行动者自己的眼光来衡量。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个体方法论，它试图通过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以及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来对社会秩序做出说明。

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主要在两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互相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系统行动包括三方面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社会资本、法人行动。科尔曼对美国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现象表示不满，提出要探讨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方式。与迪尔凯姆等人一样，科尔曼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社会科学应当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为重点”。但他又接受韦伯等人的主张，指出社会系统行为归根结底是许多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现象。他提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起点来阐述社会现象的理论必须包含三个组成部分：（1）将宏观现象转化为微观行为；（2）个体行为的分析，在科尔曼这里，个体行为被描述为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选择行为”；（3）微观的个体行为如何构成宏观现象。

由于理性选择理论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系统的微观组成部分（如个体、群体、组织）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这种方法可以被用来解释不同层面的社会选择。<sup>526</sup>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聚焦于微观经济现象和组织行为。有学者将农民工群体视为“理性人”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为定居地选择的根本原因。社会理性是重要制约因素，信任是选择的基础，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是基于理性选择的过程，不仅是微观层面个人行为，在宏观层面上也推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sup>527</sup>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不同学者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探究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间的关系。有学者将理想选择理论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强调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才是非营利组织和公众的理性选

择，并提出树立信任意愿、活动透明化与公众参与监督结合、创建长远的战略信任关系、加强组织间良性竞争有利于发展非营利组织与公众间的信任关系。<sup>528</sup>也有学者以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来研究俄罗斯的民众个人、宗教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当代俄罗斯国教关系的模式和机制。<sup>529</sup>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理性选择理论逐渐被国内外学者用来研究微观层面日常社会问题。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审视社交媒体疲劳，社交媒体自信、社交媒体自我效能感、隐私关注、社交媒体帮助和社交媒体疲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交媒体疲劳的概念模型。<sup>530</sup>有学者对少年犯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理性选择理论能够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sup>531</sup>

综上所述，理性选择理论虽起源于经济学，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散到其他领域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理性选择理论仍有许多空白待填，如在研究政府理性选择行为时，未能结合大数据和社会发展新情况讨论政府治理的逻辑、路径和保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应急管理和舆情治理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探究数字政府治理和修复群体情感的逻辑和路径，以期为今后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提供参考。

## 二、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开始在经济、电力、金融等领域进行国家信息系统的建设，此后，随着电子政务的传入与信息革命的发展，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逐步嵌入社会运行的各个角落。<sup>532</sup>当前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为社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在促进新业态经济涌现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不断推动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我国数字政府可从效率、合作、主体等方面上构建治理逻辑，更好地适应数字浪潮，更为精准地把握治理内涵和要义。

### （一）效率驱动：大数据技术推动数字政府履职便捷化

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行动者采取理性的行动，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

最大化的收益。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信息革命带来了关于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思考和探索。大数据技术作为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引擎，牵涉着智慧城市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大数据技术撬动着数字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帮助政府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去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大数据技术所提供的海量数据存储、统计、共享、挖掘等数据处理能力，帮助政府分析和研判公众信息，感知社会动态，提高事件处理效率，精准解决问题。如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行程卡”等的创建与应用保障了人员流动安全，并便于协同监管和疫情追溯，以高效、智能、精细的特点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进行。<sup>533</sup>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有利于加快无纸化办公转变，逐步实现智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构建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实现覆盖全国的社会治理大数据库，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效能。

## （二）合作共赢：建立政府与媒体的信任关系

理性选择理论提出行动者之间的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其中，权威关系是指一方行动者将自身的资源或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另一方行动者，双方建立起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信任关系则是指行动者双方对各自的资源进行委托和交换，获得了合作共赢的最佳收益。<sup>534</sup>新媒体时代下，“众声喧哗”的现实情境放大了各类社会矛盾。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发挥绝对优势的作用；而在智媒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盛行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融媒体背景下如何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审视。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政府和主流媒体双方应建立信任关系，以理性的行动通力协作，高效应对危机。一方面，主流媒体在重大议题，舆情引导，塑造政府形象、城市形象方面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依靠公众在重大事件中对主流媒体的较高信任度。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政府作为理性行动者必须要稳定社情民意，应对危机。此时，主流媒体作为危机的发现者，可以为政府提供信息预判，确保及时采取危机管理措施；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可以为政府提供公众反馈意见，协调各方利益需求，帮助事件良性发展。<sup>535</sup>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虽具有一定的信息资源和影响力，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权威调查信息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建立尊重互信的关系，在保障和维护群众权利的前提下，借助

媒体传播效应，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

### （三）多方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理性选择理论采用个体方法论，将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目标，将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起点，避免了微观行为和宏观现象相脱节的缺陷。<sup>536</sup>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下，社会治理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这一部署既鲜明地体现了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关注公众个体诉求的思想，又体现了社会治理与民生问题之间既互为前提又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宏观现象需着眼于微观个体，数字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由于资源差异的局限性，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也应当是数字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实践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构建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合力作用。

社交媒体迅速兴起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日常交往、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基于智能化的媒体平台协同，数字政府可以倾听多方意见与联系群众，实现从微观诉求到宏观政策落实的合理过渡，从而提高各项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合理性，有效化解社会问题。<sup>537</sup>新冠疫情期间，地方主流媒体在推动城市治理方面形成了一种相对开放、互动复杂的场域。在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的互动参与模式中，个体性受众在网络社群、社交平台上进行观点发表、相关求助、防疫宣传，形成疫情防控治理的合力作用。数字政府建设应当以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树立人民立场，倡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融合的治理模式，充分动员多方主体力量合理利用媒体表达平台，促进公众诉求与政府响应的有效对接，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全面惠及。

## 三、数字政府的治理路径

### （一）创建社会风险评估的机制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风险一直相伴相随，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公众在面对风险时不免产生紧张、恐慌等群体情绪。随着社会转型和网络技术的更新，社会风险具有更强烈的破坏性和威胁性。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传统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治理方式存在滞后性，以政府为单

一治理主体的模式难以适应新的挑战。政府与社会各界间“各自为战”，资源和数据不流通，形成“信息孤岛”，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风险预警提供技术保障等弊端，社会风险评估和治理效率较低。政府在创建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时应理性选择与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合作，形成多元协同治理的整体意识。

应对社会风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个城市、部门、组织以及公民都应该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在社会风险发生的过程中做到信息互通、数据协同、资源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风险感知预测和评估网络体系，同时有需要根据城市和风险的特征，做到每个城市、每个部门形成差异化和精细化的应急管理机制。<sup>538</sup>大数据的发展为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的创建提供了技术保障，数字政府应做到以大数据为依托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调查，科学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应急管理措施，有效规避社会风险。

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构风险感知和评估的数字模型，对其进行数据设定和训练，使其能够及时捕捉和跟踪数据，发现风险苗头。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家通过大数据获取确诊患者的行程、通过居民用电数据推断筛查流动居民等等，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数据支持，避免了人员交叉感染传播，防止疫情失控。评估模型不仅要有捕捉数据的“眼睛”，还要有分析数据的“头脑”。政府部门可以依托大数据技术，收集历史应急案例，汲取经验和教训，整理建构分类别的案例库，在分析数据时能够快速从案例库中找到相似风险事件，结合经验和数据进行初步智能预判，判断风险发展趋势，制定可供参考的应急策略。<sup>539</sup>大数据技术帮助政府能够及时采取事前控制措施并做出应急管理预案，降低社会风险的损失，避免或缓解群体恐慌情绪。

## （二）建立民意收集和监测系统

民意是公众对社会议题和政府公共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其实质是公众的诉求和利益表达。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提供“人人发声”的平台，在此环境下催生的网络民意更广泛地吸收多元主体的意见，集合了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和民间智慧，成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sup>540</sup>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现象是不同行动个体之间的互动结果，而个体的社会行为是社会学分析的最基本单位。<sup>541</sup>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公民发表个人意见和诉求形成社会民意，能够影响政府的应急决策方向和事件发展趋势。政府的社会治理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

得感，以人民为中心，关注公众的诉求。建立收集和监测民意的系统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社会风险的必然趋势。由于缺乏收集和监测民意的系统，政府时常面临回应不及时和应急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容易激发民众对政府的负面情绪和对突发事件的群体恐慌情绪，引发“次生舆情”，导致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湖北省红十字会物资使用事件，由于政府未能了解民意，回应和处置不当，导致政府形象受损，降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专业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和市场化网络舆情监测平台相继成立，如人民舆情监测室、清博大数据、新浪舆情通等。政府虽然掌握大量的公共数据，但缺乏网民日常网络行为数据的实时记录，可与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和平台进行合作，资源共享，依托大数据创建多元协作的民意收集和监测系统，使数字政府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和挖掘社交平台中网民的意见和情绪化表达。发挥大数据优势分析网络民意的语言文本、图片和视频等内容是否触犯法律或是情绪宣泄，结合具体情况、技术操作和价值理念分析公众关于决策方案的意见是否具有可行性，筛除不科学和非理性的民意，甄别科学可行的网络民意进行参考。理性选择理论追求利益最大化，数字政府作为理性选择的行为者，创建收集和监测民意的系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了解网络民意的内容和发展趋势，让民众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政策决策中，以便于出台的治理措施能够收获公众的支持和配合，缓解社会恐慌情绪，提高应急管理的精确性、高效性和科学性。

### （三）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

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信息的发布尤为重要，获得确切的积极信息越多，越有利于人们建立良好的预期，消除恐惧和焦虑情绪。习总书记在新冠疫情期间曾强调：政府部门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疫情初期，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和未知性，政府未能及时告知公众确切的疫情信息，信息空窗导致谣言的滋生。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安全需要，公众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取足够的信息，转向从各种小道获取消息，民间舆论场众声喧哗，谣言愈演愈烈，以至于产生“信息疫情”，加剧了群体恐慌情绪。<sup>542</sup>信息公开成为处理重大突发公共时间的关键环节，因此数字政府必须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及时澄清谣言，缓解群体恐慌情绪，避免社会负面情绪爆发。

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发布应适应新的媒介格局，与媒体基于信任

关系进行通力合作，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媒体协同的信息发布机制。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发挥新兴媒体信息发布及时性、互动性和精准性的优势，做到第一时间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传递疫情相关信息和回应公众信息需求，同时借助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对疫情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详细报道，新旧媒体使用并重，提高政府信息发布的效率，需做到线上线下联合发布机制，新闻发布会是线下沟通的有效渠道之一。突发性公众事件变化发展迅速，政府的信息发布应做到分阶段应对，重视情绪和舆论引导。政府的信息通报随着疫情的蔓延而不断扩大，针对疫情不同时期的特征，信息的内容、数据类型等都发生演变。<sup>543</sup>

在疫情初期还未大爆发时，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信息仅涉及武汉市的新冠肺炎病例。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公众陷入恐慌焦虑的情绪，形成迫切的信息需求。政府有必要公开各地疫情状况和防控动态，为公众提供相对全面的信息内容，对公众进行健康科普，引导公众跟随政府防控措施。同时以报道医生与志愿者在疫情中的辛苦奉献事迹来温暖人心，缓解群体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到疫情常态化阶段，政府信息发布以疫情防控措施和成果为主，塑造政府形象，增强公众战胜疫情的信心。作为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权威信息的发布者，数字政府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疫情相关信息，能够有效地降低社会恐慌情绪，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四、数字政府的治理保障

##### （一）法律约束：健全和完善数字政府法治

2021年8月，我国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提出“数字法治政府”，对各地政府部门的数字治理提出了法治化的要求。在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政府法治提供了依据，确保了应急响应措施的到位，为保证防疫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sup>544</sup>由于数据驱动治理的特性，数字政府既不能偏离法治轨道，又需要化解数据安全之殇。因此，健全和完善数字政府的法治体系，规避衍生出的数据安全风险，是顺利推进数字政府防范和规避网络犯罪及安全风险的重要保障。

从机制上看，需完善网络空间的法律治理体系。在立法层面上，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使网络空间的法律法规更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sup>545</sup>在实施主体上，政府部门要树立网络空间法

治管理意识，明确责任部门，避免不合理的责任推诿。在执法层面上，要加大对网络犯罪行为的管制，减少不实谣言的危害，保证政府的权威性。

从内容上看，完善数据安全方面的法律规定。数据技术提升着政府治理效能，但在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等周期中也可能暴露出数据侵权、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疫情中公开确诊病例的行程轨迹等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相关群众注意个人行程，降低信息不明确所引发的焦虑和恐慌情绪；但同时过度的信息公开也可能造成数据不规范、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等问题。北京市的“健康宝”则在数据采集上作出范例，既遵循了最小化原则和国家信息安全三级保护的原则，从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因此，数字政府治理必须加强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充分考虑重大突发性事件中的数据采用与使用的合理性，完善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内容，规范数据使用途径和边界。

## （二）网络规范：强化网络公共空间管理

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个人的理性行动具有社会意义，以此产生了规范的要求；而规范通过微观至宏观的转变得以实现，并在出现后引导着个人的行动。

<sup>546</sup>科尔曼认为，规范的基础是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网络中个人对社会现状的讨论与表达是形成网络空间规范的基础。通过政府、主流媒体对理性发言的引导，以及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逐渐形成一定的发言规范，同时这种规范又进一步影响他人的表达。因此，政府的对于公共空间的管理有利于引导网络空间形成规范、和谐的表达环境。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一系列环境变化，群众易缺乏安全感并产生恐慌情绪。在负面情绪裹挟下，群众对周遭环境的变化变得敏感，对不实言论缺乏辨别力，进而易散播相关谣言，甚至泛化成对政府的不信任。<sup>547</sup>部分不良自媒体只关注“眼球效益”，有意歪曲事实，放大公众的情绪焦点，破坏社会和谐。在复杂多变的舆论场域中，政府首先应当增强信息把关作用，利用舆情监测系统跟踪舆论传播轨迹。在共同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审查内容、举报受理、惩罚追责等方式构建网络空间的规范秩序。其次，政府应当完善网络空间政府发言机制。政府要及时澄清相关谣言，保持事件的透明程度，占领舆论导向，重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信息公开工作。通过回应当前社会热点关切，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积极介入对话，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再之，增强主流媒体在教育引导方面的话

语权。在海量信息传播的复杂环境中，主流媒体应力求客观真实，及时挖掘事件真相和背后的深层原因，报道事件的动态，消除公众的焦虑，找到主流和个性的最大公约数，以生动、有温度的亲民语态引导公众，让主流的声音落到实处。

### （三）服务云化：加快建设智能化管理体系

数据服务理念的快速渗透，各类政务步入在线平台，政府从模糊性管理走向智能精细化管理，公民能够实现信息数据的智能化应用，大大提升政府的治理效率。智能化时代下，数字政府应从数据融合共享和政务服务在线化的思维中，加快信息技术普及与智能化应用管理，从而在数据赋能中进行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打破信息数据条块分割状态，实现政务数据的深度融合共享。整合数据资源能够剔除重复多余部分，起到增强信息弹性、扩大空间与提高治理效率的作用。各政府部门应树立一体化思维，打破信息闭塞的孤岛状态，构建信息共享数据库，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整合。在此基础上逐渐过渡到社会各类主体之间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公民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便于政府及时发现问题与纠正错误，提升决策能力和服务能力。<sup>548</sup>

政务服务云端化，实现线上数据与线下资源相联动。数字政府应充分优化数据平台的业务和结构，将各领域事项转变为线上操作。如广东政府通过不断优化“粤省事”、“粤商通”、“粤省心”等粤系列平台功能，实现服务事项的“指尖化”，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政务普惠服务。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关注问题的智能化、精细化处理，提升数据平台的资源配置功能。如疫情高峰期应急物资短缺，相关政府部门通过搭建医疗物资调度平台，实现物资供应的快速配置，并对相关封闭场所的居民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减少公众恐慌情绪产生。加快建设智能服务的云端化，实现从线下“一窗一办”到线上“一网通办”的模式转变，有利于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及时解决困难，降低办事成本，从公共服务智慧中受益。在疫情反复过程中，广州市政府在物资调度以及分配方面有可圈可点之处，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都没有断货，保障了市民的日常供给，有效地阻断了谣言的散播，稳定了民心，没有引起大规模的骚乱和抢购。

## 五、小结

数字政府治理是风险社会中政府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冠疫情流行背景下，消除群众恐慌与焦虑情绪，保障社会稳定运转是数字政府要职。基于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构建新冠疫情背景下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路径和保障，旨在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思考。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效益最大化、信任关系、微观宏观相结合等方面为分析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理性行动者争取效益最大化的视角下，数字政府应以效率为驱动力，创新数据技术赋能手段；基于信任关系的合作共赢理念，政府应与主流媒体进行协作，高效应对危机；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下，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公众等在内的多方主体应发挥合力作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围绕上述治理逻辑，数字政府应做好相应的治理路径选择。依托大数据技术，创建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在捕捉和分析数据中做好应急管理预案；与其他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合作，建立民意收集和监测系统，及时了解和分析民意动态；基于信任关系，与媒体通力合作，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及时公开各地情况和防控动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媒体协同的信息发布机制。同时，为了数字治理的顺利进行，应在法治、公共空间管理、智能化管理等方面做好保障。首先，完善网络空间的法律治理体系与数据安全方面的法律规定，健全和完善数字政府的法治；其次，通过政府增强信息把关作用、完善网络发言机制，主流媒体发挥话语引导作用，从而强化网络公共空间管理，引导形成网络规范；再之，通过政务数据融合共享与政务服务云端化建设，加快智能化管理体系的建设。数据，以开放共享的形态提高了数字政府的治理效率；合作，在协同的机制中共同引导着民众思考与表达；传播，促进了多元主体就公共事务进行对话。

## 结语

世界舆论格局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相可言，尤其是非常态的大流行疾病期间，西方政客炮制的阴谋论、谣言、偏见、种族歧视等虚假新闻更是充斥着媒体舆论空间，混淆视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断炮制中国阴谋论，捏造谣言，弥漫种族偏见，散播疫苗民族主义的歪曲舆论，严重损害全球抗疫共同体。在此背景的中国抗疫行动本身就富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鲜明特色和亮点。在媒介化环境中，民众的媒介素养及风险认知存在较大偏差。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群体出现恐慌情绪在所难免。本文对疫情中群体恐慌出现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成因做了大量详实而周密的研究，得出如下具有创新性的内容：

一是媒体存在制造恐慌的倾向。制造动机并非主观、恶意，而是源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媒体往往无意识地裹挟到恶意竞争的漩涡中，为了商业利润而忽略媒体伦理与责任。本文所选择的英国报刊在 MMR 疫苗事件的报道中存在恶意炒作、肆意放大疫苗风险，为社会设置了言过其实的医疗高风险话题，激起民众群体恐慌情绪，加剧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扰乱社会秩序。我国主流媒体在传播导向上有较为严格的把控，因而制造恐慌的报道较少，以 20 年来疫苗报道样本来看，主流媒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报道模式刻板的缺陷。在议题框架设置上应兼顾多元议题的构成，如关注公众的疫苗接种态度、疫苗安全的损益平衡、公共卫生的社会公正性等议题，加强信息补偿框架，增加信息来源，合理引导舆论，避免媒体过度恐慌导致舆论偏见，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

二是探究了群体恐慌情绪蔓延、扩散到形成记忆以及释放过程。本文借助“猎巫运动”理论阐释了“广州阿婆事件”和“成都女孩事件”中舆论审判的差异，进而阐释了群体转嫁病毒由头的社会根源以及释放恐慌情绪的理由。通过深访 13 位广东、湖北、贵州的疫情经历者，梳理在疫情中的人们经历疫情时的情绪以及后疫情留下的恐慌记忆。文章运用集体记忆理论，通过访谈者的回述，勾勒出恐慌形成的记忆线索，除了个体媒介素养偏差、职业、圈层的不同影响，群体内部传播的影响是其重要因素。笔者也借用麦克卢汉的媒介按摩观点，结合文中分析的两个抗疫 Vlog 评论文本，阐释了群体恐慌情绪释放的媒体生产实践。抗疫 Vlog 中的符号象征、寓意与观看互动中所产生的情感想象、群体认同、媒介

关联等因素，通过触媒后的按摩，在群体感染中修复创伤，从而达到群体情感释放，完成情感治愈的历程。

三是从情绪共振维度分析群体恐慌蔓延机理。将疫情放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疫情演变的规律以及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恐慌情绪蔓延机理。本文指出，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文章运用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诠释了集合行为的传播特征与诱导因素。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三个信息进化路径，在模因激活、群体恐慌、社会传染阶段，属于前期信息饥渴期，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事件发生信息，表明鲜明态度，防止谣言滋生；在模因复制、群体盲从、社会围观阶段，属于中期信息扩散期，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流调信息和权威处置措施，消除社会恐慌情绪。在模因变异、群体极化、社会冲突阶段，属于峰期信息高涨期，应不断更新感染人数，发布救援情况、逐步发布事故原因、消除社会谣言；在模因转移、群体理性、社会共识阶段，属于后期信息饱和期，相关部门应发布事件完整报告，公布相关责任追究措施，完善防范预警机制。

四是提出恐慌情绪疏导之策与重构健康传播环境路径。疏导之策：笔者基于情绪传染 SIR 模型，引入媒介环境因素 M（Media）并构建出 M-SIR 模型，以分析媒介环境中群体恐慌传播的产生机制；同时援引彼得斯对话与撒播观的理念，提出消除群体恐慌的内在逻辑应是摒弃霸权式对话，尊重事实的撒播，实现真正的“对话与撒播相交融”。并从三个维度疏导恐慌情绪。宏观维度：政府应管控复杂的媒介环境，关注信息贫困群体；中观维度：媒体应尊重受众属性差异，深入一线撒播事实；微观维度：个体应提高应急信息素养，利用机会人人发声。重构路径：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政府，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基于信任关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数字政府可通过创建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民意收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三方面来实现社会治理。

## 参考文献：

- <sup>1</sup> [英]弗兰克·菲雷迪著.吴万伟.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2.
- <sup>2</sup> Hobbes, T. (1985). Leviathan. Penguin.
- <sup>3</sup> ADL. (2020, June 18). *Reports of anti-Asian assaults, harassment and hate crimes rise as Coronavirus spreads*. Anti-Defamation League.
- <sup>4</sup> Bloom, M. (2020, April 3). *How terrorist groups will try to capitalize o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Just Security.
- <sup>5</sup> Tim Dickinson. “How Roger Ailes Built the Fox News Fear Factory”, Rolling Stone, 9 June 2011.
- <sup>6</sup> [英]弗兰克·菲雷迪著.吴万伟.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13.
- <sup>7</sup>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周思成译.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M]. 谭旋.序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11.
- <sup>8</sup>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9:572.
- <sup>9</sup>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7.
- <sup>10</sup>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sup>11</sup> Blumler Jay and Coleman Stephen. After the Crisis, A “New Normal”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J]. Javnost - The Public, 2021, 28(1) : 3-19.
- <sup>12</sup> 廖皓磊,肖劲松,孙志辉.“疫区封城”期间的“心理急救”——针对“群体心理恐慌”的心理+行为对策[J].中华卫生应急电子杂志,2020,6(01):10-16.
- <sup>13</sup> 童小溪,战洋.灾害预警会引起群体恐慌吗?——基于四个案例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03):120-129.
- <sup>14</sup>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sup>15</sup> Nickie D. Phillips and Nicholas Chagnon. Where's the panic, where's the fire? Why claims of moral panic and witch hunts miss the mark when it comes to campus rape and Me Too[J].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20, 21(3) : 1-18.
- <sup>16</sup> 邵培仁.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04):27-29.
- <sup>17</sup> Schulze K, Lorenz D F, Wenzel B, et al. Disaster Myth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Warning Systems[C]//ISCR-AM. 2015.
- <sup>18</sup> Matt Carlson. Fake news as an informational moral panic: the symbolic deviancy of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3(3) : 1-15.
- <sup>19</sup> Yvonne Villanueva-Russell. chiropractors as folk devil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news coverage of a moral panic[J]. Deviant Behavior, 2009, 30(2) : 175-200.
- <sup>20</sup> Hariharan A, Dorner V, Weinhardt C, et al. Detecting panic potential in social media tweets[J]. 2017.
- <sup>21</sup> Dubé E, Gagnon D, Ouakki M, et al. “Understanding vaccine hesitancy in Canada: Results of a consultation study by the Canadian Immunization Research Network.”*PloS one*, 2016, 11(6): 1-16.
- <sup>22</sup> Stuart Blume.“Anti-vaccination movemen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62 (2006): 628-642.
- <sup>23</sup> P. R. Ward,etc.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negative respons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arental trust in childhood vaccination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5 Oct 2017:1117-1130.
- <sup>24</sup> Judith Petts, Simon Niemeyer.“Health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mplification: learning from the MMR vaccination controversy.” *HEALTH,RISK&SOCIETY*, Vol 6 , NO.1,March 2004:7-23.
- <sup>25</sup> 李梦瑶,陈志远,沈明明.社交网络媒体作用与政治效能感——基于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21(04):139-144.
- <sup>26</sup> 李香平.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J].青

- 年研究,2003(3).
- <sup>27</sup> 王佳佳,邱小燕.网络谣言与恐慌情绪并行传播相互影响研究[J].情报杂志.2021(4).
- <sup>28</sup> 禹卫华.从手机谣言到恐慌行为:影响因素与社会控制——基于第三人效果框架的历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
- <sup>29</sup> Adams, R. E., and Boscarino, J. A.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erievent Panic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ter a Community Disast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4.2 (2011):61-69.
- <sup>30</sup> Mawson, A. R. "Understanding Mass Panic and Other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Threat and Disaster." *Psychiatry* 68.2 (2005):95-113.
- <sup>31</sup> Sandin, B., Sánchez-Arribas, C., Chorot, P., and Valiente, R. M.. "Anxiety Sensitivity, Catastrophic Misinterpretations and Panic Self-efficacy in the Prediction of Panic Disorder Severity: Towards Atripartite Cognitive Model of Panic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2 (2015):30-40.
- <sup>32</sup> Clark David M.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panic[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86, 24(4) : 461-470.
- <sup>33</sup> Reiss Steven. Expectancy model of fear, anxiety, and panic[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991, 11(2) : 141-153.
- <sup>34</sup> Hayward P and Ahmad T and Wardle J. Attention to bodily sensations: a test of the cognitive-attentional model of panic.[J].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00, 12(4) : 203-8.
- <sup>35</sup> YlaTausczik,etc.“Public Anxiety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Followingthe H1N1 Outbreak: Blogs, Newspaper Articles, and Wikipedia Visits.” *Health Communication*.09 Aug 2011:179-185.
- <sup>36</sup> Meghan BridgidMoran,etc.“What makes anti-vaccine websites persuasive?A content analysis of techniques used by anti-vaccine websites to engender anti-vaccinesentimen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 Healthcare*.03 Oct 2016:151-163.
- <sup>37</sup> Liu Bingsheng etal. Can local governments' disclosure of pandemic information decrease residents' panic when facing COVID-19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24(2) : 203-221.
- <sup>38</sup> 冯露等.重大疫情背景下的道德恐慌与舆论暴力形成: 基于道德恐慌理论的沈阳“一号病例”舆情文本数据分析[J].新闻春秋.2021 (5) .
- <sup>39</sup> Dillard James Price and Li Ruobing and Yang Chun. Fear of Zika: Information Seeking as Cause and Consequence.[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0, 36(13) : 1-11.
- <sup>40</sup> 陈芬芳,郑燕,刘宏艳,胡治国.即时和延时表达性写作对情绪图片喜好度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29(03):462-467.
- <sup>41</sup> 陈卫明等.基于传染病模型的恐慌情绪研究[J].系统科学与数学,2019(4).
- <sup>42</sup> Smither、Conreyfr.Agent-basedmodeling. A new approach for the theory build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igy. Review*. No.11,2007.
- <sup>43</sup> 王瑞祥等.基于传染病模型的群体活动中恐慌心理蔓延研究[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21(17).
- <sup>44</sup> 王欣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民众恐慌情绪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
- <sup>45</sup> 宋之杰等.突发公共事件情绪感染量表编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1):38-43.
- <sup>46</sup> 刘宏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青少年应激反应与应对方式[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 (8):1235-1239.
- <sup>47</sup> 秦昕等.甲流了解程度、疫苗安全感知、接种行为及其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2011(6): 684-695.
- <sup>48</sup> 高文斌等.心理咨询热线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03 (4):400-404.
- <sup>49</sup> 陈曦等.基于计算实验的公众恐慌研究初探[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2):34-37.

- <sup>50</sup> 吴鹏等.基于 BDI-Agent 模型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响应建模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6(7):32-41.
- <sup>51</sup> 廖卫民.社会恐慌的传播机制与治理对策研究——基于谣“盐”风波的理论分析[J].当代传播,2011(03):50-53.
- <sup>52</sup> 李季梅,陈宁,陈安,武艳南.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恐慌度量系统[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09,41(02):62-67.
- <sup>53</sup> 余乐安,李玲,戴伟,汤铃.危化品水污染事件中政府危机信息公布策略与网络舆情扩散研究:基于多主体模型[J].管理评论,2016,28(08):175-185.
- <sup>54</sup> 吴鹏,杨爽,张晶晶,高庆宁.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网民群体行为演化的 Agent 建模与仿真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5(Z1):65-72.
- <sup>55</sup> 关文玲等.紧急状况下人员恐慌动力学模型及仿真研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2021(2).
- <sup>56</sup> 胡象明、陈一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逻辑[J].行政论坛,2020(27).
- <sup>57</sup>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1875.
- <sup>58</sup> Smelser N ( 1967 ) .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 New York: Free Press. P23-46.
- <sup>59</sup> 田宗介.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化社会的现在与未来.[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 <sup>60</sup>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 2 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sup>61</sup> 段京肃.大众传播学: 媒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sup>62</sup> 隋岩, 张丽萍.从“蚂蚁效应”看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双重效果[J].新闻记者, 2015(2):72-77.
- <sup>63</sup> 魏永征. 关于组织传播[J].新闻大学,1997(3):31-34.
- <sup>64</sup> 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38(01):51-56.
- <sup>65</sup> 彭兰. 网络传播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sup>66</sup> 隋岩. 群体传播时代: 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 2018(11).
- <sup>67</sup> 隋岩,谈和.网络群体传播背景下的信息扩散——基于新浪微博数据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新闻大学,2020(05):1-17+125.
- <sup>68</sup> 朱天,马超.互联网情绪传播研究的新路径探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 40(06):139-144.
- <sup>69</sup> 张小平,蔡惠福.网络情绪传播的特征、影响及应对策略[J].传媒观察,2021(02):15-23.
- <sup>70</sup> 许莹.网络群体传播中反向社会情绪的放大效应及其疏导[J].中州学刊,2013(06):174-176.
- <sup>71</sup> 赵云泽,薛婷予.危机事件中恐慌情绪传播及群体认知研究[J].当代传播,2021(02): 31-35+40.
- <sup>72</sup> 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J].国际新闻界,2020,42(01):79-98.
- <sup>73</sup> 姜楠.感性选择: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的主体关系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43(01):66-73.
- <sup>74</sup> 周琼,曾样样.群体传播时代的集体行动和仪式狂欢——对“饭圈出征”网络行动的个案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3):154-159.
- <sup>75</sup> Kate T. Luong & Emily Moyer-Gusé (2021) Can Altruistic Emotions Promote Vaccine Advocacy? Examining the Use of Empathy and Elevation in Vaccine Message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DOI: 10.1080/10810730.2021.2002981
- <sup>76</sup> 金梦玉,李劭强.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受众研究的新进路[J].中国编辑,2020(01):15-20.
- <sup>77</sup> Stephen M. Croucher (2011) Social Networking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4:4, 259-264, DOI: 10.1080/17513057.2011.598046
- <sup>78</sup> 张冠文,刘红心.微信朋友圈“点赞”的情感诉求与主体异化[J].编辑之友,2018(06):44-48.
- <sup>79</sup> Edda Humprecht, Frank Esser, Peter Van Aelst, Anna Staender & Sophie Morosoli (2021) The sharing of disinformation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nalyzing patterns of resilien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DOI: 10.1080/1369118X.2021.2006744
- <sup>80</sup> Craig R. Scott (1999)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nd discursive anonymity on group members' multiple identifications during computer-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3:4, 456-487, DOI: 10.1080/10570319909374654
- <sup>81</sup> 孔倩.从微信的互动模式看互联网群体传播的互动心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 报),2020,42(05):155-158.
- <sup>82</sup> Mette Mortensen & Christina Neumayer (2021) The playful politics of mem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16, 2367-2377, DOI: 10.1080/1369118X.2021.1979622
- <sup>83</sup> 赵乐平,范明.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网络语言的社交属性研究[J].中国出版,2016(03):53-57.
- <sup>84</sup> 隋岩,唐忠敏.多维时间、情节编制与群体传播的网络话语建构[J].文艺研究,2021(08):81-91.
- <sup>85</sup> 范明.论互联网群体叙事的意义流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4):153-157.
- <sup>86</sup> 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14-134+204-205.
- <sup>87</sup> 田维钢,张仕成.群体传播时代的传播风险及其成因分析[J].当代传播,2017(05):20-23.
- <sup>88</sup> 张爱军,赵泽泉.网络政治群体传播与政治生态形塑[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1):1-9.
- <sup>89</sup> Mei-Chen Lin & Paul M. Haridakis (2021)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Outgroup Partisan Media Contact on Intergroup Bias and Un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pposing Party: An Intergroup Threat Approach,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DOI:10.1080/15205436.2021.1996608
- <sup>90</sup> 张宏树.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J].民族学刊,2021,12(07):56-67+108.
- <sup>91</sup>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356.
- <sup>92</sup> Plutchik, R.&Kellerman, H..Emotion:theory,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theories of Emotion.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0.
- <sup>93</sup> Bollen, J., Pepe, A.&Mao, H..Modeling public mood and emotion:Twiter senti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phenomena.Computer Science.2009.44 (12). P.2365-2370.
- <sup>94</sup> Izard, C.E. Emotion-cognition relation ships and human development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P.17-37.
- <sup>95</sup> Mehrabian A. Pleasure-arousal-dominance: a general frame work for describing and measuring in dvidual differences in temperament. *Current Psychology*.1996.14 (4) .P.261-292.
- <sup>96</sup> McDougall, W. Outlin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Scribner.1923.
- <sup>97</sup>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34.
- <sup>98</sup>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
- <sup>99</sup> 罗伯特·默顿.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载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3.
- <sup>100</sup>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2.
- <sup>101</sup>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2.
- <sup>102</sup>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3-64.
- <sup>103</sup>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J].社会学研究, 2005 (1) .
- <sup>104</sup>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14.
- <sup>105</sup> 朱志玲.社会矛盾视域下群体情绪研究[M].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211.
- <sup>106</sup> Valenzuela, Ali A., and Tyler T. Reny. 2020. "Evolution of Experiments on Racial Priming."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edited by James N. Druckman, and Donald P. Gree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p>107</sup> Qiu, L. 2020. Trump's inaccurate claims on hydroxychloroquine. *New York Times* (May 21).
- <sup>108</sup> Rogers, K., C. Hauser, A. Yuhas, and M. Haberman. 2020. Trump's Suggestion that Disinfectants Could Be Used to Treat Coronavirus Prompts Aggressive Pushback.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 <sup>109</sup> Mindich, D. 2020. Trump's campaign against Fauci ignores the proven path for defeating pandemics.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 <sup>110</sup> 冉冉.反智、民粹: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疫情治理[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3) : 53-60.
- <sup>111</sup> Adida, Claire L, Kim Yi Dionne, and Melina R Platas. 2018. "Ebola, Elections, and Immigration: How Politicizing an Epidemic Can Shape Public Attitudes." *Politics, Groups, and*

- Identities*, 1–27.
- <sup>112</sup> Kam, Cindy. 2019. “Infectious Disease, Disgust, and Imagining the Other.” *Journal of Politics* 81 (4): 1371–1387.
- <sup>113</sup> Chou, Rosalind S, and Joe R Feagin. 2008. *Model Minority Myths: Asian Americans Facing Racism*. New York, NY: Paradigm Publishers.
- <sup>114</sup> Chang, Iris. 2004.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sup>115</sup> Trauner, Joan B. 1978. “The Chinese as Medical Scapegoats in San Francisco, 1870–1905.” *California History* 57 (1): 70–87.
- <sup>116</sup> Tyler T. Reny & Matt A. Barreto. Xenophobia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othering, anti-Asian attitudes, and COVID-19.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28 May 2020.
- <sup>117</sup> Perez, Efren O. 2016. *Unspoken Politics: Implicit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Thinking*.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p>118</sup> Caputo, M. Anti-China sentiment is on the rise. Politic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5/20/anti-china-sentiment-coronaviruspoll-269373>.
- <sup>119</sup> Nelson, Thomas, and D. Kinder. 1996. “Issue Frames and Group-Centrism in American Public.”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8 (4): 1055–1078.
- <sup>120</sup> Sullivan, M. 2020 The Data Is In: Fox News May Have Kept Millions from Taking the Coronavirus Threat Seriously. *Washington Post*(June 28).
- <sup>121</sup> Boot, M. 2020.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Idiocracy’.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 <sup>122</sup> Gershenson, J., and D. Plane. 2015. In Government We Distrust: Citizen Skeptic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um* 13(3):481–505.
- <sup>123</sup> Bir, C., and N. Widmar, 2020. Societal Values and Mask Usage for COVID-19 Control in the US. SSRN 3648562.
- <sup>124</sup> Smith, V., and A. Wanless 2020. Unmasking the Truth: Public Health Experts,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Raucous Marketplace of Ideas. Carnegie Foundation.
- <sup>125</sup> Wilson, J. 2020. The Rightwing Christian Preachers in Deep Denial over Covid-19’s Danger. *The Guardian* (April 4).
- <sup>126</sup> Niemietz, B. 2020. Televangelist Claims to Cure Coronavirus through Television Set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3).
- <sup>127</sup> Peters, T. 2018. Corporations, Sovereignty and the Religion of Neoliberalism. *Law and Critique* 29(3):271–292.
- <sup>128</sup> Bunch, W. 2020. America Is Drunk on a Warped Idea of Freedom, and Now It’s Killing People.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28).
- <sup>129</sup> Nichols, T. 2017.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p>130</sup> Mooney, C. 2006.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sup>132</sup> 陈茂华.现实关怀下的学术实践——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J]学术研究,2008 (4) : 120-124.
- <sup>133</sup>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M]New York:Alfred A-Konpf,1963: 196.
- <sup>133</sup>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4.
- <sup>134</sup> 苏珊·雅各布比, 曹聿非.反智时代: 谎言中的美国文化[M]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8.
- <sup>135</sup> 邵培仁,邱戈.媒体弱智:是社会咒语还是媒体现实[J]浙江学刊,2006(01):118-125.
- <sup>136</sup> 潘采夫.中国电视正在走向反智[J]新闻记者,2012(03):71.
- <sup>137</sup> Blumenthal David,Fowler Elizabeth J,Abrams Melinda,Collins Sara R. Covid-19 - Implications for the Health Care System.[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0,383(15).
- <sup>138</sup> Barreto, Matt A, Lorrie Frasure-Yokley, Edward D Vargas, and Janelle Wong. 2018. “Best Practices in Collecting Online Data with Asian, Black, Latino, and White Respondents: Evidence from the 2016 Collaborative Multiracial Post-Election Survey.”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6 (1): 171–180.
- <sup>139</sup> Eichelberger, Laura. 2007. “SARS and New York’s Chinatown: The Politics of Risk and Blame During an Epidemic of Fear.”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5: 1284–1295.
- <sup>140</sup> Denis Twitchett. “Populaion and Pestilenc in T`ang China”.pp.35-68.
- <sup>141</sup> 陈昊著.疾之成殇: 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253-254.

<sup>142</sup> [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 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29.

<sup>143</sup> [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 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98-199.

<sup>144</sup> 刘琼,马文婷,范一欣.短视频平台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情绪呈现及舆情治理——以 Bilibili 网站“新冠疫情”议题为例[J].电子政务,2021(06):52-65.

<sup>145</sup> Sides, John, Lynn Vavreck, and Michael Tesler. 2018.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p>146</sup> 渠敬东著.缺席与断裂: 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21.

<sup>147</sup> 许海云,张秦瑜.新冠疫情下美国反智言行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20(11):43-49+18+65.

<sup>148</sup> 三舍.疫情下的反智主义, 让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更严重[J].世界文化,2020(09):41-43.

<sup>149</sup> 渠敬东著.缺席与断裂: 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34.

<sup>150</sup> 黄典林.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

<sup>151</sup>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London: Paladin.pp.11.

<sup>152</sup> 黄典林.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

<sup>153</sup>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53.

<sup>154</sup> 罗圣荣.赵祺.张新.新冠疫情下疫苗民族主义的缘起、表现及其影响[J].世界民族.2021,(05).

<sup>155</sup> 新华社.综述: 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不利于全球共同抗疫[D].2021-06-0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522563482347212&wfr=spider&for=pc>

<sup>156</sup> Thomas J. Bollyky, ChadP.Bown,“The Tragedy of Vaccine Nationalism”,Foreign Affairs,vol. 99, no.5, 2020.

<sup>157</sup> 参消息.德媒: 世卫组织警告疫苗民族主义[D].2020-11-1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319470639853167&wfr=spider&for=pc>

<sup>158</sup> 光明网.疫苗公平拷问人类良知和多边主义信念[D].2021-03-30. <https://m.gmw.cn/baijia/2021-03/30/1302197884.html>.

<sup>159</sup> 半月谈.汤蓓, 抵制疫苗民族主义[D].2021-02-10. [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210210/1000200033136201612857681206223123\\_1.html](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210210/1000200033136201612857681206223123_1.html).

<sup>160</sup> Suyin Haynes.As Coronavirus Spreads, So Does Xenophobia and Anti-Asian Racism:<https://time.com/5797836/coronavirus—racism—stereotypes-attacks>.

<sup>161</sup> Louis L. Snyder.(1964).*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m, Readings in Its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Toronto: D.Van Nostrand Company.p.23.

<sup>162</sup>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办事处网.联合国专家表示, 各国有必要采取行动, 打击与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的仇外言论[D].2021-12-01.<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39&LangID=C>.

<sup>163</sup> 纪莉.种族主义的新冠: 以病为名——新冠肺炎的全球媒介呈现[J].学术研究.2020 (3).

<sup>164</sup> PAHO highlights under-recognized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the Americas due to COVID-19:<https://www.paho.org/en/news/24-11-2021-paho-highlights-under-recognized-mental-health-crisis-americas-due-covid-19>.

<sup>165</sup> See to Lawrence O. Gostin, SafuraAbdool Karim, and Benjamin Mason Meier, Facilitating Access to a COVID-19 Vaccine through Global Health Law,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48. 2020: 622-626.

<sup>166</sup> 前瞻网.欧美等发达国家联手拿走一半新冠疫苗, 全球近 1/5 人口无疫苗可打[D].2020-12-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681858866505091&wfr=spider&for=pc>

<sup>167</sup> 中本网.美国疾控中心: 美国浪费了至少 1510 万剂新冠疫苗[D].2021-10-25.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shipin/cns-d/2021/10-25/news905068.shtml>.

<sup>168</sup> 中国新闻网.产能将扩至每年 10 亿剂, 美国理应放下“疫苗民族主义” [D].2021-11-22.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1/11-21/9613402.shtml>.

<sup>169</sup> 参消息;美国“疫苗民族主义”荒唐可笑, 中国大使点评一针见血! [D].2021-06-21.

- http://www.myzaker.com/article/60cf838eb15ec067461ba46a.
- <sup>170</sup> 上观新闻网.美媒指出，美国浪费的疫苗数量远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数量 [D].2021-10-25.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417735.html>.
- <sup>171</sup> 人民网.美国新冠疫苗浪费严重[D].2021-10-25. <http://hb.people.com.cn/n2/2021/1025/c194063-34971854.html>.
- <sup>172</sup> 参考消息.疫苗捐赠[D].<https://launchandscalefaster.org/covid-19/vaccinedonations>.
- <sup>173</sup> 每日经济新闻.新冠疫苗分配不均如何破？富国囤积“超量”达10亿剂，最穷国全国仅分到25剂[D].2021-02-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308852671250320&wfr=spider&for=pc>.
- <sup>174</sup> 参考消息.追踪全球 COVID-19 疫苗的购买情况[D].<https://launchandscalefaster.org/covid-19/vaccinepurchases>.
- <sup>175</sup> 国际新闻网.美国新冠疫苗浪费严重 美媒指出，美国浪费的疫苗数量远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数量[D].2021-10-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566258850152823&wfr=spider&for=pc>.
- <sup>176</sup> 环球时报.印度国产新冠疫苗遭质疑，印官员呛：不信任它的人是低能弱智[N].2021-01-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032166592286122&wfr=spider&for=pc>.
- <sup>177</sup> 人民网.疫情反弹 美国政府矛头指向社交媒体涉疫苗不实信息[D].2021-07-18.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718/c1002-32161096.html>.
- <sup>178</sup> 央视网.美媒：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支离破碎 疫苗数据甚至依靠国外[D].2021-08-22. <https://news.cctv.com/2021/08/22/ARTIPDL6ZcTQk336I4TnH8WQ210822.shtml>.
- <sup>179</sup> 央视网.应对疫情：中国封锁近6000万人 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实现 [D].2020-02-01.<http://news.cctv.com/2020/02/01/ARTIANQjeh1gI4OLIBhuRDTP200201.shtml>.
- <sup>180</sup> Laura M. Bogart, Lu Dong, Priya Gandhi, David J. Klein, Terry L. Smith, Samantha Ryan, Bisola O. Ojikutu.(2021).COVID-19 Vaccine Intentions and Mistrust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Black Americans.
- <sup>181</sup> United Nations, World Social Report2020: Inequal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p22
- <sup>182</sup> 罗伯特·沃克.谁该优先接种新冠疫苗?[J].刘冷馨译.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0(5).
- <sup>183</sup> 查道炯.“疫苗民族主义”与多边主义[N].环球时报.2020-10-09
- <sup>184</sup> Ballyky, T.J., Gostin, L.O., & Hamburg, M.A. (2020).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theapeutics and vaccines.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23(4), 2462-2463.
- <sup>185</sup> 光明网.世卫组织呼吁：富国和疫苗生产企业不要再达成双边协议[D].2021-01-09. <https://m.gmw.cn/baijia/2021-01/09/1302018445.html>.
- <sup>186</sup> Our World in Data: 全球人口疫苗接种率[D].2021-11-27.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country=>
- <sup>187</sup> 参考消息.皮尤民调显示：三成亚裔美国人因疫情遭歧视[N].2020-07-0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170272504156435&wfr=spider&for=pc>.
- <sup>188</sup> 央视新闻.美国疾控中心：美国疫苗接种情况仍存在种族差异 [D].2021-05-1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670961572746927&wfr=spider&for=pc>.
- <sup>189</sup> 郭言，“疫苗民族主义”危害全球经济[N].来源：经济日报,网址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597099267412126&wfr=spider&for=pc>.
- <sup>190</sup> Yanqui Rachel Zhou, Vaccine nationalism contes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VID 19 and globalization.GLOBALIZATIONS.
- <sup>191</sup> 人民网.“继续支持世卫组织抗击疫情的努力”[D].2020-04-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254096259749777&wfr=spider&for=pc>.
- <sup>192</sup> 景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J].社会科学.2006(8).
- <sup>193</sup> 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64-171页.
- <sup>194</sup> 此节主体内容已发表.中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学术场域变迁考察——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2000-2019）[J].新闻大学 2021 (5) .
- <sup>195</sup> 习近平.习近平对卫生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新华社,2017-08-17.
- <sup>196</sup> Larson HJ, de Figueiredo A, XiaHong Z, et al. “The state of vaccine confidence 2016: global

insights through a 67-country survey.” *EBio Medicine*, 2016, 12: 295-301.

<sup>197</sup> Lane S, Macdonald N E, Martim, etal. “Vaccine hesitancy around the globe: analysis of three years of WHO/UNICEF Joint Reporting Form data-2015-2017.” *Vaccine*, 2018, 36(26): 3861-3867.

<sup>198</sup> Larson HJ, Schulz WS, Tucker JD, etal.“Measuring vaccine confidence: introducing a global vaccine confidence index.” *Plos Currents*, 2015, 7(2):1-18.

<sup>199</sup> Giambi C, Fabianim, D'anconaf, etal. “Parental vaccine hesitancy in Italy-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Vaccine*, 2018, 36(6): 779-787.

<sup>200</sup> ŻUK P, ŻUK P, Lisiewicz-Jakubaszko J. “The antivaccine movement in Poland: the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opposition to vaccination and threats to public health.” *Vaccine*, 2019, 37(11): 1491-1494.

<sup>201</sup>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 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

<sup>202</sup> 宫留记.场域、惯习和资本: 布迪厄与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不同视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6-80.

<sup>203</sup> 张志安.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的研究[J].新闻大学,2010:48-55.

<sup>204</sup> 孙鸿飞等.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推荐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J].情报科学,2014(12):12-15 转 20.

<sup>205</sup> 王军利.国内外身体活动研究趋势的知识图谱分析(2000-2014年) [J].体育科研,2017 (1):38-43.

<sup>206</sup> 陈曦等.基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公共卫生绩效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J].医学与社会, 2012(5):9-11.

<sup>207</sup> 张琪明等.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公共卫生绩效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81-285.

<sup>208</sup> 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王贤文.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 Cite Space 实用指南[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4:137.

<sup>209</sup> 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王贤文.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 Cite Space 实用指南[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4:43.

<sup>210</sup>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 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1.

<sup>211</sup> 许志强,曹三省.全媒体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智能媒体应急平台研究[J].现代传播 2016 (12): 133-136.

<sup>212</sup> 袁军,冯尚钺.突发性公共事件与政府形象修复策略研究[J].现代传播,2013(10): 31-34 转 51.

<sup>213</sup> 陈虹等.互联网使用、公共事件关注度、信息公开评价与政府信任度研究[J].新闻大学, 2015(3):24-29 转 23.

<sup>214</sup> 张薇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官方媒体报道的隐喻架构分析——基于 SARS 和 H7N9 疫情报道语料[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100-108 转 169-170.

<sup>215</sup> 任景华.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信息传播策略建构[J].现代传播,2015(10):152-153.

<sup>216</sup> 王宇琦,陈昌凤.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的危机传播与形象塑造: 以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7):47-59.

<sup>217</sup> 刘宏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青少年应激反应与应对方式[J].中国健康心理学志,2017(8): 1235-1239.

<sup>218</sup> 高文斌等.心理咨询热线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03(4): 400-404.

<sup>219</sup> 赵玉芳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构[J].心理科学,2008(5):1263-1264 转 1271.

- <sup>220</sup> 秦昕等.甲流了解程度、疫苗安全感知、接种行为及其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2011(6):684-695.
- <sup>221</sup> 张钟等.南京市儿童家长手足口病认知和EV71疫苗接种意愿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18(21):3998-4000.
- <sup>222</sup> 张洁等.广州市大学生HPV疫苗的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9):965-967 转 971.
- <sup>223</sup> 赵敏等.成都地区女性患者对宫颈癌筛查和HPV疫苗认知调查分析[J].重庆医学,2018(60):786-788.
- <sup>224</sup> 宋之杰等.突发公共事件情绪感染量表编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1):38-43.
- <sup>225</sup> 王威.风险传播中公众社会情绪的平衡[J].当代传播,2018(5):68-69 转 112.
- <sup>226</sup> 丁迈等.心理应激影响下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公众舆论流变——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2015(2):50-53.
- <sup>227</sup> 薛可等.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概念形成与维度分析[J].现代传播,2015(10):24-29 转 56.
- <sup>228</sup> 刘从等.微博情绪与微博传播力的关系研究——基于24起公共事件相关微博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9):92-106.
- <sup>229</sup> 王凌云等.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双重话语空间对比分析[J].当代传播,2013(2),第45-48页.
- <sup>230</sup> 宫承波.重大事故灾害事件的网络舆论及其导控[J].当代传播,2014(1):94-96.
- <sup>231</sup> 李翠敏.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协同疏解研究——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J].情报杂志,2018(11):1-7.
- <sup>232</sup> 喻国明.健康传播的舆情特点与常态分布——基于2016年国内食药安全热点事件的量化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8(5):50-55.
- <sup>233</sup> 张一弛.风险社会语境下“疫苗事件”报道研究——以“康泰乙肝疫苗事件”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14(17):34-35.
- <sup>234</sup> 陈冀周.公共危机背景下的政府与媒体关系研究[J].新闻战线,2014(5):123-125.
- <sup>235</sup> 王晓菲等.卫生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8(11):827-829 转 851.
- <sup>236</sup> 崔鹏等.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及政府应对能力研究[J].现代情报,2018(2):75-83 转 95.
- <sup>237</sup> 陈曦等.基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公共卫生绩效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2(5):9-11.
- <sup>238</sup> 王春雪等.地铁应急疏散恐慌程度模型[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5(2):171-176.
- <sup>239</sup>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1.
- <sup>240</sup> Burgess D C , Burgess M A , Leask J . The MMR vaccination and autism controversy in United Kingdom 1998–2005: Inevitable community outrage or a failure of riskcommunication? *Vaccine*,2006,24(18):3921—3927.
- <sup>241</sup> Holton A , Weberling B , Clarke C E , et al. The Blame Frame: Media Attribution of Culpability About the MMR–Autism Vaccination Scare.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2, 27(7):690-701.
- <sup>242</sup> Fowler E F , Gollust S E , Dempsey A F , et al. Issue Emergence, Evolution of Controversy, and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ve Framing: The Case of the HPV Vaccin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2, 17(2):169-189.
- <sup>243</sup> 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级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6.序 1.
- <sup>244</sup> 李杰/陈超美: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78.
- <sup>245</sup> 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王贤文: 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 CiteSpace实用指[M].北京:

- 科学出版社,2014:137.
- <sup>246</sup> 谢卫红、董策、李忠顺: 基于 Citespace 的商业生态系统研究可视化分析[J].现代情报, 2017 (2) .
- <sup>247</sup> Betsch.C.Innovations in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et and the psychology of vaccination decisions. *Eurosurveillance*, 2011.28 April.
- <sup>248</sup> P. R. Ward, K. Attwell, S. B. Meyer, P. Rokkas & J. Leask.Risk, responsibility and negative respons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arental trust in childhood vaccinations.*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7.25 Oct.
- <sup>249</sup> Petts J,Niemeyer S. Health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mplification: learning from the MMR vaccination controversy. *Health, risk & society*, 2004.6(1): 7.
- <sup>250</sup> Kim.S, Pjesivac I, Jin Y. Effects of Message Framing on Influenza Vaccinatio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Risk Disclosure, Perceived Vaccine Efficacy, and Felt Ambivalence.*Health communication*, 2017.34(1):21.
- <sup>251</sup>Bie B, Tang L. Representation of autism in leading newspapers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5.30(9): 884-893.
- <sup>252</sup>James Olumide Olufowote.Local Resistance to the Global Eradication of Polio: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2003–2004 Vaccination Stoppage in Northern Nigeria.*Health Communication*. 2011.10 Jun.
- <sup>253</sup>Liana Blas Winett and Regina G.Lawrence.Public Health,the News,and the 2001 Anthrax Attacks.*Politics*.2005.10(3):3-25.
- <sup>254</sup>Jang S M, McKeever B W, McKeever R, et al. From social media to mainstream news: The information flow of the vaccine-autism controversy in the US, Canada, and the UK.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7.13 Oct.:110.
- <sup>255</sup> [美]迈克尔·埃默里: 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9:35.
- <sup>256</sup> Christopher.E. Clarke.A case of conflicting norms? Mobiliz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formation in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autism-vaccine controversy.*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6.20(5).
- <sup>257</sup> Julie Leask, Simon Chapman.'The cold hard facts' immunisation and vaccine preventable diseases in Australia's newsprint media 1993-1998.*Social Science& Medicine* 2002.54: 445-457.
- <sup>258</sup> Jennifer Keelan.YouTube as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Immunization: A Content Analysis,*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7.Vol 298, No.21.
- <sup>259</sup> Brooke Weberling McKeever, Robert McKeever, Avery E. Holton & Jo-Yun Li.Silent Majority: Childhood Vaccinations and Antecedents to Communicative Action, *Mass Communication &Society*, 2016. (4):477.
- <sup>260</sup> Tausczik Y , Faasse K , Pennebaker J W , et al. Public anxiety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following the H1N1 outbreak: blogs, newspaper articles, and Wikipedia visits.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2.27(2):179.
- <sup>261</sup> Meghan Bridgid Moran, Melissa Lucas, Kristen Everhart, Ashley Morgan & Erin Prickett.What makes anti-vaccine websites persuasive? A content analysis of techniques used by anti-vaccine websites to engender anti-vaccine Senti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 Healthcare*.2016.03 Oct.
- <sup>262</sup> Anna Kata.A postmodern Pandora's box: Anti-vaccination mis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Vaccine*.2010.28.
- <sup>263</sup> Richard E. Adams, Joseph A. Boscarino: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erievent Panic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ter a Community Disast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1. Vol.24, No.1.

<sup>264</sup> Xiaoli Nan & Kelly Madden, HPV Vaccine Information in the Blogosphere: How Positive and Negative Blogs Influence Vaccine-Related Risk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2,27 Mar.

<sup>265</sup> Betsch C, Renkewitz F, Betsch T, et al. The influence of vaccine-critical websites on perceiving vaccination risk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0.15(3): 446.

<sup>266</sup> [英]弗兰克·菲雷迪著.吴万伟.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6.

<sup>267</sup> [英]弗兰克·菲雷迪著.吴万伟.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4.

<sup>268</sup>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sup>269</sup>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London: Paladin. pp.11.

<sup>270</sup> 黄典林.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等著《控制危机》[J]国际新闻界 2014.4: 55-67.

<sup>271</sup> Thurlow, C. (2006). From statistical panic to moral panic: The meta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popular exaggeration of new media language in the print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1(3), 667–701.

<sup>272</sup> Szablewicz, M. (2010). The ill effects of ‘opium for the spirit’: A critical 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a’s Internet addiction moral panic.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 453–470.

<sup>273</sup>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sup>274</sup> Ingraham, C., & Reeves, J. (2016). New media, new panic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33(5), 455–467.

<sup>275</sup> Marwick, A. E. (2008). To catch a predator? The MySpace moral panic. *First Monday*, 13(6).

<sup>276</sup>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sup>277</sup> “Fast food timebomb: Obesity fears grow as burger, fried chicken and pizza joints flood Britain’s high streets”, *Daily Mirror*, 25 July 2017.

<sup>278</sup> <https://www.metro.news/men-in-west-face-fertility-time-bomb/686986>(accessed 27 July 2017).

<sup>279</sup> “Police:’Iheanacho was to some degree a ticking timebomb””, Daily Mail,27 July 2017.

<sup>280</sup> “time bomb,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7.

<sup>281</sup> Cited in Nerlich and Halliday(2007),p.57.<http://longbets.org/9/>.

<sup>282</sup> Castells, M., Qui, J., Fernandez- Ardèvol, M. and Sey, A. 2007.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sup>283</sup> DiMaggio, P., Hargittai, E., Neuman, W. R. and Robinson, J. P. 2001.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307–336.

<sup>284</sup> Guzelian,C. P. (2004), *Liability and Fear*, Standford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Series: Standford,CA:Standford Law School. pp.712,767.

<sup>285</sup> Bateson, G. 1956. “The message‘This is play’”. In B. Schaffner (Ed.) , Group processes: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M].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pp.145-242.

<sup>286</sup> Scheufele, D.A. and Tewksbury, D. 2007.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9-20.

<sup>287</sup> Entman, R.M., 1993.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51-58.

<sup>288</sup> Hallahan, K. 1999.Seven models of framing: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rela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1 (3),205-242.

<sup>289</sup>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M]. New York, NY: Free Press.P193.

<sup>290</sup>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7.

<sup>291</sup> Gamson, W.A. and Modigliani,A.,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1-37.
- <sup>292</sup> Shen, F. & Edwards, H. 2005 .Economic individualism, humanitarianism, and welfare reform: A value-based account of framing effect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4),795-809.
- <sup>293</sup> Brewer, P.R. 2002. Framing, value words, and citizens' explanations of their issue opinions[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3), pp.16.
- <sup>294</sup> 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 <sup>295</sup> Lewison, G. The reporting of the risks from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the news media, 2003-2004. *Health, Risk and Society*, 10,2008.241-262.
- <sup>296</sup> Ungar, S. Hot crisis and media reassurance: A comparison of emerging diseases and Ebola Zai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48,1998. 36-56.
- <sup>297</sup> Danielle K.Kilgo, Joseph Yoo & Thomas J. Johnson. Spreading Ebola Panic: Newspaper and Social Media Coverage of the 2014 Ebola Health Crisi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ume 34,2019.811-817.
- <sup>298</sup> Finn, J. C. & Palis, J. Introduction: The medium, the message, and media ge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 *GeoJournal*, 80,2015. 781-790.
- <sup>299</sup> A.L. Kavanaugh, E.A. Fox, S.D. Sheetz, S. Yang, L.T. Li, D.J. Shoemaker, etal. Social media use by government: from the routine to the critic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ume 29 (4),October 2012, pp.480-491.
- <sup>300</sup> B.F. Liu, L. Austin, Y. Jin. How publics respond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e interplay of information form and source. *Safety Science*, Volume 78 2011, pp.101-110.
- <sup>301</sup> L.V. Chewning. Multiple voices and multiple media: co-constructing BP's crisis respons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ume 41 (1), March 2015, pp.72-79.
- <sup>302</sup> X. Ma, J. Yates.Optimizing social media message dissemination problem for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ume 78,December 2014, pp. 107-126.
- <sup>303</sup> Y. Jin, B.F. Liu, L.L. Austin. Exam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the effects of crisis origin, information form, and source on publics' crisis responses. *Communication. Res.*, 41 (1), 2014
- <sup>304</sup> Holton A , Weberling B , Clarke C E , et al. The Blame Frame: Media Attribution of Culpability About the MMR–Autism Vaccination Scare.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2, 27(7):690-701.
- <sup>305</sup> Fowler E F , Gollust S E , Dempsey A F , et al. Issue Emergence, Evolution of Controversy, and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ve Framing: The Case of the HPV Vaccin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2, 17(2):169-189.
- <sup>306</sup> Cohen, S.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New York, USA: Routledge.2002. Garland, D. On the concept of moral panic. *Crime, Media, Culture*, 4, 2008. 9-30.
- <sup>307</sup> Swain, K. A. Outrage factors and explanations in news coverage of the anthrax attack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4,2007. 335-352.
- <sup>308</sup> Goffma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USA: Simon and Schuster.2009.
- <sup>309</sup> Crawford, R. The boundaries of the self and the unhealthy other: Reflections on health, culture and AID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8,1994. 1347-1365
- <sup>310</sup> Foucault, Michel.1998.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Will to Knowledge*. New York, NY: Penguin. p134.
- <sup>311</sup> 景军.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9.
- <sup>312</sup> M.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up>313</sup> 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0.
- <sup>314</sup> 景军.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59.
- <sup>315</sup>此部分内容已发表：我国公共卫生议题的传播学反思——以 2005-2018 年疫苗事件为分析样本.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3).
- <sup>316</sup> Stuart Blume. 2006.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8-642.
- <sup>317</sup> Stuart Blume, 2006.Anti-vaccination movemen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8-642.

- <sup>318</sup> Robert M Wolfe. 2005. Vaccination or Immunization? The Impact of Search Terms on the Internet[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Oct.
- <sup>319</sup> Christopher E. Clarke. 2011. A case of conflicting norms? Mobiliz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formation in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autism-vaccine controversy[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 609-626.
- <sup>320</sup> P. R. Ward, ect. 2017.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negative respons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arental trust in childhood vaccinations[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5 Oct. 1117-1130.
- <sup>321</sup> 赵敏等.成都地区女性患者对宫颈癌筛查和HPV疫苗认知调查分析[J].重庆医学,2018(6).
- <sup>322</sup> 张钟等.南京市儿童家长手足口病认知和EV71疫苗接种意愿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18(21).
- <sup>323</sup> 张洁等.广州市大学生HPV疫苗的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9).
- <sup>324</sup> Entman, R.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51-58.
- <sup>325</sup> Van Gorp, B. 2007.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60-78.
- <sup>326</sup> Karpf, A. 1988. Doctoring the Media. London[M]. UK: Routledge.
- <sup>327</sup> Kitzinger, J., & Reilly, J.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risk report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319-350.
- <sup>328</sup> Valkenburg P M, Semetko H A, De Vreese C H. 1999, The effects of news frames on readers' thoughts and recall[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5): 550-569.
- <sup>329</sup> Gandy, O. H. 1980. Information in health: Subsidized news[J].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103-115.
- <sup>330</sup> Nucci, M. L., Cuite, C. L. and Hallman, W. K. 2009. When good food goes bad: Television network news and the spinach recall of 2006[J]. Science Communication, 31: 238-265.
- <sup>331</sup> Lacy, S. and Coulson, D. C. 2000. Comparative case study: Newspaper source use on the environmental beat[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1: 13–25.
- <sup>332</sup>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 47, 263-292.
- <sup>333</sup> Rothman, A. J., Kelly, K. M., Hertel, A. W., & Salovey, P. 2003. Message frames and illness representations: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and sustain healthy behavior. In L.D.Cameron & H. Leventhal (Eds.)[M]. New York, The self-regulation of health and illness behavior. pp. 278–296.
- <sup>334</sup> Mazur, D. J., & Hickam, D. H. 1997. Patients' preferences for risk disclosure and role in decision making for invasive medical procedures[J].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2,114–117.
- <sup>335</sup> Kennedy, A., LaVail, K., Nowak, G., Basket, M., & Landry, S. 2011. Confidence about vacc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parents' perceptions[J]. Health Affairs, 30,1151-1159.
- <sup>336</sup> Casiday, R., Cresswell, T., Wilson, D., & Panter-Brick, C. 2006. A survey of UK parental attitudes to the MMR vaccine and trust in medical authority[J]. Vaccine, 24,177-184.
- <sup>337</sup> Tine Walravens. 2019. Recalibrating risk through media: Two cases of intentional food poisoning in Japan[J]. Food and Foodways. Sep. 74-97.
- <sup>338</sup> 娜奥米·克莱恩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的兴起[M].吴国卿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7.
- <sup>339</sup> Kata, A. 2010. A postmodern Pandora's box: Anti-vaccination mis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J]. Vaccine, 28: 1709–1716.
- <sup>340</sup> Swain, K. A. 2007. Outrage factors and explanations in news coverage of the anthrax attack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4, 335-352.
- <sup>341</sup> Goffman, E. Stigma. 2009.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USA: Simon and Schuster.
- <sup>342</sup> Garland, D. 2008. *On the concept of moral panic*. USA: Routledge. Crime, Media, Culture, 4,9-30.
- <sup>343</sup> 徐善伟.女性因何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J].历史研究,2015(05): 157-172+193.

- <sup>344</sup> 参见 Wilhelm Gottlieb Soldan, *Geschichte der Hexenprozesse. Aus dem Quellen dargestellt,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Cotta*, 1843.
- <sup>345</sup> 徐善伟.女性因何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J].历史研究,2015(05):157-172+193.
- <sup>346</sup> Matilda Joslyn Gage, *Woman, Church and State*, New York: The Truth Seeker Company, 1893, pp.217-293.
- <sup>347</sup> 刘淑青.论欧洲猎巫史学的演变[J].甘肃社会科学,2012(02):174-177.
- <sup>348</sup> 王明珂.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3):1-7.
- <sup>349</sup> 王明珂.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3):1-7.
- <sup>350</sup> Neil Postman. Future Schlock [M] // Neil Postman. Conscientious Objections: Stirring Up Trouble About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162—174.
- <sup>351</sup>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7.
- <sup>352</sup>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5-106.
- <sup>353</sup> 梁其姿著,朱慧颖译.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1.
- <sup>354</sup> 文字资料来自于数据挖掘。
- <sup>355</sup> 文字资料来自于数据挖掘。
- <sup>356</sup> 文字资料来自于数据挖掘。
- <sup>357</sup> 文字资料来自于数据挖掘。
- <sup>358</sup> 文字资料来自于数据挖掘。
- <sup>359</sup> 徐彬.“弱者维权”的社会认知与社会规制[J].广西社会科学,2017(12):151-153.
- <sup>360</sup> 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4):5-13+126.
- <sup>361</sup> 徐顽强,谭伟.网络新闻跟帖中地域歧视现象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J].电子政务,2013(09):9-13.
- <sup>362</sup> 汪露著.刻板印象与老年传播[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6.
- <sup>363</sup> 张爱玲,逯杉楠.“后真相时代”的地域歧视传播——以东北人的形象传播为例[J].传媒,2018(13):67-69.
- <sup>364</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刘芳译,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20.
- <sup>365</sup> 罗謾.网络暴力的微观权力结构与个体的“数字性死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6):151-157.
- <sup>366</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刘芳译,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20-21.
- <sup>367</sup> 李岩.网络话语的暴力效果——以福柯话语理论解读网络暴力的生成[J].当代传播,2014(05):26-28.
- <sup>368</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2.
- <sup>369</sup> 张爱军,梁赛.网络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和规避措施[J].学术界,2019(04):75-83.
- <sup>370</sup> 陈伟光.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发展趋势与中国策略[J].社会科学,2022(01):14-23.
- <sup>371</sup> 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1.
- <sup>372</sup> Michel Foucault. *Saber y verdad*. Madrid: La Piqueta.1985.pp.193-194.
- <sup>373</sup> 朱振明,陈卫星.福柯的“主体化”及其传播学认识论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9):22-27.
- <sup>374</sup>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著,姚芸竹译.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 96.
- <sup>375</sup> 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 <sup>376</sup>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sup>377</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sup>378</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sup>379</sup>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 <sup>380</sup>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sup>381</sup> 杨超,朱小阳,揭其涛.建构、遗忘与激活：社会危急事件的媒介记忆[J].浙江社会科学.2020 (6) .
- <sup>382</sup> 吴林璞,王玲宁.创伤叙事：慰安妇集体记忆的媒体建构——以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为例[J].东南传播,2018 (11) : 128-131.
- <sup>383</sup> 巴比·泽利.寻找过去的帮助：为创伤性公共事件提供个人见证[J].媒介文化与社会 2002, 2 (5) 697-714.
- <sup>384</sup> [英]弗兰克·菲雷迪著.吴万伟.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30.
- <sup>385</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sup>386</sup> 麦克卢汉,何道宽.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sup>387</sup>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 2004(1):4.
- <sup>388</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54.
- <sup>389</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28.
- <sup>390</sup> 尼克·库尔德里著.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崔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5-26.
- <sup>391</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105-106.
- <sup>392</sup> 资料来源, 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vlog/7548732?fr=aladdin>.
- <sup>393</sup>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昆廷·菲奥里, 杰罗姆·阿吉尔著, 何道宽译, 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8.
- <sup>394</sup> 何镇飚.“媒介即信息”还是“媒介即按摩”？——论“媒介即按摩”的由来和价值[J].新闻界, 2006(01):40-42.
- <sup>395</sup> 何道宽.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当代诠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1).
- <sup>396</sup> 曾一果,时静.从“情感按摩”到“情感结构”：现代性焦虑下的田园想象——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122-130+170-171.
- <sup>397</sup>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昆廷·菲奥里, 杰罗姆·阿吉尔著, 何道宽译, 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4.
- <sup>398</sup> [美]斯坦利·巴兰, 丹尼斯·戴维斯著, 曹书乐译, 受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96.
- <sup>399</sup> [美]乔纳森·特纳著, 孙俊才, 文军译,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2.
- <sup>400</sup> [加拿大]梅蒂·莫利纳罗, 科琳·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 仲冬译, 麦克卢汉书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92.
- <sup>401</sup>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译,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33.
- <sup>402</sup> 李昕揆.“媒介即按摩”及其在网络时代的价值[J].青年记者,2012(36):43-44.
- <sup>403</sup> Norman Doidge, 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 New York: Penguin, 2007, pp. 310-311
- <sup>404</sup> John M. Culkin, “A Schoolman’s Guide to Marshall McLuhan,” Saturday Review, March 18, 1967.
- <sup>405</sup> Strauss A L, Corbin J M. Basics of qualitative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J].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014, 36 (100) :129.
- <sup>406</sup> 陈向明. 扎根理论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探索[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1): 2-15.
- <sup>407</sup> 苏郁锋, 吴能全, 周翔. 制造视角的创业过程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7, 20(1): 181-192.
- <sup>408</sup> 王小章：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J].浙江学刊.2015(1): 184.

- <sup>409</sup> [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著, 赵星植译, 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78.
- <sup>410</sup>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毕然, 郭金华译, 论集体记忆[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81.
- <sup>411</sup> 王源,李智鹏.浅析现实题材电视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以电视剧《少年派》为例[J].当代电视,2020(01):16-19.
- <sup>412</sup> [英]尼克·库尔德里著, 崔玺译,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25-26.
- <sup>413</sup> 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4,36(04):6-19..
- <sup>414</sup> 常江,何仁亿.数字时代的媒介仪式: 解读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实践[J].新闻界,2022 (02):21-29.
- <sup>415</sup> 曾一果,朱赫.记忆、询唤和文化认同:论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媒介仪式”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3):92-98.
- <sup>416</sup>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译,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55.
- <sup>417</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52.
- <sup>418</sup> 张卓,李晨.意义、情感与认同: 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2 (01):180-186.
- <sup>419</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21.
- <sup>420</sup> Ta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Austin W(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 Hall, 1986. 7-24.
- <sup>421</sup> Algesheimer, R., Dholakia, U. M. & Herrmann, A.,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Brand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ar Club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69, no. 3, 2005, pp. 19-34.
- <sup>422</sup> 吴玥,王江楠,刘艺萱.她们为何在同人社群自愿创作: 以群体认同与情感付出为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S1):108-125+128.
- <sup>423</sup> 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J].河南社会科学,2015,23(09): 20-24.
- <sup>424</sup> 陈薇,柯金妍.脱嵌、再嵌与联结: 离散群体的疫情叙事与共同体想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8):48-54.
- <sup>425</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109.
- <sup>426</sup> 喻国明.重拾信任:后疫情时代传播治理的难点、构建与关键[J].新闻界,2020(05):13-18+43.
- <sup>427</sup>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 欧阳景根译, 流动的现代性[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21-44.
- <sup>428</sup>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 何傅闻译, 风险社会[M].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13.
- <sup>429</sup> 赵鑫,高玉忠.国家政策的影像化传播策略研究——以“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为例[J].电视究,2018(03):43-46.
- <sup>430</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田禾译, 现代化的后果[M].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18-40.
- <sup>431</sup>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著.姚芸竹译.情感地缘政治学: 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新华出版社, 2010:98-99.
- <sup>432</sup>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sup>433</sup> Cohen,S.(1972).*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London: Paladin.pp.11.
- <sup>434</sup> 黄典林.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 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等著<控制危机>[J].国际新闻界. 2014(4).
- <sup>435</sup> Thurlow, C.(2006).From statistical panic to moral panic: The met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popular exaggeration of new media language in the print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1, 667–701.
- <sup>436</sup> Claire L. Adida, Kim Yi Dionne, Melina R. Platas (2018). Ebola, Elections, and Immigration: How Politicizing an Epidemic Can Shape Public Attitudes.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15, 488-514.

- <sup>437</sup> Efren O. Perez.(2016).*Unspoken Politics: Implicit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Thin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p>438</sup> CohenS.(1972).*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sup>439</sup> [英]查斯·克里彻著.道德恐慌与媒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sup>440</sup> Boot,M.(2020).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I diocracy'. *Washington Post*.June 30.
- <sup>441</sup> Nelson, Thomas, D.Kinder.(1996).Issue Frames and Group-Centrism in American Public.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8,1055-1078.
- <sup>442</sup> Sullivan, M.(2020).The Data Is In: Fox News May Have Kept Millions from Taking the Coronavirus Threat Seriously. *Washington Post*. June 28.
- <sup>443</sup> Manuel Castells,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raba Sey. (2007).*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pp.119-120.
- <sup>444</sup> Valenzuela, Ali A.,Tyler T.Reny.(2020)."Evolution of Experiments on Racial Priming."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edited by James N.Druckman, and Donald P.G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p>445</sup> Mindich,D.(2020).Trump's campaign against Fauciignores the proven path for defeating pandemics.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 <sup>446</sup> Dimaggio, P, Hargittai,E, Neuman WR, Robinson JP.(2001).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307-336.
- <sup>447</sup> Castells,M,QuiJ.,Fernandez-Ardèvol, M.Sey,A.(2008).The new public sphere: global civil society, communication networks, global govern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78-93.
- <sup>448</sup> Gershenson, J., D. Plane.(2015).In Government We Distrust: Citizen Skeptic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um*.13,81-505.
- <sup>449</sup> Bir,C., NO. Widmar.(2021).Societal Values and Mask Usage for COVID-19 Control in the US. *Preventive Medicine* 153,1-7.
- <sup>450</sup> 陈茂华.现实关怀下的学术实践——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J].学术研究.2008(4):120-124.
- <sup>451</sup>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4.
- <sup>452</sup> [美]苏珊·雅各比著.曹聿非译.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 <sup>453</sup> [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等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9.
- <sup>454</sup> 中国国际电视台及时客观报道中国抗击疫情[D].央视网.2020-03-07.网址：<http://m.news.cctv.com/2020/03/07/ARTIfKIdUBqLkZjCngMAE3Vj200307.shtml>.
- <sup>455</sup> 病毒变异赛跑 3 亿与中国疫苗力供全球[D].光明网.2021-06-02.
- <sup>456</sup> 渠敬东著.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21.
- <sup>457</sup> 渠敬东著.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34.
- <sup>458</sup>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5(1).
- <sup>459</sup> 刘勇.利益差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1):150-155.
- <sup>460</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芳译, 群体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21.
- <sup>461</sup> 朱志玲.社会矛盾视域下群体情绪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197.
- <sup>462</sup> Russell,A James. (1991) . Culture and the categoriza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 (3) .
- <sup>463</sup> 何飞,杨森.情绪性谣言传播机制及演化机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当代传播, 2022(01):90-93.
- <sup>464</sup> 戴笑惠.冷天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简析[J].新闻记者.2009(7).
- <sup>465</sup> 凯斯·桑斯坦.极端的人群[M].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
- <sup>466</sup> 陈红梅.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整合视野的思考[J].新闻记者,2015(05): 28-35.
- <sup>467</sup>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89.
- <sup>468</sup> Clore G Schwarz N Conway M. (1994) . *H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Lawrence Erlbaum

Accocaiates.

- <sup>469</sup> 龚新琼.新媒体语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叙事主体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03):152-155.
- <sup>470</sup> 曾建雄, 刘劲松.公共事件报道中的报纸角色扮演及公信力探析——以《南方都市报》“番禺垃圾焚烧厂风波”报道为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 170-176.
- <sup>471</sup> 毛湛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方法——“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14(11):87-91.
- <sup>472</sup> 喻国明,郭婧一.讲好故事的非理性机制——试论场景交互系统下的非理性说服[J].社会科学战线, 2021(11):148-154.
- <sup>473</sup>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63.
- <sup>474</sup>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64.
- <sup>475</sup> 付宗国.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探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02):122-124.
- <sup>476</sup> Crosby 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working wome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sup>477</sup> 郭星华.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M].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1: 202.
- <sup>478</sup>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9.
- <sup>479</sup>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5.
- <sup>480</sup>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98.
- <sup>481</sup> 董天美,张友国.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恐怖主义发生机制研究——以中亚国家为案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34(05):100-109.
- <sup>482</sup>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82.
- <sup>483</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冯克利译,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4.
- <sup>484</sup> 刘勇.利益差异数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1):150-155.
- <sup>485</sup> 许鑫.十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进路、视角和框架[J].当代传播,2016(05):35-39.
- <sup>486</sup> 姜金贵,张鹏飞,付棣,宋艳.群体性突发事件诱发因素及发生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J].情报杂志,2015,34(01):150-155.
- <sup>487</sup> Quarantelli,E.L.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Panic. Am.J.Sociol. No.3, 1954.
- <sup>488</sup> 黄磊.公共治理视角下群体恐慌问题实证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 2015(7).
- <sup>489</sup>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82-83.
- <sup>490</sup> 赵云泽、薛婷予.危机事件中恐慌情绪传播及群体认知研究[J].当代传播, 2021(2).
- <sup>491</sup> 陈业华、张晓倩.网络突发群体事件网民群体情绪传播模型及仿真研究[J],情报科学.2018(36).
- <sup>492</sup> Kermack W. O.McKendrick A. G.. 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Epidemic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No.A115,1927.
- <sup>493</sup> 陈卫明、周豪洁等, 基于传染病模型的恐慌情绪研究[J].系统科学与数学, 2019(4).
- <sup>494</sup> Hill Alison L, etal. *Emotions as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 large social network: the SISa model*. Proceedings. Biological sciences. No.277,2010.
- <sup>495</sup> Libi Fu et al. Simulation of emotional contagion using modified SIR model: A cellular automaton approach.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No.405,2014.
- <sup>496</sup> Ajay Kumar etal. SMIR model for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No.540,2020.
- <sup>497</sup> 陈福集, 陈婷.基于 SEIRS 传播模型的网络舆情衍生效应研究[J].情报杂志, 2014(36).
- <sup>498</sup> 丁学君.基于 SCIR 的微博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5(51).
- <sup>499</sup> 万立军、郭爽、侯日冉.基于 SIRS 模型的微博社区情传播与预警研究[J].情报科学, 2021(39).
- <sup>500</sup> 黄旦.手拉手还是心连心:什么是交流? [J].读书,2004(12).
- <sup>501</sup>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 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 上海译文出版

- 社,2017:83.
- <sup>502</sup> 彭善民、张起帆.疫后社会心态治理：参与、疏导与引领[J].学习与实践，2020(4).
- <sup>503</sup> [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69.
- <sup>504</sup> 谢清果、王婕.《庄子》对“交流失败”的求解——从与彼得斯《对空言说》比较的视角[J].新闻爱好者，2020(6).
- <sup>505</sup> 黄旦.手拉手还是心连心:什么是交流？[J].读书，2004(12).
- <sup>506</sup> 同上。
- <sup>507</sup> 常江、何仁亿：约翰·杜伦·彼得斯：传播研究应当超越经验——传播学的技术史视角与人文思想传统[J].新闻界，2018(6).
- <sup>508</sup>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4.
- <sup>509</sup>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383.
- <sup>510</sup> 殷晓蓉.“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 <sup>511</sup> 王江蓬、李潇凝.建设性新闻视域下的公众情绪治理——以重大突发事件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编辑.2021(10).
- <sup>512</sup>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 年.
- <sup>513</sup> 杨嵘均、操远芫.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间的张力及其消解[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
- <sup>514</sup> 何高奇、边晓晖、孙菲、卢兴见.基于传染病机制的突发事件下群体情绪感染模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4).
- <sup>515</sup> 周国韬、邓胜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信息感知与保护性行动决策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
- <sup>516</sup> 曹林.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J].记者观察，2018(22).
- <sup>517</sup> 解庆锋.媒介使用、恐慌感对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策展新闻的影响[J].国际新闻界.2021(43).
- <sup>518</sup> 于赓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M].北京：中华书局.2020:106.
- <sup>519</sup> 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sup>520</sup> 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校释[M].南京中医学院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668-672.
- <sup>521</sup> Comfort, Louise, William Waugh and Beverly Cigler.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ergence, Evolution, Expans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72, 2012, no. 4.
- <sup>522</sup> Comfort, Louise. *Shared Risk: Complex System in Seismic Response*. New York, NY: Pergamon Press, 1999.
- <sup>523</sup> Giddens, Anthony.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Trans. Tian He. Nanjing: Yilin Press, 2000.
- <sup>524</sup> Gurr, Ted.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sup>525</sup> Haibo, Zhang. “What Has China Learnt from Disasters? Evolution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fter SARS, Southern Snowstorm, and Wenchuan Earthqua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vol. 14, 2012, no. 3.
- <sup>526</sup> 赵思栋、岳泉、雷晶、袁勤俭.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J].现代情报，2020(6).
- <sup>527</sup> 丁波、王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研究——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J].西北人口.2015(4).
- <sup>528</sup> 杨金键.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研究——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J].行政论坛.2011(1).
- <sup>529</sup> D Sh Tsyrendorzhieva and K A Bagaeva. State-Religio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Rational

- Choice Theory: the Case of Russia.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 272, 2019,3.
- <sup>530</sup> Logan and Bright and Grau. “UNFRIEND ME, PLEASE!”: SOCIAL MEDIA FATIGUE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6, 2018,4.
- <sup>531</sup> Zhao Jihong et 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pplied to an Explanation of Juvenile Offender Decision Making in the Chinese Set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20.
- <sup>532</sup> 黄璜.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J].治理研究.2020(3).
- <sup>533</sup> 沈费伟、诸靖文.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创新路径[J].政治学研究.2021(1).
- <sup>534</sup> 杨金键.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研究——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J].行政论坛.2011(1).
- <sup>535</sup> 刘良训.政府、媒体、公众间的危机心理契约及其三角互动关系构建[J].领导科学.2017(2).
- <sup>536</sup> 谢舜、周鸿.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J].思想战线.2005(2).
- <sup>537</sup> 梁华.整体性精准治理的数字政府建设:发展趋势、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J].贵州社会科学.2021(8).
- <sup>538</sup> 文洁贤、张建华.大数据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思维范式转换及其路径创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sup>539</sup> 温志强、李永俊.大数据环境下社会冲突的风险感知与预警[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5).
- <sup>540</sup> 何志武、陈呈.公共决策视域下的网络民意分析:主体性、科学性与倾向性[J].电子政务.2020(2).
- <sup>541</sup>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M].顾忠华、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sup>542</sup> 刘晓娟、王晨琳.基于政务微博的信息公开与舆情演化研究——以新冠肺炎病例信息为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2).
- <sup>543</sup> 李月琳、王姗姗.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发布特征分析[J].图书与情报.2020(1).
- <sup>544</sup> 杜专家、王爱丽.论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以社会治理智能化提升为视角[J].学习与探索.2020(9).
- <sup>545</sup> 雷承锋.法治视角的网络社会治理探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2).
- <sup>546</sup> 蒋明敏.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泛政治化风险: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J].青海社会科学.2021(6).
- <sup>547</sup> Artem A Kosorukov. *Digital Government Mode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Legal, Ethic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vol.20, 2017, 3.
- <sup>548</sup> 吴磊.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创新——以广东数字政府建设为例[J].学术研究.2020(11).

## 附 1 访谈提纲表

<b>基本情况</b>	年龄、性别、学历、地区、职业、籍贯、家庭结构、个人兴趣爱好等。
<b>疫情期间的情绪反应</b>	武汉“封城”后，您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您是否担心、害怕、恐惧、恐慌？ 疫情期间，您主要担心什么？自己的身体？家人？工作？
<b>接触媒体情况</b>	您主要接触的媒介渠道是哪些？为何选择这些渠道？ 您特别想看到关于疫情的哪些信息？ 您每天看疫情信息的频率？时长？
<b>情绪反应</b>	当您看到哪些信息时会紧张、焦虑、恐慌？ 如果长时间看疫情信息，您是否会更加紧张、焦虑、恐慌？ 您是如何缓解紧张、焦虑等情绪？
<b>情绪感知</b>	您有无感觉自己已经产生不的情绪反应 如果您长时间看疫情信息，有无生理反应？如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腿抖、心慌、口舌干燥等？
<b>集合行为</b>	您有无比往常增加网购、采购物品等行为？ 您有无抢购行为？ 您有无在微信群、微博或贴吧之类的平台发表疫情言论？ 网络讨论有无增加或缓解您的焦虑、恐慌等情绪？
<b>日常生活影响</b>	疫情是否增加您的日常生活难度？举例说明。 您如何降低生活难度？ 您的经济收入有无影响？如何弥补？ 您最担心的事是什么？健康？经济？
<b>群体情绪</b>	疫情期间，您如何与家人、朋友、同事信息互动或交流？对于缓解您的疫情焦虑是否有用？ 您有多少微信群？有无在群里交流疫情信息？ 您感觉群聊方式对于焦虑、恐慌情绪有何作用？
<b>风险感知</b>	您最担心这个新冠病毒的危害是什么？ 您对这个新冠病毒的了解多少？ 您知道的防范措施有哪些？ 您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原理吗？
<b>疫情反复后的心理变化</b>	疫情反复时，您是否担心、焦虑、恐慌？ 您是否积极接种疫苗？ 您对疫苗的信任度如何？
<b>疫情后的变化</b>	您觉得此次疫情后，您的疾病健康方面有无增长知识？ 您是否有意识地增加了体能锻炼？
<b>对政府抗疫行动的评价</b>	您对政府抗疫行动的评价如何？ 您如何看待中外抗疫行动的区别？

附 2 访谈对象信息表

编号	年龄	性别	地区	职业	学历	编码
1	20	女	广东	学生	本科	F-01-01-CBY
2	21	女	湖北	学生	本科	F-02-00-CYLY
3	40	女	贵阳	教师	硕士	F-03-81-ZYY
4	52	女	贵阳	医院行政人员	本科	F-04-70-LX
5	49	女	贵阳	医务人员	大专	F-05-73-LXY
6	46	女	贵阳	教师	硕士	F-06-76-HJH
7	39	女	贵阳	教师	硕士	F-07-83-CLC
8	35	男	贵阳	公务员	硕士	M-08-87-SX
9	22	男	广州	学生	本科	M-09-00-GSY
10	29	女	广东	医院行政人员	硕士	F-10-93-WYY
11	27	女	广州	媒体工作者	硕士	F-11-95-CLF
12	43	男	广州	教师	博士	M-12-79-JX
13	32	女	广东	公务员	硕士	F-13-90-ZYL